

FLC

外国语言与文化

Foreign Languages and Cultures

季刊

| 第7卷 第1期 | (总第23期) | 2023年3月 |

外国语言与文化

Foreign Languages and Cultures

| 第7卷 第1期 | (总第23期) | 2023年3月 |

主 编: 蒋洪新 Editor-in-Chief: Hongxin Jiang
副 主 编: 邓颖玲 Associate Editor-in-Chief: Yingling Deng
执行主编: 曾艳钰 Executive Editor-in-Chief: Yanyu Zeng
编辑部主任: 任海燕 Managing Editor: Haiyan Ren

编 委

(以姓氏拼音为序)

陈众议 湖南师范大学
黄国文 华南农业大学
黄友义 中国翻译协会
黄忠廉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金 莉 北京外国语大学
李德凤 澳门大学
陆建德 中国社会科学院
聂珍钊 浙江大学
申 丹 北京大学
束定芳 上海外国语大学
王宏志 香港中文大学
王克非 北京外国语大学
王 宁 上海交通大学
王守仁 南京大学
许 钧 浙江大学
杨金才 南京大学
张隆溪 香港城市大学

Editorial Board

Zhongyi Chen, Hunan Normal University
Guowen Huang, South China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Youyi Huang, Translators Association of China
Zhonglian Huang, Guangdong University of Foreign Studies
Li Jin, Beijing Foreign Studies University
Defeng Li, University of Macau
Jiande Lu,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Zhenzhao Nie, Zhejiang University
Dan Shen, Peking University
Dingfang Shu, Shanghai International Studies University
Hongzhi Wang,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Kefei Wang, Beijing Foreign Studies University
Ning Wang, 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
Shouren Wang, Nanjing University
Jun Xu, Zhejiang University
Jincai Yang, Nanjing University
Zhang Longxi, City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主 管: 湖南省教育厅 出版发行: 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 海外总发行: 中国国际图书贸易集团有限公司
主 办: 湖南师范大学 国际标准连续出版物号: ISSN 2096-4366 海外发行代号: QR9393
编 辑: 《外国语言与文化》编辑部 国内统一连续出版物号: CN 43-1536/H 国内发行: 湖南省邮政报刊发行局
邮 箱: jflc@hunnu.edu.cn 印 刷: 湖南雅嘉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国内发行代号: 42-380
地 址: 湖南长沙岳麓区麓山路 36 号 出版日期: 2023 年 3 月 28 日 整体设计: 周基东
电 话: 0731-88873041 定 价: 28.00 元 排版制作: 书亦有道

本刊已被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学术期刊数据库、中国知网及其系列数据库 (CNKI) 收录, 不得以任何形式收取版面费

期刊基本参数: CN43-1536/H*2023*q*16*160*zh*P*¥28.00*1500*14*2023-03

目次

赵一凡《中国与美国》专栏

- 001 英国现代化奇迹 赵一凡

"译(学)之道"专栏

- 012 全译转化观 余承法 段园园
022 全译方法之分合论——以汉语政治文献英译为例 郭薇 徐雨纯

文学文化研究

- 032 在普鲁士传统与拿破仑道路之间——论克萊斯特《洪堡亲王》与普鲁士军事改革 史敏岳 曾悦
045 《仙后》中的历史书写与英格兰民族身份建构 郭龙 吴玲英
057 隔离与清洁:《迪尔布鲁克》与维多利亚早期共同体的医学重塑 刘芳
068 论《看得见风景的房间》中的环形结构 陈逸华

精准国际传播专栏

- 078 中国形象国际传播研究的现状与趋势 马华 熊超 李京泽
091 数字人文视域下中国科幻作品的对外传播研究:以《流浪地球》为例 代建华 徐敏赞 曾道建

语言学研究

- 102 基于学习者学业情绪的在线英语教学评价研究 王文菁 徐启豪
117 论俄罗斯宗教哲学的语言本体论特征 姜宏 王云婷
127 基于语料库的“V+down”构式搭配分析及语义映射 刘国兵 张莫晗

外语基础教育

- 137 高中英语学科大观念的概念辨析及建构路径 张智义 刘斌河

书评

- 148 开拓与创新:寻中西文论同筑之鉴,探世界文心共通之缘——评蒋洪新教授新作《T.S.艾略特文学思想研究》 张龙海

Contents

- 001 **Zhao Yifan** The Miracle of British Modernization
- 012 **Chengfa Yu, Yuanyuan Duan** On Transformation in Complete Translation
- 022 **Wei Guo, Yuchun Xu** Division and Combination in Complete Translation: A Case Study of the English Translation of Chinese Political Documents
- 032 **Minyue Shi, Yue Zeng** Between the Prussian Tradition and the Napoleonic Way: On Kleist's *The Prince of Homburg* and Prussian Military Reform
- 045 **Long Guo, Lingying Wu** Historical Writing in *The Faerie Queene*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English National Identity
- 057 **Fang Liu** Quarantine and Cleaning: *Deerbrook* and the Medical Reconstruction of Community in the Early Victorian Age
- 068 **Yihua Chen** On Circular Structures in *A Room with a View*
- 078 **Hua Ma, Chao Xiong, Jingze Li** Current Situation and Trend of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Research on China's Image
- 091 **Jianhua Dai, Minyun Xu, Daojian Zeng** A Study on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of Chinese Science Fiction Work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Digital Humanities: A Case Study of *The Wandering Earth*
- 102 **Wenjing Wang, Qihao Xu** Research on Online English Teaching Evaluation Based on Learners' Academic Emotion
- 117 **Hong Jiang, Yunting Wang** Characteristics of Language Ontology in Russian Philosophy of Religion
- 127 **GuoBing Liu, Mohan Zhang** A Collostructional Analysis of "V+down" Construction and Its Semantic Mapping: A Corpus-Based Approach
- 137 **Zhiyi Zhang, Binhe Liu** The Conceptual Distinction and Route Construction of the Disciplinary Big Concept for Senior High School English Course
- 148 **Longhai Zhang** Pioneering and Innovating: Seeking Lessons from the Co-Construction of Chinese and Western Literary Theories, and Proving the Commonness of the World's Literary Minds: A Review on *Research on T. S. Eliot's Literary Thought* by Hongxin Jiang

FLC

赵一凡《中国与美国》专栏

编者按：继 2020 年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之后，党的二十大报告又提出了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战略任务。中国的现代化历程，无疑是世界史上的大事件，但它仍须我们的讲述和解读。为此，编辑部邀请中国社会科学院外文所赵一凡研究员赐稿，解说中国现代化的故事。自 2018 年起，赵老师开始撰写《中国与美国》，前后已有两稿。全书分八章，合计 30 万字，每章分成 5 讲，目标是以课堂讲稿的形式，写一本国民普及教材。4 年来，赵老师已在解放军南京国关的公众号《美国学与美国研究》上，陆续发表了第一章到第六章的 30 讲修订稿。剩下的七八两章，合计 10 讲，其中本期刊文为第七章第一讲，其余各讲也将在本刊接续发表，敬请关注。

英国现代化奇迹

◎ 赵一凡

内容提要：英国爆发第一次工业革命，率先建立现代国家，随之成为统治世界的日不落帝国。这一切都是怎样发生的？敬请关注。

关键词：工业革命 西方现代化

中图分类号：I5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4366 (2023) 01-0001-011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北京 100732

DOI: 10.19967/j.cnki.flc.2023.01.001

Title: The Miracle of British Modernization

Abstract: British saw the first Industrial Revolution, set up the first Modern State, and thus became the British Empire on what the sun never set. How could all these happened on that little Island? Please read and think.

Keywords: Industrial Revolution, Modernization in the West

Author: Zhao Yifan, Research Fellow, Institute of Foreign Literatures,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Beijing, China.

导读：中国的现代化故事

读书向导：霍布斯鲍姆、沃勒斯坦

作者按：1995年夏，我回哈佛看老师。丹向我推荐《民族主义：走向现代的五条道路》。此书作者莉亚(Liah Greenfeld)，原为苏联犹太儿童。她随父母移居以色列，成了社会学博士。丹说莉亚1982年赴美进修，你也刚入哈佛。如今她成功比较了英美德法俄五大国的现代化，就差中国了。Boy，你对此有何打算？

面对激将法，我傲然回答：首先，中国现代化与五大国皆不同。再者，中国今后也会继续不同。丹大喜。

本书第七章，名曰《中国的现代化故事》。其中包含2个心愿：一是要完成我对老师许下的诺言，开讲中国现代化；二是要拿中国与英美两强作比较，说说何谓“中国式现代化”。

讲述中国现代化，首先要搞清楚英美两强在西方现代化进程中，是如何捷足先登的。这方面，我看重英美学界的权威性研究，据此圈定了2位左派大家，即英国的霍布斯鲍姆(Eric Hobsbawm)，美国的沃勒斯坦(Immanuel M. Wallerstein)。

借助霍老师的《工业与帝国》，我在第一讲讨论英国现代化基本特征；第二讲则援引沃老师的《现代世界体系》，揭示美国现代化的一系列创新与灾变。为何没有中国向导呢？

这是因为1840年以降，欧美国国家欺压中国，造成一段百年屈辱史。所谓中国现代化，也处于仓促应变的被动局面。哈佛教授费正清(John K. Fairbank)，将此格局定义为“西方冲击/中国反应”。此说在欧美学界影响之大，竟导致中国现代化叙事的长期分裂，难以愈合。

中国现代化：由被动到主动 我在第七章遭遇的大难题，即相对于五大国，中国现代化为何如此缓慢、不情愿？费正清《美国与中国》，陈述冲击/反应模式如下：

自17世纪起，明清帝国满足于“悠久文化、传统体制、与生俱来的优越感，一再错过走向世界的机会”。老费又说“中国人的思想变得衰老、迟钝，乃至僵死。西方却以震撼世界的技术发明，完成了自身现代化”。中国只能借助外部力量，蹒跚而行。^[1]

1968年，老费的弟子柯文(Paul A. Cohen)，率领新左派学生造反，进而发表《在中国发现历史》。在柯文看来，老费的冲击/反应论，列文森的传统/现代论，及其帝国主义/革命论，都暴露出欧美汉学的偏激意识，即迷信西方中心，强调二元对立。

柯文称以上三大模式，彰显欧美汉学对中国现代化的严重扭曲：它们忽略中国传统与现代之间的历史连续性，漠视中国现代化的自主性、内生性。他强调“应从中国内部、而非西方人的外部视角，来判定中国现代史上一系列现象的重要含义”。^[2]

拦腰一刀，各取一半 柯文造反有理。但他的中国中心论，相比老费冲击/反应论，大约晚了40年。这凸现老费及其弟子的代沟。就连双方的研究对象，中国自身，也在这40年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巨变。窃以为，这是巨大分歧的根源。

赵按：老费一度误判大局，可他切中19世纪的中国时弊，即历史包袱重，改革风险大。而以中国的庞大规模、古老传统、循环惯性，这条臃肿巨舰不经过百年屈辱，也是很难掉转船头的。与老费不同，柯文这一代汉学家，伴随新中国长大。他们目睹中国脱胎换骨，并在朝鲜、越南战场上，2次挫败强敌。鉴于这一划时代巨变，我有意将费科二人各打五十板，以便提出自己的新看法。

中国现代化：前后分期 简单说，老费冲击/反应论，大致适用于1840—1940年。我将它定义为中国现代化的“被动期”，或曰“近代化阶段”。柯文提出的中国中心论，则可覆盖1940后的中共主导期，又称“自主现代化”。为何是1940年？

窃以为1940年，毛泽东开始在中共党内稳定发挥领导作用。其重要标识，是他在延安发表《新民主主义论》。同年，八路军发起百团大战，中国抗战也进入了最艰苦的相持阶段。

赵按：老费晚年，修正己见。他说中国人民“依据他们承袭下来的境况、制度与价值观，以自己的方式来对待现代化。在此基础上，中国革命已在一种新的中国文化综合体中，交织了中外因素。但千万不要下结论说，他们变得像我们了”。^[3]

说起英国现代化，英国人当仁不让。哪怕是在西方文明起源、民族国家形成、资本主义发生学方面，英国也是挖掘最深、涉猎最广的执牛耳者。上述优势，彰显英国左翼史学传统：它自带火种，历久弥新。这一传统的代表人物，正是左派史学元老、英国科学院院士霍布斯鲍姆。

马克思的英国遗产

霍布斯鲍姆1917年生于埃及：老爸是俄国犹太人，妈妈来自奥地利中产家庭。2岁时，他随家迁往维也纳。不料父母双亡，小霍和妹妹成了孤儿，便由叔父带去柏林，挣扎求生。饥寒交迫的他，从小就和工人为伍，面对纳粹褐衫队、党卫军，这个14岁娃娃，竟在中学参加了德共！他说从此“我成了一个终身的共产党员。而我那一代人，是把十月革命当作世界的希望”。^[4]

1933年希特勒上台，小霍逃去英国，读完高中，考入剑桥历史系。1940年他投笔从戎，直至1946年退伍。于是重返剑桥，拿下博士学位。1947年他当上历史系讲师。此时有大批退伍老兵，英共党员，在伦敦组建“英共史学家小组”，小霍积极参与。

马恩：英国文化批判 1848年马克思流亡伦敦，即以英国政治经济为对象，辛苦写出《资本论》。他在伦敦生活大半辈子，却一直厌恶英国。他认为“英国资产阶级有一种伪君子风格”，并留下一句英国国骂：Drat the British（该死的不列颠人）。^[5]

据恩格斯分析：德国人唯心，故能弘扬普世理想。法国人唯物，所以强调国家利益。英国人一味崇拜私有财产，“这导致冷酷的处事准则、虚伪的政治文化。英国也因此成了世界的统治者”。^[6]

马恩给英国留下宝贵遗产。小霍入剑桥，发现左翼师生人头攒动，人数上千。于是他加入英共，当选学生党支部委员。他回忆当年思想变化，称希特勒上台前，牛桥师生目睹经济危机、工人失业，开始集体向左转。1933年后，他们抱团对抗法西斯。^[7]

英共史学家小组 小组成员多来自牛桥两校，其中有希尔顿（Rodney Hilton）、汤普森（E. P. Thompson）、威廉斯（Remond Williams）和希尔（Christopher Hill）。作为“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孵化器”，小组设置一个十年研讨班。大家定期聚会，补习马克思主义史学方法。老霍说，“我们都有十年研讨班的印记”。^[8]

重写英国历史 两次世界大战，让英国左派明白，资本主义恶贯满盈。小组主席希尔顿称：我们开启左翼书写，目标是“将英国人民的真正历史，归还给人民”。1946年多布（Maurice Herbert Dobb）写出《资本主义发展研究》；1955年希尔出版《1640年英国革命》；1963年汤普森推出《英国工人阶级形成》。另有一位加拿大青年麦克弗森（Crawford B. Macpherson），1932年赴伦敦政治经济学院读博。小麦并未参加史学小组，可他深受感召。1962年，他发表《占有性个人主义的政治理论：从霍布斯到洛克》。

赵按：第五章4讲讨论《英美占有性文明》。这方面，老麦的突出贡献，是解剖英国新教伦理，指其塑造现代社会，扭转人类发展方向。其中要害，是将人定义为私人财产的占有者，又将人生目标，设定为最大限度地攫取财富。而英国政治学鼻祖，霍布斯与洛克，正是导致病变的理论代表。^[9]

老霍一生无悔

小麦不善交往，小霍却是剑桥红人，长期维持一个国际朋友圈。在他看来，剑桥左派尽是些寄宿学校毕业的贵族公子，伦敦政经学院，才是他理想中的平民大学。麦卡锡反共高压下，小霍生活窘困，可他不改初衷。1954年他随团访苏，不料随后的匈牙利事变，赫鲁晓夫秘密报告，引发轩然大波。小霍身为小组主席，目睹团体分裂，战友退党。^[10]

小霍始终不退党。这个军情五处的长期监控对象，竟在此后30年里，一连写出30多本著作，包括他著名的年代四部曲：《革命的年代：1789—1848》、《资本的年代：1848—1875》、《帝国的年代：1875—1914》、《极端的年代：1914—1991》。

老霍晚年得意 1982年老霍退休，荣升伯克贝克学院院长。继而获奖不断，享誉欧美，

成了英国国宝。美国左派大家萨义德，称老霍“代表二战后史学写作的高峰”。英国新左派安德森（Perry Anderson）表示，老霍“始终面向普罗大众，他有理性现实感，也有感性同情心”。年轻学者朱特（Tony Judt）甚至扬言：英国学界存在“霍布斯鲍姆一代”！^[11]

剑桥教授埃文斯（Richard J. Evans），2012年发表《历史中的人生：霍布斯鲍姆传》，评判如下：

1. 小霍在剑桥，受惠于导师波斯坦（Mounia Postan）。波老师是经济史教授，精通多种语言文化，熟知法国年鉴学派。小霍因此思路宽泛，擅长比较，充分展示马克思主义影响力。

2. 老霍环游世界，与各国左派名人交往，还当过切·格瓦拉的翻译。他在《民族与民族主义》中，痛陈民族主义危害，批评斯大林的偏见。其研究重点也从19世纪扩展开去，深入浅出。

3. 身为共产党人，老霍目睹资本主义兴衰，又切身体验了国际共运的潮涨潮落。1956年后，欧洲左派大批退党。老霍选择留在党内，但远离斯大林主义，推崇欧洲共产主义。其目的是将政治文化研究，融于经济社会，以摆脱史学专业的狭隘性。^[12]

2012年10月1日，老霍在伦敦辞世，享年95岁。下面我拟介绍《工业与帝国》，因为它是讲述英国现代化的传世经典。

英国现代化的前奏

英国现代化起于何时？资本主义何以在英国最先成功？围绕此题，马克思、恩格斯、韦伯，都有经典论述。

马克思：土地兼并 马克思指中世纪英国农户，集体劳作，共享财产，属于自然经济。英法战争爆发后，黑死病横行，消灭三成人口，致使农奴逃亡，货币地租代替了实物地租。领主无奈，也允许农民以现金换取土地租用权（Tenure）。至16世纪，英国地主和商人大举圈地，令大批自耕农沦为流民，雇工与资本家随之出现。马克思指这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只有在英国，才具有典型的形式”。

恩格斯：英国普通法 恩格斯称欧洲国家中，唯有英国人采用日耳曼法。原来罗马陷落后，蛮族法与罗马法混用。宗教改革敦促欧洲各国，编制等级森严的拉丁文法典，统称民法（Civil Law）。不料11世纪后，英国独家推行普通法（Common Law），即参照蛮族习惯，归纳出适合本土的法律条款，特征是援引旧案，倾向平民。^[13]

韦伯：新教伦理 韦伯也以16世纪为转折点，可他更关注宗教，而非经济。他相信英国现代化的关键，在于原始氏族解体，取而代之的是独立农户。15世纪末，英国农户也开始解体。韦伯发现，新教伦理鼓励个人信仰，破除家长权威，激发一种“将财产从传统伦理中解脱出来的心理效应，其中心表征是欲壑难填”。结果“新教哺育了近代经济人，英国从此迥异于其他文明”。^[14]

霍布斯鲍姆1968年发表《工业与帝国》第一版。此书直奔主题，集中剖析18世纪英国

的工业革命。至于革命前的5个世纪，则被他轻轻一笔带过，当成了工业革命的前奏，或是英国现代化准备阶段。

赵按：同理，中国也有一个长达百年的预热期。

英国现代化诸条件 老霍考察现代化，并非泛泛而论，而是着眼于工业化奇迹，及其发育条件。先看自然环境：英国与欧陆隔海相望，若即若离。24万平方公里国土，相当于中国广西。18世纪英国人口4000万，仅为大清朝的十分之一。老霍指1750年前，英国与欧陆国家相差无几，但在国家法律、土地制度、工商环境、雇佣劳动等方面，它已具备了转型条件，即从农耕国家，迈入工商社会。^[15]

两场革命，君主立宪 1566年尼德兰革命爆发，马克思称之为第一场资产阶级革命。英国清教徒受鼓舞，开始对抗国王。1640年苏格兰起义，查理一世急需军费，议会坚决抵制，并处死国王宠臣。国王发动内战，战败被俘，上了断头台，史称清教徒革命。

英国革命要比法国大革命早了140年。可它优柔寡断，形同钝刀子割肉。查理二世死后，其弟登基，恶习不改。英国议会遂于1688年发动政变，宣布废除国王，恭迎其女回国执政，美其名曰君主立宪。说白了，就是议会当家主事，君主统而不治。

英式保守主义 这场资产阶级革命，又称光荣革命。老霍说它近乎完美，但风险极大：万一局面失控，就会像法国那样血流漂杵。所幸英国上层油滑，包容双方利益，即一面巩固清教意识形态统治，一面又利益均沾，建立起一套缓冲制度。

老霍称这种英式保守主义，并不对抗改革，反而“静悄悄地快速吸收新事物、新观念”。由于珍惜财产、惧怕动乱，英国权贵擅长谈判妥协，刻意规避冲突，由此产生一批“平庸改革者”：他们修修补补，小步快跑，偷着发大财，其乐无穷。^[16]

赵按：英国人小步快跑，似可少犯颠覆性错误。对照中国戊戌变法：光绪帝幼稚冲动，保守派冥顽不化。

伏尔泰看英国 1726年伏尔泰被驱逐出境。他身无分文，逃去伦敦，住在土豪家里，读洛克《政府论》。此时正值工业革命前夜。伏尔泰目睹英国城乡欣欣向荣，自愧法国不如。他拜会诗人蒲柏，小说家斯威夫特，科学家牛顿，继而大发感慨：英国政府腐败，却能减免税赋，鼓励工商，改善民众生活。

再说了，鄙人不过写诗一首，影射王室，就被投入巴士底狱！英国作家却在政府挂职、领取养老金。回巴黎后，伏尔泰发表《英国书简》。此书被查禁，作者逃去乡下。法国文坛为之骚动。孟德斯鸠、卢梭、爱尔维修，纷纷跑去英国，考察君主立宪。^[17]

英国政权，偷梁换柱 英国从传统农耕转向工商社会，离不开一个灵活多变的新政权。具体分析如下。

1. 光荣革命后，英国出现一个“土地贵族的寡头政权”。掌权者是大地主、工商巨头。他们彼此联姻，利益交换。其中的显赫家族有罗素、威廉斯、卡文迪什。他们在议会呼风唤雨。老霍坦言：“英国的政治权利，取决于土地财产所有权。”

2. 法国宫廷中，国王专制，贵族荒淫。反观英国的达官显贵：清教暴发户盘踞下院，上院也被资产阶级化的老贵族所霸占。土地使用权的高度集中，令地主与企业家结为一体。英国法律也鼓励社会财富，大量投向工业生产、海外贸易。

3. 英国人口迅速增长，乡镇企业遍地开花。这既增加了利润与税收，也促进交通物流的发达，形成以伦敦为中心的统一市场。社会相对自由，民众忙着挣钱，革命愿望也就逐渐消解了。

4. 老霍称英国人是旧瓶装新酒的高手。他们编造各种伪传统、伪习俗，以便让一个资本统治的国家，维持封建正统性。

简单说，1750年的英国，家境殷实，发财心切，活脱脱一个“店小二民族”。即便在英国农村，也“不存在欧洲大陆意义上的小农阶层。人们都在为了市场销售而努力生产”。^[18]

从店小二，到全球霸主

欧美现代化牛皮哄哄，内容冗杂。各路专家从民族国家、民选政府、依法治国，一直讲到工商经济、科技发明、多元社会。老霍身为史学家，深知现代史难写。于是他放飞无人机，好让读者从高处俯瞰，英国工业革命是如何催生一个现代国家的？

首先是工业革命造就了旷世奇迹，其次是它让英国变成“世上唯一的工厂、唯一进出口大国、唯一全球帝国，因此也是世界唯一的海军强权，唯一拥有世界政策的国家。这种垄断地位，多半得益于它的先驱身份：既然没对手，英国便是开天辟地的主人”。

我们已知英国国土狭小，人口有限。它之所以一骑绝尘，确立现代国家框架，是因为它带头完成了工业革命，并将英国推向全球霸主地位。如此成就，竟无任何国家，可以望其项背！

工业革命，来自何方 世人都说工业革命始于瓦特。其实瓦特之前，已有好几种蒸汽机。作为原动力机械，它们能将热能转换成动能。老霍暗示，科技发明只是工具，关键要看怎么用。英国人眼中的蒸汽机，更像是赌场上的骰子，能赚大钱！

早年英国煤矿，井下冒水严重。矿主不惜下血本，试以火力提水、排水，以节省人工与畜力。伯明翰煤矿的技师瓦特，针对蒸汽机的缺陷，陆续改造了活塞、齿轮、连杆、节气阀，使之适应工业化生产。他的突破启发众人：老板们一哄而上，先将蒸汽机抬进了纺织厂，进而驱动了火车、轮船、升降机。

老霍提醒大家：彼时的科技水平低下，远不足以引领大工业。而工人捣毁机器，老板仇视发明，更是家常便饭。但不断涌现的土法创新、低技术发明，却让人们充满自信。为啥？因为它代表一种新生产体制、新生活节奏，新的历史阶段。

工业革命与海外市场 人们普遍以为，钢铁、煤炭、蒸汽机是工业革命的加速器。但工业革命的动能，更多来自市场的需求端、供给侧。既然店小二遍布全国，人人都想发财，就会造成工业产品积压，乃至降价血拼。面对窘境，政府咋办？

英国人历来重商，其重商传统源自北欧的海盗文化（Vikings Culture）。1588年，英国海

军击败西班牙无敌舰队，成了海洋霸主。工业革命降临，英国故技重施，“一则夺取他国出口市场，二是通过战争与殖民，摧毁敌对国家的竞争力”。而政府的关注重点，无非是：1. 国内市场；2. 对外出口；3. 政府扶持。^[19]

三大条件，独门利器 英国经济学之父斯密（Adam Smith），1776年发表《国富论》。他在革命大风口上，谆谆教导英国人：若想创造财富，一个国家“需要和平环境、公平税收、健全司法”。^[20]于是英国人开始展示其独门利器。

老霍挑剔斯密三大条件。他称“英国政府的一切政策，都是为了开辟国内外市场。而英国所有的战争，也都瞄准了商业盈利”。^[21]当时的世界体系，可谓一山不容二虎。英国因其弱小平庸，从未有过独霸世界的野心。但随着革命点火、加速、轰鸣向前，它开始挥舞刀剑，露出一个老海盗的凶狠嘴脸。

国家干预，垄断市场 试以英国棉纺织业为例。恩格斯一度踏勘曼彻斯特，写下《英国工人阶级状况》。老霍对此补充道：曼城在30年里扩大10倍，居民从1.7万增至18万。城里厂房林立，煤烟滚滚。而它主营的棉花加工，正是工业革命的命门！

世人皆知，英国人习惯穿兽皮，17世纪改用棉麻混纺的粗布。英国与荷兰的东印度公司，发现印度盛产棉花，便在当地织布，争抢欧洲市场。英国厂商气急败坏，一再向政府施压。1770年政府下令封杀棉花进口。从此，英国羊毛商垄断了国内市场。

英国商人随之出海，贩卖黑奴，并在西印度群岛设立棉花种植园，为本国提供原料。至1770年，英国棉织品产量爆增10多倍，其中九成销往远东和非洲。1790年后，美国南方的奴隶种植园，开始供应优质原棉。老霍对此哭笑不得：北美种植园成了兰开夏纺织厂的经济附庸，“最现代的生产中心，拓展了最原始的剥削形式”。^[22]

英国经济，放任自流？ 英国技术先进，无情碾压对手。但这种压倒性优势，既有英国海军的加持，也离不开殖民地的市场垄断。有人拍马屁，说英国经济是放任自流的典范。老霍反驳：唯有工业强国，才敢放任自流。经济学家“忽略政府因素”，闭口不谈帝国设计。其实英国现代化，“不仅依靠发达经济，它还需要一个愿意为了英国制造商的利益、不惜发动战争政府”。^[23]

老霍又指第一次工业革命，既无高精尖技术，也没有啥子顶层设计。店小二的逐利本能，指向“廉价与简单”。他们的利益诉求，直接影响议会。于是政府顺水推舟，沿用旧制度，应付新问题，同时管控风险，增加税赋，充盈国库。老霍承认，资本主义确能自我调节，可它更需要政府的呵护与调节，例如劳工法、福利法、济贫法。所以不可以偏概全，粉饰自由主义经济。^[24]

外部因素决定一切 老霍尖锐提问：店小二生意不大，风险自担。他们深知国内市场弱小，增长缓慢。究竟是何因素，激发其投资热情、强化其扩张欲望？是“庞大的外部需求”。老霍说，“唯有海外贸易，能给他们带来新原料、新市场、新的盈利空间”。

老霍下判断：“英国工业经济，是从我们与欠发达世界的商业交往中成长起来的。庞大的

国际贸易流、收支流、投资流、移民流，锻造了帝国的国际支配能力。回过头来看，海外贸易与殖民战争，才是英国经济腾飞的点火器。”^[25]

赵按：老霍的研究，师承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加拿大的麦克弗森教授，也在《占有性个人主义的政治理论》中，强烈呼应老霍。他指英国人的占有性欲望，“蕴含市场资本主义的全套表征”，从重商体制、海外殖民，炮舰政策，再到股份制、公司法、专利权、完善的财产保护。这套私有化制度，催生一群追求自身利润最大化的资产者。他们对于合股、投资，就像信奉上帝那样狂热。^[26]

大英帝国的挽歌

假如说土地兼并与新教伦理，为英国打下现代国家的基础。那么 1780 年后的英国，则仰仗“亦商亦战的海上力量”，开辟了至关重要的海外市场。18 世纪末，英国成为世界工厂。等到维多利亚女王登基，英国已从工业强国，升格为大英帝国。

老霍相信，工业革命无疑是人类史上的划时代事件。可它不只是生产方式的简单升级，而是“人类生活方式的根本性改变”。^[27]年轻人往往搞不懂，工业革命与英国称霸，二者是何关联？老霍揭示其中必然性，即工业革命改变了英国自身面貌，提升其世界地位。在此基础上，英国得以称霸百年，大幅改写国际地缘政治。

从暴力征服，到巧取豪夺 英国迅猛崛起，变成一个不同以往的新帝国。老霍说它包括了内外三层：1. 有形帝国，又称“日不落帝国”；2. 半有形帝国，或受其控制的海外殖民地；3. 无形帝国，即由庞大资本、先进技术支持的英国霸权。

新帝国新在何处？老霍盘点英国的军事、外交与法律，指其与旧帝国大相径庭。譬如早年英军入侵外国，杀人越货，暴虐成性。进入北美殖民地，他们讲究策略，小施恩惠。印度人闹独立，但凡非暴力，都算是合法。轮到苏格兰脱英，干脆全民公决了。^[28]

由此可见，新帝国由硬变软，软硬兼施。巧取豪夺之余，它也展示绅士风范。这方面英国不乏前车之鉴：西班牙疯狂掠夺，功亏一篑。荷兰人偏重商业，却被英国组合拳击败。何谓组合拳？麦克弗森说，英国人的占有性世界观，“塑造并渗透进一切社会关系”。英国人把它当成了绅士美德，美国人则把这种癖好，升级为一种自由民主的普世价值，这就是组合型的“硬实力-软实力-巧实力”。

新帝国与现代化 英国作为世界工厂，拉动全球经济。它“生产了约占世界总量三分之二的煤、一半的铁、七分之五的钢、一半的棉布、四成的金属器件”。基于它的国际垄断地位，英国顺理成章，也成为其他国家的领头羊+示范者+裁判长。

老霍反复强调，工业革命确立一种不可逆的现代化趋势，中国人谓“顺我者昌，逆我者亡”。其中关键，即工商经济全面取代了农耕传统，彻底革新了政治、法律与社会制度。罗马帝国能发动工业革命？波斯帝国会批准君主立宪？绝无可能。然而英国告别传统，开辟创新之路，发展出

一套新帝国统治术：它有坚船利炮，却不反对利益均沾。比较北欧海盗，这也算是一种人类进步。

帝国竞争，英国落败 大英帝国一度成了欧洲各国的典范。它们纷纷模仿其海外扩张模式，即从殖民地攫取原材料，又向全球销售产品。工业革命的动力，因而源源不绝。谁能想到，大英帝国亲身示范的结果，居然是强国林立，混战一场。

作为工业革命的第一拨研究生，德国、美国与日本迅速崛起，各领风骚。1880年英国陷入经济危机，焦头烂额，风光不再。老霍说它“只剩下一条出路，即走帝国争霸之路”。列强之间恶性竞争，你死我活，结果便有两次世界大战。

英国的最大麻烦，在于它迷恋传统，因循守旧。一战前后，它将长期积累的资本，大量投资海外，从此吃上了金融饭。玩金融的好处，是不劳而获、坐收红利。害处是创新乏力，不求进取。老霍笑称：成也工业革命，败也工业革命。全人类都没料到，第二次工业革命，竟将店小二扔下神坛，变作一个破落户。

美国何以成功？老霍说它靠的是第三次工业革命，即不再依赖钢铁、煤炭、蒸汽机，转而玩起了电气、石油与化工，包括自动化与原子弹。这就需要科学家、企业家与银行家通力合作，同时重视制度创新，诸如公司化、标准化、福特制与托拉斯。另外，美国在国内反垄断，厉行进步改革；在海外摒弃殖民陋习，鼓吹门户开放。这说明它在硬软实力方面，大大超越了英国。^[29]

工业革命的冷酷逻辑 老霍这一生，目睹了工业化锦标赛的全过程。第一次工业革命，造就了大英帝国。第二次工业革命，导致群雄并起，帝国混战，德国与日本误入歧途，惨遭灭国。最终登上领奖台的，竟是英国往日的小弟，美利坚合众国。从弱冠少年，到白发老翁，老霍反复琢磨，得出3个结论。

1. 无论什么国家，一旦从稳定的农业社会，进入工业革命轨道，它都必须遵循不断创新的工业革命逻辑，奋勇向前。若是停顿下来，坐吃山空，新的工业革命就会将其淘汰。一句话，“对于工业化国家，开弓没有回头箭，因为工业化将持续往前推进”。

2. 英国一时还死不了，但它只能走上一条漫长而痛苦的下坡路。凯恩斯的政府调节，撒切尔的市场化改革，都无法治愈“英国病”。老霍诊断说，“英国正在成为一个不竞争的寄生经济体，纯粹依靠过去的财富积累、依靠对手的进步过日子”。

3. 病根何在？在老霍看来，“资本家对利润的追逐与聚敛，主导了整个经济，甚至是全部生活”。而众多个人追逐私利的结果，不但能左右政府，而且驱使大英帝国，长期推行唯利是图的国策。所以说，帝国衰败的挽歌，深埋在英国文化的土壤中。^[30]

第七章第一讲修订版，2022年12月20日于合肥

注释 [Notes]

[1] 费正清：《美国与中国》，张理京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0，第132-34页；*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4th edition, Harvard UP, 1976. 费正清、邓嗣禹：《冲击与回应：从历史文献看近代中国》，陈少卿译。北京：民主与

- 建设出版社, 2019; *China's Response to the West, A Documentaty Survey, 1839-1923*. Harvard UP, 1979.
- [2] 柯文:《在中国发现历史》,林同奇译。北京:中华书局,2002,序言第1页,第42,76,135页; *Discovering History in China: American Historical Writing on the Recent Chinese Past*. Columbia UP, 1984.
- [3] 费正清:《伟大的中国革命》,张理京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0,第10-11页; *The Great Chinese Revolution*. Harvard UP, 1976; 霍布斯鲍姆:《工业与帝国》,梅俊杰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7; Eric Hobsbaum, *Industry and Empire: From 1750 to the Present Day*. 1st edition, 1968, revised edition. Penguin Books, 1999.
- [4] 霍布斯鲍姆:《趣味横生的20世纪》,周全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6,第72,97页; *Interesting Times*, Bruce Hunter and Christopher Wrigley, 2022.
- [5] 麦克莱伦:《马克思传》,王珍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第404,467页; David McLellan, *Karl Marx: A Biography*. Macmillan, 2006.
- [6] 柏拉威尔:《马克思与世界文学》,梅绍武译。北京:三联书店,1980,第233页; S. S. Prawer, *Karl Marx and World Literature*. Oxford UP, 1976; 马克思:《评卡莱尔》,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1),第301页; 恩格斯:《英国状况》,载同书第1卷,第664页。
- [7] 霍布斯鲍姆:《趣味横生的20世纪》,第133,175页。
- [8] 同上,第245-247页; 埃文斯:《历史中的人生:霍布斯鲍姆传》,韦斯琳译。北京:中信出版集团,2022; Richard A. Ewans, *Eric Hobsbaum: A Life in History*. Athabasca UP, 2020.
- [9] 麦克弗森:《占有性个人主义的政治理论》,张传玺译。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8,第35,55页; *The Political Theory of Possessive Individualism: Hobbes to Locke*. Oxford UP, 1964.
- [10] 霍布斯鲍姆:《趣味横生的20世纪》,第131,280-81页。
- [11] 同上,读者评语; 埃文斯:《历史中的人生:霍布斯鲍姆传》,第636页。
- [12] 埃文斯:《历史中的人生:霍布斯鲍姆传》,第三、四、七、八章。
- [13] Karl Marks, *Capital, Vol.1*, Lawrence and Wishart, 1996, pp. 616, 670, 676, 618; 麦克法兰:《英国个人主义的起源》,管可秣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8,第67-69页。
- [14] Max Weber, *The Protestant Ethic and the Spirit of Capitalism*. Translated by Talcott Parsons, Unwin University Books, 1930, pp. 52, 21, 53, 174; Talcott Parsons, editor, *The Theory of Social and Economic Organization*, by Max Weber, Free Press Paperback, 1964, pp. 263, 277; 麦克法兰:《英国个人主义的起源》,第74-76页。
- [15] 霍布斯鲍姆:《工业与帝国》,第16-18页。
- [16] 同上,导言第6-8页。
- [17] 参见伏尔泰《英国书简》法文版 *Lettres philosophiques sur les Anglais*. Paris, 1733, 英文版 *Letters Concerning the English Nation*. Oxford UP, 2009; 霍布斯鲍姆:《工业与帝国》,第17-18页。
- [18] 霍布斯鲍姆:《工业与帝国》,第17-23页。
- [19] 同上,导读第5页,第22,34页。
- [20] 斯密:《国富论》,唐日松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5,第216-18页; *The Wealth of Nations*. London: W. Strahan and T. Cadell, 1776.
- [21] 霍布斯鲍姆:《工业与帝国》,第53-55,65页。
- [22] 同上,导读第15页,第63页。
- [23] 同上,第18-20,43页。
- [24] 同上,导言第5页,第53-55页。
- [25] 同上,译序第20页。
- [26] 麦克弗森:《占有性个人主义的政治理论》,第50-55页。
- [27] 霍布斯鲍姆:《工业与帝国》,导言第3页,第80页。
- [28] 同上,导读第6-7页,第228,303,343页。
- [29] 同上,导读第12-13页,第100,200,205,230,265页。
- [30] 同上,导读第13-16页,第22,36,43,63页。

FLC

"译(学)之道"专栏

全译转化观

◎ 余承法 段园园

内容提要: 全译之轴是转化,转化之魂是“化”。“化”的内涵体现在它反映全译行为的本质属性,与文字学、哲学、美学中的“化”一脉通连、彼此呼应;“化”的外延指译者在处理形义矛盾时采取的对、增、减、移、换、分、合七种手段及其相应的方法和技巧。

关键词: 全译 转化 化 形义矛盾

中图分类号: H05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6-4366(2023)01-0012-10

基金项目: 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翻译理论发展史研究”(20&ZD312);2021年湖南省新文科研究与改革实践项目“‘四新’学科背景下翻译传播新兴专业建设探索与实践”(20219418YCF)

作者单位: 湖南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湖南 长沙 410081

DOI: 10.19967/j.cnki.flc.2023.01.002

Title: On Transformation in Complete Translation

Abstract: The axis of complete translation is transformation, whose quintessence is in sublimation. In terms of connotation, sublimation, as the intrinsic nature of complete translation, shares interrelated and mutually denotative meanings with the Chinese word “化” in philology, philosophy and aesthetics. In terms of denotation, sublimation refers to the translator’s various means of dealing with the contradiction between form and meaning in the source language and target language, including corresponding, adding, reducing, transferring, converting, dividing and combining as well as concrete methods and skills.

Keywords: complete translation, transformation, sublimation (化, *hua*), contradiction between form and meaning

Authors: Chengfa Yu, Professor, Foreign Studies College, Hunan Normal University, Changsha, Hunan, China; Yuanyuan Duan, Ph.D. Candidate, Foreign Studies College, Hunan Normal University, Changsha, Hunan, China.

全译是“人或/和机器通过对、增、减、移、换、分、合七大策略用乙符转化甲符文化信息以求信息量极似的智能活动和符际活动”(黄忠廉、袁湘生 108-18)。为讨论方便,本文将“符号”限定为语言文字符号,将甲乙两种符号及其文本分别简化为原语与译语、原作与译作。在钱锺书的“化境说”中,“化”作为名词,是文学翻译的最高理想和最高标准;“化”作为动词,指在两种语言文字的转变过程中,“既能不因语文习惯的差异而露出生硬牵强的痕迹,又能完全保存原作的风味”,此类译作才算入于“化境”(《七缀集》77)。钱氏明确提出两种求“化”方式——欧化和汉化,认为求“化”是为了避“讹”,实现原作对译作的“投胎转世”(77)。全译行为之轴是转化,转化之魂是“化”(余承法、黄忠廉 89-93)。该“化”源自文字学之“匕”,内涵于哲学之“化”的“量变”“渐变”,相当于美学之“化”的“物化”“化生”,即为钱氏挪移为译学之“化”的“去痕存味”。

一、转化:全译之轴

从全译的上述新定义可知,转化是全译之轴:转移原作语义,保留或更换其语形,化解语际的一义多形/言矛盾,追求译作与原作的信息量极似。

(一) 转移原作语义

转移原作语义,指将原作的信息内容移植到译语,保留或变换其语言形式,将原作化生为译语受众理解和习惯接受的译作。

任何作品都是语形和语义的有机统一体,某些文本或话语在特定场合还有语用。语形是外显形式,包括书面文字和口头话语,体现为语素、词、短语、小句、复句、句群和语篇等语言单位。语义是隐含在内的关系或内容,包括义素、词义、短语义、小句义、复句义、句群义和语篇义。语用指语形蕴含或体现的特定价值,包括修辞值、语境值和文化值。一般而言,全译的理解、转化和表达三个阶段都涉及语形、语义、语用,其中语形与语义的关系是主体,语形与语用的关系为次体(黄忠廉 187)。如果原作的语用不突出,或者视为零,语形、语义与语用之间的三角关系可简化为语形与语义的线段关系。为简化起见,本文论及的全译转化主要考虑语形与语义的矛盾,即一义多形/言矛盾。在全译的语言单位中,小句是中枢单位,向下由词和短语构成,向上构成复句和句群,而复句和句群的语义重心是词义和(小)句义。因此,全译转移的语义主要是句义及其包含的词义和短语义。如:

例(1)“命运共同体”强调整体思维,推崇共生共荣的关系,追求持久和平和共同繁荣。

The concept of a community of shared future emphasizes the virtue of holistic thinking, cosmopolitan ideals, and the pursuit of lasting peace and shared prosperity. (韩清

月、蔡力坚译)

例(1), 译文与原文的句义及其构成的词义和短语义几乎形成一一对应, 略有出入。“强调”“推崇”为近义词, 二者可择其一。译文增添了 *virtue*, 表明“整体思维”是一种“美德”, 将“共生共荣的关系”减译为 *cosmopolitan ideals*, 将“追求……”视为“强调”的宾语, 用一个谓语动词 *emphasizes* 连接整个译句。译文整体上采用对的手段, 适当运用增、减手段, 忠实、完整地转移原文的词义、短语义和单句义, 实现表达的简洁和通畅。

(二) 化解形义矛盾

原作和译作分属不同的语言文字符号系统, 源于不同的思维模式, 反映不同的文化背景, 必然存在符际和符内的一义多形/言矛盾, 简称为形义矛盾。符际形义矛盾是主要矛盾, 符内形义矛盾是次要矛盾: 二者相互区别, 前者居支配地位, 起主导和决定作用, 后者处于从属地位, 发挥次要作用; 同时, 二者又相互联系、互为前提, 前一矛盾的解决规定后一矛盾的走向, 后一矛盾的解决影响前一矛盾的解决路径。全译行为实际上是一个识别、分析、协调和化解形义矛盾的循环往复过程。

1. 形义矛盾的识别和分析

首先, 形义矛盾表现在语内的一义多形: 一种语形可以表达多种语义, 一种语义可借助不同语形。受众基于已有的知识背景, 通过特定的上下文, 对听读的信息作出理解和判断, 并通过一定的手段调节形义矛盾。如: 在“爸爸和妈妈的朋友在看电影”中, 联合短语“爸爸和妈妈的朋友”是歧义短语, 形成结构上的形义矛盾, 需要通过调整层次关系加以化解: (1) [(爸爸) 和 (妈妈)] 的朋友; (2) [(爸爸) 和 (妈妈的朋友)]。

其次, 形义矛盾表现为语际的一义多言, 即同一语义在不用语言中有不同的语形, 因语言亲疏而体现不同的对应程度。印欧语系内部相同语族的不同语言之间的对应程度最高, 如英德之间; 不同语族的语言之间的对应程度次之, 如英俄之间; 印欧语系与汉藏语系之间的对应程度最低, 如英汉之间。如:

例(2) 英语: *poor as a church mouse*
 德语: *arm wie eine Kirchenmaus*
 俄语: *Беден как церковная мышь*
 汉译: 穷 如 教堂 老鼠

例(2), 英语和德语的习惯几乎是逐词对应, 区别在于 *church mouse* 是短语, 而 *Kirchenmaus* 是复合名词。俄语跟英、德习语几乎如出一辙, 只是没有与之对应的不定冠词。英德、英俄、英汉之间的对应程度依次递减。这几个习语可直译为汉语的“穷得像教堂里的

老鼠”，可简化为“穷如教堂老鼠”，也可意译为“一贫如洗”，还可引申为“穷得叮当响”“穷困潦倒”。“穷如教堂老鼠”是属于典型的直译，保留了西方文化中的宗教元素，已逐渐为中国人理解和接受。这些不同的汉译表达，既是处理语际的一义多言矛盾，也是处理语内的一义多形矛盾。

2. 形义矛盾的协调和化解

形义矛盾的协调和化解基于识别和分析：识别是分析的前提，分析是协调的基础，化解是协调的结果。只有抓住全译中的主要矛盾，才可能找到解决矛盾的道器。道器结合才能推动译作与原作的矛盾化解与形义和谐。全译力求实现译作与原作的信息量极似，确保量的守恒、质的保全。在准确、完整转移原作语义的前提下，如能兼顾语形，且为译语受众理解和接受，形义矛盾即可化解，分为两种情况：

一是，原语在译语中有对应或相似的语形，二者形成某种耦合的理想状态。例（3）中，“百”并非实指，而是强调“多”，相当于英语的all。“川”对应rivers，“归”对应flow（与rivers保持人称和数的一致），“海”对应the sea（the与sea属于“标配”）。

例（3）百川归海。

All rivers flow to the sea.

二是，原语语形在译语中尚无对应，即使勉强对应，在译介之初可能不被译语受众理解或接受。随着时间推移，使用者增多，新奇的表达方式可能由个体扩展到群体，由限时限地过渡到多时多地，最终成为译语中的常见部分。外来词、成语和谚语的互译就属于此类。如：

例（4）Juda's kiss. 犹太之吻。（比喻“可耻的背叛和变节”）

例（5）好好学习，天天向上。Good good study, day day up.（现已出现在美国的童书中）

二、“化”：全译转化之魂

转化是全译之轴，转移原作语义，化解译语之形与原作之义的矛盾，落脚在“化”上。“化”不仅是全译转化之魂，更体现为全译的本质，有其特定的内涵和丰富的外延。

（一）“化”的内涵

“化”的内涵指其反映全译行为的本质属性，与文字学、哲学、美学和钱氏“化境说”中的“化”一脉通连、彼此呼应。

1. “化”的文字学原解

“化”起源于商周时代的甲骨文，记载于西周和春秋时期的兴壶、中子化盘、齐国的刀货等文物上的铭文中。在《尚书》、《左传》、《孟子》、《荀子》等先秦古籍中，“化”大多单独成词，后来与其他汉字组合成“教化”“变化”“化育”“化气”等双音节词，并引申出系列含义。许慎认为“匕”“化”是两个同声同切不同义的汉字：“匕，变也。从到人。凡匕之属皆从匕。”“化，教行也。从匕从人。”（168）段玉裁的注疏基本上沿用了许慎对“化”的释义：“凡变匕当作匕，教化当作化，许氏之字指也。今变匕字尽作化，化行而匕废矣。”（384）徐灏则认为“匕”的本义为“化生”：“周官柝氏曰：‘若欲其化也。’《乐记》曰：‘和故百物皆化。’郑注：‘化犹生也，引申为造化、教化之称。’”（148）徐灏对“化”的笺注更加周详，将其本义解释为“（化）生”，并引申出自然界的“造化”和人类的“教化”等含义。

2. “化”的哲学通解

“化”是中国古代哲学典籍中的高频词和核心术语。哲学家最初分别探究“变”“化”，后来进行整体考察，再论述二者作为对偶范畴的区别与联系，逐渐将它们与质变和量变的内涵相接近，最终确立为中国哲学范畴发展史上一对重要的中介范畴（张立文 423）。

《论语》中有“变”无“化”，《道德经》中有“化”无“变”，唯有《孟子》并列“变”“化”，稍加区分：“变”即“改变”，“化”即“教化”。《周易·易传·系辞上》以明晰语言论述二者的关系：“化而裁之谓之变，推而行之谓之通。”《荀子·正名》明确区分了“变”“化”的内涵：“状变而实无别而为异者，谓之化；有化而无别，谓之一实。”《庄子·德充符》指出“变”“化”的程度差异：“死生亦大矣，而不得与之变；[……]审乎无假而不与物迁，命物之化而守其宗也。”换言之，“变”是大变，蕴含质变之意，“化”是小变，包含量变之意。这种区分为后世提出质变、量变奠定了基础。

张载概括了“变”“化”的本质特征：“变，言其著；化，言其渐。”（70）朱熹将变化与动静、有无范畴相联系，既指出变、化互相区别和对待：“‘变化’相对说，则变是长，化是消。”又阐明二者互相联系和转化：“变者，化之渐；化者，变之成。”（黎靖德 1694）王夫之借用“体用”范畴，进一步规定变、化的关系：“变者，化之体；化之体，神也。”（66）他还将变化范畴与形质范畴联系起来，注意到事物从渐化到骤变的运动过程中存在部分质变和根本性质变。

在中国哲学的发展演进中，“变”“化”源于辞书释义，经过人们的日常观察和思辨，逐渐与质变、量变的内涵相接近，成为联系道器、有无、动静的中介范畴。“化”作为一种形变实存的运动，是一种细微、缓慢、不易察觉的量变形式和状态，是事物自有而无、自动而静的运动过程和结果（余承法、庄义辉 98）。

3. “化”的美学专解

中国历代文人提出诗歌、小说、绘画、书法中的“化工说”“化境论”，如李贽的“化工”“画工”

标准、许学夷的“化境”概念、胡应麟的“化境”审美境界、金圣叹的“三境说”等，都强调创作主体如何经过艺术锤炼，达到炉火纯青的地步。“化”作为文艺创作的最高境界，涵盖四个要素：主体修炼时具备的德、才、学、识等创作素养；主体排除外部干扰时的虚静创作心态；主客之间物我相融、浑然一体的创作状态；作品达到的“天人合一”境界。

4. “化”的译学新解

钱锺书博通古今、学贯中西，从许慎关于翻译的一段训诂出发，将文艺之“化”与美学之“境界”“不隔”联姻，将“化”移植为译学范畴，揭示文学翻译的最高理想境界。综观文字学、哲学、美学之“化”和钱氏挪移的“化”，可知译学之“化”的内涵包括以下五点。

(1) “化”是变易与不易、得失兼备的量变过程

全译存在变易与不易的成分，包含得与失的元素，正所谓“此‘本’不‘失’，便不成翻译”（《管锥编》1236）。变易原作语形，不易其语义，原作语形虽经迁移，但实质内容不发生突变。“化”是一种“得意忘言/形”的量变过程，是译作对原作的“状变”而“实无别”（钱氏也曾借用《荀子》对“化”的这种界定），流失原作的形式外壳，即“形体变化”（473），消除译作与原作的形义矛盾，保存原作的风味或“精魂”，即“转世轮回”（473）。

(2) “化”包含理想之“化”与实际之“讹”

一般认为，“化”“讹”是彼此不容的对立范畴。这实际上是对钱氏“化境说”的一大误解，因为他明确指出“讹”“化”是一脉通连、虚涵数意。“讹”“讹”包含“动”之义，这与“化”的“变化”义有关，“化”与“讹”“讹”相同，引申为“错误”。对原作的创造性叛逆可能导致“讹”，但这是译者的“明知故犯”，是另一境界之“化”。因此，“化”“讹”形式上背出分训，意义上相反相成，对立统一于具体的全译实践。

(3) “化”是求信与造美的有机统一

钱锺书曾阐明信、达、雅之间的辩证关系：“译事之信，当包达、雅，达正以尽信，而雅非为饰达。依义旨以传，而能如风格以出，斯之谓信。”（1101）他在界定“化”时指出：“译本对原作应该忠实得以至于读起来不像译本，因为作品在原文里绝不会读起来像翻译出的东西。”（《七缀集》77）“化”既是译作内容求信的应有之义，也是形式造美的必然要求，既解决语际语内的形义矛盾，又解决信美之间的二律背反，是对原作语义保真、风格求似和译作语形求美的结晶。因此，“化”是对“信达雅”的突破和发展，是原作在译语中求真与造美的再现。

(4) “化”兼有“师法造化”和“笔补造化”

西方造艺主张“模写自然”和“润饰自然”，但钱锺书认为“二说若反而实相成，貌异而心则同”（《谈艺录》60-61）。造艺之“师法造化”是“以模写自然为主”，但“作者必加一番简择取舍之功”（60-61）。译艺之“师法造化”，要求译者以积极态度明确身份定位，能动地忠实于原作及其作者，需要具备相当的社会阅历、敏锐的洞察力、充分的鉴赏力、取舍的功力、精湛的语言表达。钱氏“笔补造化”的翻译美学思想，既指译作超过原作的可能性，也肯定

译者的创造性，译者借助神来之笔对原作进行美化，得精去粗，得意忘言。

基于上述分析，可将“化”定义为：“译者为消除语际内容与形式之间的‘一意多言’式矛盾，得原文之意、存原文之味、成译文之形的双语转换过程和结果。”（余承法 43）全译之“化”与文字学之“化”的基本含义吻合，与哲学之“化”的内涵一致，与文艺美学之“化”的追求相同，这是由全译的性质决定的。

（二）“化”的外延

“化”的外延指译者在处理形义矛盾时采取的应对方案和灵活运用的对、增、减、移、换、分、合七种手段。译者结合宏观文化背景、中观语言环境和微观语言单位，运用可操作、能验证的具体方法，将每种方法细化为若干技巧，形成完备的全译实践方法论体系。

1. 对

对，指译者为减少语际的形义矛盾，尽可能将原作与译语的语形对应，实现译作与原作的语用趋同、语义相等，并符合译语规范。“对”（为免歧义加引号，本小节之后皆同）是最常见的求“化”手段，译者听读原作时，最本能的反应是在大脑中搜寻与原作相应的译语单位，并逐一对等替换。语形对应是前提，语义相等是基础，语用趋同是核心。通常采取从小到大的语言单位对应，即从词、短语到小句、复句，再到句群和语篇，形成逐层对应，难度依次增加，频率相应减小。如：

例（6）信言不美，美言不信。（老子《道德经》）

译文A: True words are not fine-sounding; fine-sounding words are not true. (威利译)

译文B: True words are not high-sounding; high-sounding words are not true. (居延安译)

译文C: Faithful words are not beautiful; beautiful words are not faithful. (赵彦春译)

例（6）原文是并列的文言复句，言简意赅地阐述信与美的对立关系。无论是汉学家威利（Arthur Waley）的译文A，还是旅美30年的华人学者居延安的译文B，或是知名翻译家赵彦春的译文C，都在词、短语、小句、复句层面采用“对”的手段，除了增加系动词are之外，其他的字词完全对应，结构对仗，首尾回环，均为求“对”入“化”的佳译。

2. 增

增，指译者为化解语际的形义矛盾，根据句法结构、语义传达和语用再现的需要，在译语中增添少量必要的语言单位。汉语的助词和量词在英语中缺失，英语的冠词在汉语中无对应，全译时需要视具体情况加以补位。原语中习惯省略的语言单位、表达丰富含义的精炼形式等，也需要根据具体语境加以补充，才能确保译语成型成活。如：

例(7) 三从四德

three obediences—to father before marriage, to husband after marriage, to son after husband's death; four virtues—morality, proper speech, modest manner and diligent work

例(7)的“三从四德”是中国封建礼教压迫、束缚女子的道德标准之一,稍有文化的汉语使用者大多明白其具体内涵。若简单对译为three obediences and four virtues,英美受众可能不明其意,必须增添“从”和“德”的具体内容,才能成功实现跨文化交际。

3. 减

减,指译者为化解语际的形义矛盾,在译语中删减原作的部分语言单位,以便在转移原作语义的同时,确保译作言简意赅。减与增的运用理据相同,语言对方向相反。汉译英时增添的语形,英译汉时需要删减;反之亦然。即使是英汉双语都有的介词和连词,也可视具体情况在译语中省去。原语的某些典故可能出现约定俗成的必要冗余,全译中可视具体情况加以删减。如“东床”源自南朝刘义庆《世说新语》,后来指代女婿,汉语中有“东床快婿”的同义表达。英译时不必保留“东床”(the eastern bed)的形式和意象,只需译成son-in-law即可。

4. 移

移,指译者为了化解语际的形义矛盾,在译语中移动原作语言单位的位置,确保译作语义地道和顺畅的表达。英汉句子中主谓宾的位置次序总体相同,但定状补的位置差异较大。汉语中作定语的词和短语大多前置,英语中作定语的短语和从句往往后置,互译时需要根据译语习惯进行移位。如:

例(8) 电视中的暴力和暴力犯罪的关系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violence on television and crimes of violence

例(8)中的中心词是“关系”,两个修饰语“电视中的暴力”“暴力犯罪”本身都是偏正式名词短语,需要根据英语表达习惯后置两种定语。

5. 换

换,指译者为化解语际的形义矛盾,在译语中改换原作的表达方式,以便准确、流畅地表达原作语义。每种语言都有独特的组词成句和布局谋篇的方式,全译时不能原封不动地照搬,而需要根据译语的表达习惯和规范进行变换,包括词类、句类、语气之间的互换,以及动静、正反、语态之间的互换。如:

例(9) His ten-year-old daughter is completely stage-struck.

原译: 他十岁的女儿是一个十足的演员迷。(《牛津高阶英汉双解词典》)

试译: 他十岁的女儿非常痴迷当演员。

例(9)中的复合形容词“stage-struck”意为“渴望当演员的”。原译将其换为名词“演员迷”，试译换为动词短语“痴迷当演员”，异曲同工地传达了原文含义，且符合汉语的地道表达。

6. 分

分，指译者为化解语际的形义矛盾，在译语中分离原作的句式结构，以凸显其语义，确保译作结构清晰、表达地道。英语多结构嵌套的长龙复句，但主次分明，逻辑语义清晰。汉译时通常需要根据汉语流水小句的特点，加以切分。如：

例(10) It's miraculous how much weight you've lost!

你体重降了这么多，这是出乎意料！（《牛津高阶英汉双解词典》）

例(10)原文中的it为形式主语，how much引导的主语从句为真正主语，这是一个紧凑型主从复合句，采取“评（表态）+述（事实）”的结构顺序。汉译时采取先述（事实）后评（表态）的顺序，且将述与评分开，不仅切分了复合句，还移动了位置。

7. 合

合，指译者为了化解语际的形义矛盾，在译语中合并原作的句式结构，以整体表达原作语义。合与分的运用理据相同，语言对方向相反，英译汉时多切分，汉译英时多合并。如：

例(11) 同志们住在一起，说说笑笑，十分开心。（《现代汉语词典（汉英双语）》）

The comrades felt happy living under the same roof and talking and laughing together.

例(11)原文是包含三个并列谓语的单句，遵循常见的“三步法”排列，即前提（住在一起）——动作（说说笑笑）——结果（十分开心）。英译时，先叙述结果，再说明前提、分析原因，将结果作为谓语动词，前提和动作变换为-ing分词，移至句末，将原文的三个并列谓语合为一个谓语短语及其两个状语短语。本例除了采取合并，还运用了移与换的手段。

综上所述，“化”贯穿于全译的整个过程：在原语理解阶段，译者需要融化原作，完整准确地理解其语形、语义和语用；在语际转化阶段，译者需要采用灵活的求“化”手段或方法，化解语际的一义多言/形矛盾；在译语表达阶段，译者需要基于理解原作来巧妙化生译作。全译之轴是转化，转化之魂是“化”，“化”的内涵与文字学、哲学、美学、钱氏“化境说”之“化”一脉通连、彼此呼应，外延上包括对、增、减、移、换、分、合七种手段，体现为相应的方

法和技巧。译者单独或组合运用这些求“化”手段，追求译作与原作的信息量极似，达到译作出神入化的境界即“化境”。

引用文献 [Works Cited]

- China International Publishing Group, Academy of Contemporary China and World Studies, and China Academy of Translation, editors. *Keywords to Understand China: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2nd edition). Translated by Qingyue Han and Lijian Cai, New World Press, 2019. [中国外文出版发行事业局、当代中国与世界研究院、中国翻译研究院编:《中国关键词:“一带一路”篇》(第2版),韩清月、蔡力坚译。北京:新世界出版社,2019。]
- Huang, Zhonglian. *The Clause Oriented Approach to Complete Translation*. Central China Normal UP, 2008. [黄忠廉:《小句中枢全译说》。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
- Huang, Zhonglian, and Xiangsheng Yuan. “Comment on the Epistemological Process of the Concept of Translation.” *Foreign Languages and Cultures*, no. 1, 2017, pp. 108-18. [黄忠廉、袁湘生:《翻译观认识论过程例话》,载《外国语言与文化》2017年第1期,第108-18页。]
- Li, Jingde, editor. *Classified Conversations of Zhu Xi*. Vol. 1-4. Collated by Shengqi Yang and Xianjun Zhou, Yuelu Publishing, 1997. [黎靖德编:《朱子语类》(1-4册),杨绳其、周娴君校点。长沙:岳麓书社,1997。]
- Qian, Zhongshu. *On the Art of Poetry* (Expanded and Amended Edition). Zhonghua Book Company, 1984. [钱锺书:《谈艺录》(补订本)。北京:中华书局,1984。]
- . *Limited Views: Essays on Ideas and Letters*. Zhonghua Book Company, 1986. [钱锺书:《管锥编》。北京:中华书局,1986。]
- . *Patchwork: Seven Essays on Art and Literature*.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2002. [钱锺书:《七缀集》。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
- Wang, Fuzhi. *Annotations of Zhang Zai's Correcting Youthful Ignorance*. Zhonghua Book Company, 1975. [王夫之:《张子正蒙注》。北京:中华书局,1975。]
- Xu, Hao. *Notes of Origin of Chinese Characters* (Vol. 2). Shanghai Chinese Classics Publishing, 1992. [徐灏:《说文解字注笺》(卷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
- Xu, Shen. *Origin of Chinese Characters* (with Indexes). Zhonghua Book Company, 1963. [许慎:《说文解字》(附检字)。北京:中华书局,1963。]
- . *Annotations of Origin of Chinese Characters*. Annotated by Yucai Duan, Shanghai Chinese Classics Publishing, 1981. [许慎:《说文解字注》,段玉裁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
- Yu, Chengfa. *On Sublimation Mechanism in Complete Translation: Based on the Interactive Exploration of Qian Zhongshu's Translation Thought and Art of "Sublimity."* The Commercial Press, 2022. [余承法:《全译求化机制论——基于钱锺书“化境”译论译艺的考察》。北京:商务印书馆,2022。]
- Yu, Chengfa, and Zhonglian Huang. “Sublimity: Quintessence of Transformation in Complete Translation.” *Journal of Huazho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ocial Science Edition)*, no. 2, 2006, pp. 89-93. [余承法、黄忠廉:《化——全译转换的精髓》,载《华中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2期,第89-93页。]
- Yu, Chengfa, and Yihui Zhuang. “Tracing Qian Zhongshu's *Huajing Shuo* [Theory of Sublimity] to *Hua* [Sublimation] and *Jing* [Realm].” *Foreign Languages in China*, no. 2, 2022, pp. 96-103. [余承法、庄义辉:《钱锺书“化境说”考镜源流》,载《中国外语》2022年第2期,第96-103页。]
- Zhang, Liwen. *A History of Evolvement of Chinese Philosophical Categories (Tao of Heaven)*. China Renmin UP, 1988. [张立文:《中国哲学范畴发展史(天道篇)》。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8。]
- Zhang, Zai. *A Collection of Zai Zhang*. Collated by Xichen Zhang, Zhonghua Book Company, 1978. [张载:《张载集》,章锡琛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78。]

◇责任编辑:林小慧

全译方法之分合论 ——以汉语政治文献英译为例

◎ 郭薇 徐雨纯

内容提要: 分与合是客观世界存在与发展的规律, 两者对立统一、相辅相成, 其分合互动律可用于指导语言转换, 解决译语与原文因哲学传统、思维方式和句法结构差异而产生的形意矛盾。正确认识和运用全译七法中的分译与合译, 有利于译者脱离原文语言外壳, 产出地道译文。汉语政治文献作为一种应用文体, 在语形、语序和句长等方面具有汉语语法和句法结构的标志性特征。本文详细论述分译与合译的理论依据与操作过程, 并结合实例探讨它们在汉语政治文献英译实践中的应用, 以期为中国政治话语“走出去”提供启示。

关键词: 分译 合译 全译机制 汉语政治文献

中图分类号: H05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6-4366 (2023) 01-0022-09

基金项目: 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翻译理论发展史研究”(20&ZD312);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青年基金项目“安乐哲中国儒学典籍传译模式研究”(21YJC740017)

作者单位: 中南大学外国语学院, 湖南 长沙 410083

DOI: 10.19967/j.cnki.flc.2023.01.003

Title: Division and Combination in Complete Translation: A Case Study of the English Translation of Chinese Political Documents

Abstract: Division and combination are the laws of the existence and development of the world. They are the unity of opposites and complementarities, whose interrelationship can be used to guide the translation process, balancing the form-meaning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source language and the target language despite their differences in philosophy, thinking patterns and syntactic structures. Through the proper application of division and combination, two of the seven methods in complete translation, it is more likely for translators to produce idiomatic translations with deverbilization. As applied writing, Chinese political documents are characterized by Chinese syntactic structure. This paper probes into division and combination in theoretical basis and operational process and discusses their specific applications in the translation practice of Chinese political documents with examples, to shed light in helping Chinese political discourse “go global.”

Keywords: division, combination, complete translation mechanism, Chinese political documents

Authors: Wei Guo, Associate Professor,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Central South University, Changsha, Hunan, China; Yuchun Xu,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Central South University, Changsha, Hunan, China.

分与合的对立统一，是一切事物发展的客观过程。在日常生活中，正确认识事物发展过程中分与合的必然趋势，有利于掌握事物发展规律，提高统筹与应对能力。在语言转换过程中，正确认识语言表述中的分合机制，有利于更好地掌握语言规律，提高语言运用与翻译转换能力。分合机制提倡以思辨与综合的眼光把握语言转换规律，对原文句法结构进行合理拆分与恰当合并，在指导翻译实践中具有重要价值。

一、分合机制的理论依据

机制指各要素之间的结构关系和运行方式，是事物之间既相互联系又相互作用形成的统一整体。分与合两种思维方式，可构成一对思维机制。“分”是认识事物发展必要的一环，通过“分”，事物将被观察得更仔细。“合”不是简单的合并相加或排列组合，而是用综合的眼光、统筹的方法，按照事物发展规律重新组合。通过“合”，事物将被理解得更透彻。在分合机制中，分与合呈对立统一关系，两者并行不悖、相辅相成。

分译，是译者应原文语用再现、语义传达和译语表达之需，将原文单位（多为复杂长句）进行拆分和重组的一种全译方法。合译，指译者根据原文语用再现、语义传达和译文语形之需，将原文某些单位合并为一个译语单位的全译方法。在汉英翻译中，分译与合译的选用有中西方传统哲学与思维模式、语法与句法结构差异的理据。

中西方传统哲学的主要差别在于不同的宇宙观。中国传统哲学重“气”，主张“一多不分”、万物相系，以求看到全局，打造“旁通系统”；西方哲学重“原子”，主张透过二分法把完整的世界一分为二，或上界与下界对立，或内界与外界对立。在民族思维模式方面，东方倾向于追求结局开放的宇宙秩序和综合感悟式的价值评判；西方则推崇形式逻辑和因果关系，善用理性演绎法去认识伦理学乃至几乎所有问题。中国传统哲学的“过程性”思维模式，衍生了中国人万物相系的日常行为准则和倾向于动态（使用动词为主）的行为方式，以及注重过程性语言的语言规则；西方传统哲学的“实体性”思维模式，衍生了西方人主客二分、单线单向的日常行为准则和倾向于静态（使用名词为主）的行为方式，以及注重实体性语言的语言规则。

中西方语言的主要差别在于不同的语法和句法结构。从语序差异来看，汉语重意合，句子结构较为灵活，无严格的形态变化，信息安排重心在后；英语重形合，语句严格按逻辑原则排列，信息安排重心在前。就主谓关系而言，汉语突出主题、轻形式关联，主谓非构句必要成分；英语突出主谓结构，受多重语法关系制约。从句长差异来看，汉语句式为竹竿型结构，多流水小句，最佳平均长度为7~12个汉字，偶见长句；英语句子呈葡萄型结构，一般较长，可达几十、上百甚至更多单词。连淑能系统比较过英汉两种语言，认为在英语和汉语之间至少存在十种对应范畴，即：综合语与分析语、聚集与流散、形合与意合、繁复与简短、物称与人称、被动与主动、静态与动态、抽象与具体、间接与直接、替换与重复（1-173）。

鉴于中西方传统哲学与民族思维模式的不同,还有双语在语序、主谓关系和句长等方面的差异,汉英互译时不可一味保留原文的形式与结构,而应基于理解,按照译语的文化传统、民族思维特色和语法、句法结构,拆分或合并原文的词、短语、小句和复句,以确保译文准确、地道、自然。

二、分合译法的操作过程

分译与合译的操作理据相似,语言方向与操作程序相反:分译旨在化整为零,将原作中数量较少、紧密结合的较小单位逐一切分为译语中数量较多、更加分散的较大单位,可以避免译句冗长繁复,缓解受众理解长句式的压力;合译旨在聚零为整,将原作中众多零散的较小单位逐渐融合为紧凑的较大译语单位,可以避免译句重复拖沓松散,确保译文重点突出,表意连贯。

分译遵循“分形不断义不损值”的操作原则,译作分离原文语形,但保证语义不中断,语用价值不受损,同时译文符合译语的表达习惯和规范,实现求真、求美的目的(余承法,《全译求化机制论》226)。分译的操作过程大致分为八个步骤:(1)把握全句的总体轮廓和脉络;(2)区分全句的主干和枝干,即区分复合句中主句与从句以及小句成分;(3)根据关键结合标记,如复句的连接词、关联词、标点符号,以及小句的主干与枝干、修饰成分和被修饰成分,将整句拆分为相对独立的词、短语、小句甚至复句;(4)将拆分的语言单位如词、短语、小句、复句转换为思维中对应的简单概念、复合概念、简单判断、复合判断、推理;(5)将这些概念、判断或推理外化为译语的词、短语、小句、复句和句群;(6)根据原文语义层次和关系调整译语单位的顺序和结构;(7)按照译语表达规范和习惯组织成文;(8)比读译文和原文,校对和润饰。其中,前三项为原文理解阶段,中间两项为语际转化阶段,后三项为译语表达阶段。

合译采取聚零为整的手段,将较大的原文单位融合、压缩为较小的译语单位,从而将短小、零散的原文结构整合为繁长、紧凑的译文句子,使译文表意严谨集中,形式简洁洗练,地道规范。因此,合译的操作原则是“合形不漏义不变值”(243)。合译的操作过程包括三个阶段和七个步骤。(1)原文理解阶段,包括三个步骤:把握全句的总体轮廓和脉络;弄清小句成分之间的深层语义关系、复句的层次及其分句之间的逻辑关系(尤其是无标记的汉语多重复句);基于对原文深层结构的理解和重新分析,将形式分散、结构松散的语言单位进行语内的初步压缩和整合。(2)语际转化阶段,包括两个步骤:将整合之后的语言单位如词、短语、小句、复句转换为思维单位中对应的简单概念、复合概念、简单判断、复合判断;这些概念和判断外化为词、短语、小句和复句等译语单位。(3)译文表达阶段,包括两个步骤:按照译语表达规范和习惯重新调整译文的顺序和结构;比读译文和原文,从语值的有效性、语义的完整性、语法的正确性着手审视和校改译文。

三、分合译法在汉语政治文献英译实践中的具体应用

政治文献指党中央、国务院和各级地方政府所发布的有关国家、社会与经济发展大政方针的文件（郭影平 52）。因此，政治文献翻译是传播一个国家的方针政策和政治立场的重要媒介（于丽 67），准确、清晰地翻译政治文献具有特殊的价值和意义。汉语政治文献既包括中国党政领导人的重要言论，如《习近平谈治国理政》，也涵盖关乎国家大政方针的政策文件，如国务院每年发布的中国政府工作报告和代表中国政府立场的各类白皮书。作为以阐发政治观点为核心的应用文本，政治文献与科技文章、新闻报道、广告说明书等应用型文本不同，其突出特征是口吻严肃、语气坚定、行文简洁，其撰写宗旨在于解析思想、阐发观点，达到政治宣传的目的（王小萍 109）。

通过文本分析，笔者发现汉语政治文献具有多成语、多复杂长句、多无主句、多竹节型句法结构、语形重复等文本特点。在汉语政治文献英译实践中，需注重汉英语言在句法结构和语篇连贯方面的差异性，关注译语读者的文化背景认知，合理使用分译与合译，提高译文的可读性，以准确向译语读者传递中国政府的政策立场，为中国的发展营造良好舆论环境。本文以《习近平谈治国理政》、中国政府工作报告和《关于中美经贸摩擦的事实与中方立场》、《关于中美经贸磋商的中方立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中国人权事业发展的光辉篇章》白皮书等汉语政治文献用例为研究对象，对分译与合译的具体运用进行分析，以求为中国政治话语“走出去”提供启示。

（一）汉语成语、小句和复句的分译

根据具体操作的语言单位，分译可分为词分译、短语分译、小句分译和复句分译四种类型（余承法，《全译方法论》286）。汉语政治文献翻译中，小句需要分译的词和短语常以成语，尤其是紧缩复句型成语的形式出现。汉语成语的特点是形式简洁而内涵精辟，多为四字结构，包括主谓式、动宾式、连动式、兼语式、联合式等类型。

汉语成语分译，指将汉语成语视作一个短语、小句甚至复句，从原句中分离出来，在译文中扩充为简单句、复合句甚至句群。如：

例 (1) 面对来势汹汹的新冠肺炎疫情，国际社会没有退缩，各国人民勇敢前行，守望相助、风雨同舟，展现了人间大爱，汇聚起同疫情斗争的磅礴之力。[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四卷）》415]

译文: Confronted by the ravages of Covid-19,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has not flinched, and the people of all countries have risen to the challenge. Around the world, people have pulled together as one, helping each other as best we can. With love and compassion, we have forged extraordinary synergy in the battle against Covid-19. (Xi, IV 483)

例(1)原文是2020年国家主席习近平在第七十三届世界卫生大会视频会议开幕式上致辞的一部分,强调在全球疫情肆虐的背景下国际社会应团结一致,通力合作。原文两个四字格“守望相助、风雨同舟”,不仅共同构成表动作的短语结构,同时也是形式简洁而内涵精辟的汉语成语。译者为实现语用趋同的交际效果,弥合文化差异,将两个四字格扩展为小句people have pulled together as one, helping each other as best we can,并将其从句中拆出,形成相对独立的小句,英文表达更为流畅,表义更为准确。若将汉语成语强行译成英文四字结构,一是不符合英文的表述特点,二是不符合英语读者尤其是英美等国人民的思维方式。

汉语复句分译,指将汉语复句中的某些分句分离出来,译成相对独立的单句或扩展为复句,从而将汉语复句切分为英语句群。汉语政治文献的复句主要包括以下三种情况:复句包含总一分一(总)结构;复句包含举例小句;复句句末包含表判断的陈述小句。

第一,复句包含总一分一(总)结构时,需要将表示总结、概括的小句从中分译。分译是从读者角度出发,以读者理解为前提的全译方法。汉译英时,根据意思层次将长句划分为若干短句,再译为相应的英语句子,更易于读者理解。如:

例(2) ①稳是大局,②要着力稳增长、保就业、防风险,③守住金融安全、民生保障、环境保护等方面的底线,④确保经济社会大局稳定。(例中序号为笔者添加,下同。)

译文: Stability is of overriding importance. We should ensure stable growth, maintain employment, and prevent risks. To ensure overall economic and social stability, we must not allow the red line to be crossed concerning financial security, people's well-being or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中国日报网,《2017年政府工作报告》web)

例(2)原文选自《2017年政府工作报告》,由四个小句构成,小句①是对后文内容的总括,英译时可以单独成句。小句②包含排比句式,内容上较为紧凑,也应该单独成句,并增添主语。小句③和④结构上是并列,逻辑一语义上是条件与结果,为表达完整意思,可合并译成一个复句。循此,汉语长句分译成三个英语句子,更便于目标语读者理解汉语原意。

第二,复句包含举例小句时,为了便于区分,通常需要分译。如:

例(3) ①我们要随时随刻倾听人民呼声、回应人民期待,保证人民平等参与、平等发展权利,维护社会公平正义,②在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上持续取得新进展,不断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③使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在经济社会不断发展的基础上,朝着共同富裕方向稳步前进。[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一卷)》41]

译文: We should always bear the people's aspirations in mind and be responsive

to their expectations, ensure their equal rights to participate in governance and develop themselves, and uphold social fairness and justice. We should make steady progress in ensuring that all the people enjoy the rights to education, employment, medical and old-age care, and housing; and we should continue to fulfill, uphold and develop the fundamental interests of all the people. All these efforts will enable our people to share fully and fairly the benefits of development and move steadily towards shared prosperity on the basis of continued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Xi, I 43)

例(3)原文是多重并列复句,分句主要由动宾短语构成,分句之间形成并列关系,强调政府应该为实现人民福祉而实施的相应举措。译者在②处拆分原文,①和②分成两个以“*We should....*”开头的单句,列举政府应当采取的行动,同时将③拆分,借助*All these efforts*总结上文,承上启下,表明上文是政府应该付出的*efforts*,③后半句进一步展望*efforts*的目的与意义。译者将原文长句译成三个英语句子,使原文的逻辑关系更加明显,译文表意更清晰。

第三,复句句末包含表判断的小句且对其前述内容进行评价和概括时,判断小句若不适合英译为复句的从句,则可分译为独立的小句。如:

例(4)中美两国经济发展阶段、经济制度不同,存在经贸摩擦是正常的,关键是如何增进互信、促进合作、管控分歧。

译文: *China and the US are at different stages of development. They have different economic systems. Therefore, some level of trade friction is only natural. The key however lies in how to enhance mutual trust, promote cooperation, and manage differences.* (中国日报网,《关于中美》web)

例(4)原文选自《关于中美经贸摩擦的事实与中方立场》白皮书,是典型的汉语意合长句,通过语义之间的逻辑关系,将数个分词短语、小句组合成长句。译者基于理解,将原文合拢后重新拆分,用*they*指代上文中的*China and the US*,用*therefore*表明上下文的因果关系,表达更符合译语习惯。

原文长句包含多个短句时,译者采取分译方式,增添代词指代原文主语,并增加连接词,最终实现语义的完整连贯。如:

例(5) ①全党同志一定要永远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②永远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③以永不懈怠的精神状态和一往无前的奋斗姿态,继续朝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奋勇前进。

译文: *In our Party, each and every one of us must always breathe the same breath as the people, share the same future, and stay truly connected to them. The aspirations of*

the people to live a better life must always be the focus of our efforts. We must keep on striving with endless energy toward the great goal of national rejuvenation. (中国日报网, 《2020年政府工作报告》web)

例(5)原文选自《2020年政府工作报告》，为包含三个分句的并列复句，旨在号召全党人民共同努力实现目标。小句①②③主语相同，内容完整，分别代表原文复句的一层含义。译者采取化整为零的手段，将每个分句译成独立小句，原本冗长复杂的句子变成了言简意赅、表意明晰的句群，增强了译文的可读性和层次感。

(二) 汉语短语、小句、复句和句群的合译

根据具体操作的语言单位，可分为短语合译、小句合译、复句合译和句群合译四种类型，较大语言单位的合译以较小语言单位的合译为前提和基础（余承法，《全译方法论》311）。短语合译，指将原作短语整合为译语的词，或者将原语中几个同义、近义短语压缩为一个译语短语。如：

例(6) 全体中国共产党员！党中央号召你们，牢记初心使命，坚定理想信念，践行党的宗旨，永远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始终同人民想在一起、干在一起，风雨同舟、同甘共苦，继续为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不懈努力，努力为党和人民争取更大光荣！[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四卷）》15]

译文：The Central Committee calls on every one of you to stay true to our Party's original aspiration and founding mission and stand firm in your ideals and convictions. Acting on the aims of the Party, you should always maintain close ties with the people, empathize and work with them, stand with them through good times and testing times, and continue working tirelessly to realize their aspirations for a better life and to bring still greater glory to the Party and the people. (Xi, *IV* 17)

例(6)原文中的两个四字格“风雨同舟、同甘共苦”共同构成表愿望的短语结构。其中“风雨同舟”字面意思为“共乘一艘船与风雨搏斗”，可引申理解为“共同经历患难”，与下文“同甘共苦”语义重复。译者将两个四字格成语合并，压缩为stand with them through good times and testing times，既显简洁又符合英语规范。

小句合译，指将原文小句整合为译文短语或词，包括小句部分合译和小句整体合译。小句部分合译，指将小句中某个词或短语的语义压缩为一个词，再与其他成分重组，从而形成简练译句。如：

例(7) 劳动是财富的源泉,也是幸福的源泉。[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一卷)》46]

译文: Work is the source of wealth and happiness. (Xi, I 49)

例(7)原文为并列复句。译者采用合译,将原文两个并列小句中“系动词+定语+表语”部分提取共用的系动词is与表语source,并将原文定语的英译wealth与happiness并置,从而减少词语复用,精简译文结构,使意义更加显豁。

小句整体合译,指将原文小句整体融合为一个译语短语甚至单词。汉语句法结构属于竹节型,结构短小,句式简单,语义关系清晰,多流水句;英语句法结构属于葡萄型,一环套一环,每个限定小句都有固定的主谓结构,限定小句之间必须有连接词。因此,汉译英时,为了简化句子结构,确保语义更为明确,常需将某些汉语小句整体融合为英语短语甚至单词。如:

例(8) ①全力以赴救治患者,②不遗漏每一个感染者,③不放弃每一位病患者。

译文: China did everything possible to treat all patients. (中国日报网,《全面建成》web)

例(8)原文选自《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中国人权事业发展的光辉篇章》白皮书。原文由三个小句构成,小句①表明中国会尽全力救治患者的决心,小句②③则是对该决心的补充说明。②③语义相近,都表现出中国救治每位新冠患者的决心与信心,这又与①语义重合,因此译者将三个小句合并为一句,以减少信息赘余,避免语形重复。

复句合译,指将原文复句中的分句合译为译语单词或短语,在将原语中多个重复句整合、压缩为层次较少的译语复句甚至是单重复句的基础上,原文复句自动融合为译语单句或复句。

例(9) 各地区各部门各方面要深刻认识当前国内外疫情防控的复杂性、艰巨性、反复性,进一步动员起来,统一思想,坚定信心,坚持不懈,抓细抓实各项防疫工作。[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四卷)》108]

译文: All provincial authorities, central departments, and sectors should be fully aware of the complexity and difficulty of epidemic prevention and control, and the volatility of the epidemic at home and abroad. We should mobilize, be of one mind, stay confident, and respond to Covid-19 with dedicated efforts. (Xi, IV 124)

例(9)原文为包含六个分句的并列复句。在“坚持不懈,抓细抓实各项防疫工作”中,后者“抓细抓实”是“坚持不懈”的具体体现,二者在表意上有所重合,因而译者借用with结构将其合译为with dedicated efforts,以减少信息冗余,使译语简洁有力。

句群合译,指在原文小句合译为译语短语或词、原文复句合译为译语单句或短语的基础上,将原文句群压缩、整合为译语单句或复句。如:

例(10) 中方支持通过一揽子成果方案。希望通过该方案为解决难点问题增加政治动力,推动谈判在领导人会议前取得更大突破。

译文: China supports the adoption of a package solution which hopefully will provide more political impetus to the resolution of difficult issues and greater breakthrough before the leaders' meeting. (中国日报网,《关于中美》web)

例(10)原文选自《关于中美经贸磋商的中方立场》白皮书,为共用一个主语的并列句群。译者将原文句群合译成英语复句,未另起一句翻译“希望”所引的内容,而是通过which hopefully引导的定语从句整合原文“希望”的具体内容与前述“一揽子成果方案”。英译更加连贯自然,句子呈现主从结构,更为紧凑。翻译政治文献的无主语句时,可巧借前后逻辑关系,整合成一句话,如本例第二句所示。这不仅能妥善处理无主语句,且能提高语言质量。

在全译求化过程中,译者必须遵循以语用价值为关键和核心、语里意义为基础和前提、语表形式为结果和外化的三位一体原则(余承法,《全译求化机制论》56)。在全译实践方法中,分译与合译相辅相成、对立统一。分译与合译并非任意为之,而是基于中西传统哲学与思维方式差异,以及汉英两语句法结构的区别而得以实现。汉语政治文献翻译实践中,译者需要明确这类文本突出的语言特征,正确认识汉英语言的形义矛盾,合理使用分合译法。分译常见于汉语成语、小句与部分复句的英译,译者基于汉英政治文献的语法与句法差异,将语形化整为零,分离原文部分单位并进行独立转化。合译则常见于短语、小句、复句与句群的合译,译者因原文语用价值再现和语里意义传达之需,将原文单位进行融合、压缩,聚零为整。分合机制在汉语政治文献翻译中的合理运用,有利于实现原意的准确传递与译语的通达晓畅,达到语义求真、语用求美的翻译目的;有利于译语读者对原文思想的理解与接受,实现中国政治话语真正“走出去”、有效“走进来”。

引用文献 [Works Cited]

- China Daily Website. "The Bilingual Version of Report on the Work of the Government in 2017 (Bilingual Version)." 17 Mar. 2017, language.chinadaily.com.cn/a/201703/17/WS5b20d235a31001b825721492.html. [中国日报网:《2017年政府工作报告(双语全文)》,2017年3月17日,language.chinadaily.com.cn/a/201703/17/WS5b20d235a31001b825721492.html。]
- . "The Facts and China's Position on China-US Trade Friction (Bilingual Version)." 25 Sept. 2018, language.chinadaily.com.cn/a/201809/25/WS5ba99f4aa310c4cc775e7ea5.html. [中国日报网:《关于中美经贸摩擦的事实与中方立场(双语全文)》,2018年9月25日,language.chinadaily.com.cn/a/201809/25/WS5ba99f4aa310c4cc775e7ea5.html。]
- . "China's Position on the China-US Economic and Trade Consultations (Bilingual Version)." 3 June 2019, language.

- chinadaily.com.cn/a/201906/03/WS5cf47231a3104842260bf165.html. [中国日报网:《关于中美经贸磋商的中方立场(双语全文)》, 2019年6月3日, language.chinadaily.com.cn/a/201906/03/WS5cf47231a3104842260bf165.html。]
- . “The Bilingual Version of Report on the Work of the Government in 2020 (Bilingual Version).” 1 June 2020, language.chinadaily.com.cn/a/201703/17/WS5b20d235a31001b825721492.html. [中国日报网:《2020年政府工作报告(双语全文)》, 2020年6月1日, language.chinadaily.com.cn/a/201703/17/WS5b20d235a31001b825721492.html。]
- . “Moderate Prosperity in All Respects: Another Milestone Achieved in China’s Human Rights (Bilingual Version).” 12 Aug. 2021, language.chinadaily.com.cn/a/202108/12/WS6114ca40a310efa1bd66868d.html. [中国日报网:《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中国人权事业发展的光辉篇章(双语全文)》, 2021年8月12日, language.chinadaily.com.cn/a/202108/12/WS6114ca40a310efa1bd66868d.html。]
- Guo, Yingping. “A Probe into the English Translation Features of Chinese Political Texts.” *Shanghai Journal of Translators*, no. 4, 2015, pp. 52-58. [郭影平:《政治文献英译特点探究》, 载《上海翻译》2015年第4期, 第52-58页。]
- Lian, Shuneng. *Contrastive Studies of English and Chinese*. Higher Education Press, 1993. [连淑能:《英汉对比研究》。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 1993。]
- Wang, Xiaoping. “On the Difficulty of Translating Chinese Political Documents into English and Its Solutions.” *Shandong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no. 5, 2006, pp. 109-32. [王小萍:《政治文献英译的疑难及其解决办法》, 载《山东外语教学》2006年第5期, 第109-32页。]
- Xi, Jinping. *Xi Jinping: The Governance of China I*. Foreign Languages Press, 2014. [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一卷)》。北京: 外文出版社, 2014。]
- . *Xi Jinping: The Governance of China I*. Translated by the English Translation Group in Foreign Languages Press, Foreign Languages Press, 2014.
- . *Xi Jinping: The Governance of China IV*. Foreign Languages Press, 2022. [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四卷)》。北京: 外文出版社, 2022。]
- . *Xi Jinping: The Governance of China IV*. Translated by the English Translation Group in Foreign Languages Press, Foreign Languages Press, 2022.
- Yu, Chengfa. *Methodology of Complete Translation*. China Social Sciences Press, 2014. [余承法:《全译方法论》。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4。]
- . *On Sublimation Mechanism in Complete Translation: Based on the Interactive Exploration of Qian Zhongshu’s Translation Thought and Art of “Sublimity.”* The Commercial Press, 2022. [余承法:《全译求化机制论——基于钱锺书“化境”译论与译艺的考察》。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22。]
- Yu, Li. “Study on Translator’s Subjectivity in Political Documents Transl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Appraisal Theory.” *Foreign Language Research*, no. 6. 2021, pp. 67-72. [于丽:《评价理论视角下政治文献翻译中译者的主体性研究》, 载《外语学刊》2021年第6期, 第67-72页。]

◇责任编辑: 吴晋先

FLC

文学文化研究

在普鲁士传统与拿破仑道路之间 ——论克莱斯特《洪堡亲王》与普鲁士军事改革

◎ 史敏岳 曾悦

内容提要: 克莱斯特的《洪堡亲王》创作于拿破仑战争的语境之下, 19 世纪初的军事变革和作家的军事知识构成了戏剧文本建构的重要元素。通过改写 1675 年的费尔贝林战役, 克莱斯特演绎了普鲁士军事传统与拿破仑时代军事原则之间的冲突, 从而以戏剧的形式表达了时代的军事文化之变, 反映了普鲁士军事改革的困境。《洪堡亲王》的文本与同时代军事理论和军事技术发展之间的互文关系证明了克莱斯特对军事问题的关切及其人生最后几年中的文学创作与普鲁士军事改革之间的密切联系。

关键词: 克莱斯特 《洪堡亲王》 普鲁士军事改革 战争书写

中图分类号: I51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6-4366 (2023) 01-0032-13

基金项目: 2020 年江西省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文化学视阈下启蒙时期德语文学战争书写研究”(WG20203); 2021 年江西省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克莱斯特德意志民族思想研究”(WG21204)

作者单位: 南昌航空大学外国语学院, 江西 南昌 220063

DOI: 10.19967/j.cnki.flc.2023.01.004

Title: Between the Prussian Tradition and the Napoleonic Way: On Kleist's *The Prince of Homburg* and Prussian Military Reform

Abstract: Heinrich von Kleist's *The Prince of Homburg* was created in the context of the Napoleonic Wars. The military revolution in the early 19th century and the writer's military knowledge constituted important elements in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play. By rewriting the Battle of Fehrbellin of 1675, Kleist interprets the conflict between the Prussian military tradition and the military principles of the Napoleonic era, thereby expressing the changes in the military culture of the era in a dramatic form. His text reflects the Prussian military reforms. The intertextual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text of *The Prince of Homburg* and the contemporary developments in military theory and military technology testifies to Kleist's concern with military issues and the connection between his literary creation in the last years of his life and the Prussian military reforms.

Keywords: Heinrich von Kleist, *Der Prinz von Homburg*, Prussian military reform, war writing

Authors: Minyue Shi, Lecturer,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Nanchang Hangkong University, Nanchang, Jiangxi, China; Yue Zeng, Lecturer,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Nanchang Hangkong University, Nanchang, Jiangxi, China.

克莱斯特(Heinrich von Kleist)的《洪堡亲王》(*Der Prinz von Homburg*)完成于1811年前后,是其生前最后一部剧作,留下了极大的阐释空间。二战之后,为了与19世纪的民族主义解读划清界限,德国学界对《洪堡亲王》的研究几乎扬弃了一切思想史和政治角度的分析(Hackert 53)。此后,哲学、审美以及形而上学的阐释主导着《洪堡亲王》研究,直到本世纪初才逐渐让位于文化学的阐释方法。例如,卢盛舟指出《洪堡亲王》中的情感表达与18世纪电学知识之间存在关联(154),表明了从文化和知识诗学角度解读该文本的巨大潜力。

一个显而易见却又容易忽略的事实是,该剧创作于拿破仑战争阴云笼罩欧洲时的1810至1811年,演绎的是1675年勃兰登堡击败瑞典的费尔贝林战役——《洪堡亲王》是一部再明显不过的战争剧。如果将战争视为人类文化的一种特殊现象,并且注意到克莱斯特写作的19世纪初正是欧洲军事思想与战争实践发生激烈变化的时代,也是普鲁士在拿破仑打击之下被迫进行军事改革的时代,就不能忽略《洪堡亲王》与当时战争文化之间的联系,不能无视军事在克莱斯特知识结构中的重要性,不能排除克莱斯特借文学来思考普鲁士军事改革道路的可能性。

一、19世纪初的战争文化之变和克莱斯特的军事改革理念

法国大革命爆发之后,1793年的全民动员令(*levée en masse*)消除了古典战争中对军人与平民的区分,使战争从一项职业军队的事务变成了全民族的事务。拿破仑的崛起则颠覆了18世纪的线式战法,完善了歼灭战略和大兵团作战的散兵战术,从而使18世纪欧洲的军事传统发生了断裂。克劳塞维茨(Karl Philip Gottfried von Clausewitz)从中认识到,军事问题已经不再是理性的战争规划、战略的合目的性、明智的洞察,而是非理性:它所关乎的是一种士气上的决定(891)。从文化学的视角看,19世纪初战争性质与战略战术的变化反映了启蒙时代战争文化的转折。这一变化可以追溯到18世纪晚期,战争艺术的哲学观念和战争的道德评价开始偏离启蒙文化的理性主义与和平主义倾向。

一方面,对战争艺术的理解从启蒙前期的机械主义与理性主义走向了18世纪末的生物学主义,脱离了近代早期霍布斯及笛卡儿以机械原则描述运动的模式和拉美特利(Julien Offroy De La Mettrie)在《人是机器》(*L'homme-Machine*)中的“钟表隐喻”(60)。机械主义世界观认为物体的运动遵循既定的机械法则,这种法则“既适用于生命体,也适用于无生命体,物体的运动和秩序位于静态不变的世界之中”(Kleinschmidt 51)。正如人的身体可以被感知为机器,军队也可以被感知为由官兵构成的战争机器,18世纪线型操练方式的整齐划一和精确同步完全符合机械主义的观点。随着世界中有生命的一部分被描述为不同于机械世界的有机体(Organismen),这种机械主义世界观在启蒙晚期彻底改变了,并且也反映在了军事思想上。法国人吉贝尔(J. Guibert)的《战术通论》(*Versuch über die Taktik*)认为,军队的行动规则应

当与人的自然行动规则相一致(184),因此相比于静止和保持平衡,他更重视运动和制造紧张。吉贝尔的军事建议在1791年法国革命军队的规章中受到重视,军队放弃了固定动作流程的训练,而是单独练习某些动作,用个性化的独立动作替代预先计划好的复杂的动作(Kleinschmidt 66)。由此,18世纪军事理论家的“几何精神”(钮先钟 138)不再适用,而英国人劳易德(H. Lloyd)的主张,即指挥战争需要几何一般的精确性(XVIII),或普鲁士人比洛(A. H. Bülow)的希望,即战争的科学化终将消灭战争本身(*Geist des neuern Kriegssystem* 2),二者也都在18世纪末遇到了自身的反题。

另一方面,18世纪晚期的德意志文化精英开始质疑启蒙的和平主义,转而肯定战争的道德价值。康德在《判断力批判》中指出,战争能使一个民族的精神境界变得更崇高,而长期的和平只会助长纯粹的商业精神,使民族精神变得低贱(103)。威廉·冯·洪堡(Wilhelm von Humboldt)则将战争和教育联系起来,称赞战争对民族性格的积极影响,并称之为“塑造和教育人类的最有益和有效的现象之一”(48)。费希特(Johann Gottlieb Fichte)也肯定战争的教化作用:“战争提高了我们的灵魂,使我们具有英雄主义的情感和行为,使我们蔑视危险和死亡。”(226)黑格尔亦有类似论述:“战争还具有更崇高的意义,[……]持续的平静会使湖水发生相反的结果,正如持续的甚或永久的和平会使民族堕落。”(341)

伴随着战争领域哲学观念与道德评价的转变,反思启蒙文化对军事的负面影响也成为军事著作的重要内容。1780年,普鲁士军事理论家冯·布伦肯霍夫(L. von Brenkenhoff)批判了军事领域内启蒙的后果,认为启蒙强调军人阶层应具备的科学知识、文化修养和艺术品味对军事活动产生了消极影响(转引自Sikora 31)。19至20世纪的军事史书写批判18世纪的战争只是一种玩弄形式的训练艺术,是战争精神的“颓废”,充斥着“非决定性”,遵循着逃避战斗实质的“洛可可”式战略,因而根本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战争(Mönch 75)。直到耶拿战役100年之后的1906年,普鲁士军事作家范德戈尔茨(C. von der Goltz)还指出,对普鲁士的军事而言,“在启蒙的阳光下萌发的花朵”带来的只有灾难(509)。

世纪之交军事领域的种种现象表明,至19世纪初,启蒙时代那种通过科学和理性来约束乃至消弭战争的军事文化已经式微,取而代之的是随拿破仑战争而兴起的通过动员全民族资源和激发全民族热情来歼灭政治敌人的战争文化。在这个意义上,施米特(Carl Schmitt)称拿破仑之前的18世纪欧洲战争为“古典的”战争(355)。到拿破仑时代,战争从一种“尊重与侵略、互惠与竞争、共情与敌对之间的平衡”(Figal 23)变成了蕴含着绝对敌对关系的生死存亡之争。

在战争文化转变的语境下,普鲁士的军事改革却表现为传统与革新之间漫长而艰难的斗争和妥协,因为在普鲁士这样的典型军事国家,七年战争以来腓特烈二世(Friedrich II)的战争神话根深蒂固,导致18世纪古典战争艺术的传统极其深厚。克莱斯特之所以离开普鲁士军队,与其积弊已深且无心改革不无关系。文学史的传统观点是,克莱斯特发现了军人生活与个人道德之间的鸿沟,因而最终为了个人发展而放弃了军事生涯(Günzel 37)。实际上,克莱斯特

的离职不是因为厌恶军事本身，而是由于对腓特烈二世晚期的普鲁士军队结构和军事原则感到绝望。在写给家庭教师马蒂尼（Ch. E. Martini）的信中，他强调了作为人和作为军官的两种原则相互对立，无法调和：“要使这两种义务[人的义务和军官的义务]统一起来，以目前普鲁士军队的状况，绝无可能。”（Kleist 27）在长达八年的驻军生活中，克莱斯特对1800年前后的普鲁士军事体制感到不满，这种不满与其说是源于作家天性中对军事领域天然的反感，倒不如说是来自他军人意识中对普鲁士军事改革迫切性的认识和对军事领域改革无望的愤怒。

克莱斯特14岁就以下士军衔加入波兹坦步兵军团第15号近卫队，并于第一次反法同盟期间参加了莱茵河战役。1794年7月，在特里普施塔特附近，克莱斯特所在军团与数千名法国散兵展开了战斗，感受到了战争的变化。在波兹坦驻军期间，克莱斯特与有志于普鲁士军事改革的军官马森巴赫（Ch. von Massenbach）来往密切，并通过他与改革派的哈登贝格亲王建立了联系。1798年春，克莱斯特上书刚即位的普鲁士国王腓特烈·威廉三世（Frederick William III），就普鲁士军队的现实发表看法，希望引起国王的注意。但事后，他认为有充分理由断定国王没有改革的意愿，故未将此信寄出（Günzel 38）。

1805年9月8日，拿破仑向奥地利宣战，并于10月在埃尔辛根战役中大败奥军，次月即占领维也纳，在12月的奥斯特里茨战役中又击败俄奥联军。克莱斯特对普鲁士在法奥战争中迁延不决的态度非常忧虑，并从拿破仑的胜利中预见到了普鲁士的崩溃。他敏锐地指出这是一场不同于以往的“关乎存在与毁灭的战争”，并认为冬季戍营和堡垒战的规则无法应对拿破仑“极端的力量”，相反，应当召集国内各等级人民参战，并增加兵员数量（Kleist 351）。对于克莱斯特而言，1805年的战争意味着“时代似乎想造就一种新秩序，而我们在这种新秩序中所能经历的，只有旧秩序的颠覆”（352）。克莱斯特对战争局势的判断说明他不仅认识到了战争性质的变化，也感知到了普鲁士军事改革的方向。

1806年普鲁士在耶拿和奥尔施泰特大败之后，王室暂迁于柯尼斯堡。同时活跃在这座东普鲁士都城的还有后来普鲁士改革的核心人物：政治改革家包括施泰因（Heinrich Friedrich Karl vom und zum Stein）和哈登贝格（Karl August Fürst von Hardenberg），军事改革派如沙恩霍斯特（Gerhard Johan David von Scharnhorst）、格奈森瑙（August Wilhelm Anton Neithardt von Gneisenau）和克劳塞维茨。同在柯尼斯堡的克莱斯特与普鲁士改革派人物常有来往，包括当时战争及领土委员会的主席奥尔斯瓦尔德（H. J. von Auerswald）、参事谢夫纳（J. G. Scheffner）、曾从事东普鲁士农民改革的施泰戈曼（F. A. von Stägemann）等（Samuel 29）。同时，克莱斯特的密友利林施特恩（R. von Lilienstern）是普鲁士军事改革的重要人物。当时执教柏林军事学院的沙恩霍斯特曾认为，除了克劳塞维茨之外，利林施特恩是他最出色的学生，而这两人属于普鲁士军队中具有知识分子气质的新生代军官，也是后来普鲁士军事改革的发起者（Schulz 71）。

由于改革派活动的特殊性，克莱斯特在柯尼斯堡的活动没有在书信中留下过多痕迹，他在1806年12月6日致信其姊乌尔里克（Ulrike von Kleist）时表示：“关于他们（改革派）在

做些什么，我却不能写在信里，因为那些都是被禁止的。”（367）这说明，克莱斯特对改革派主张和活动的了解远比文献中所能体现的更多。1807至1809年在德累斯顿期间，他甚至直接参与了改革派的秘密政治活动。普鲁士步兵元帅许泽（H. von Hüser）对这一时期普鲁士爱国运动的回忆可以佐证：“法国人密切监视着邮局，因此为了与人交接和寄出信件，需要绕路去那些监视较少的偏僻之处。我曾为此多次骑马到巴鲁特给克莱斯特寄信。这位知名诗人住在德累斯顿，是我们志同道合的伙伴。”（转引自 Sembdner 292）

19世纪德国历史学家特赖奇克（H. von Treitschke）曾站在偏狭的民族主义立场上，将克莱斯特的反拿破仑斗争与反对法国大革命联系起来，深刻地影响了20世纪的梅林（F. Mehring）和卢卡奇（G. Lukács）等人对克莱斯特的评价（Grathoff 37）。但事实上，克莱斯特在观念和行动上与普鲁士改革派的“志同道合”恰好说明他不仅并非如特赖奇克所说“在内心上始终是老派的普鲁士军官”（转引自 Sembdner 171），反而在某种意义上是旧普鲁士军事制度的叛逆者。克莱斯特之所以仇恨法国人和拿破仑，并非因为拿破仑继承了法国大革命的理念，而是因为拿破仑对德意志的军事征服。从1793年的第一次反法同盟战争到1805年的法奥战争，克莱斯特对于战争的变化有了清晰的认识：普鲁士的局面只能通过一场战争来解决，而且是一场性质完全不同的战争。要摆脱异族的统治，救赎的道路不是简单排斥拿破仑的战争观念和战争方式，而是改变普鲁士的军事体制。正是在1805年之后，克莱斯特与普鲁士改革派人物之间的联系日益密切，而战争影射和军事讨论也开始频繁地出现在他的政治活动、论战文章和文学创作中，成为阐释其作品的一条重要线索。从《破瓮记》（*Zerbrochene Krug, Der*）到《赫尔曼战役》（*Die Hermannsschlacht*）再到《洪堡亲王》，都与19世纪初战争文化的改变和克莱斯特对普鲁士军事改革的思考有着密切的联系。

二、军事变革的文学加工：军事知识与《洪堡亲王》的文本建构

在克莱斯特的知识结构中，军事占据了重要地位，而且构成了他人生最后几年中思考的重要问题。《洪堡亲王》演绎了可称为勃兰登堡立国之战的费尔贝林战役，剧本与普鲁士反拿破仑战争之间的现实联系可见一斑。然而，克莱斯特却将军事史上一场凭借地形和骑兵优势而获胜的战争改写成了一场因未按书面战略计划展开而导致歼灭计划失败的战争。选帝侯的意图是通过各兵种的投入，彻底歼灭瑞典军队，而洪堡所代表的骑兵冲锋精神不仅无益于作战计划的实现，反而妨害了战争大局。显然，这个作战计划不属于17世纪选帝侯的时代，而属于19世纪拿破仑的时代。正是凭借对同时代军事发展状况的熟悉，克莱斯特才得以用军事知识构建《洪堡亲王》中的战争。

这场战争剧始于洪堡亲王在梦幻与现实的交织之中对作战计划的无视。在口授命令的过程中，给洪堡亲王的命令重复了三次：“在此之前，他不可吹响进攻的号角。”（574）^[1]而对他

列阵待命的范围则更有明确的规定：在哈克维茨村的平原上，列阵于敌军右翼的对面，远离炮火射程之外（571）。这样的划分方式来自同时代的军事理论。1805年，比洛在《新型战争原理》（*Lehrsätze des neuen Krieges*）中将炮火射程作为区分战略和战术范畴的第一定义：

一切在炮火射程之外或在敌军视野之外的战争运动都是战略性的。一切在此边界之内的运动都是战术性的。因此，战略是关于视野范围或炮火射程之外的战争运动的科学，而战术是关于此边界之内战争运动的科学。（Bülow, *Lehrsätze des neuern Krieges* 1）

克莱斯特对洪堡亲王列阵位置的安排反映了当时的军事知识，战略与战术范畴的区分表明了19世纪初战争的变化。正如法国哲学家维利里奥（P. Virilio）所言：“像腓特烈二世那样临机发挥，如纸上的几何图形一般规整地组织作战阵型和秩序的时代已经一去不返。”（116）克莱斯特用戏剧表明，19世纪战争的发展已经明显地扩展了战场（Kriegstheater）的范围：战争这出在腓特烈二世时代还可以被观者尽收眼底的大戏，此时已脱离了指挥者的视野。《洪堡亲王》通过第一幕和第二幕刻画了一场战役从谋划到实施的全过程，从三个视角还原了战役：第一个视角是理论的视角，即作战计划的视角；第二个视角是主角视角，即洪堡亲王的视角；第三个视角是第三方视角，也即第二幕第六场默尔内（Mörner）战报中的视角。多视角的战况书写暗示任何一方对战场形势的把握都是片面的，无以窥视战场的全貌。就此而言，18世纪战场的明晰性已经消失，战争正从可知走向不可知。其结果就是参战者无法再完全信任自身的判断，而正因如此，尤其涉及战略范畴时，必须制定详细周密的计划。洪堡亲王被部署在炮火范围之外，说明选帝侯为他的进攻行动赋予了战略意义，希望通过各部的配合，达成歼灭敌军战略意图。

基于军事知识，克莱斯特在《洪堡亲王》中构建了一个无法把握的现代战争空间，察觉到拿破仑时代的指挥官已经因战场的扩大而无法按传统方式现场指挥战争。19世纪初，军事指令日益间接化和书面化。拿破仑本人曾通过大量书信指挥各战场，他与麾下将帅之间的书信往来为这一变化提供了早期的佐证文献（Kittler, „Kleist und Clausewitz“ 73）。《洪堡亲王》第一幕中由元帅口授、军官笔写的战略部署过程则在文学上反映了这种战争范式转换。只有在战争范式转换的背景之下，才会出现洪堡亲王胜而获罪的悖论。由于战场上信息传递的不畅，选帝侯并不知晓瑞典人行动的变化已经超出了自己的预判，因而只能按照原先的作战计划，暂未向洪堡亲王发出指令；而洪堡亲王身处战场，看到敌军的变化，却尚未收到命令，只能凭靠自己的临机判断，介入战争。

在军事意义上，戏剧所塑造的洪堡与选帝侯之间的矛盾灵感来自19世纪初战场信息交流不畅的问题，这不仅关系到战争范式的转换，也表明了《洪堡亲王》对当时的新军事技术的关注。早在1790年，法国牧师沙普（C. Chappe）就发明了一套远程传递信息的信报系统，被称为光

学电报 (Kittler, „Kriegstheater“ 38)。通过在高处修建钢架, 再利用改变钢架的形态来表示不同字母和数字, 达到远程传输信息的目的。拿破仑曾使用这套系统来加强当时各支军队之间的联系, 但由于担心传递的信息被敌人获取, 大多时候仍通过书信来指挥战争。克莱斯特看到这一体系的进步性, 不仅在《洪堡亲王》中加以演绎, 也在 1810 年 10 月的《柏林晚报》(*Berliner Abendblätter*) 上以“有益的发明”为题, 构想了一种以炮弹传递信息的系统 (Bombenpost)。文中介绍了当时电报的发明, 称赞其快如“骑在闪电的翅膀”上, 也指出其只能发送简短讯息之不足。在谈及炮弹信息系统之时, 克莱斯特称该系统将“填补空白, 加快和丰富文明世界之间的贸易交流”, 而只字未提其军事用途 (Kleist 593)。行文之中的戏谑意味很可能是在讽刺炮兵出身, 并在战争中运用了电报系统的拿破仑。《柏林晚报》的言论看似荒诞不经, 《洪堡亲王》却隐藏着对法国新战争技术的关切。

全面歼敌的战略计划、扩大了战场范围、书面化的命令体系、间接的指挥方式、新突破的军事技术, 等等, 这些都是在拿破仑时代逐渐开始主导战争的因素。《洪堡亲王》对费尔贝林战役的重写融入了这些新的军事元素, 使军事知识成为戏剧文本构建的重要环节, 充分表明了克莱斯特对军事变革的感知和思考, 反映了他的军事问题意识。通过军事知识去建构《洪堡亲王》的文本, 去重写一场勃兰登堡的立国之战, 足以说明克莱斯特在这部历史剧中对普鲁士军事改革问题的思考是严肃的, 他所关心的是在拿破仑时代的军事变革之中, 若有需要, 普鲁士要如何才能像一个多世纪之前的勃兰登堡那样成功地抵御外敌。

三、戏剧冲突的军事意义：战争书写中普鲁士传统与拿破仑道路的碰撞

《洪堡亲王》处于 19 世纪初完全不同乃至相反战争思想的交界上, 因此洪堡的战场表现和选帝侯的战略计划可以看作不同军事观念的文学化。选帝侯的计划象征着新的指挥方式和歼灭战略, 洪堡的主动进攻则体现了贵族军官的军事荣誉感和英雄主义精神。他虽然赢得了战役, 却破坏了歼敌之计, 阻碍了全局性的胜利 (Kittler, *Die Geburt des Partisanen aus dem Geist der Poesie* 260)。作为战争文本, 《洪堡亲王》反映了 19 世纪初普鲁士面临着在军事上进行新旧抉择的特殊局面, 洪堡亲王与选帝侯的矛盾是不同军事观念之间的冲突。

剧中的洪堡亲王与普鲁士传统关系密切。1807 年军事改革开始之时, 沙恩霍斯特和格奈森瑙等人革除了以统帅之名给军队编号的旧制, 改为以兵源省份、兵种、数字来编号, 试图用军队与国家之间的归属关系去替代军队与统帅之间的归属关系, 强化军队的国家意识。而唯一保留旧制的只有国王的近卫轻骑兵团 (Leib-Husaren) 和王后龙骑兵团 (Königin-Drögoner)——前者仍按封建军制组织, 而后者则是因 1805 年失去统帅而更名 (Kittler „Die Revolution“ 66)。洪堡亲王所率骑兵团仍按旧制命名, 而与他在情感上最亲近的娜塔莉公主则是龙骑兵团在名义上的统帅, 暗示了军事改革对普鲁士传统的让步。到第二幕第二场, 洪堡亲王力主抗命出击,

宣扬为统帅而战的原则：“诸位，听我口令！谁若不随其统帅投入战斗，就毫无道德！”（Kleist 583）这一以统帅为中心的战争观念反映的是军事改革前的状况，军队只须服从于统帅，而非国家意识。与梦幻和编织桂冠的情节一致，上述细节都象征洪堡亲王遵循的是一种前现代战争观。

在元帅部署作战计划之时，处于梦游状态的亲王与紧张备战的其他军官明显分属两个世界。在战术层面，洪堡亲王可以依靠直觉来观察判断，也能够发挥精神力量赢得战斗，但他却无法在战略层面统观整个战争计划，也无力把握全局的部署。他在开战之前抱怨说：“口授笔写，令我糊涂。”（Kleist 579）在拿破仑时代的书面命令体系之前不知所措，是因为他并未意识到军事史的新时代已经来临，这与军事溃败之后普鲁士一部分军事精英的状态如出一辙。1807年7月，腓特烈·威廉三世委任军事重组委员会调查战败的原因。在这个委员会中，几乎没有人认为现存体制需要重大的变革，包括约克元帅（Ludwig Yorck von Wartenburg）和克奈泽贝克（Karl Friedrich von dem Knesebeck）等人在内的委员会高层也认为，战败不是因为军事或政治体制的根本失败，而是因为领导层的无能和运势不佳（Craig 39）。

与洪堡的军事贵族作风相比，克莱斯特笔下的选帝侯却表现出深受法国影响的现代军事特质，固守歼灭瑞典人的计划。选帝侯与洪堡在军事观念上的冲突在科特维茨为洪堡辩护那一场戏集中表达了出来：

蹂躏你土地的恶龙已遭驱逐，头破血流：一天之内还能有更大的作为？它是否两周之内还精疲力竭地躺在沙地上，治愈伤口，与你又有什么关系？我们已经学会战胜它的技艺，对于再次使用，我们饶有兴味：就让我们再次和全副武装的弗兰格尔面对面地战斗吧，直到将其赶下波罗的海！（Kleist 631）

科特维茨仍旧推崇战争的艺术，将战争看作允许重复的竞争，而不是决定生死存亡的斗争，故而满足于胜负之分而不追求其绝对性。然而，选帝侯并不认可洪堡的胜利：“我不想要这种胜利，它不过是偶然的一个子嗣；我要维护的是律法——它是王冠之母，为我生下一个胜利的家族。”（632）在选帝侯眼中，凭借战争艺术之优越性而取得的胜利是偶然的，无法长久维持，正如18世纪的战争模式一样，缺乏决定性。而他所谓的维护律法，就是坚持拿破仑时代歼灭战略的一个隐喻。这个隐喻的本身就是：在军事上维系勃兰登堡—普鲁士国家的希望不在战争艺术上，而在改变普鲁士对战争原则和战争本质的理解上。

早在第二幕末场，克莱斯特就已暗示了洪堡与选帝侯之间矛盾的军事意义。当洪堡的身份象征佩剑被解下之后，他说：

我的表兄弗里德里希想当布鲁图斯，他用粉笔在亚麻布上记录，看到自己坐在贵人席上，面前是瑞典人的旗帜，桌上是勃兰登堡的军人守则。[……]我有一颗典

型的德意志心灵，习惯高尚和爱；如果在此刻他像老古董那样顽固地“眷顾”我，他会使我感到难过，我为他感到惋惜！（597）

此处指涉罗马共和国缔造者之一的布鲁图斯（L. J. Brutus）处决自己两个密谋帝制、颠覆共和的儿子的史实。而文中的“老古董”（Antike）一词指坚守共和制度的古代遗风。

克莱斯特影射了法国画家大卫（J. David）的油画《护从搬来布鲁图斯儿子的尸体》（*Les licteurs rapportent à Brutus les corps de ses fils*）。此画创作于1789年，借这一历史事件讴歌法国革命。克莱斯特为何隐秘地将选帝侯与法国大革命联系在一起？洪堡亲王自称拥有“典型的德意志心灵”之时，他与选帝侯之间就形成了一条相对清晰的界线。按照这一逻辑，选帝侯的坚持律法对应着随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而兴起的新战争形式，来自古代罗马传统（Antike），而洪堡亲王则象征着普鲁士—德意志的旧战争形式。洪堡亲王之所以为选帝侯“感到惋惜”，不仅是因为自己胜而获罪，更是因为选帝侯的做法乃是将异族的方式凌驾于本民族的传统之上，甚至以古罗马—共和制—拿破仑的军事策略来取代日耳曼—普鲁士—德意志的军事传统。

四、在普鲁士传统与拿破仑道路之间：《洪堡亲王》的妥协与改革的折中

关于《洪堡亲王》和普鲁士军事改革之间的关系，大卫那幅讴歌法国大革命的油画传达了关键信息：当纯粹的军事问题与民族问题联系到一起，状况就变得复杂起来。拿破仑的军事道路作为法国大革命的遗产，与普鲁士传统格格不入，即便这一源自法国的现代战争方式可以为普鲁士提供军事上的出路，在普鲁士亦缺乏生长的土壤，更何况其中还夹杂民族传统和民族情绪的因素。在《洪堡亲王》和普鲁士军事改革中，军事问题必然同时是民族问题和政治问题。这既是普鲁士军事改革派所处的特殊历史境遇，也是普鲁士军事改革始终面临的困难。

关于拿破仑时代军事发展趋势的认识，普鲁士改革派与克莱斯特不谋而合。1792年之后，军事改革派代表人物沙恩霍斯特出版的《新军事期刊》（*Neues Militärisches Journal*）后六卷（1792—1797）指出：第一次反法同盟战争之后，民众及其牺牲意愿是战争胜负的因素之一，道德、社会和政治因素往往影响乃至决定战争的进程，而政治秩序和制度在有效动员一个国家的军事潜力上发挥着关键的作用（White 15）。但这种潜力的发挥必然要诉诸政治改革，这一点在当时的普鲁士很难实现，因此当沙恩霍斯特于1801年来到柏林为普鲁士军队服役时，他的改革建议也仅仅是战术层面上的。包括把普鲁士军队重组为各兵种联合的军团、改变普鲁士步兵的战斗队形并使之囊括炮兵和骑兵、把线式战法步兵的第三排训练成散兵，等等（28），但尽数遭到拒绝。因为这些措施每一条都对普鲁士的传统军事体系做出了调整，似乎更深入一些就会涉及政治体制，令保守派嗅到革命的气息。但事实上，普鲁士军事改革从来就没有

深入到政治层面，甚至在军事上也只是对传统体制进行修正。

沙恩霍斯特在一份备忘录中指出：“我从未写过任何不利于普鲁士军队的文章，出于信念，我始终是普鲁士军事传统的崇拜者和赞颂者。”（214）柏林军事学会存在的1801至1805年间，沙恩霍斯特所主导的论辩主题虽然主要围绕着法国大革命之后的战争，但也经常讨论七年战争。在《柏林军事学会大事记》（*Denkwürdigkeiten der militärischen Gesellschaft in Berlin*）中，他发表了一系列关于1757年各战役的论文，论述内容包括布拉格战役、科林战役和罗斯巴赫战役。在普鲁士，七年战争是一个在政治上不受怀疑的主题，沙恩霍斯特得以间接地表明自己的改革绝非与普鲁士军事传统决裂。

对于反法同盟战争中产生的全民皆兵的军事遗产，沙恩霍斯特的态度也极为谨慎，因为这种动员全民族资源的军事观念显然超出了他关于常备军与民兵组织相结合的构想。对于改革派的另一重要人物格奈森瑙而言，策划民众起义的计划与削减常备军的长期计划密不可分，可以化解民族与军队二元对立的局面，形成德意志民族的军队。而对于这样一种与法国类似的民族军队结构，沙恩霍斯特的态度仍是开放的：他没有收回自己重视常备军的意见，也不认为受资助的国民军队和全民战争的方案相互排斥（Sikora 181）。沙恩霍斯特的态度一方面是由于现实考虑，因为在1808年夏季的情形下，要和法军进行一场有规划的持久战，无论是依靠各省的常备军，还是通过战时后备军，都不可能实现；但另一方面也说明他仍然遵循着18世纪以来普鲁士的军事传统，不愿任凭民众的激愤来主导反法战争，即便是秘密起义的筹划，也要保持国家对行动的控制。

实际情况是，即便改革派接受了拿破仑的军事理念，也无法在他们设计的普遍义务兵役制和民兵组织方面取得直接的进展。直到1813年，旧普鲁士的划区征兵制仍然保有效力，而且在建立民间力量补充机制方面，普鲁士未能采取任何措施。改革中的速成兵制度效用也并不明显。后世所谓的该制度成功绕开了法国的限制，训练出了一支十五万人的秘密军队的说法，自从提出以来，就成了一个爱国主义的神话。速成兵制度在1807年7月首次被沙恩霍斯特提出之时，其目的仅仅是训练战争中的替代性力量。在1809年之前，它并没有被应用到整个军队里，而且在1811年就被打断了，其作用远没有想象中那么大。1813年战争爆发之时，普鲁士正规军队及其后备力量也只有65,675人（Craig 49）。

在军事改革的语境下，克莱斯特的《赫尔曼战役》和《洪堡亲王》正与沙恩霍斯特的态度构成一反一正的映照。《赫尔曼战役》所构建的民族解放战争模式恰与沙恩霍斯特的观念相反。赫尔曼放任狂热的民族情绪去操纵战争，付出巨大代价，在构建德意志民族的热情之时破坏了日耳曼人的土地。克莱斯特在塑造赫尔曼的过程中又不断消解这一英雄形象，在宣扬游击战争和民族主义意识形态的同时又在不断地进行解构。正如他的《法国新闻学教程》（*Lehrbuch der französischen Journalistik*）在教导德国人如何向民众宣传的同时，也在拆解和讽刺这种政治鼓吹的伎俩。当施米特将《赫尔曼战役》称为所有时代最伟大的游击战作品之时，也许没有在意克莱斯特在其中描述的并非真正的游击战。按照施米特所定义的，游击队员具有一种“依

托大地的品格”(363),而赫尔曼战役的结局是条顿堡变为“废墟和灰烬”(Kleist 551)。显然,赫尔曼不是一个游击队战士,他甚至可以为了完成战争而牺牲乡土(Horn 73)。通过这一矛盾,克莱斯特传达了双重信息:游击战争中的非正规性和意识形态宣传是随着拿破仑战争而出现的,要击败拿破仑,必然要采取与之相同的军事策略;然而,这么做也意味着对一切旧式战争伦理的颠覆——对普鲁士的军事传统而言,这无异于“废墟和灰烬”。于是,克莱斯特在塑造这样一种民族解放战争的同时,也揭示了其运行机制,从而解构了战争的崇高意义。这表明,克莱斯特通过《赫尔曼战役》建构了一种反拿破仑的战争模式,但又不能完全认同这种模式,因为它既可以消灭敌人,也必然毁灭自身。这种毁灭既包括物理上的毁灭(破坏乡土),也包括伦理上的毁灭(颠覆传统)。

正是这种在普鲁士传统与拿破仑道路之间的两难境地,使得克莱斯特不得不在《洪堡亲王》中安排了一个妥协的解决方案。洪堡亲王在剧末的内心转变表明他最终服从了选帝侯的战争原则。当最后一次面对选帝侯时,原本惶惶不可终日而急于求生的洪堡转而表示甘愿以死来颂扬神圣的战争律法。而在第五幕终场,选帝侯手执桂冠,交给娜塔莉,并由娜塔莉为洪堡亲王戴上,则象征着选帝侯最终接纳了洪堡的胜利,由此构成了一种双向的妥协。克莱斯特在《赫尔曼战役》中已经指明,普鲁士若要摆脱拿破仑的异族统治,只能吸收和容纳异族的军事优势——现代的全民战争形式,但这种转变在消灭敌人的同时也无限扩大了战争,最终毁灭了日耳曼尼亚。在《洪堡亲王》中,克莱斯特一以贯之,但是却从一个与游击战争相反的角度讨论了反拿破仑战争的问题。洪堡的屈服和选帝侯的让步既说明普鲁士对军事变革的反应是被迫的,也表达了克莱斯特对反拿破仑战争的文学想象:将普鲁士传统与拿破仑道路相结合,从而既战胜拿破仑的强权,又保全普鲁士的传统。一场类似法国发生的彻底的军事革命必然以普鲁士政治体制的变革为基础,而这在当时既不具备客观条件,也必将以市民革命的形式铲除普鲁士的根基。可以说,沙恩霍斯特关于常备军与民兵结合的军事策略为《洪堡亲王》中的妥协下了一个现实的注脚。

注释 [Note]

- [1] 本文中《洪堡亲王》译文参考袁志英译本,见杨武能选编:《克莱斯特作品精选》。南京:译林出版社,2007。部分译文有改动。

引用文献 [Works Cited]

- Bülow, A. H. *Spirit of the Modern War System*. By Benjamin Gottlieb Hofmann, 1799. [Bülow, A. H. *Geist des neuern Kriegssystems*. Bei Benjamin Gottlieb Hofmann, 1799.]
- . *Tenets of the Modern War*. By Heinrich Föhlich, 1805. [Bülow, A. H. *Lehrsätze des neuern Krieges*. Bei Heinrich Fröhlich, 1805.]
- Clausewitz, Carl Von. *On War*. Vol. 3. Translated by Academy of Military Sciences, The Commercial Press, 1982. [克劳塞维

- 茨:《战争论》(第三卷),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译。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82。]
- Craig, G. A. *The Politics of the Prussian Army 1640-1945*. Clarendon, 1955.
- Fichte, G. *Anthology of Fichte's Works*. Vol. 1. Edited by Zhixue Liang, The Commercial Press, 1990. [费希特:《费希特著作选集》(卷一), 梁志学编。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90。]
- Figal, S. E. "The Point of Recognition: Enemy, Neighbor, and Next of Kin in the Era of Frederick the Great." *Enlightened War. German Theories and Cultures of Warfare from Frederick the Great to Clausewitz*, edited by E. Krimmer and P. A. Simpson, Camden House, 2011, pp. 21-40.
- Goltz, C. *From Roßbach to Jena and Auerstedt. A Contribution to the History of the Prussian Army*. Königliche Hofbuchhandlung, 1906. [Goltz, C. *Von Roßbach bis Jena und Auerstedt. Ein Beitrag zur Geschichte des preußischen Heeres*. Königliche Hofbuchhandlung, 1906。]
- Grathoff, D. "Heinrich von Kleist and Napoleon Bonaparte the Furor Teutonicus and the Distant Revolution." *Heinrich von Kleist. Kriegsfall – Rechtsfall – Sündenfall*, edited by G. Neumann, Rombach, 1994, pp. 31-60. [Grathoff, D. „Heinrich von Kleist und Napoleon Bonaparte der Furor Teutonicus und die ferne Revolution.“ *Heinrich von Kleist. Kriegsfall – Rechtsfall – Sündenfall*, hrsg. v. G. Neumann, Rombach, 1994, pp. 31-60。]
- Guibert, J. A. H. *General Essay on Tactics*. Waltherscher Eigenverlag, 1774. [Guibert, J. A. H. *Versuch über die Taktik*. Waltherscher Eigenverlag, 1774。]
- Günzel, C. *Kleist. A Picture of Life in Letters and Contemporary Reports*. Verlag der Nation, 1984. [Günzel, C. *Kleist. Ein Lebensbild in Briefen und zeitgenössischen Berichten*. Verlag der Nation, 1984。]
- Hackert, F. "Kleist's Prince Friedrich von Homburg in the Post-War Interpretation. 1947-1972." *Journal of Literature and Linguistics*, no. 3, 1973, pp. 53-80. [Hackert, F. „Kleists Prinz Friedrich von Homburg in der Nachkriegs-Interpretation. 1947-1972.“ *Zeitschrift Für Literaturwissenschaft und Linguistik*, no. 3, 1973, pp. 53-80。]
- Hegel, Georg Wilhelm Friedrich. *Elements of the Philosophy of Right*. Translated by Yang Fan and Qitai Zhang, The Commercial Press, 1979. [黑格尔:《法哲学原理或自然法和国家学纲要》, 范扬、张企泰译。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79。]
- Horn, E. "Herrmann's 'Lessons.' Strategic leadership in Kleist's 'Herrmannsschlacht.'" *Kleist-Jahrbuch*, J. B. Metzler, 2011, pp. 66-90. [Horn, E. Herrmanns „Lektionen.“ Strategische Führung in Kleists „Herrmannsschlacht.“ *Kleist-Jahrbuch*. J. B. Metzler, 2011, pp. 66-90。]
- Humboldt, Wilhelm von. *Ideas for an Attempt to Determine the Limits of the Effectiveness of the State*. Verlag von Eduard Trewendt, 1851. [Humboldt, W. *Ideen zu einem Versuch die Gränzen der Wirksamkeit des Staates zu bestimmen*. Verlag von Eduard Trewendt, 1851。]
- Kant, Immanuel. *Critique of the Power of Judgment*. Translated by Xiaomang Deng, People's Publishing, 2001. [康德:《判断力批判》, 邓晓芒译。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1。]
- Kittler, W. *The Birth of the Partisan from the Spirit of Poetry. Heinrich von Kleist and the Strategy of the Wars of Liberation*. Rombach, 1987. [Kittler, W. *Die Geburt des Partisanen aus dem Geist der Poesie. Heinrich von Kleist und die Strategie der Befreiungskriege*. Rombach, 1987。]
- . "The Revolution of the Revolution, or What Matters in the War that Kleist's Prince of Homburg is Fighting." *Heinrich von Kleist. Kriegsfall – Rechtsfall – Sündenfall*, edited by G. Neumann, Rombach, 1994, pp. 61-83. [Kittler, W. „Die Revolution der Revolution oder Was gilt es in dem Kriege, den Kleists Prinz von Homburg kämpft.“ *Heinrich von Kleist. Kriegsfall – Rechtsfall – Sündenfall*, hrsg. v. G. Neumann, Rombach, 1994, pp. 61-83。]
- . "Kleist and Clausewitz." *Kleist Jahrbuch*, J. B. Metzler, 1998, pp. 62-79. [Kittler, W. „Kleist und Clausewitz.“ *Kleist Jahrbuch*, J. B. Metzler, 1998, pp. 62-79。]
- . "War Theatre." *War Theatre. Representations of War, Struggle and Battle in Drama and Theater since Antiquity*, edited by M. Auer and C. Hass, J. B. Metzler, 2018, pp. 25-48. [Kittler, W. „Kriegstheater.“ *Kriegstheater. Darstellungen von Krieg, Kampf und Schlacht in Drama und Theater seit der Antike*, hrsg. v. M. Auer u. C. Hass., J. B. Metzler, 2018, pp. 25-48。]
- Kleinschmidt, H. "Mechanism and Biologism in the Military of the 17th and 18th Centuries: Movements – Orders – Perceptions." *The Art of War in the Light of Reason: Military and Enlightenment in the 18th Century*. Part I, edited by D. Hohrath and K. Gerteis, Felix Meiner, 1999, pp. 51-73. [Kleinschmidt, H. „Mechanismus und Biologismus im

- Militärwesen des 17. und 18. Jahrhunderts: Bewegungen – Ordnungen – Wahrnehmungen.“ *Die Kriegskunst im Lichte der Vernunft: Militär und Aufklärung im 18. Jahrhundert. Teil I*, hrsg. v. D. Hohrath u. K. Gerteis, Felix Meiner, 1999, pp. 51-73.]
- Kleist, H. *Complete Works and Letters in Four Volumes*. Deutscher Klassiker, 1987-1997. [Kleist, H. *Sämtliche Werke und Briefe in vier Bänden*. Deutscher Klassiker, 1987-1997.]
- La Mettrie, J. O. *Man a Machine*. Translated by Shouguan Gu, The Commercial Press, 1996. [拉美特利:《人是机器》, 顾寿观译。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96。]
- Lloyd, H. *General von Lloyd's Treatise on the General Principles of the Art of War*. By Philipp Perrenon, 1783. [Lloyd, H. *Des Herrn General von Loyds Abhandlung über die allgemeinen Grundsätze der Kriegskunst*. Frankfurt u. Leipzig: bei Philip Heinrich Perrenon, 1783.]
- Lu, Shengzhou. “On Representation of the Emotion and Knowledge of Electricity in the 18th Century in Kleist’s *The Prince of Homburg*.” *Foreign Literature*, no. 3, 2022, pp. 153-63. [卢盛舟:《论克莱斯特〈洪堡亲王〉中的情感表现与18世纪电学知识》, 载《外国文学》2022年第3期, 第153-63页。]
- Mönch, W. “‘Rococo Strategies.’ Their Negative Posthumous Fame in 20th Century Military Historiography. The Example of Reinhard Höhn and the Problem of the ‘Moral’ Factor.” *The Art of War in the Light of Reason: Military and Enlightenment in the 18th Century*. Part I, edited by D. Hohrath and K. Gerteis, Felix Meiner, 1999, pp. 75-97. [Mönch, W. “‘Rokokostrategien’. Ihr negativer Nachruhm in der Militärgeschichtsschreibung des 20. Jahrhunderts. Das Beispiel von Reinhard Höhn und das Problem des ‘moralischen’ Faktors.” *Die Kriegskunst im Lichte der Vernunft: Militär und Aufklärung im 18. Jahrhundert. Teil I*, hrsg. v. D. Hohrath u. K. Gerteis, Felix Meiner, 1999, pp. 75-97.]
- Niu, Xianzhong. *History of Western Strategic Thought*. Guangxi Normal UP, 2003. [钮先钟:《西方战略思想史》。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3。]
- Samuel, R. *Heinrich von Kleist's Participation in the Political Movements of 1805-1809*. Kleist-Gedenk- und Forschungsstätte, 1995. [Samuel, R. *Heinrich von Kleists Teilnahme an den politischen Bewegungen der Jahre 1805-1809*. Kleist-Gedenk- und Forschungsstätte, 1995.]
- Scharnhorst, G. *Scharnhorst's Letters*. By Georg Müller, 1914. [Scharnhorst, G. *Scharnhorsts Briefe*. Bei Georg Müller, 1914.]
- Schmitt, C. *The Conception of the Political*. Translated by Zongkun Liu, et al., Shanghai People's Publishing, 2004. [施米特:《政治的概念》, 刘宗坤等译。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4。]
- Schulz, G. *Kleist. Eine Biographie*. C. H. Beck, 2007.
- Sembdner, H. *Heinrich von Kleist's Traces of Life. Documents and Reports of the Contemporaries*. Carl Hanser, 1996. [Sembdner, H. *Heinrich von Kleists Lebensspuren. Dokumente u. Berichte der Zeitgenossen*. Carl Hanser, 1996.]
- Sikora, M. “Scharnhorst and the Military Revolution.” *The Rebirth of War from the Spirit of Revolution. Studies on the Bellicose Discourse of the Late 18th and Early 19th Centuries*, edited by J. Kunisch and H. Münkler, Duncker and Humblot, 1999, pp. 153-83. [Sikora, M. „Scharnhorst und die militärische Revolution.“ *Die Wiedergeburt des Krieges aus dem Geist der Revolution. Studien zum bellizistischen Diskurs des ausgehenden 18. und beginnenden 19. Jahrhundert*, hrsg. v. J. Kunisch and H. Münkler, Duncker und Humblot, 1999, pp. 153-83.]
- Virilio, P. *War and Cinema. Logistics of Perception*. Hanser, 1986. [Virilio, P. *Krieg und Kino. Logistik der Wahrnehmung*. Hanser, 1986.]
- White, Ch. E. *The Enlightened Soldier. Scharnhorst and the Militärische Gesellschaft in Berlin 1801-1805*. Praeger Publishers, 1989.

◇责任编辑: 吴晋先

《仙后》中的历史书写与英格兰民族身份建构

◎ 郭龙 吴玲英

内容提要: 埃德蒙·斯宾塞在其史诗《仙后》中采用编年史、地方志和史诗预言三种历史书写形式建构了英格兰民族的历史、地理和宗教身份,由此确立了该诗“英格兰民族史诗”的地位。《仙后》中的历史书写不仅彰显了史诗中史与诗的互动,构成史诗中英格兰民族身份建构的重要途径,而且确证了历史文化记忆对强化英格兰民族认同、彰显英格兰民族身份中独特的英格兰性的关键作用。

关键词: 《仙后》 历史书写 英格兰民族身份 建构 埃德蒙·斯宾塞

中图分类号: I56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6-4366 (2023) 01-0045-13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英国 16、17 世纪史诗与英吉利民族命运共同体想象之研究”(20BWW052);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弥尔顿作品整理、翻译与研究”(19ZDA298)

作者单位: 中南大学外国语学院, 湖南 长沙 410083

DOI: 10.19967/j.cnki.flc.2023.01.005

Title: Historical Writing in *The Faerie Queene*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English National Identity

Abstract: *The Faerie Queene*, written by Edmund Spenser, represents history of England and constructs the historical, geographical, and religious identity of the English nation through three forms of historical writing: chronicle, chorography, and epic prophecy, making it the national epic of England. The historical writing in *The Faerie Queene* not only reflects interactions between history and poetry, which provides medium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English national identity in this epic, but also affirms the key role of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memory in strengthening national identity and in highlighting the unique Englishness embedded in the English national identity.

Keywords: *The Faerie Queene*, historical writing, English national identity, construction, Edmund Spenser

Author: Long Guo, Ph.D. Candidate,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Central South University, Changsha, Hunan, China; Lingying Wu, Professor,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Central South University, Changsha, Hunan, China.

《仙后》(*The Faerie Queene*)是英国16世纪史诗诗人斯宾塞(Edmund Spenser)受意大利浪漫史诗传统影响创作而成的一部岛国“浪漫史诗”(romance epic)。斯宾塞在史诗中通过寓言、类比、暗指和编年史等多种形式全方位地呈现了英格兰历史。史诗中浓厚的历史意识和独特的历史书写更是集中再现了英格兰的民族性。斯宾塞在《致雷利爵士函》(“The Letter to Sir Walter Raleigh”)中甚至将自己与古希腊的荷马、古罗马的维吉尔、文艺复兴时期的阿里奥斯托(Lodovico Ariosto)及塔索(Torquato Tasso)等“历史诗人”(poets historical)并置,认为《仙后》选取亚瑟王的历史作为题材正是遵循了史诗这一传统与惯例。在学者阿舍(Laura Ashe)看来,“史诗的意义即在于它的历史性”,虽然浪漫传奇相较于史诗具有明显的非历史性,但岛国浪漫传奇却是例外,它不仅具有突出的地域性和历史性特点,而且对现实、政治和道德探索特别关注(转引自肖明翰,《诺曼征服》116),这些特质对英格兰民族性的发展和民族身份的建构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斯宾塞在《仙后》中对历史的再现自17世纪以来就备受关注。英国文艺复兴时期诗人德雷顿(Michael Drayton)在史诗《多福之国》(*Poly-Olbion*)中模仿了斯宾塞对待历史的态度。19世纪英国浪漫主义诗人柯勒律治(Samuel Taylor Coleridge)坚称“仙国”完全是想象中的世界,无关任何具体的时间和空间,因此也不包含任何历史和地理领域(36)。20世纪以来,学界再次聚焦《仙后》中的历史,并对其展开多维研究:哈珀(Carrie Anna Harper)梳理了《仙后》中不列颠编年史的史料来源;格林劳(Edwin Greenlaw)系统地研究了斯宾塞作品中的历史寓言;奥康奈尔(Michael O'Connell)研究了《仙后》中历史的伦理价值;范·埃斯(Bart Van Es)梳理并讨论了斯宾塞笔下的历史形式。特别是近年来,学界对英国的民族性关注增加,斯宾塞作品中的民族性亦受到高度关注,然而鲜有学者对斯宾塞在《仙后》中的历史书写与英格兰民族身份建构之间的关联展开专门的探讨。国内学者仅刘立辉讨论了《仙后》中有关布鲁特抵达不列颠的历史叙述所揭示出的英格兰岛国性质与其岛国民族身份认同之间的关系(142)。自维吉尔以降,民族史书写已成为一种史诗传统,在该传统中,史诗英雄的行动被置于民族或帝国诞生之前的遥远历史过去(Fichter 1),诗人借神圣人物之口以预言未来的方式向史诗英雄揭示民族历史,以彰显其民族的神圣起源和伟大历史命运。因此,史诗中的历史书写对民族历史记忆传承、民族身份建构和民族认同强化都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本文拟从历史、地理和信仰三个维度对《仙后》中的历史书写展开研究,探讨史诗中的编年史、地方志和史诗预言三类历史书写形式之于英格兰民族历史、地理文化和宗教身份建构的重要作用。

一、编年史书写与英格兰民族历史身份之建构

英国著名社会历史学家、民族主义与族裔研究专家史密斯(Anthony D. Smith)在探讨民族认同的族裔基础时指出,在所有的族裔共同体特质中,一个关于共同祖先的神话是起决定

作用的因素(22),而当论及共享的历史记忆时,他认为历史也可以采用神话的形式,因为历史与神话之间的界限往往模糊难辨。因而,关于共同祖先的神话实质上也被视为一种共享的民族历史记忆,这鲜明地体现于英格兰的民族神话-历史叙事之中。

斯宾塞在《仙后》中的编年史书写正是其利用民族神话-历史叙事建构民族历史身份的范例之一。史诗中的编年史书写始于第二卷第十诗章亚瑟王子和该恩骑士在阿尔玛城堡(Castle of Alma)中“记忆”(Eumnestes)的书房所阅读的《不列颠编年史》(*Briton Moniments*)与《仙国帝王案卷》(*Antiquitee of Faery Lond*)。前者记载了从布鲁特(Brutus,传说中最早抵达不列颠岛并建立统治的人)到尤瑟不列颠诸王的历史,后者叙述了从埃尔弗到奥白龙的仙国君王历史。此外,史诗第三卷第三诗章借梅林之口以预言的方式向布里弼马特讲述了从仙国骑士阿提戈尔到伊丽莎白一世的历史。该段叙述包含了从不列颠到撒克逊再历经诺曼和都铎王朝更迭的历史,将从不列颠到英格兰的历史贯穿起来,建立了一种历史的连续性。第九诗章,斯宾塞又通过帕里戴尔重述从特洛伊沦陷到布鲁特抵达不列颠重建特洛伊的历史,进一步强化了不列颠与古代特洛伊的联结,使特洛伊的辉煌经不列颠到英格兰的历史传承延续下来。斯宾塞的编年史书写不仅建构了从不列颠到英格兰民族的神圣起源,夯实了斯宾塞时代都铎王朝合法统治的神话-史实基础,强化了英格兰民族的历史身份认同,而且还寄予了其王朝历史更替现象背后之规律的伦理反思。

斯宾塞的编年史书写融合了三类不同的民族起源神话和传奇:亚瑟王传奇、特洛伊神话和盎格鲁-撒克逊移民神话。亚瑟王传奇是基于亚瑟王的传说创作而成的浪漫传奇,也是中世纪各类题材的浪漫传奇中“作品最多,成就最高,流传最广,影响最大”(肖明翰,《英语文学传统》422)的题材。亚瑟王的传说起源于公元5到6世纪时不列颠人抵抗盎格鲁-撒克逊人入侵的冲突与战争,亚瑟王的原型极有可能是这些冲突和战争中一个领导抵抗运动并取得多次胜利的将领。蒙茅斯的杰弗里(Geoffrey of Monmouth)的《不列颠君王史》(*Historia re Britanniae*)被认为是亚瑟王传奇故事发展史上第一部里程碑式的作品(424),该作品从不列颠民族的立场叙述亚瑟王在率军抵抗撒克逊人侵略过程中的英勇事迹,将亚瑟王塑造为不列颠的民族英雄。杰弗里关于亚瑟王朝的历史叙述不仅构成了该作品中最核心的部分,而且对后代的亚瑟王传奇产生了深刻影响。斯宾塞正是借鉴了杰弗里笔下亚瑟王历史的叙述模式和民族立场,在《仙后》中不仅重述亚瑟王朝的历史,将其作为英格兰民族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塑造了以亚瑟王为原型、象征融合后的英格兰民族英雄:高贵纯洁的美德骑士亚瑟王子。

特洛伊神话是古罗马诗人维吉尔在《埃涅阿斯纪》(*Aeneid*)中根据特洛伊历史建构的民族起源神话。特洛伊战败后,王子埃涅阿斯在神意的引领下经历艰难险阻远赴罗马,重建特洛伊的辉煌。维吉尔借由埃涅阿斯建立罗马的历史叙述将古罗马民族的起源追溯至古老而高贵的特洛伊民族之辉煌历史,奠定古罗马民族的高贵血统,同时也建构了特洛伊民族起源神话。该神话的建构确立了一种宿命论的、神意决定的历史发展模式:如果一个民族的命运被上天预先决定,而且该民族甘愿服从这种命运的安排,那么无论它曾经历多少艰难险阻,最

后必定会以一种高昂的姿态屹立起来。西罗马帝国灭亡后，位于君士坦丁堡的东罗马帝国成为了罗马帝国的合法继承者，而日耳曼人的不同分支在西欧所建立的王国，如英格兰和法兰克等，为了寻求自己的独立地位纷纷选择特洛伊作为其民族的神圣起源，以证明自己从未隶属于罗马帝国，甚至拥有与罗马人同等高贵的民族起源。于是，便有了蒙茅斯的杰弗里在《不列颠君王史》中所建构的不列颠是由特洛伊人后代布鲁特所建立的民族起源神话。该神话通过建立不列颠与特洛伊的渊源形塑了不列颠的高贵身份，为后世诗人建构英格兰民族身份提供了叙事依据。15世纪最伟大的史诗诗人莱德盖特(John Lydgate)在其史诗《特洛伊书》(*Troy Book*)中通过将古希腊特洛伊故事变形为具有英格兰民族特性之叙事，将维吉尔的“罗马即新特洛伊”之神话改写为“伦敦即新特洛伊”之“英格兰民族神话”，为随后英国的强大和崛起以及诗人们为之歌功颂德提供了“天赋神权”的思维模式和思维传统。斯宾塞在《仙后》中秉承这一历史叙述传统，将不列颠建立在特洛伊的辉煌历史基础之上，并将其与亚瑟王传奇和英格兰神圣家族之都铎王朝的沿革史相嫁接，勾勒了英格兰民族的政治-历史谱系，赋予其统治的神圣性和合法性，为英格兰民族历史身份之建构发挥了关键作用。

不同于史诗中赋予亚瑟王传奇和特洛伊神话以正统历史地位的做法，斯宾塞却贬抑盎格鲁-撒克逊移民神话，从不列颠的视角将盎格鲁-撒克逊人塑造为外来侵略的他者。这是因为不列颠的历史叙事确证了早在圣奥古斯丁(坎特伯雷的第一任大主教)到不列颠传教前，不列颠已建立了自己的基督教会，从而证明英格兰民族教会独立于罗马教会而存在的事实。虽然盎格鲁-撒克逊移民与不列颠人最终通过战争的融合构成了日后英格兰民族的主体，但16世纪宗教改革的历史语境下反对罗马天主教的需要，却使斯宾塞在建构英格兰民族历史叙事时首先选择了不列颠历史传统中的亚瑟王传奇和特洛伊神话。诗人借此建构了英格兰民族的宗教历史叙事，强化了英格兰民族的历史和宗教认同，为英格兰民族宗教的确立奠定了历史基础。

《仙后》中的编年史书写彰显了斯宾塞作为“历史诗人”的自觉，体现了史与诗的互动。诗人在第二卷第十诗章和第三卷第三诗章叙述不列颠的历史前曾分别向仙后和“历史缪斯”克莉奥发出“诗歌吁求”(poetic invocation)，恳求助他一臂之力完成对不列颠伟大民族的历史谱系歌唱。诚如荷马在史诗中吁请缪斯赐予的不仅是赋诗的灵感(形式)，更是信息和知识(内容)(陈中梅 36)，斯宾塞首先吁请仙后赐予他语言、歌喉和羽翼，助他将粗鄙的诗行化作文辞高雅的颂歌；其次则恳求“历史缪斯”克莉奥而非史诗缪斯卡莉欧碧为他提供关于不列颠君王宗族门第的历史知识。这表明历史对于史诗不可或缺。虽然诗歌需要历史，尤其是英雄诗歌，因为由历史所提供的真实是英雄诗歌的基础(Tasso 26)，但诗毕竟不等同于史，诚如亚里士多德所言，诗表现带普遍性的事，而历史则只记载具体事件，因此诗比历史更富哲学性，亦更严肃(1451b.1-5)。锡德尼(Philip Sidney)在为诗辩护时更直接称，与历史呈现出的黄铜世界相比，诗歌呈现的是一个黄金世界(85)。锡德尼意在强调诗歌所独有的寓教于乐功能，相较于哲学的抽象说教，诗更能怡悦性情，而相比历史学家对真实的严肃追求，诗人则能在

不失历史真实的基础上通过虚构达到更高、更普遍的真实，从而催人向善。

斯宾塞在编年史学家历史真实之基础上对历史叙事的改写和重构体现了诗人在道德教育方面之于历史学家的优势。例如，史诗中的不列颠编年史在蒙茅斯的杰弗里和霍林斯赫德（Raphael Holinshed）对不列颠历史简洁、客观叙述的基础上书写，着重呈现从布鲁特到尤瑟时期不列颠诸王朝的兴替史，特别再现历代不同统治者在王朝进入稳固期后因不能自我克制而使王朝陷入衰败或灭亡的现象。这一对既有史料的独特改写呼应并强化了史诗第二卷的“节制”主题。正如该恩需要抵御阿克拉霞（Acrasia）所象征的情欲和愤怒之诱惑从而习得节制美德，不列颠的统治者亦需时刻保持警醒，驾驭好“灵魂的马车”（Plato 471）、克制内心的邪恶激情，甚至必要时应如该恩一样以行动捍卫节制美德。正是在此意义上，不列颠历史在艰难抵抗诱惑和侵略中的螺旋式演进构成了斯宾塞在民族历史层面对“节制”的定义（Rossi 48）。节制不仅是就个人伦理品格而言，更上升至统治者在管理（govern）^[1]国家时保持“中庸之道”（golden mean）的能力，一如阿奎那（St. Thomas Aquinas）所言，特殊和完美的管理即一个人不仅能够自我管控，而且能管理好一个城邦或王国共同体（1400）。因此，可以说，斯宾塞的不列颠民族史书写不仅从历史文化和宗教认同方面建构了英格兰的民族身份，更从民族精神和价值取向维度树立了英格兰民族的精神道德品格，为英格兰民族共同体之形成注入了强大精神动力。

二、地方志书写与英格兰民族地理文化身份之建构

斯宾塞在《仙后》第四卷第十一诗章采用史诗名录（epic catalogue）的方式详述了庆贺泰晤士河（Thames）与梅德韦河（Medway）联姻的各路宾客：由尼普顿（Neptune）率领的海神和流经不同区域的河流。这一描写属于典型的地方志书写（Chorography）。地方志书写是一种独特的文本书写形式，旨在描写某一地区的地理和历史风貌，并广泛流行于16世纪末和17世纪初的英格兰和威尔士地区。德雷顿的《多福之国》是最典型的英国地方志书写作品。《仙后》第四卷的地方志书写以河流联姻为主题，该主题源于英国本土（Roche 171）。16世纪中期英国诗人利兰（John Leland）的拉丁文作品《天鹅之歌》（*Cygnea Cantio or The Swan Song*）开启了以河流为媒介的地方志书写之先河。利兰在诗中化身天鹅，沿泰晤士河顺流而下，吟咏了其所目睹的从牛津到“新特洛伊”（Trinovantum）^[2]沿途的地理风光，包括河流沿岸的城市和城堡建筑等信息，尤其诗中刻意采用古老的不列颠名称指涉这些城市，在描绘不列颠优美风光之同时也确证了不列颠的古老性。虽然利兰的诗歌并未直接涉及河流联姻，但它对河流沿岸地理风光的书写无疑深刻地影响了后来的英国诗人。例如，英国博学好古研究者和诗人卡姆登（William Camden）在《不列颠志》（*Britannia*）中通过对河流沿岸地理风光的书写完成其所叙述的泰姆河（Tame）和伊西斯河（Isis）的联姻。哈里森（William Harrison）在《不

列颠述略》(*Description of Britain*)中同样也将想象中河流所流经的路线作为一段“诗性航程”(poetical voyage)来描述。

斯宾塞在1580年致好友哈维(Gabriel Harvey)的信中曾提出想要创作一首名为《泰晤士婚曲》(*Epithalamion Thamesis*)的诗歌,并具体阐述了对该诗歌内容的设想。同时,他自信地宣称该诗在知识性、创新度和处理难度上均首屈一指,并表示要借助霍林斯赫德的《英格兰、苏格兰和爱尔兰编年史》(*The Chronicles of England, Scotland and Ireland*)中所提供的有关河流源头和路线等信息(612)。事实上,斯宾塞在此指的是哈里森的著作,因为哈里森的《不列颠述略》曾被收入霍林斯赫德编年史的第一部分出版,其中的六个章节详细描写了英格兰诸河流所流经的路线和支流。而在斯宾塞尚未创作出其计划的诗歌之前,卡姆登就在《不列颠志》中收录了一首名为《泰姆河与伊西斯河之联姻》(*De Connubio Tamae et Isis*)的诗歌残篇,有学者认为该诗可能是卡姆登受斯宾塞在致哈维的信中提及的那首《泰晤士婚曲》之启发而创作(Oruch 613)。虽然斯宾塞后来改变了创作计划,但他后来所创作的河流联姻主题诗歌实质都从该创作计划衍生而来,而且它们不同程度地受到了利兰、卡姆登和哈里森等人创作的影响。

斯宾塞在《仙后》中所描绘的泰晤士河与梅德韦河的联姻为读者呈现了一幅以英格兰河流为中心的水域地形图,并绘制出英格兰民族的地理文化版图,使英格兰人以视觉直观的方式了解其所属的地区和国家。史诗从泰晤士河上游的泰姆河(Thame)和伊西丝河(Isis)出发展开描述,用24个诗节(stanzas 24-47)列举了流经英格兰和威尔士的44条河流。借由对河流水系的描绘,斯宾塞不仅勾勒了各条河流及其所流经的主要城市,更重要的是揭示出英格兰的主要河流和城市在民族文化塑造中的历史内涵和文化意义,强化了英格兰民族的地理、历史和文化认同感。因为地方志的书写不仅表现在地理层面,更与一个民族的历史紧密相连,这在文艺复兴时期的英国已成为人们对该体裁的共识。

斯宾塞不仅通过在叙述开始前向“历史缪斯”克莉奥吁求赐予灵感以表明这一地方志书写的历史维度,而且有意将神话和历史融入叙述。史诗叙述了尼普顿率领的一众海神后,随即转向描述历史上的强国缔造者,其中最具英格兰色彩、亦为诗人最为详细叙述的是阿尔滨(Albion)。阿尔滨是不列颠岛屿的古称,该词源于原始印欧语系中的词根albho,意为“白色的”。由于从欧洲大陆前往不列颠的人上岸前首先看到的景象是英格兰南部海岸上的白垩岩峭壁,故将其命名为阿尔滨。斯宾塞在诗中将阿尔滨塑造为海神尼普顿的后嗣,他率领英武的人民建立起不列颠,而且还曾到高卢地区挑战大力神赫拉克勒斯,虽肉身不幸被屠戮,但其精神却永存(FQ IV. xi.15-16)。^[3]在这段神话与历史相融的叙述中,斯宾塞在借用16世纪意大利诗人、神话收集者卡姆斯(Natalis Comes)编著的《神话故事》(*Mythologiae*)和霍林斯赫德的《英格兰、苏格兰和爱尔兰编年史》等素材与史料的基础上,根据叙事需要进行重组和再加工,尤其是将阿尔滨与古代其他民族英雄人物并置,突出强调了其神圣族源与丰功伟绩。作为地理名称的阿尔滨在斯宾塞笔下被拟人化为不列颠的建国英雄,这无异于从另一视角再

次书写了英格兰民族起源的布鲁特神话。因此，斯宾塞的地方志书写不仅深化了英格兰人对其地理环境的认识，而且通过地理景观与民族历史文化的融合强化了英格兰的民族认同，并由此成为赫尔格森(Richard Helgerson)所界定的“民族性形式”(forms of nationhood)之一(105)。丹尼尔斯(Stephen Daniels)在阐释地理景观与民族之关系时指出，地理景观既提供了具体可见的形态，也在抽象意义上建构了民族的地理文化身份(4-5)。正是意识到地理与民族之间的紧密关联，以及得益于早期现代英国地理学科的迅速发展和对地理环境与人的气质和性情之关系的深入认知，16和17世纪英国的诗人和历史地理学家纷纷选择地理书写弘扬英格兰民族的自信心和自豪感。

此外，英格兰民族的地理文化身份建构还与斯宾塞在史诗中对不列颠帝国的想象密不可分。史诗书写参加联姻庆典的宾客中，除英格兰和威尔士的河流外，^[4]还包括遍及欧、亚、非、美四大洲的18条著名河流(stanzas 20-21)以及爱尔兰境内的18条河流(stanzas 40-44)。斯宾塞在史诗中对世界各大河流的描绘某种程度上暗示了他对建立不列颠世界帝国的想象。早在都铎王朝初期，英格兰就已开始海外探险活动，亨利七世曾资助意大利商人和冒险家卡伯特(John Cabot)于1497年出海探险，最终抵达北美大陆，占领了纽芬兰，从此英格兰迎来了一个海外贸易和殖民扩张的新时代。自1485年至1603年，日益增长的海外殖民扩张活动使英格兰的势力范围延伸至亚洲和美洲大陆，初步建立了英格兰的“海上帝国”。斯宾塞对英国的海上殖民活动并不陌生。他的好友哈维和雷利爵士(Sir Walter Raleigh)都是海外殖民扩张活动的热烈支持者，后者甚至还曾于1595年率队探险，发现了南美洲的圭亚那地区。尽管斯宾塞对海外殖民活动的态度可能较为复杂，但作为英格兰第一位“帝国诗人”(Waller 2)，斯宾塞在史诗中不可避免地根据当时英国海外殖民活动的记载从文学视角想象了不列颠世界帝国的未来。

斯宾塞对爱尔兰河流的描绘再现了其对不列颠统一之想象。一方面，他出于自己在爱尔兰的实际生活经历对爱尔兰境内的河流，尤其是其府邸周围的河流，表现出明显的正面情感。例如，当叙述爱尔兰众河流前来道贺时，斯宾塞称：“他们也和别人一样美名广传，邻国的联姻自然要烘托场面，这场庆典的日子如此庄严，他们为何不能来分享喜悦。”(FQ IV. xi. 40. 2-5)可以说，斯宾塞借由对英格兰河流和爱尔兰河流相汇聚的地理诗学想象提出了实现不列颠统一的宏伟政治愿景。

另一方面，读者通过史诗对爱尔兰河流的描绘不难发现诗人潜意识流露出的殖民主义意识形态。首先，斯宾塞坦言他既无法按照门第血缘(degree and hidden race)叙述这些河流的来历，甚至连他们所经的地区(salvage cuntries they pace)也无法说明。这一措辞中的“race”包含“种族”和“水道”双重含义，但结合后一诗行中的“salvage”^[5]一词之内涵来看，显然诗人在此将爱尔兰河流所代表的爱尔兰民族置于他者的地位，表现出强烈的英格兰民族中心主义倾向。其次，第42诗节中的巨人布洛米乌斯(Blomius)很容易令读者联想起史诗第二卷第十诗章中不列颠岛上的巨人族，正如布鲁特抵达前未开化的不列颠一样，未经英格兰

征服的爱尔兰也是一片蛮荒之地。第44 诗节中发生在沃尔河 (Oure) 的暴力流血事件影射了1580 年格林勋爵 (Arthur Grey) 率领英国军队在格伦马鲁尔 (Glenmalure) 镇压德斯蒙德叛乱 (Desmond Rebellions) 过程中所遭遇的溃败。斯宾塞恰好于 1580 年随格林勋爵抵达爱尔兰, 并亲历了这一事件。该事件强化了爱尔兰在诗人心中的野蛮他者形象, 并直接影响了斯宾塞在散文《论爱尔兰之现状》(A View of the Present State of Ireland) 中所提出的针对爱尔兰的强硬殖民策略。与《论爱尔兰之现状》中将爱尔兰塑造为野蛮与邪恶的他者之立场相呼应, 斯宾塞还在《仙后》中从古典道德哲学出发“为殖民主义寻找一种道德根基”(陈雷 144), 将爱尔兰所象征的非理性和无序转化为人的“心灵内部需要被抑制的倾向”(149), 建构出一套行之有效的殖民主义道德话语, 使之成为不列颠帝国主义话语体系的重要基础。斯宾塞的不列颠帝国想象本质上反映了这一时期不断发展的英格兰民族国家意识, 其核心是反对罗马教皇的统治, 建立以英格兰民族新教为核心的独立王权, 参与海外殖民活动。诗人借由地方志书写中河流联姻主题的政治历史内涵, 不仅构想了以英格兰为中心的世界帝国, 而且赋予英格兰民族地理文化身份以新的意蕴。

三、红十字骑士身份预言与英格兰民族新教身份之建构

虽然《仙后》第一卷并非斯宾塞在史诗创作伊始就已完全计划好, 而是在史诗第一版(1590 年版) 出版前夕才确定下来 (Bennett 121), 但关于英格兰宗教的内容尤其是圣乔治骑士传奇和罗马天主教与新教之间的冲突始终是该卷的核心情节。这是因为围绕罗马天主教与新教的宗教之争本质上反映了罗马教权与世俗王权之间的矛盾。这不仅是贯穿 16 世纪英格兰宗教改革全程的焦点议题, 而且对英格兰的政治、经济、外交、文化和社会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宗教独立构成了英格兰王权独立的前提。因此, 新教与天主教之争对于确立英格兰民族身份, 促使英国形成独立的民族国家具有决定性的意义。斯宾塞将反映英格兰民族宗教身份之建构的情节置于史诗第一卷足见其重视程度, 这对于诗人来说代表着一项严肃且艰巨的任务, 帮助确立英格兰民族宗教身份的同时亦将诗人自己塑造为如维吉尔一样的“民族史诗诗人”。相较于英格兰的历史和地理文化身份, 宗教身份代表了英格兰民族身份中的精神信仰维度。从这个意义上来说, 史诗第一卷无论对于英格兰民族精神品格的塑造还是个体精神的追寻都有着极为重要的示范意义。

《仙后》第一卷第十十章在红十字骑士 (Redcrosse Knight) 的冒险经历中发挥着关键性的转折作用。经历多重考验后的红十字骑士不仅在“虔诚宫”(House of Holiness) 坚定了信仰、恢复了力量, 而且还在修道院院长“沉思”(Contemplation) 的指引和预言下, 目睹了新耶路撒冷的盛况, 知晓了自己作为英格兰民族之后裔圣乔治的民族骑士身份和历史使命。斯宾塞笔下红十字骑士的民族身份通过史诗预言的方式得以揭示。预言是史诗中的传统之一, 最典

型的史诗预言往往事关某一民族或帝国的命运，通常由一位关键人物向史诗英雄揭示其真正的民族身份，展示其民族的历史，预言其民族的未来，以及暗示他所肩负的伟大历史使命。《埃涅阿斯记》第六卷中的预言是极具开创性和代表性的一例，在维吉尔影响下几乎所有的文艺复兴史诗中都包含了此类史诗预言。它承载和表达了蒂利亚德（E. M. W. Tillyard）所言的史诗之“合唱要素”（choric element），即“集体情感”（group feelings）或“伦理气质”（ethical temper），对确证某一民族的神圣性与合法性、建构民族身份和提升史诗英雄行动的民族乃至世界意义有着重要的作用（12）。

首先，斯宾塞在史诗预言中创造性地挪用了关于圣乔治的历史传奇，并将其塑造为英格兰民族的守护者。圣乔治的传奇主要记载于沃拉吉纳（Genoa Jacobus da Varagine）所著的圣徒传记《金色传奇》（*The Golden Legend*）。相传圣乔治是卡帕多西亚人，曾在罗马的军队中担任保民官。他最伟大的事迹是帮助利比亚省的西尔沙城居民屠杀毒龙，并使国王和臣民都接受了基督教的洗礼。圣乔治的事迹在世界多地广泛流传，他被奉为英格兰民族集体崇拜的对象则得益于“狮心王”理查一世（Richard I）。理查一世不仅下令要求重建圣乔治教会（Gordon 69），而且还在1222年的牛津议会中宣布圣乔治为英格兰的守护者，并将每年的4月23日确定为“圣乔治日”（Saint George's Day）。理查一世也是首位使用圣乔治十字作为英格兰国旗的国王。随后，理查二世（Richard II）和亨利五世（Henry V）等英国国王甚至要求军队在战争中佩戴圣乔治十字标志的武器和盔甲。1348年，爱德华三世（Edward III）建立的嘉德骑士制（The Order of the Garter）将圣乔治作为骑士团的守护圣徒，圣乔治屠龙的形象和圣乔治十字分别镌刻于嘉德骑士的衣饰和徽章上。斯宾塞在此民族叙事基础上改写圣乔治的出身，通过“沉思”预言他作为古老的英格兰民族之后裔的身份，揭示出他与英格兰民族悠久的历史渊源。这一改写呼应了16和17世纪流行于英国的关于圣乔治母亲出生于英国王室的叙事（Hume 155），表明此时的英国有意利用圣乔治传说的虚构性将圣乔治塑造为真正的英格兰民族英雄，并使之成为英格兰民族历史中重要的文化符码。

其次，斯宾塞采取了史诗历史预言与《启示录》中的拯救预言相结合的历史书写策略，并利用16世纪评论家对《启示录》的历史化解读，使之成为再现英格兰宗教改革历史中新教与天主教之间矛盾与冲突的潜在结构。第一卷第十诗章，修道院院长“沉思”在高山之巅向红十字骑士展示那座美丽坚固的城邦新耶路撒冷时，红十字骑士不禁将其与他曾经到过的仙土首府克勒俄波利斯相比较，这一比较引出“沉思”关于红十字骑士世俗和神圣双重身份的预言。红十字骑士的仙土之子身份象征着其世俗价值，目标即通过“武力之功绩”（deeds of arms）（*FQ* I. x.62.5）在世俗之城（Earthly City）克勒俄波利斯赢得荣誉。他作为英格兰民族后裔并将成为圣乔治的身份则寓指其神圣价值，肩负着守护英格兰民族的重任。红十字骑士身份中的双重价值看似相互对立，实则相辅相成，正如克勒俄波利斯和新耶路撒冷两座城均指向英格兰的首府伦敦一样，这一双重价值亦统一于英格兰民族宗教身份认同之中。作为虔诚美德之象征的红十字骑士在追求个人荣誉时履行的使命是在乌娜的引领下前去解救被毒龙

囚禁的乌娜父母。这一使命象征着《启示录》中基督征服地狱、击败恶魔撒旦、拯救出正直的灵魂并光复圣城新耶路撒冷。此外，《启示录》在16世纪的英国被历史化地解读为象征着新教之于罗马天主教胜利的启示和预言(Bennett 111)，而新教与罗马天主教之冲突也反映在史诗第一卷以红十字骑士和乌娜为代表的正义力量与以杜埃莎为代表的邪恶势力之间的较量。由此，斯宾塞基于《启示录》中的预言模式和16世纪英国对其历史化的解读，将《启示录》中的意象原型、情节结构和象征体系融入《仙后》第一卷，成功再现了英格兰宗教改革的历史，彰显了英格兰民族新教身份的认同。

在此基础上，斯宾塞利用红十字骑士从仙土之子向英格兰民族神圣守护者身份之转变的可能，将新教教义及其伦理价值观融入对红十字骑士的塑造中，使圣乔治成为英格兰民族新教的象征。根据新教教义，人生而有罪，人的一生即发现、认识并不断克服罪恶的过程。面对原罪，人并非只能被动地等待救赎，而是可以在实践中认识、抵制罪恶，并凭借坚定信仰而获得恩典，即“因信称义”(Sola fide)。第一卷中红十字骑士的经历鲜明地体现了这一新教伦理价值观念。作为神圣美德“虔诚”的守护者(the Patron of true Holiness)，红十字骑士在冒险之初并非完美地表现了虔诚骑士所应具备的一切品质。相反，读者甚至在他身上目睹了人性的一切弱点和罪恶：骄傲、嫉妒、怀疑和绝望等。这些罪恶是红十字骑士与以杜埃莎为代表的象征罗马教会之邪恶势力较量失败的结果。堕入深渊的红十字骑士最终被亚瑟王子解救并在乌娜的引领下来到虔诚宫，在真诚的忏悔中重拾信仰，这为其战胜毒龙、解救乌娜的父母起了决定性作用。红十字骑士也由此成长为名副其实的虔诚骑士，并完成了向神圣守护者圣乔治的身份转变。圣乔治这一身份暗指了英格兰民族和宗教的双重内涵：作为古老的英格兰民族后裔，圣乔治既是英格兰的守护者，也是英格兰民族宗教中“圣者”之象征，是居住在新耶路撒冷的上帝的选民(FQ I. x. 57. 4)。双重内涵促成了“英格兰是上帝的选民”(Hadfield 60)和“英国教会起源于本土古老教会而非罗马教会”(胡琦 59)之民族宗教话语的形成，前者所建构的“族群拣选神话”(myth of ethnic election)被认为是民族自我复兴和长久存续的核心要素(Smith 36)，后者则再次表明了英格兰民族宗教较之于罗马天主教的优越性和纯洁性。它们进一步强化了英格兰的民族意识和民族宗教认同，凝聚了民族情感，最终确立了英格兰民族宗教的身份。英格兰民族宗教身份的确立，打破了罗马教皇长期以来对英格兰世俗王权的掣肘，有利于建立独立于罗马教权的世俗王权，为近代英国民族国家的形成奠定了政治和宗教基础。

16和17世纪见证了英国历史书写的爆炸式增长，书写形式包括诗歌、戏剧、编年史和地方志等。究其原因，除人文主义思想所带来的史学观念变化外，最根本的在于这一时期既是英国政治和社会剧变的转型期，又是英国民族意识空前高涨和民族身份熔铸的关键期。历史书写，尤其是民族历史的书写，对英格兰建构民族身份、促成社会转型从而成长为欧洲强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作为“文学形式之巅峰”(吴玲英 2)的史诗则因其兼具史与诗的真实与虚

构之双重性而成为书写民族历史的绝佳体裁。斯宾塞正是利用史诗这一独特优势，在《仙后》中通过史与诗的互动书写了英格兰民族历史，建构了英格兰历史、地理文化和民族宗教身份。编年史的书写代表着斯宾塞为英格兰缔造民族起源神话，使都铎王权神圣化、合法化并塑造英格兰民族品格的尝试；以泰晤士河与梅德韦河联姻为主题的地方志书写则在描绘英格兰地理文化版图、强化民族历史认同的同时想象了构建以英格兰为中心的不列颠帝国之梦；红十字骑士的身份预言隐喻了英格兰宗教改革的历史，见证了英格兰在民族意识的刺激下反对罗马天主教、重构民族宗教的努力。斯宾塞的历史书写确认了历史文化记忆在建构英格兰民族身份和强化民族认同方面的重要作用，深刻彰显了这一时期英格兰民族身份中鲜明的英格兰性。

注释 [Notes]

- [1] 管理 (govern) 在此具有双关的语义，除指涉管理国家的含义外，也用于指涉自我在美德方面的约束和克制。斯宾塞在《仙后》中多次使用该词表达自我克制的意涵，如第二卷第九诗章第1诗节，叙述者称人如果能够克制自己的身体，那么无论是其力量还是形态均是世间最美；第48诗节，阿尔玛城堡中的三位圣贤职责是为阿尔玛提供谏言，以教会他如何学会“管理”。
- [2] “新特洛伊” (Trinovantum or Troynovant) 即伦敦。据《不列颠君王史》记载，伦敦系特洛伊人后代布鲁特抵达不列颠岛后所建立，并将其命名为“新特洛伊” (Toria Nova)。15世纪英国诗人莱德盖特在《特洛伊书》中首次使用“新特洛伊”指代伦敦，开创了伦敦即新特洛伊的传统。《仙后》中的这一用法延续了这一传统，进一步强化了英格兰与特洛伊的历史渊源，与史诗中的历史叙述一脉相承。
- [3] 文中所引斯宾塞诗文皆出自朗文出版社出版的《仙后》 (Edmund Spenser, *The Faerie Queene*. Edited by A. C. Hamilton. Longman, 1977)。文内将其缩写为FQ，并以FQ加卷数、章数、节数和行数的方式随文标出，不另加注。所引诗行的中文翻译参考了胡家峦和刑怡的译文，略有改动。
- [4] 值得注意的是，斯宾塞在细数前来参加婚宴的河流时并未提及苏格兰境内的任何河流，这是因为在16世纪英格兰与苏格兰之间由于宗教意识形态的分歧一直处于对立的状态，而这一敌对反映在此时的英格兰民族想象中便表现为英格兰在政治和地理上均将苏格兰排除在外，在政治上将自身想象为以英格兰为中心的不列颠帝国，在地理上则将自身想象为一个排除了苏格兰在外的岛屿。这一想象不仅体现于斯宾塞笔下，而且也反映在利兰和哈里森的书写中。
- [5] Salvage一词是斯宾塞在史诗《仙后》和《论爱尔兰之现状》中专门用于指涉爱尔兰的词汇。斯宾塞利用该词含混的多重意涵构造出一套关于爱尔兰的殖民话语。在他看来，爱尔兰不仅野蛮落后，而且地处与中心相对的边缘，它原本属于英格兰，现在等待被恢复其原貌。参见 Willy Maley, *Salvaging Spenser: Colonialism, Culture and Identity*. Macmillan, 1997, pp. 4-5.

引用文献 [Works Cited]

- Aquinas, St. Thomas. *Summa Theologica*. Vol. III (Part. II, Second Section). Translated by Fathers of the English Dominican Province, Cosimo, 2007.
- Aristotle. *Poetics*. Translated by Stephen Halliwell, Harvard UP, 1995.
- Bennett, Josephine Waters. *The Evolution of the Faerie Queene*. B. Franklin, 1942.
- Chen, Lei. "Colonialism and Temperance: Edmund Spenser's Portrayal of Ireland, with a Note on *Heart of Darkness*." *Foreign Literature Review*, no. 1, 2021, pp. 142-63. [陈雷:《殖民主义与节制的美德——斯宾塞笔下的爱尔兰, 兼及〈黑暗的心〉》, 载《外国文学评论》2021年第1期, 第142-63页。]
- Chen, Zhongmei. "The Divergence of History and Literature: Odysseus's Lies and the Emergence of the Classic Representational Form in Western Literature." *Foreign Literature Review*, no. 3, 2011, pp. 29-63. [陈中梅:《历史与

- 文学的分野：奥德修斯的谎言与西方文学经典表述样式的初始展现》，载《外国文学评论》，2011年第3期，第29-63页。]
- Coleridge, Samuel Taylor. *Coleridge's Miscellaneous Criticism*. Edited by Thomas Middleton Raysor, Harvard UP, 1936.
- Daniels, Stephen. *Fields of Vision: Landscape Imagery and National Identity in England and the United States*. Princeton UP, 1993.
- Fichter, Andrew. *Poets Historical: Dynastic Epic in the Renaissance*. Yale UP, 1982.
- Gordon, Elizabethan O. *Champion of Christendom and Patron Saint of England*. Swan Sonnenschein, 1907.
- Hadfield, Andrew. *Literature, Politics and National Identity: Reformation to Renaissance*. Cambridge UP, 2009.
- Helgerson, Richard. *Forms of Nationhood: The Elizabethan Writing of England*. The U of Chicago P, 1992.
- Hu, Qi. "Protestantism and the National Identity in Early Modern England." *History Teaching*, no. 18, 2012, pp. 58-63. [胡琦：《新教与近代早期英格兰民族认同》，载《历史教学》2012年第18期，第58-63页。]
- Hume, Anthea. *Edmund Spenser: Protestant Poet*. Cambridge UP, 1984.
- Liu, Lihui. "Geo-Cognition and National Identity in Early Modern English Literature." *Journal of Southwest University (Social Sciences Edition)*, no. 6, 2020, pp. 139-52. [刘立辉：《早期现代英国文学中的地理认知与国家认同》，载《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6期，第139-52页。]
- Oruch, Jack B. "Spenser, Camden, and the Poetic Marriage of Rivers." *Studies in Philology*, vol. 64, no. 4, 1967, pp. 606-24.
- Plato. *Euthyphro, Apology, Crito, Phaedo, Phaedrus*. Translated by Harold North Fowler, Harvard UP, 1999.
- Roche, Thomas P. *The Kindly Flame: A Study of the Third and Fourth Books of Spenser's Faerie Queene*. Princeton UP, 1964.
- Rossi, Joan Warchol. "Britons Monuments: Spenser's Definition of Temperance in History." *English Literary Renaissance*, vol. 15, no. 1, 1985, pp. 42-58.
- Sidney, Philip. *An Apology for Poetry*. Manchester UP, 2002.
- Smith, Anthony D. *National Identity*. Penguin, 1991.
- Spenser, Edmund. *The Poetical Works of Edmund Spenser*. Edited by J. C. Smith and E. DE. Selincourt, Oxford UP, 1926.
- Tasso, Torquato. *Discourses on the Heroic Poem*. Translated by Marielia Cavalchini and Irene Samuel, Clarendon, 1973.
- Tillyard, E. M. W. *The English Epic and Its Background*. Oxford UP, 1966.
- Waller, Gary. *Edmund Spenser: A Literary Life*. Macmillan, 1994.
- Wu, Lingying. *Temptation and Hero: A Study of Milton's Trilogy*. Science Press, 2018. [吴玲英：《诱惑与英雄：弥尔顿三部曲研究》。北京：科学出版社，2018。]
- Xiao, Minghan. "A Review of Ashe's *Fiction and History in England, 1066-1200*." *Foreign Literature*, no. 4, 2009, pp. 109-19. [肖明翰：《诺曼征服后英格兰民族性之发展——评阿舍新著〈虚构与历史：1066—1200年之英格兰〉》，载《外国文学》2009年第4期，第109-19页。]
- . *The Development of English Literary Tradition in the Middle Ages: A Critical Study of Medieval English Literature*. Vol. 2.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2009. [肖明翰：《英语文学传统之形成》（下册）。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

◇责任编辑：马妮娅

隔离与清洁: 《迪尔布鲁克》与维多利亚早期共同体的医学重塑

◎ 刘芳

内容提要:《迪尔布鲁克》作为哈里特·马蒂诺在虚构领域的一次大胆尝试,揭示了医学在维多利亚早期共同体中的重要地位。前人研究或聚焦于医生的道德品质在维护共同体秩序中的作用,或关注医学话语对病人个体的规训,却很少对医学与共同体之间的关系展开研究。文章以共同体的健康为线索,首先阐明医生及其医学话语对塑造维多利亚早期社会健康的重要作用及马蒂诺在小说中对相关医学话题的指涉,进而分析小说中精神和身体两个层面上的瘟疫场景,阐释霍普医生在不同瘟疫中采取的不同医学手段——隔离与清洁,从而揭示他对社区共同体的医学重构及他在共同体中的中心地位。

关键词:《迪尔布鲁克》 隔离 清洁 医学重塑 社区共同体

中图分类号: I56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6-4366 (2023) 01-0057-11

作者单位: 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北京 100871

DOI: 10.19967/j.cnki.flc.2023.01.006

Title: Quarantine and Cleaning: *Deerbrook* and the Medical Reconstruction of Community in the Early Victorian Age

Abstract: As a daring endeavor taken by Harriet Martineau in the fiction realm, *Deerbrook* reveals the important role of medicine within community in the early Victorian age. Previous studies have focused either on the moral character of the doctor and its function in maintaining the order of the community, or the medical discourse and its discipline's impact on individual patients. Few, nonetheless, have been interested i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edicine and community. Focusing on the health of the community, this paper first attempts to illustrate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doctor and his medical discourse in shaping social health in the early Victorian age, meanwhile presenting Martineau's reference to related medical themes in *Deerbrook*. Then by analyzing the two plague scenes on spiritual and physical levels and demonstrating the different methods Mr. Hope adopts to tackle the plagues, i.e., quarantine and cleaning, thus revealing his medical reconstruction of the community and his leading role within the community.

Keywords: *Deerbrook*, quarantine, cleaning, medical reconstruction, community

Author: Fang Liu, Ph.D. Candidate,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Peking University, Beijing, China.

出版于 1839 年的《迪尔布鲁克》(*Deerbrook*) 是哈里特·马蒂诺 (Harriet Martineau) 在长篇小说领域的第一次尝试, 也是她所获得的唯一一次成功。这种成功在学者桑德斯 (Valerie Sanders) 看来, 来自于该作品的划时代性: 此时距离奥斯丁 (Jane Austen) 的流行已有二十余载, 而不管是勃朗特姐妹还是乔治·艾略特 (George Eliot) 都还未登上文学的舞台; 真正意义上的家庭现实主义 (domestic realism) 小说还没有成型, 受后者青睐的一些主题——家庭女教师、医生的情感和职业生活, 以及狭隘的地方社会对受教育阶层理想的束缚等——却都在此书中有了雏形 (“Introduction to *Deerbrook*” xxx)。颇可注意的是, 在对医生角色的处理上, 该书开启了一个新的文学传统, 即首次将医生作为维多利亚长篇小说的主角。^[1] 波特 (Roy Porter) 甚至认为, 《迪尔布鲁克》中的霍普医生在整个英国文学史上是史无前例的, 因为在他身上表现出维多利亚时期医生主角身上的所有个人特质 (*Body Politics* 258)。小说描写了霍普医生与初来迪尔布鲁克的伊博斯顿姐妹海斯特和玛格丽特之间的情感纠葛, 并重点讲述了霍普如何在姊妹俩的支持下战胜流言和暴乱带来的职业挑战, 最终在瘟疫中重建自己的医学声望。

关于小说中的医生及医学话语, 学界大致有两种观点。一些学者认为马蒂诺虽以医生为主角, 却没有从医学的视角出发来塑造霍普, 而是突出了他的责任意识和道德原则 (Webb 187; Sanders, *Reason Over Passion* 78-79; Sparks 35-36), 尤其强调了医生的道德责任感对社会的贡献, 指出医生个人的美德通过家庭传递和扩散到整个社群, 从而对社会产生良好的影响 (Colby 248; Warren 227); 另一些学者从 19 世纪初期英国医学发展的情况入手, 突出了霍普的医生身份, 通过分析其对医学话语和医学理性的运用, 解读医学对病人所进行的规训 (Roberts 56-75)。但这一分析主要集中在个体层面, 对医学在社会层面上发挥的作用关注不足。

本文认为, 借由选举和瘟疫这两场危机, 小说揭示了医生及其医学话语对社区共同体的重塑。这两起事件看似关联不大, 实则可看作两场性质不同的瘟疫, 且因共同体健康这一线索而紧密相连: 在政治选举中, 霍普的特立独行破坏了人们对共同体健康的认知, 人们在驱逐他的过程中, 使谣言和暴力如传染病一般传播扩散, 最终在整个迪尔布鲁克形成了一场精神上的瘟疫; 随后爆发的瘟疫则在身体层面上威胁到共同体的安全与稳定, 而霍普又恰恰因为保护了共同体的健康而恢复了声誉。两场瘟疫可以看作马蒂诺对工业化背景下维多利亚早期种种社会问题的反映。而霍普对瘟疫的防范与治理则反映出以医生及其医学话语为核心重塑社会共同体健康的重要性。在小说中, 霍普一方面通过隔离谣言和暴力病菌保持自身的精神健全, 从而为修正以贵族为核心的健康理念、捍卫中产阶级的个人主义健康观, 并重建以中产阶级为核心的精神共同体打下基础; 另一方面又在身体疫病的肆虐中大力推介清洁之法以抵抗平民百姓和乡绅的迷信, 将其从肮脏和洁癖这两种极端状态中解放出来, 从而建构起一个以医生为核心的身体共同体。霍普在两场瘟疫中凭借医学手段实现了对个体和整个社会健康的保卫, 由此从共同体的边缘走向了中心。

一、维多利亚早期的医学话语与共同体重塑

英国自 18 世纪后半叶开启工业化进程,至 1840 年前后,工业革命的成果对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尤其是健康方面的影响尤为明显。一是健康观念发生变化,围绕中产阶级而非土地贵族的健康观念重塑精神共同体成为当务之急;二是环境恶化导致疫病孳生,进而威胁到社会的经济与道德稳定,通过治疗和管理人们的身体重塑一个健康的共同体同样刻不容缓。在这一背景下,以管理个体健康、维护社会整体健康为主要职责的医生逐渐成为中心人物,医生及其医学话语从精神和身体两个层面上担负起重建共同体的重任。

工业奇迹所创造的物质财富令英国一时间风头无两,尤其塑造与成就了中产阶级。这在经济上体现为奉行自由放任政策,在精神层面则体现为以功利主义思想为核心的社会进步观和对个人主义的信仰。这种个人主义信仰又催生出新的健康观念——中产阶级将身体健康作为获取财富和地位的物质保障,认为一个人越健康,他越有可能成功。然而一直到 19 世纪 40 年代,英国民众大多仍持有一种传统的健康理念,他们将有关健康的话语权完全交到了贵族阶层手中,认为“卫生与健康是一笔人生财富,只属于那些贵族阶层、上流社会”,而下层民众“只能依靠统治阶级,通过对全体民众有利的环境清洁保障自己的卫生健康”(王广坤 102)。随着 1832 年《改革法案》(Reform Act)的通过和 1839 至 1845 年间中产阶级围绕《谷物法》(Corn Laws)与土地贵族展开的一系列斗争的最终获胜,中产阶级在政治和经济领域逐渐取得支配权,然而“被土地贵族长期垄断的文化领导权则是他们必须继续攻破的另一个重要领域”(陈智颖 63),因此中产阶级有必要以自身的健康观念为出发点,重塑一个符合本阶级文化利益的精神共同体。

在聚焦健康问题的过程中,医生逐渐成为关键人物。中产阶级正是借医生权威传达自身的健康观念,从而取代了以贵族为核心的健康观并重塑了精神共同体。1815 年颁布的《药剂师法案》(The Apothecaries' Act)确定了英国医生的认证与考核标准,正统医学界以内科医生、外科医生、药剂师为代表的职业等级制度得到确立,医生群体开始有了职业认同;1832 年《解剖法》(Anatomy Act)的通过使解剖尸体的供应合法化并促进了病理解剖学的发展,医生凭借科学的培训和严格的考察成为“共同体中最招人喜欢的医学人士”(转引自 Loudon, “Cash Book” 262)。借立法等举措,不仅医学本身逐渐成为一门专业性学科,医学从业者的地位也得到了提高,尤其是以外科医生和药剂师为代表的全科医生(general practitioner)得到重视。至 1851 年,在整个英国甚至有将近半数的医学从业者为全科医生(Corfield 158)。在这样的医学背景下,“充满智慧与财富”的中产阶级后裔大量涌入这一职业(转引自 Loudon, “Cash Book” 257),使医生职业本身几乎成为中产阶级的代表。不光如此,他们还通过构建“家庭医生”(family doctor)这一形象左右了时人的健康观念。19 世纪 20 至 30 年代,全科医生主要以“家庭医生”的形象出现。家庭医生与中产阶级订立契约,按照后者认可的风格从事医学实践,即以同情理解与仁慈友善来缓解病人的恐惧与痛苦(Loudon, “Family Doctor” 358-59)。这种

对病人个体的照料与共情承载着维多利亚时期人们的多愁善感和怀旧之情 (Loudon, “Medical Practitioners” 243), 即对病房医学 (bedside medicine) 传统下私密而惬意的病房环境及医生与病人个体间亲密关系的向往, 实则传达出对个人健康的重视。由此, 中产阶级借医学权威这一传声筒表达了自身的健康观念, 挑战甚至瓦解了以贵族为核心的健康观念, 对社会共同体进行了精神上的重塑。

与医学改革的实时性不同, 文学创作在对社会问题的反映上往往具有一定的滞后性。《迪尔布鲁克》一书出版于 1839 年, 维多利亚女王登基仅有两年, 中产阶级读者虽是小说市场的中坚力量, 却仍热衷于追逐贵族的礼仪时尚, 摄政时期流行的作为土地贵族文化及意识形态传声筒的“银叉小说” (silver-fork novel) 仍是文学市场的主角。与此同时, 读者又对本阶级粗鄙的文化流露出一不屑或自卑情结。《迪尔布鲁克》中与他们出身相同的霍普是英国正统医学界地位较低的药剂师, 他既通过给各类医学期刊投稿来贴补家用, 又为迪尔布鲁克周围村庄的穷人提供医疗服务以获取相应报酬, 其职业所包含的技术与商业性质使他身上多少带有这样的“粗鄙”痕迹, 因此这样一位主人公的出现“既新鲜又易引起不适” (Martineau, *Autobiography* 415)。但作为穆勒 (John Stuart Mill) 口中这个国家和时代的标志 (Pichanick 243), 马蒂诺敏锐地注意到时代的医学转向, 她启用医生为主角本就体现出对银叉小说及其所代表的土地贵族文化的反抗 (Sparks 44-45)。这一旨趣在小说中的具体体现便是两场瘟疫情节。小说称霍普“不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乡村药剂师” (38), ^[2] 他对隔离与清洁两种防疫手段的灵活运用表明他对当时各种流行的病因学知识的熟稔, ^[3] 这突显出医生在保卫健康方面的专业权威。借助这一权威, 作者传达了中产阶级的健康理念及其对精神共同体的重塑: 选举事件中霍普的政治选择导致其与迪尔布鲁克人以乡绅为核心而形成的传统健康观念展开对抗, 在对个体病人的关怀无法得到施展时, 他通过隔离的方法避免了精神瘟疫的感染, 从而捍卫了自身及家人的健康; 在随后的身体瘟疫中, 霍普借机将自身的健康理念传递给民众, 最终建构起以医生, 也即中产阶级为核心的健康共同体。

与工业带动经济同时产生的, 是严重的环境污染和卫生问题, 瘟疫由此频发, 国家与社会稳定屡遭威胁, 这在另一个层面上决定了医生、健康与共同体间的关系: 医生以医学知识与手段恢复个人的身体健康, 从而对社会共同体进行身体上的重塑。在维多利亚早期, 虽然仍有不少人视疾病的传播为上帝的旨意, 认为唯有净化灵魂才能消除疾病, 但在以进步为导向的社会中, 这一观点逐渐遭到质疑, 尤其当人们发现“流行性疾病常光顾英国那些更为肮脏的地区, 因此合乎逻辑的推论是, 环境污染是致病的根源” (William 12-13)。通过清洁来打造更为美好舒适的社会环境成为主流认知, 正是这样的认知转变为医生发挥主导作用奠定了基础。随着对霍乱病原的调查, 至 19 世纪中叶, 医生在改善居住环境、清洁卫生运动及预防食物中毒等一系列行动中起到重要作用。到 19 世纪 60 年代, 医学及其相关学科甚至已成为国家构建社会整体的必要手段 (Gilbert 52)。由此, “英国社会日益重视职业医生的作用, 认为他们承担着整个社会卫生改良和护理民众健康、保障社会大众幸福的责任” (王广坤 87)。《迪

尔布鲁克》一书诞生于卫生改革运动兴起之时，其中的两场瘟疫既是对中产阶级争夺文化主导权的隐喻，又暗含对现实中霍乱瘟疫的指涉。其中身体瘟疫这一情节尤其与现实呼应：瘟疫的爆发增加了小镇的贫困人口甚至还催生出抢劫事件，表明瘟疫的确威胁到社会的经济与道德秩序。镇上的人在疾病面前手脚慌乱，以牧师为领导、以净化道德风气来消除疫病的观点已经得不到认可，而作者虽暗示气候异常而导致的粮食歉收是身体瘟疫产生的前兆（这似乎与工业污染导致的霍乱瘟疫关联不大），但其将霍普的清洁之法作为消除疫情的根本对策，实则也是以霍乱危机中医生的举措为模本，确认了环境卫生对瘟疫传染的影响，肯定了医生在救治个人继而维护社会稳定方面的重要意义。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工业的发展既催生了中产阶级的健康观念，又破坏了社会的健康稳定，破旧与立新都意味着社会共同体亟需重塑。共同体的重塑又以健康为核心，因此借由医学立法、医学组织及医学知识和诊疗手段等方面的发展，医学权威增强，医生职业及其医学话语得到了新的包装与定位，医生由此成为共同体重塑过程中的核心人物。后文将从《迪尔布鲁克》中的两场瘟疫情节入手，指出马蒂诺正是通过霍普的医学实践——隔离与清洁——在精神与身体两个层面实现对迪尔布鲁克的医学重构。不仅如此，霍普医生更是借助对个体和社会健康的保卫而成为了这一共同体真正的领导者和庇护人。

二、瘟疫与隔离之法：共同体的精神重构

甫一进入第二卷，霍普就因执意投票给不受乡绅亨特看好的候选人罗瑞先生而遭到乡民的排挤。迪尔布鲁克人打着维护健康的名义，以谣言和暴力驱逐霍普，殊不知在谣言和暴力的扩散中，他们已然在精神层面感染了瘟疫，从内部瓦解了小镇的健康，使小镇面临精神上的分崩离析。为了遏制这场精神瘟疫，霍普以隔离的医学手段阻挡了谣言和暴力的扩散，抑制了精神病菌的进一步传播，实则将人们从精神瘟疫中拯救出来，使其恢复健康；人们最终也以霍普为核心，建构起新的精神共同体。

选举开始之前，格雷先生提醒霍普：“你没必要把自己搅到政治里去，没人盼着一个医生这样做。人人都知道，对于一个像你这样的专业人士来说，支持某一个党派会带来怎样不利的影 响。我可以肯定，你将面临非常严重的后果。”（215）格雷先生的善意提醒并非杞人忧天，在维多利亚早期的历史语境下，英国社会以“基于财产与恩庇制度的开放式贵族体制”为主要特征（Perkin 14），这意味着“在一般人工作、生活和生存延续的小型社区、乡村和城镇中，收入本身及个人的其他‘生存机遇’都受到地主的家长式统治”（31）。此外，这一体制的“恩庇”特征还暗含顺从的重要性，“‘恩庇’和‘顺从’作为社会权力关系组织和运作的机制，至少在19世纪前半叶的英国乡村主导着人们的生活和认知”（胡怡君 184-86）。作为职业人士的霍普想要获得工作和收入，自然要仰赖地方乡绅亨特的庇护。而当霍普罔顾恩庇制度，做出有悖于亨特的政治选择时，他就违背了“伟大的服从之法”（Perkin 31），必将遭到亨特无情的镇

压，具体表现就是他的职业受到了极大破坏，他在济贫院的工作行将不保，不少人家急于和他撇清关系，而邻人也对他颇有微词。

乡绅亨特及小镇居民对霍普的镇压，既是对他不服从的惩罚，同时也揭示出，霍普的不服从在接受亨特庇护的小镇居民中制造了健康危机，在人群中引起了恐慌。弗洛姆（Erich Fromm）指出，随着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两次浪潮的冲击和资本主义的发展，人们在个人情感的表达、宗教信仰乃至经济、政治层面上都获得了极大的自由，但这一自由使个人陷入了孤立无依的境地（73）。当无法忍受这种孤立时，人面临着两种选择，“在自发之爱与生产劳动中与世界相连，或者寻求一种破坏其自由及个人自我完整之类的纽带，与社会相联，以确保安全”（19）。对于迪尔布鲁克人来说，依附在乡绅贵族亨特的羽翼之下，接受并内化其思想并与之保持一致，可以使他们免于被孤立的危险，从而保障共同体的稳定。此外，当时人们秉持的健康观是以贵族乡绅为核心的，通过维持一个稳定的卫生环境来达到保障自身健康的目的。霍普在政治选举中没有依附众人的选择，这使他在彰显自我完整的同时破坏了这一环境的稳定性，实际上也就威胁到了人们的健康，为此他将以破坏共同体健康的罪名遭到惩罚。

这种惩罚以谣言和暴力为表现形式，二者可以视作一种关于传染病的隐喻，其传播的速度之快、范围之广，堪比传染病病菌（Jacobson 99），且这一传染病菌“同样可以引发瘟疫，这可以在‘群体’现象中得到理解[……]数量不断扩大的群体威胁着既定的社会秩序，因为在个体之间毁灭性的暴力行为不断从一个人传到另一个人身上”（Christensen 12-13）。政治选举过后，罗兰德夫人先散播了有关霍普的谣言，继而人们对霍普的质疑迅速发酵和蔓延：既声称“解剖是[他的]事业和追求，还说只要教堂的墓地里埋了人[他]就会去盗尸”（279），又荒唐地指称他为了招揽生意而给孩子注射疫苗，把好牙拔下来拿去卖（309）；镇上的衣帽商奈尔斯小姐也听信谣言，说霍普把泰勒家的保姆那摔断的右臂整个接反了，导致这个可怜的仆人丢了工作（365）；人们还编造故事，称霍普医生医术不精，在治疗玛丽亚的坏腿时不得不把它折断两次才复归原位（440）。在谣言的扩散下，霍普甚至变为死亡的象征：当他想为一位因风湿病而卧床的老妇人进行诊治时，他被病人的朋友们拦了下来，她们不肯让他进屋，“唯恐他把她给治死了”（344）。同样，人们对霍普的暴力侵袭也从个体行为上升为集体行动，最终形成了一场以破坏医疗器具、烧毁霍普雕像为标志的群体性暴力事件。可以说，迪尔布鲁克人打着捍卫传统健康观念的旗号驱逐霍普，却使谣言和暴力如传染病菌般向其内在在精神实质渗透扩散，最终使自己深陷精神瘟疫的泥沼，无心也无力再恢复以亨特为核心的共同体。

面对这场精神瘟疫，霍普起初仍兢兢业业为人们治病，即便受到生命威胁，仍声称自己不会轻易离开迪尔布鲁克，除非“看到这些可怜的老人家被委托给像我一样好的人来照顾”（349），但当他的医术再无用武之地时，他便采取以静制动的隔离医学手段来自保。首先，他避免接触谣言和暴力等“病菌”，使自己免于精神瘟疫的传染。早在小说开篇作者就暗示霍普习惯以隔离之法来断绝不良精神的传染，称他从不参与小镇的流言制造与传播，因此镇上的人“不仅什么事都愿意向他倾诉，还不愿把各种流言蜚语传到他耳朵里以免玷污了他”（39）。

在精神瘟疫中,这一隔离之法更是被当作一种专业医学手段,通过与谣言和暴力保持距离,霍普得以维护自身的精神健康。不仅如此,他还以家庭为据点实施隔离,保护了家人的健康。暴乱之时,尽管霍普表示他会适时站出来和暴徒对质(357),但实际上他一直与亲友待在家庭这一内部空间,直至暴徒自行解散才把窗户打开。当外部的咆哮和哭号连成一片时,霍普一家却围绕着一天的经历展开愉快的对话,妻子海斯特的脸上甚至还“洋溢着幸福和喜悦之美”(357)。内部空间的和谐、愉悦与完整和外部的骚乱、破碎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缓和了暴动的狂乱冲击,使暴徒在一时的狂热降温后自行退去,同时也确保了霍普一家不会受到外界这一狂热的传染。

对霍普来说,隔离措施的目的有二。其一,当全镇陷入流言与暴力中时,霍普及其家庭成员在精神上的冷静自持实则作为一种解药,对这条精神瘟疫传染链进行了医学干预,使病菌在他这里失效,从而遏制了瘟疫的蔓延。隔离因而可以视作消灭精神瘟疫之路上最基础也最重要的步骤,其效果在小说第三卷中的身体瘟疫中得到了验证。当身体瘟疫将人们的注意力由流言和暴力转向健康和死亡时,已经得到遏制的精神瘟疫便也随之被彻底切断。

其二,更为重要的一点,霍普在选举中表现出来的独立决断和随后在精神瘟疫中采取的隔离举措都体现了他对自身健康的关注。这一健康观不同于依附乡绅亨特的迪尔布鲁克人,代表的是中产阶级的个人主义健康观。霍普以隔离举措维护了这一健康观念,使其免受传统健康观念支配下的精神瘟疫的感染,这也使他得以在随后的身体瘟疫中通过治疗人们的身体,将这一健康观念传递给病人。正是意识到了个人健康的重要性,在经历了瘟疫的洗涤和净化之后迪尔布鲁克不再人心惶惶,人们仅仅因为自己还能健康地活着就感到心满意足。“熟人之间再碰面,发现他们各自还都活着,这碰面可和其他任何形式的碰面都不同:它使最冷漠无情的人变得生机勃勃,而且几乎能把敌人也变成朋友”(593)。人们也终于意识到他们更应该信赖的是霍普在医学上的“能力和善心,而不是威廉·亨特殿下的显赫地位和万贯家产,这些在患难时刻救不了他们”(575)。正如桑德斯所说,瘟疫象征着对充满错误价值观的虚伪社会的一种净化,它同时强化了那些在瘟疫中活下来的人们的道德观念,也使医生最终走向了中心位置(*Reason Over Passion* 81)。此刻人们对个人健康的推崇不仅取代了对谣言和暴力的热衷,使其彻底摆脱精神瘟疫的阴霾,更使他们自愿以霍普的健康观为纽带、以医生为中心建立一个新的和谐而牢固的精神共同体。也就是说,霍普以隔离为出发点,最终围绕中产阶级的健康观达成了对共同体的精神重塑。而身体瘟疫不仅使霍普隔离法的效果得到印证,还使他有机会利用清洁这一医学手段消除迷信影响下共同体的解体威胁,进而在身体层面对共同体进行重构。

三、瘟疫与清洁之法：共同体的身体重构

如前所述，身体瘟疫证实了隔离法的功效，使医生最终实现了对共同体的精神重塑。同时，由于身体瘟疫带有恐怖和威吓的力量，迪尔布鲁克人“病急乱投医”，在江湖游医的“指导”下展开五花八门的身体保卫战：或是在肮脏的生活环境中靠咒语驱逐疾病，或凭毫无科学依据的消毒法在极端的无菌环境中躲避疾病，人人孤身奋战，无暇顾及他人安危，共同体由此面临新的解体风险。对此，霍普不仅亲自践行清洁的医学手段，还间接通过妻妹玛格丽特的行动将清洁之法扩散，通过打造符合医学标准的卫生环境对人们的身体进行管理。经过这场瘟疫的洗礼，霍普实现了对迪尔布鲁克的身体重构，建立起一个以医生为核心的社区共同体。

在刚觉察到瘟疫的苗头时，霍普就急着和李维特牧师联络，“咨询有关清洁 [……] 村子里条件最差的一些房子的举措”（531）。但小说并没有正面描写霍普的清洁措施，而是通过其妻妹玛格丽特对普拉特一家的照料，暗示霍普正是以卫生环境的清洁战胜了人们对咒语的偏信和对肮脏环境的忽视，实现了对病人身体的重构。如罗伯茨（Caroline Roberts）所分析的那样，通过玛格丽特“对表面的精准凝视”，小说对这一照顾病人的过程进行了“实证主义”式的描摹，这本身就是小说对霍普式“医学话语”（63）的展现。而玛格丽特在普拉特一家所采取的种种措施，如清理盛水的木桶、清洁床架及用香皂、毛巾和热水为病人擦洗身体等，显然也是在霍普的清洁理念指导下进行的医学实践。不过在展开清洁运动时，玛格丽特遭遇了病人无知的抵抗。在照顾普拉特太太时，玛格丽特发现，能够帮上她的只有普拉特太太的母亲，然而她只是“坐等着算命先生的预言结果”（548），家里的床单和裹毯甚至“在早上就已经被抵押给了巷子里的算命人”，作为回报，算命人“给床底下放着的一桶清水施了法，并且承诺到早上再施加新的咒语”（549）。对此，玛格丽特不顾病人这种毫无根据的虔诚，赎回了干净的床单和裹毯，甚至倒掉了病人无比珍视的“圣水”，以用木桶盛装病人身子下面垫着的肮脏不堪的削屑（549）。为此普拉特对着她咒骂，“他大概以为她又破坏了他付钱才得到的护身符”（550）。然而遵循着霍普的指示，玛格丽特确实通过清除室内的污秽和保证普拉特太太身体的整洁使她的病痛得到了缓解，后者最终成功康复。她的母亲看在眼里，也终于恢复了对医学的一些信任。与此同时，虽然普拉特先生没能在医学的照看下痊愈，但他作为整个医疗过程的亲历者和见证人，切实感受到干净整洁的环境和细心的照料相较于咒语和“圣水”的优势所在，因此他从对玛格丽特的不配合甚至是排挤，逐渐变为对她的感激和对霍普一家的愧疚，以至于在临终前坦白了自己的入室抢劫之罪并归还了玛格丽特的定情戒指。这枚失而复得的戒指既喻示着玛格丽特的感情生活即将出现转机，也象征着清洁的医学方法最终赢得了病人的信任，驱逐了迷信与无知的力量。

与此同时，霍普不计前嫌地为那些曾经诽谤和伤害过他的病人诊治，甚至还以医学实践代替宗教教诲，不但遏制了宗教权威都无法控制的迷信狂热，还通过对病人个体的悉心照料维护了整体的健康。他身体力行，“不带自私的想法和无知的恐惧”（539），深入到病人家庭

之中进行清洁,这使他真正成为了群体健康的守护者和社会秩序的维系者。在这里,作者同样没有正面切入,而是通过书写亨特一家对毫无科学依据的消毒方法的迷信、对极端无菌环境的偏执及由此产生的与迪尔布鲁克人的疏离来反衬霍普医学方法的合理性。亨特一家一直是迪尔布鲁克人惯于仰视的对象,然而在他们最应该站出来为镇上的人加油打气时,他们却谈病色变,不仅“大门紧锁,以防任何村里来的人踏足他们的庭院;还对每一样送到家的用品进行烟熏消毒”(547)。在这里,亨特一家采取的预防措施正是江湖游医所力荐的烟熏消毒法,而当作者夸张地指出,亨特一家连经手的钱币也要一一消毒时,他们身上所散发出的迷信色彩几乎要将其作为乡绅的优雅与高贵完全抹消。正是在与世隔绝且充满迷信色彩的亨特一家的反衬下,作者表明医生才是一个处在危机之中的社会群体的真正领导者。而以普拉特一家和亨特一家为切入点,清洁之法逐渐得到整个共同体的认可,迪尔布鲁克人也由此脱离江湖游医的管控,不再轻信咒语、圣水或是毫无依据的消毒法,也不再各自为战,使共同体在千奇百怪的医疗尝试中分崩离析,而是统一臣服于医生的清洁方法,从而形成一个具有凝聚力和抵抗力的整体。至此,霍普完成了对迪尔布鲁克人的身体重构,以医生和清洁的医学手段为核心的共同体得到确立。

实际上,马蒂诺于1850年在狄更斯主编的《家常话》(*Household Words*)杂志上连载了一篇题为《布利伯恩人的疾病与健康》(“*The Sickness and Health of the People of Bleburn*”)的故事,这篇小说以真实事件为底本,就清洁与共同体建构问题进行了进一步发挥。小说中,来自美国的年轻姑娘玛丽拜访她在约克郡的姨妈,却发现这里遭受了斑疹伤寒瘟疫的感染,且因为缺乏专业护理人员 and 公共卫生意识而情势严峻。这位好心肠的姑娘执意留下来照顾病患,并最终帮人们渡过难关,使小镇重获健康。前人研究注意到该小说对19世纪40至50年代英国公共卫生改革运动的映射,甚至有学者谈到马蒂诺对清洁手段的关注实则与狄更斯的创作宗旨相呼应(Kennedy 41-42)。但很少有学者注意到,马蒂诺早在狄更斯热心宣传公共卫生政策之前就已经在《迪尔布鲁克》中阐述了清洁卫生与铲除疫病及凝聚共同体之间的关联了。小说中玛丽对环境的医学凝视与她的前辈玛格丽特极其相似:在玛丽看来“一切都是昏暗的”;孩子们在污浊的水池边玩耍,“脏得要命”;在“促狭的街道上,每扇窗好似都关着,有些甚至连窗帘都拉了下来”(Martineau, “*The People of Bleburn*” 197);她的姨妈家也是又热又挤、令人窒息,唯一的窗户在门旁边,所以新鲜空气无法在室内流通,且房间里的一切都“亟需彻底的清洁”(198-99)。玛丽照料病人的手段也与玛格丽特如出一辙,她处理掉被当作药物使用的朗姆酒和肮脏的床具,并建议村民将传染病人的衣物消毒,甚至用生石灰将病人房间重新粉刷,最终通过消毒和清洁等流程使整个村落重新恢复活力。

或许与《迪尔布鲁克》一书最大的不同在于,这个故事并没有把医生置于前景,但不可否认,当初指导玛格丽特以清洁手段照料普拉特一家的霍普医生的幽灵,此刻化身为一整套公共卫生理念,继续指导着玛丽的清洁实践。究其原因,霍普凭一己之力或许可以清除迪尔布鲁克的瘟疫并将小镇重构,但对世纪中叶覆盖广泛、目标宏大的公共卫生运动而言,重构整个社

会却不能单凭医生个人的行医实践，因此小说更需要将医学理念和医学手段，而不是医生本人，置于瘟疫的风暴眼，而以一个外行人来践行清洁理念，似乎更能突出医学本身的权威性，也促使受病痛折磨的破碎的共同体围绕医学观念重新聚合起来。无论如何，从迪尔布鲁克到布利伯恩，马蒂诺持续地记录着清洁这一医学话语对维多利亚早期社会共同体的重塑过程。

综上所述，在19世纪三四十年代工业化背景下，健康观念更替，健康问题频出，英国社会面临着解体和重塑的挑战。医生在医学发展与医疗改革的支持下成为在身体和精神层面上重建共同体健康的核心人物。《迪尔布鲁克》中的两场瘟疫虽作用于不同层面，核心却都是围绕医学话语对共同体健康重塑。在精神瘟疫中，民众的流言与暴力使他们在共同体内部制造了健康危机，对此霍普以隔离之法应对，通过保护自身及家庭的精神健康，既切断了精神瘟疫的传染链，使瘟疫得到控制，又为日后在身体瘟疫中重建以中产阶级的健康观和医生为核心的精神共同体奠定了基础。身体瘟疫不仅验证了霍普隔离法的疗效，还促使他进一步通过清洁手段，将民众从江湖郎中的咒语和消毒法中拯救出来，从而实现了对共同体的身体重构。在《迪尔布鲁克》中，马蒂诺正是将自己对社会健康问题的理解置于两场瘟疫语境，并借助霍普医生及其隔离与清洁的医学手段实现了对迪尔布鲁克镇的身心重塑，而霍普医生也凭借对个人及社会健康的保卫完美地履行了医生职责，从而由小镇的边缘角色一跃成为中心人物。

注释 [Notes]

- [1] F. R. 李维斯 (F. R. Leavis) 和 Q. D. 李维斯 (Q. D. Leavis) 认为，金斯利 (Charles Kingsley) 在 1857 年的《两年前》(Two Years Ago) 中塑造的治疗霍乱的瑟纳尔医生是“真正现代意义上的”第一个医生角色，因为其不仅具有科学钻研的精神，还有着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对病人十分关心 (180)。但正如斯巴克斯 (Tabitha Sparks) 所说，这些特征早在《迪尔布鲁克》中的霍普医生身上基本都得到了体现，唯一的区别仅在于霍普还具有一种基督教意味的良知，而《两年前》中的医生则是一个宗教怀疑论者，见 *The Doctor in the Victorian Novel: Family Practices*, pp. 15-16, 注释 18。
- [2] 文中关于《迪尔布鲁克》的引文均出自 Harriet Martineau, *Deerbrook: A Novel*. Edited by Valerie Sanders, Penguin, 2004. 由于本书无中译本，故引文为笔者自译。以下仅标出页码，不再一一注明。
- [3] 瘟疫传播的病因学 (etiology) 早在 18 世纪的英国就曾引起广泛争论。一方面，英国皇室御医米德提出人际传播论 (contagion theory)，认为经人感染后的空气、感染的人及感染的货物都会引发疫病的传播，并由此强调了隔离的重要性；另一方面，将污浊的空气作为根源的瘴气致病说 (miasma theory) 自古希腊时期便开始流传，因此有着深厚的历史基础，再加上瘴气能够为人际传播论中一些无法被阐释的现象 (如为何不是所有接触者都会得到感染) 提供解释 (Porter, *The Greatest Benefit to Mankind* 10, 259)，因此也不乏支持者。在 19 世纪 60 年代细菌学说确立之前，这两种理论通常同时存在，相互融合和补充。霍普身上体现了这种融合，而且正是他对医学的认知和灵活运用保障了群体的健康。

引用文献 [Works Cited]

- Chen, Zhiying. "Guidebooks for the Middle Class: Fashionable Novels in Early Nineteenth-Century England and the Battle for Cultural Hegemony." *Foreign Literature Review*, no. 4, 2021, pp. 46-69. [陈智颖:《中产阶级的教科书: 英国时尚小说与文化领导权的争夺》, 载《外国文学评论》2021年第4期, 第46-69页。]
- Christensen, Allan Conrad. *The Nineteenth-Century Narratives of Contagion: "Our Feverish Contact."* Routledge, 2005.

- Colby, Vineta. *Yesterday's Woman: Domestic Realism in the English Novel*. Princeton UP, 1974.
- Corfield, Penelope J. *Power and Professions in Britain, 1700-1850*. Routledge, 1995.
- Fromm, Erich. *Escape from Freedom*. Translated by Linhai Liu, China International Culture Press, 2007. [弗洛姆:《逃避自由》,刘林海译。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7。]
- Gilbert, Pamela. *The Citizen's Body: Desire, Health, and the Social in Victorian England*. The Ohio State UP, 2007.
- Hu, Yijun. "Wife Sale, Witchcraft, Skimmington and the Prudent Businessman: A Study of the Paradigms of Community in *The Mayor of Casterbridge*." *Foreign Literature Review*, no. 2, 2019, pp. 182-99. [胡怡君:《卖妻、巫术、斯基明顿与理性的商人:《卡斯特桥市长》里的共同体范式研究》,载《外国文学评论》2019年第2期,第182-99页。]
- Jacobson, Carolyn Anne. *Contagious Transmissions and Charged Atmospheres: Disease Theories and Narrative in Early Victorian Novels*. Diss.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2008.
- Kennedy, Meegan. "Cleanliness and Medical Cheer: Harriet Martineau, the 'People of Bleaburn' and the Sanitary Work of *Household Words*." *Victorian Medicine and Popular Culture*, edited by Louise Penner and Tabitha Sparks, U of Pittsburgh P, 2016, pp. 41-52.
- Leavis, F. R., and Q. D. Leavis. *Dickens the Novelist*. Pantheon Books, 1970.
- Loudon, Irvine. "A Doctor's Cash Book: The Economy of General Practice in the 1830s." *Medical History*, vol. 27, no. 3, 1983, pp. 249-68.
- . "The Concept of the Family Doctor." *Bulletin of the History of Medicine*, vol. 58, no. 3, 1984, pp. 347-62.
- . "Medical Practitioners 1750-1850 and the Period of Medical Reform in Britain." *Medicine in Society: Historical Essays*, edited by Andrew Wear, Cambridge UP, 1992, pp. 219-48.
- Martineau, Harriet. "The Sickness and Health of the People of Bleaburn." *Household Words*, no. 1, 1850, pp. 193-99, 230-38, 256-61, 283-88.
- . *Harriet Martineau's Autobiography*. Vol. 1. Edited by Maria Weston Chapman, James R. Osgood, 1877.
- . *Deerbrook: A Novel*. Edited by Valerie Sanders, Penguin, 2004.
- Perkin, Harold James. *The Origins of Modern English Society 1780-1880*. Routledge, 2005.
- Pichanick, Valerie Kossew. *Harriet Martineau: The Woman and Her Work, 1802-76*. U of Michigan P, 1980.
- Porter, Roy. *The Greatest Benefit to Mankind: A Medical History of Humanity*. Norton, 1997.
- . *Body Politics: Disease, Death and Doctors in Britain, 1650-1900*. Cornell UP, 2001.
- Roberts, Caroline. *The Woman and the Hour: Harriet Martineau and Victorian Ideologies*. U of Toronto P, 2002.
- Sanders, Valerie. *Reason Over Passion: Harriet Martineau and the Victorian Novel*. Harvester, 1986.
- . "Introduction to *Deerbrook*." *Deerbrook: A Novel*, edited by Valerie Sanders, Penguin, 2004, pp. xi-xxxii.
- Sparks, Tabitha. *The Doctor in the Victorian Novel: Family Practices*. Ashgate Publishing, 2009.
- Wang, Guangkun. *The General Practitioners: A Study on Career Change of Doctors during the Victorian Era in English History*.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2018. [王广坤:《全科医生:英国维多利亚时代医生的职业变迁》。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
- Warren, John. "Harriet Martineau and the Concept of Community: *Deerbrook* and *Ambleside*." *Journal of Victorian Culture*, vol. 13, no. 2, 2008, pp. 223-46.
- Webb, Robert Kiefer. *Harriet Martineau: A Radical Victorian*. Heinemann, 1960.
- William, A. Susan. *The Rich Man and the Diseased Poor in Early Victorian Literature*. Macmillan, 1987.

◇责任编辑:马妮娅

论《看得见风景的房间》中的环形结构

◎ 陈逸华

内容提要: 在 E. M. 福斯特的代表作《看得见风景的房间》中, 音乐、地点、人物三个关键元素构成了三个环形结构。这三个环形结构在其内部以“重复加变化”实现福斯特对简单节奏的追求, 同时又以彼此间的交错实现福斯特对复杂节奏的追求。在这三个环形结构的作用下, 小说由内而外地呈现出节奏带来的美感, 助推情节发展与女主角露西的成长。

关键词: 《看得见风景的房间》 环形结构 简单节奏 复杂节奏

中图分类号: I56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6-4366 (2023) 01-0068-10

作者单位: 华东政法大学外语学院, 上海 201620

DOI: 10.19967/j.cnki.flc.2023.01.007

Title: On Circular Structures in *A Room with a View*

Abstract: In E. M. Forster's masterpiece *A Room with a View*, the three key elements of music, space, and character form three circular structures. These three circular structures achieve the effect of easy rhythm within themselves by "repetition with variation" and present the effect of intricate rhythm in an interlocking layout. With the help of these three circular structures, the novel is given a sense of beauty brought by rhythm, helping improve the development of the plot and the heroine Lucy.

Keywords: *A Room with a View*, circular structures, easy rhythm, intricate rhythm

Author: Yihua Chen,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East China University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Law, Shanghai, China.

在其为剑桥学子所做的最后一场克拉克讲座上, E.M. 福斯特 (Edward Morgan Forster) 试图将小说创作的技巧从表层的故事与人物塑造层面提升至小说阅读氛围的营造, 讨论小说家如何为小说赋予美感。由于缺少现有的文学术语来指代福斯特所要论述的内容, 他便从绘画领域借来“模型”(pattern) 一词, 又从音乐领域借来“节奏”(rhythm) 一词, 讨论小说家如何创作出能让读者享受到美学体验的小说 (Aspects 132)。在福斯特看来, 小说家不应追求模型式的写作, 因为模型所营造的美感过于抢眼, 甚至会有鸠占鹊巢之嫌, 使小说家为了迁就某一模型而删减本该生动的情节, 束缚本该活泼的人物。与之相反, 节奏则是小说家深埋在小说内部的无形角色, 由内而外地对整部小说进行缝合与拼贴, 并为读者提供审美体验, “以其可爱的起起伏伏”“以惊喜、新鲜感和希望”来满足读者 (132)。

福斯特在讲座中将小说的节奏分为两类, 为了方便论述, 福斯特还将小说中的节奏与贝多芬的《第五交响曲》进行类比。第一类节奏被福斯特命名为“简单节奏”(easy rhythm), 其特点为显著的“重复加变化”(133), 正如交响曲开端的“嘀、嘀嘀、哒”节奏, 能够被读者快速捕捉, 领会其中的节奏感和由此带来的美感。在小说中, 这种简单节奏可以是反复出现的某一意象, 同时, 该意象在每一次出场时都会带来自身或小说中其他元素(如人物、环境)的变化。例如, 在《霍华德庄园》(Howards End) 中, 威尔克斯太太留下的遗嘱及其数次出场时掀起的风波构成一种简单节奏, 既缝合了整部小说, 也让读者逐步意识到威尔克斯先生对玛格丽特的爱情其实是建立在占领霍华德庄园的意图之上。简单节奏着眼局部, 小说家可以通过摹仿与练习来习得这一写作技巧, 但福斯特所追求的第二种节奏则需要小说家具有一定的审美造诣, 能够在写作过程中有意识地协调小说中的各成分, 使其如同交响曲中出现的不同乐器, 在展现自身音色的同时又能和谐地彼此应和。换言之, 小说家若想在小说中呈现出这种节奏效果, 则需要其在创作过程中注意小说情节发展的音乐性过程 (Prasad 124)。例如, 在《印度之行》(A Passage to India) 中, 殖民地上殖民者之间的矛盾、殖民者与被殖民者之间的矛盾, 以及被殖民者之间的矛盾三线并行, 构成一出《天佑女王》(“God Save the Queen”) 与湿婆神音乐 (Shiva Music) 的融合曲, 曲中的激烈碰撞反映出福斯特对殖民行为的反感。福斯特并未为第二种节奏命名, 但他在叙述中使用了与“简单”相对应的“复杂”一词 (Aspects 132), 因此, 这种节奏也被简称为“复杂节奏”(intricate rhythm)。简单节奏与复杂节奏并不冲突, 前者以小构大, 后者则强调小说呈现的整体效果, 需要小说家在创作过程中具有音乐性意识。

福斯特在其关于节奏理论的讲座中曾谦虚地说或许只有像《战争与和平》(Война и мир) 这样的史诗巨作才能呈现出“在阅读时就能感到和弦在身后响起”(134)的复杂节奏, 事实上, 作为一名能深入理解贝多芬的作曲方法和他在《第五交响曲》中如何体现辩证思维的音乐爱好者 (Fillion 295), 福斯特本人早已将节奏式小说创作融入到其写作实践中。福斯特的《看得见风景的房间》(A Room with a View, 以下简称为《房间》) 就是一部具有节奏感的小说。这种节奏感体现在小说中由音乐、地点和人物三方面元素构成的三个环形结构所呈现出的简单节奏

效果和三个环形结构相互配合、应和而呈现出的复杂节奏效果上。在思想上,《房间》充分反映了福斯特个人的精神哲学(Olson 107)及他“对自己及他人的诚实与真实的追求”(Fordoński and Kwiatkowska web);在结构上,《房间》则以其巧妙的三环形结构突破了小说线性叙事带来的约束。《房间》中以女主角露西为核心的三个环形结构从三个维度塑造出露西的立体形象,每一环形结构内部同一元素的变化各有侧重,以重复加变化的形式构成简单节奏,而若以整体的视角来看这三个环形,则三个环形又交叉融合,构成复杂节奏。简单节奏与复杂节奏的叠加与交响为小说赋予了难得的节奏感,也使《房间》超越了普通的爱情小说模式,成为福斯特对勇敢追求自我的后维多利亚时代女性的一曲赞歌。

一、环形内部的简单节奏“圆中有缘”:以音乐环形为例

在《房间》中,围绕女主角露西展开的三个环形结构,即音乐环形、地点环形与人物环形从不同维度填补露西的人物形象,使其不断立体化。音乐环形即露西在小说中弹奏的音乐作品呈“贝多芬—舒曼—莫扎特—贝多芬”的环形结构;地点环形即小说故事发生的地点呈“佛罗伦萨—伦敦—佛罗伦萨”的环形结构;最后的人物环形则是指露西身边的伴侣呈现出“乔治—塞西尔—乔治”的环形结构。

在这三个环形结构中,音乐作品的环形结构较为隐蔽但却更为重要。因为文本透过露西对音乐作品的选择向读者呈现出露西的本心从动摇到坚守的过程。音乐在福斯特的生活和小说中地位突出。福斯特接受过良好的音乐教育,具备高水准的音乐鉴赏力,《房间》、《霍华德庄园》和《小说面面观》(*Aspects of the Novel*)等书都体现出他对古典音乐,尤其是贝多芬的作品的独到见解。在福斯特看来,音乐“最能表达纯粹的感情”(Stone and Forster 60)。《房间》的小说结构受到瓦格纳音乐戏剧的启发,被认为是福斯特“最具音乐性的小说”(Fillion 266),同时,露西的音乐选择和她的审美洞察力也为小说结构、心理和意义的研究提供新的视角。

不管是就小说情节发展的时间顺序还是事件的出场顺序而言,露西为读者弹奏的第一首曲子都是贝多芬的作品。贝多芬在作曲界的重要地位自不必多言,在福斯特的世界中,贝多芬同样占据重要地位,而露西在《房间》里弹奏的音乐作品以贝多芬而始又以贝多芬而终,其中偏爱,可见一斑。作为作曲家,贝多芬既是德国古典主义音乐的集大成者,也是浪漫主义音乐潮的开创者;作为成长于后维多利亚时期的英国少女,露西既接受了“家庭天使”对她的规训,也在内心中产生了突破桎梏的冲动,这是露西与小说中其他女性角色的不同之处,也是她最终能逃离中产阶级约束的原因所在。虽然贝多芬是这个环形中最重要的一环,但福斯特对露西三次弹奏贝多芬的作品的描述都不尽相同。从故事情节发生的顺序来看,露西第一次弹奏钢琴曲是在英国乡下的教会联欢上。她虽选择弹奏贝多芬的作品,却舍弃了《土耳其进行曲》这样广为人知且展现欢乐幸福的曲子,而是选择了复杂的《C小调钢琴奏鸣曲》,

并且以胜利的锤击声结束自己的演奏。正是这样的处理让作为听众的毕比牧师感到非比寻常。毕比牧师也是露西第二次弹奏贝多芬的作品时的听众。在此之前，她在贝尔托利尼公寓里见识到了英国中产阶级如何排斥出身工人阶级的艾默生父子，又在一次出游里感受到艾默生父子直率但略显笨拙的善意，她对这种反差感到不适，对此前接受的以阶级、宗教为基础的闺阁教育产生质疑并在内心深处萌发反叛的种子。因此，此时的露西在弹奏贝多芬的作品时将音乐赋予的胜利感进一步转化为激情，“这份激情很难定义，它介于爱意，恨意和妒意之间，游走在各类形象化的演奏风格之中”（Forster, *Room* 19）。从“胜利”到“激情”，露西内心深处的反叛精神已经呼之欲出。她向巴特莱特小姐发问：“为什么非凡的东西总是不淑女呢？”（25）提出这一问题的时候其实也是在向自己发问，她问的次数越多，选择做淑女的可能性就越小。音乐环形中的最后一环，即露西第三次弹奏贝多芬的作品是在福斯特为小说添补的后记中，在露西历尽千帆终于同乔治结婚后，她成为一名音乐教师，教授贝多芬的曲目。福斯特并未详细描述作为老师的露西如何弹奏贝多芬的作品，但作为一名孤身从中产阶级牢笼中逃出的后维多利亚时代女性，露西早已将少女时期为贝多芬赋予的胜利与激情融入自身，“以对待演奏的态度来对待生活”，将她的演奏与生活都变成“一件激动人心的事情”（20）。

除了露西三次弹奏贝多芬的作品的变化外，福斯特还为露西的数次音乐演奏加入了两个变量，使其构成音乐环形中不可或缺的另外两个环节。第一个便是音乐诗人舒曼的作品。舒曼除了是19世纪德国著名的作曲家、钢琴家与音乐评论家外，还是一位浪漫主义文学的爱好者。在其创作生涯中，浪漫主义文学的阅读体验使他的音乐作品富有浪漫主义特征。露西弹奏舒曼的作品是在其当时的未婚夫塞西尔位于伦敦的家中，此时的她已经对乔治动心，却囿于礼法逃离了乔治与佛罗伦萨，回到伦敦后在众人的期许下接受了同样出身中产阶级的塞西尔。露西并不喜欢带着“中世纪遗风”（50）的塞西尔，也不喜欢伦敦这种“雾重重”（68）的生活，当她带有抵触情绪时，她如何能演奏平日里最喜欢的贝多芬呢？因此，听到塞西尔在众人面前提议让她弹奏贝多芬的作品，她只是摇摇头，带着“不可思议的神奇魔力”（75）弹奏起舒曼的作品。带有浓厚浪漫主义色彩的音乐预示着露西的浪漫冲动，这种浪漫并不仅仅局限于她想要的人生伴侣，更在于她对于自己人生道路的规划。但此刻的她，不管是人生伴侣还是人生道路都不是自己想要的，而是在礼法与社会规约下被迫选择的。正因如此，露西此时弹奏起舒曼的作品只能感到悲伤，且这种悲伤“通常是人生的悲伤，但绝不应该是艺术的悲伤”（75）。音乐环形中的第二个变量是莫扎特。在古典音乐的创作史上，莫扎特是一座难以逾越的高峰，其音乐风格极大影响了贝多芬与舒曼的创作。露西弹奏莫扎特的作品是在自己位于伦敦城郊的家中。在此之前，露西终于下定决心离开塞西尔，这一决定让她的母亲和表姐都感到“悲伤”（111），唯有她泰然自若，将莫扎特的作品弹了一遍又一遍。与其他几处音乐描写不同，福斯特在此并未描写露西的琴声，而是将重点放在露西的母亲、表姐和毕比牧师对她毁婚的讨论之中。面对舆论的狂风暴雨，露西并未辩解，只是安静地弹奏莫扎特的作品。当她“叮叮当当”（tinkling）地弹奏时，历经挣扎而最终做出选择后的如释重负

感跃然于琴上（111，114）。

与音乐环形一样，地点环形与人物环形也同样遵循“重复加变化”（*Aspects* 133）的规律。露西初次前往意大利旅行就被佛罗伦萨的氛围深深吸引，“感觉自己可以喜欢每一个人，感觉社会阶级间的鸿沟虽不可消除但并非深不可测”（*Room* 68）。当她和乔治前往佛罗伦萨度蜜月时，这种感觉已经成为现实，再次听到法厄同之歌，露西“意识到一种比爱情神秘的爱”（131）。与佛罗伦萨不同，伦敦城代表一种守旧、古板、严格划分不同阶级的生活，当露西发现“伦敦的经历会让自己疏远过去所热爱的一切”（75）后，她想要逃离这种生活的冲动便越来越明显。在人物环形中，乔治既是工人阶级的代表，启发露西冲破阶级藩篱，也是理想爱情的化身。他对露西的爱完全是建立在了解并尊重露西的思想之上，而塞西尔则更像是后维多利亚时代诸多中产阶级男性的缩影，虽然博学广闻，但却“不让女人为自己做决定——事实上，他不敢”（113），这样的塞西尔注定无法和不愿做“家庭天使”的露西走到最后。对这两个人物的刻画既体现了福斯特的婚姻观也体现了其阶级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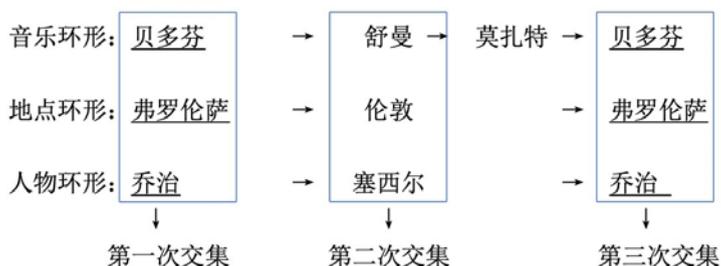
二、环形交错的复杂节奏“圆外有言”：回旋曲式三重奏

《房间》中的三个环形结构并非各自独立，相反，这三个环形结构不仅相互交叠而且在交叠中产生出回旋曲式的三重奏。它们的路线虽然不同，但起点却是重合的：露西在佛罗伦萨邂逅了乔治，并在和乔治短暂相处后，于佛罗伦萨的雨天弹奏起贝多芬的作品。在这个场景中，三个环形结构第一次产生交叠。佛罗伦萨给露西带来完全不同于伦敦的体验，在这里，露西做出了许多大胆的尝试，如自己游览圣克罗彻大教堂、与乔治并行在亚诺河畔长谈，这些在伦敦不被允许做的事情在佛罗伦萨都显得稀疏平常，而这则进一步放大了露西内心深处对真诚、善良等美好品质的渴望，也让她更清楚自己对中产阶级诸多价值观念的否定。正如福斯特在后文所说，“意大利赋予露西她自己的灵魂，那是所有财产中最无价的宝贝”（68）。而乔治的出现则进一步让露西意识到她并不想像表姐宣传的那样去“激励男性去取得某种成就，而不是实现自己的个人目标”她渴望的是一些“非凡的东西”（25）。同乔治的相处让露西逐渐厌倦贝尔托利尼公寓中充斥的英国中产阶级气息，她选择弹奏贝多芬的作品，将自己从“糟喋喋，一锅粥”（19）的氛围中暂时抽离出来，也让这三个环形结构产生第一次交集。可以看出，此时的露西已经受到这三个核心环节的影响，内心的自我意识有了初步的觉醒。最终，露西在认清自身所需后选择嫁给乔治，前往佛罗伦萨度蜜月，并在婚后成为教授贝多芬作品的音乐教师。至此，三个环形结构的核心环节又一次产生交集，并为各自的环形结构画上圆满的句号。“贝多芬—佛罗伦萨—乔治”的三位一体也构成了福斯特在《房间》中搭建起的理想园地。

三个环形结构的第二次交集产生于露西人生的低谷时期。在她接受塞西尔的求婚并且跟

随他去到其位于伦敦的家中时,她仿佛看见铺在自己眼前的只剩下做好“维斯太太”这一条路。露西不想成为某个人的风景,既然是风景就不应该被限定在窗框之中。此外,露西与塞西尔也并没有达到精神上的共鸣,塞西尔瞧不上露西自小长大的生活环境,此前也从未对露西有过任何心动,仅仅是因为“意大利在她身上施展了某种魔法”,“为她打上了光”,“投下了影”而决定向她求婚(*Room* 55)。与其说塞西尔珍视露西,不如说他珍视的是露西身上带有的欧陆烙印。在这一前提下,塞西尔对露西的爱只能说是某种占有欲作祟,而塞西尔的名字(Cecil)也在暗示他对于露西而言是一层难以冲破的“牢笼”(Cell)。塞西尔请露西在宴会的众人面前弹奏钢琴,既是想向伦敦城里的众人炫耀自己未婚妻的气质与才华,也是想借由这个机会将露西从他鄙夷的乡绅社交圈中带离,引入伦敦城的社交圈子里,为露西套上一层更高雅的枷锁。露西在此拒绝了塞西尔让她弹奏贝多芬作品的提议,而是弹起了舒曼的作品,用这种方式表达不满,“她是一个反叛者,但却不是塞西尔能理解的那种反叛者,追求的不是一间宽敞的客厅而是与所爱之人平等相处”(68)。在“舒曼—伦敦—塞西尔”的这一锁链中,露西想要逃离伦敦与塞西尔,而舒曼则是她表达逃离欲望的一条通道。与上一次交集不同,在这一次的交集里,地点与人物的环形结构互相契合,但音乐环形却与之产生冲突,并成为进一步推动三个环形结构往下一环节发展的关键因素。

除了这三次交集外,三个环形结构还有一次交错,即当露西弹奏莫扎特的作品时,地点环形正处于从“伦敦”到“佛罗伦萨”之间,而人物环形则处于从“塞西尔”到“乔治”之间。在此,莫扎特的作品犹如一针催化剂,推动露西在另外两个环形上走向下一个节点。露西单方面解除婚约这件事在她的家庭里掀起不小的风波,只有能够从她弹奏的贝多芬的作品里听出胜利感的毕比牧师对此表示支持,认为“这本就不是一场悲剧”(114)。此时的露西虽然已经下定决心要离开伦敦,可是就连她自己也不知道将去向何方,也不知道自己解除婚约之后还能再与什么人走入婚姻殿堂,但她已经迈出了最勇敢的一步,即做出逃离的尝试,这也为露西接下来与乔治重逢并最终同乔治一起前往佛罗伦萨做好了铺垫。可以说,“莫扎特”环节既是对之前环节的总结,也是开启最终环节的钥匙,成为为读者带来“惊喜、新鲜感”(Aspects 132)的插曲。



▲图1

如图1所示,《房间》中的三个环形结构正如三个回旋曲式,除了在各自曲部内达到统一外,还因其或产生交集,或互相冲突,或交错并行的排列构成一曲三重奏。正如交响乐曲中不同乐器的演奏同时进入听众的脑海并“构成一个共同的实体”(Aspects 133),不同环形之间也是在故事情节的推动中自然生发出具有“节奏性”(133)的联系。《房间》以露西到佛罗伦萨旅游为始,地点环形也成为第一个入场的环形结构;在露西逗留佛罗伦萨期间,她在贝尔托利尼公寓里遇见乔治及其父亲并因一间“看得见风景的房间”与其产生交集,由此,人物环形也被引入文中;在佛罗伦萨的经历和乔治父子使露西对自己原本接受的教育产生动摇并在一个雨天弹奏起贝多芬的作品,至此,音乐环形出现并因其能反映出露西的心理成长过程而逐步成为三重奏的主线。当地点环形进入伦敦,而人物环形中出现塞西尔时,露西内心对这两者产生了抵触,她便借由音乐环形中的舒曼来诉说这种哀伤,这也使三个环形结构的第二次交集产生了冲突,而在地点环形与人物环形要回到最初的起点之前,露西已经早其一步自救于伦敦与塞西尔的桎梏中,在音乐环形与另两个环形结构的交错间隙抒发自己的坦然与自怡,主导着地点环形与人物环形步入最终也是最初始的环节中。这三个环形结构从内部将小说缝合在一起,“走向美的建立,陶醉读者的记忆”(132),并在其错峰与并行中交织出小说人物的丰满形象,实现文本内外的大融合。

三、环形之美:情节、人物与节奏的和谐统一

作为首位受邀至剑桥大学进行克拉克讲座的小说家,福斯特在其演讲中的野心绝不仅限于传授简单的小说写作技巧,而是想讨论小说区别于其他文艺形式的美感到底从何而来。尽管福斯特在这一系列讲座中关注的诸多议题在约半个世纪后才被正式命名为“叙事学”(Narratology),但他当时的演讲已经触及了这门学科的某些重要论题,如“故事”(story)与“情节”(plot)的区分(Kermode 25)。福斯特所看重的小说节奏正是小说家推动故事升华为情节的关键手法之一,节奏感也在由内而外缝合小说情节的同时为小说赋予可与音乐类比的美感。在《房间》中,无论是每个环形内部的简单节奏还是三个环形耦合在一起的复杂节奏都在推动故事成为情节,并为小说赋予美感。

简单节奏以其“重复加变化”(Aspects 133)的特质为小说情节发展服务。在福斯特看来,叙述一系列按时间顺序排列的事件可以被称为故事,但只有当这一系列事件之间互相产生了联系,并且叙述的重点由描述事件转移到事件间的联系,此时叙述的内容才能被称为小说的情节(69-70)。例如,在《房间》的第三章中,露西在佛罗伦萨的雨天里弹奏贝多芬的作品与她在伦敦乡下的联欢会上弹奏贝多芬的另一部作品可以被看作是两个独立的故事,但在福斯特的安排下,这两次弹奏经由毕比牧师的回忆而产生了联系,使贝多芬成为露西这一人物形象的立身之根,而他评价露西“弹奏太多贝多芬了”(Room 25)也为后文露西逃离中产阶级

的举动埋下伏笔。由此可以看出,想要创造两件事之间的联系,关键元素的重复不失为一种见效显著的手法。布鲁克斯(Peter Brooks)在其著作中也强调,如果将文学作品的文本看作一套热力驱动系统,那么,“重复”的手法便是这套系统的主要操作原则之一,通过重复,文本和读者可以在构建主题整体和叙事秩序的形式中一起工作(123)。然而,如果只是单纯重复相似或相同的元素,那这种手法对情节的推动作用便十分局限。虽然重复能够满足小说家让读者具有记忆力(Aspects 70-71)的期许,但若要实现读者对小说家的期许,即小说情节“有始有终”,“有伏线必有照应”,更甚者,使读者在阅读过程中能够“不断将记忆片段重新组合,再三思考,发现新的线索、新的因果链条”并最终收获“一个在美学意义上紧凑的整体”(71-72)的期许,那就需要在重复的基础上再加入变化,或者如布鲁克斯所言,“在重复中包含时间变化的概念,而且可能是一个潜在的进步行为”(124)。同样以《房间》第三章中对露西弹奏贝多芬的作品的两处描写为例,福斯特通过毕比牧师的心理活动表现这两次弹奏的不同之处:在伦敦乡下的露西虽然对贝多芬的作品有自己的见解,但她只能领会到作品中表层的胜利元素,而在佛罗伦萨领略过意大利与工人阶级的热情与善意后,她才开始将这种胜利元素进一步升华为对演奏、对生活的激情。在这两厢对比下,地点环形的核心佛罗伦萨与人物环形的核心乔治体现出了各自的重要性,即助推露西发现内心的真实自我,埋下后文露西逃离伦敦、逃离塞西尔的伏线。

复杂节奏强调小说的整体和谐,在《房间》的情节中,这种和谐性并不是靠同一音部的反复吟唱实现的,而是靠三个环形结构碰撞出的变音实现的。热奈特(Gerald Genette)将叙事中的变音分为两种情况,一种是“省叙”,指叙述者“提供的信息量比原则上所需的更少”;另一种被其称为“赘叙”,指“提供的信息量比支配总体的聚焦规范原则上许可的要多”(133-34)。这两种变音都能在《房间》中找到恰当的例子。在地点环形中,露西从佛罗伦萨逃离后动身前往罗马与塞西尔会和,福斯特却省略了露西在罗马的经历。表面上来看,这样处理使地点环形缺失了一环,但这恰恰说明罗马和身处罗马的塞西尔对露西个人的成长而言并没有起多大的助推作用,虽然说“意大利赋予露西她自己的灵魂”(Room 68),但真正为露西增添欧陆光彩的只有佛罗伦萨和她在佛罗伦萨结识的艾默生父子。省叙的手法向读者强调“贝多芬—佛罗伦萨—乔治”这一核心链条的重要性,赘叙的手法则接近于福斯特在讨论复杂节奏时提到音乐节奏对小说创作的另一种启发:扩张(expansion)。“扩张”并不意味着小说家要在某一段节奏中不断加入能提供新鲜感的变化,而是要有所取舍地将小说中的世界向读者开放,通过变化来逐步拓展小说世界的边缘,“不是四舍五入而是敞开心扉”(Aspects 133)。例如,在《房间》正文中,塞西尔总是以一副自命不凡、不体贴露西的形象出现,可在福斯特为《房间》添补的后记里,正是因为塞西尔力陈“贝多芬是比利时人”的观点,才使原本被认为属于“德国佬”的《月光奏鸣曲》在二战时的英军阵营内被奏响。在此,“塞西尔”与“贝多芬”竟产生交集,并且塞西尔喜欢恶作剧但又富有真才实学的性格在这次交集中发挥了正面作用,为塞西尔添上一个闪光点。通过这一次错位的交集,福斯特扩张了塞西尔原本的人物形象,为

其提供了另一种成长的可能,即在与露西和乔治接触过后,他也许能摆脱“中世纪遗风”(50),接受由意大利带来的光与影。由此也可看出,福斯特并不会为了情节的发展而强行改变人物的成长方向,他深知小说中人物幸运与否并非全靠情节展现,绝不能死板地用任何硬性法则对其加以规定(*Aspects* 76-77),但恰恰是这种为人物成长而服务的意识使《房间》中不同环形结构相互碰撞而产生变音,让情节发展更为生动活泛,并为小说赋予节奏美感。

小说所呈现的内容主要由眼睛吸收,再由大脑加工形成艺术效果,而在小说创作中加入对节奏的兼顾,则为这一艺术形式增添可与古典乐相类比的美感。小说情节的重复、变化与变音可以为小说增添节奏感,而这种节奏感也能反过来为小说情节的发展服务。要实现这一效果,则需要小说家具有“思想家兼诗人”(thinker-poet)(Lefebvre 9)的节奏意识,也要求其在创作时凌驾于作品之上,“(以情节制造者的身份)不断跟身为人物制造者的自己协商调停”(Forster, *Aspects* 77-79)。

在其克拉克讲座上,福斯特提出的节奏观为小说之美提供了全新的探索视角,福斯特本人也在其小说《看得见风景的房间》中通过三个环形结构来呈现小说的节奏感。简单节奏易于捕捉,以重复引起读者注意,又以变化为读者提供惊喜感,而复杂节奏则完全融合在小说内部之中,需要小说家在小说的各成分之间建立起带有节奏感的联系,使整部小说具有和谐的美感。简单节奏与复杂节奏并不冲突。相反,一部具有节奏感的小说既要让读者能够在阅读时就快速捕捉到某些重要元素的变化,并顺着这条变化线深入到小说的世界之中,也要让读者在阅读完全文后感受到小说家的塑造在和谐的同时又有足够的留白以供想象。

在《房间》中,福斯特通过音乐、地点、人物三个环形结构的安排为小说增添了节奏感,也使女主角露西的形象在三个环形结构的交错与并行中逐步成长、丰满。音乐环形的每一环节都呈现出露西的心理变化,最终构成其精神成长的过程,此时的节奏可以说是露西的成长曲。地点环形呈现的节奏像一曲热情的意大利民歌:意大利的人和风景激励英国人发展出融合不同阶级和性别以及国家和民族的新方式(Roszak 167),而伦敦和伦敦人则如同福斯特在其他小说中展现的那样具有一颗“发育不良的心”(岳峰 147)。人物环形呈现的节奏是福斯特颂扬平等、自我与真情的布鲁姆斯伯里之歌,乔治对露西来说就像是启蒙时代的欧洲大陆向大英帝国投射去的一缕光,让露西逐步看清自己的内心,而从露西在乔治与塞西尔之间做出的选择也不难看出福斯特对其代表的不同阶级的态度。这三个环形结构的并行交织使这部以时间为顺序进行线性叙述的小说逐步立体化,更重要的是,这三个环形结构通过其内部的简单节奏以及外部耦合后营造的复杂节奏为小说赋予“可以与整个《第五交响曲》相媲美”的效果,读者结束阅读时正如听众在听完管弦乐队的演奏一样,能够听到“从未真正演奏过的东西”(Aspects 132)。

引用文献 [Works Cited]

- Brooks, Peter. *Reading for the Plot: Design and Intention in Narrative*. Harvard UP, 1992.
- Fillion, Michelle. "Edwardian Perspectives on Nineteenth-Century Music in E. M. Forster's *A Room with a View*." *19th Century Music*, vol. 25, no. 2-3, 2001, pp. 266-95.
- Fordoński, Krzysztof, and Anna Kwiatkowska. *The World of E. M. Forster: E. M. Forster and the World*. E-book ed., Cambridge Scholars Publishing, 2021.
- Forster, Edward Morgan. *A Room with a View*. E-book ed., Project Gutenberg, 2001.
- . *Aspects of the Novel*. E-book ed., Rosetta Books, 2010.
- Genette, Gerald. *Figures III (Discours du récit): Nouveau discours du récit*. Translated by Wenrong Wang. China Social Sciences Press, 1990. [热奈特:《叙事话语 新叙事话语》, 王文融译。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0。]
- Kermode, Frank. *Concerning E. M. Forster*. E-book ed., Farra, Straus and Giroux, 2010.
- Lefebvre, Henri. *Rhythmanalysis: Space, Time and Everyday Life*. Continuum, 2004.
- Olson, J. N. *E. M. Forster's Spiritual Journey in His Life and Works: By Jeane Noordhoff Olson*. E-book ed., Jeane Olson, 2016.
- Prasad, Yamuna. *E. M. Forster: The Theories and Practices of His Novels*. Classical, 1981.
- Roszak, Suzanne. "Social Non-Conformists in Forster's Italy: Otherness and the Enlightened English Tourist." *Ariel*, vol. 45, no. 1-2, 2014, pp. 167-94.
- Stone, Wilfred, and Edward Morgan Forster. "Some Interviews with E. M. Forster, 1957-58, 1965." *Twentieth Century Literature*, vol. 43, no. 1, 1997, pp. 57-74.
- Yue, Feng. "Development of the Motive about 'Undergrown Hearts' in E. M. Forster's Novels." *Journal of Nanchang University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no. 6, 2005, pp. 147-51. [岳峰:《论“发育不良的心”主题在福斯特小说中的演变》, 载《南昌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6期, 第147-51页。]

◇责任编辑: 吴晋先

FLC

精准国际传播专栏

中国形象国际传播研究的现状与趋势

◎ 马华 熊超 李京泽

内容摘要: 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不断增强和国际影响力的持续扩大,向世界展示一个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形象具有越来越重要的现实意义。为推进中国形象国际传播研究,本文利用可视化文献分析软件CiteSpace对现有研究进行计量学分析,从发文量变化态势、发文学科、作者-机构共现图谱和关键词共现图谱等方面概述了研究现状,指出了已有研究的不足,从加强基础理论研究、融合新一代信息技术和强化交叉学科研究三个方面归纳了中国形象国际传播的发展趋势。

关键词: 中国形象 国际传播 计量学分析 研究现状 发展趋势

中图分类号: G20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6-4366 (2023) 01-0078-13

基金项目: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62077014)

作者单位: 湖南师范大学智能计算与语言信息处理湖南省重点实验室/湖南师范大学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湖南长沙 410081

DOI: 10.19967/j.cnki.flc.2023.01.008

Title: Current Situation and Trend of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Research on China's Image

Abstract: With the continuous enhancement of China's comprehensive national strength and the continuous expansion of its international influence, it is of increasing practical significance to show the world a true, multi-dimensional and comprehensive image of China. To promote the research on China's image construction and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this paper uses the visual literature analysis software CiteSpace to conduct quantitative analysis of related research. The current state of research is summarized from the aspects of the change trend of publication volume, the disciplinary characteristics of the publications, author-institution co-occurrence map and keyword co-occurrence map, and it points out the shortcomings of existing research. The development trend of China's image construction and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is summarized from three aspects, i.e., strengthening basic theoretical research, integrating a new generation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nd strengthening interdisciplinary research.

Keywords: China's image,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metrological analysis, research status, development trend

Authors: Hua Ma, Professor, Hunan Provincial Key Laboratory of Intelligent Computing and Language Information Processing / School of Information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Hunan Normal University, Changsha, Hunan, China; Chao Xiong, Hunan Provincial Key Laboratory of Intelligent Computing and Language Information Processing / School of Information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Hunan Normal University, Changsha, Hunan, China; Jingze Li, Hunan Provincial Key Laboratory of Intelligent Computing and Language Information Processing / School of Information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Hunan Normal University, Changsha, Hunan, China.

中国形象是对中国实践、中国理论、中国精神的高度浓缩和符号化表达。使用融通中外的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积极开展中国形象国际传播,对提升我国的国际话语权和影响力、有效开展国际舆论引导和斗争有重要意义(葛彬超、郭怡菲 121-28)。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不断增强和国际影响力的持续扩大,讲好中国故事,传递好中国声音,向世界展示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将日益重要。然而,当前中国形象在国际传播中存在自塑形象与他塑形象、媒体形象与真实形象、现实形象与期望形象的三大不一致挑战(郭可、王宁 15-26),且现代媒体融合背景下涉华舆情的快速传播经常对中国形象造成负面影响。

近年来,关于中国形象国际传播的研究成果丰硕,发表了多篇综述性文章。但是,多数文章是基于少量文献进行的定性分析(季乃礼 104-13;罗幸 232-34),现有的基于计量学的论文,主要围绕“国家形象”“China”和“Image”等有限的主题词进行分析(王海洲 3-16;印闯等 110-16)。此外,吴飞、林心婕分析了2009—2019年间中国知网(CNKI)和Web of Science核心数据库中有关中国形象研究的论文,由于包含了未经严格同行评审的文献来源,降低了统计结果的效度(4-9)。郇昌鹏、管新潮将CNKI中的核心期刊作为数据来源,通过将标题含有“中国形象”或“国家形象”的期刊论文作为分析对象,结合信息贡献度和文献计量学手段,从话语与翻译转向的角度探讨了中国形象研究的现状和趋势(56-62)。

针对当前所面临的挑战,亟需从中国形象的构建策略、传播策略和传播效果等方面进行系统深入的研究,以有效推进中国形象的国际传播。鉴于此,不同于现有研究,本文采用文献计量法,围绕“中国形象”和“国际传播”相关的主题词,结合可视化文献分析软件CiteSpace的分析结果(陈悦等 242-53),梳理CNKI上从2000—2022年间的研究成果,总结中国形象国际传播研究的现状和趋势,以期为研究者提供重要参考和启发。

一、研究现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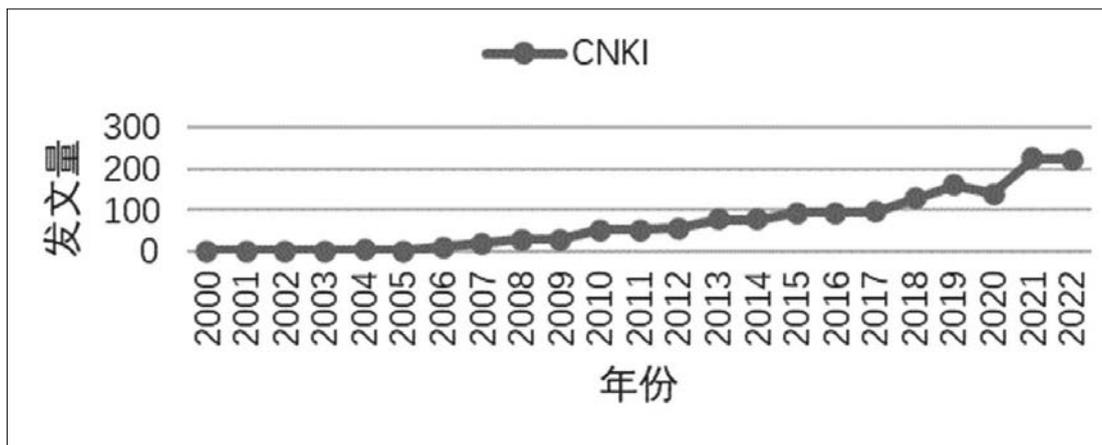
为了解中国形象国际传播研究的基本状况,本文使用CiteSpace软件对现有研究的发文量、学科、相关期刊、发文作者和机构共现图谱、关键词共现图谱等进行可视化分析。

(一) 研究方案

本文将CNKI作为数据采集平台,“(中国形象+中国国家形象)*(构建+国际传播)”作为统计主题。根据数据统计,2000年之前尚无与该主题相关的成果,故本文将数据来源年份设为2000年至2022年。经人工筛选去除与主题无关的文献后得到1595条记录。这些记录中,960条记录来源于学术期刊,占比为60.19%;530条记录来源于硕士和博士学位论文,占比为33.22%;41条记录来源于会议,占比为2.57%;26条记录来源于学术辑刊,占比为1.63%;40条记录来源于特色期刊,占比为2.51%。

（二）发文量变化态势分析

领域文献发文量反映了其研究热度，是衡量领域发展的重要指标。中国形象国际传播领域在CNKI中的发文量如图1所示。



▲图1 中国形象国际传播领域发文量变化态势

由图1可知，该领域的发文量由2000年的2篇增长到了2022年的231篇，尤其是2017—2021年，发文量增长了128篇，增长迅速。此外，图中在2008年、2013年、2019年及2021年出现了四个局部最高点，它们的出现与中国综合国力不断增强、国际影响力不断提高有密切关联。例如，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成功举办为中国提供了展示自我、塑造形象的机会，中国取得了当届金牌榜第一名，让世界认识到中国体育的长足进步；2013年“神舟十号”飞船和“嫦娥三号”探测器取得的成功，让世界看到了中国科技的快速发展；2019年，针对美国政府发起的贸易战，中国秉承负责任大国的担当和胸怀，本着对世界人民负责的道义立场积极推动磋商，致力于真正解决中美经贸摩擦问题；2020年面对新冠肺炎疫情，中国积极采取措施遏制疫情蔓延，实现了控制疫情、复工复产、经济增长的目标，在2021年实现国内生产总值首次突破100万亿大关，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

为分析发文质量，本文统计了960篇学术期刊论文的期刊级别，其中，来源于北大核心期刊目录的文献有385篇，占比40.1%；来源于CSSCI（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的文献有343篇，占比35.7%。

（三）发文学科

对领域内文献进行学科分析有助于帮助研究者了解该领域中各学科的研究热度，因此本文对该领域各学科发文量进行分析，并在北大核心、CSSCI期刊文献中为各学科挑选出引用次数较多的文献作为代表文献，发文量前六的学科如表1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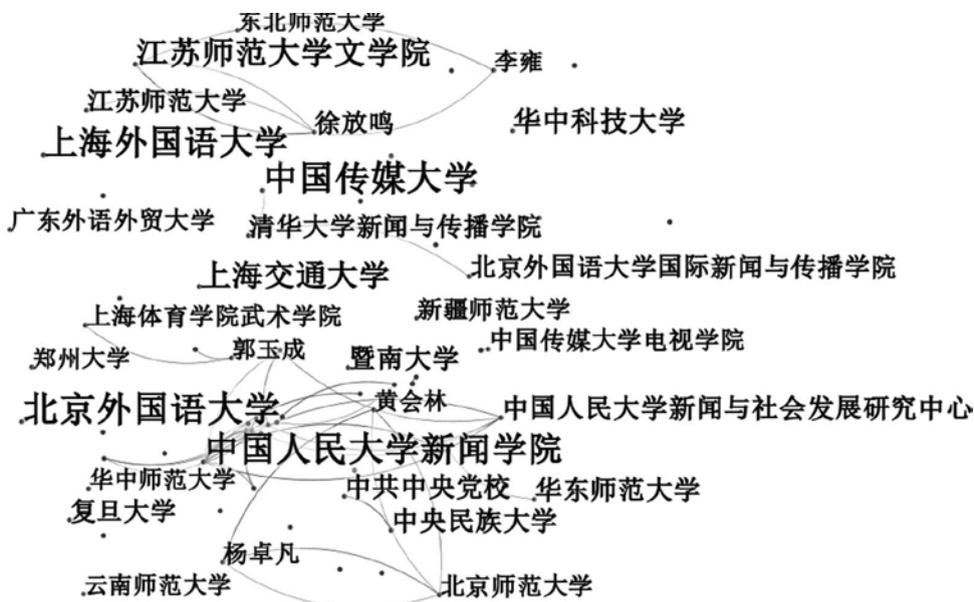
表 1 发文量前六学科及其代表文献

| 学科 | 文献数量/篇 | 代表文献 | 被引次数 |
|-----------|--------|-----------------|------|
| 新闻与传媒 | 875 | (何辉 113-17) | 99 |
| 中国政治与国际政治 | 449 | (韩源 99-104) | 188 |
| 戏剧电影与电视艺术 | 234 | (赵瑜 58-63) | 47 |
| 中国语言文字 | 103 | (胡开宝、李鑫 70-75) | 79 |
| 体育 | 94 | (虞定海、张茂林 73-77) | 51 |
| 外国语言文字 | 85 | (赵秀凤、冯德正 31-36) | 141 |

表 1 中“新闻与传媒”与“中国政治与国际政治”的发文量遥遥领先于其他学科。本文认为，“新闻与传媒”是研究人类社会各类信息传播活动的形成、发展和基本规律的应用性社会科学，且新闻传媒与和谐社会的经济发展是相互联系、相互依存、共生共存的关系（李胜楠 115-16），而国家形象本身就带有鲜明政治性（张昆、王创业 142-50），可见这两个学科均和中国形象国际传播这一领域联系十分紧密。

（四）作者-机构共现图谱分析

文献的作者与发文机构代表着该领域内的研究力量，对研究领域内的研究者与研究机构进行分析可识别该领域一定时期内有较高影响力的研究群体。基于 CiteSpace 获得的核心作者-机构共现图谱如图 2 所示。图 2 中，结点间的连线表示共现关系，连线越多或字体越大，表示结点出现频次越高。为突出显示领域核心作者，图中隐藏了发文少于 7 篇的作者。



▲图 2 核心作者-机构共现图谱

图2中,核心作者之间的合作不多,并且主要为单一机构内部的合作,例如李雍和徐放鸣同属江苏师范大学文学院。机构之间的合作也不多,且多为单一机构内部多个部门间的合作。点击图2中的作者节点,可查看其发文量和发文时间。其中,黄会林的发文量较多,共发7篇文献,主要研究中国电影对国家形象的构建与传播作用。此外,郭玉成也发表了7篇文献,他主要研究武术对中国国家形象构建的影响。本文统计了发文量前六的高产机构,如表2所示。

表2 发文量前六的高产机构

| 机构 | 文献数量/篇 | 首发年份 |
|------------|--------|------|
| 北京外国语大学 | 26 | 2015 |
| 中国传媒大学 | 24 | 2007 |
| 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 | 23 | 2008 |
| 上海外国语大学 | 21 | 2004 |
| 江苏师范大学文学院 | 17 | 2013 |
| 上海交通大学 | 15 | 2008 |

表2中,北京外国语大学的发文量最多,其主要发文人为刘琛、张虹等。发文量第二的是中国传媒大学,其主要发文人为任孟山。其中,刘琛依据我国学者对国家形象构成的定义,从政治形象、经济形象和文化形象三个方面对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在澳大利亚的形象展示进行历史分析与评价(155-60);张虹以习近平在70届联大上的演讲为语料,基于社会文化语言学中的“指示原则”,探讨如何通过话语构建国家形象(17-21);任孟山结合公共外交理论等研究了国家形象的构建与传播(85-88)。

为找出领域中影响力较大的作者,本文统计出各个作者的被引次数。其中,被引次数最高的五名作者分别为何辉(237次)、赵秀凤(230次)、韩源(219次)、郭玉成(196次)和卢小军(194次)。何辉基于中国形象的国际传播现状分析了中国形象的定位(113-17);赵秀凤和冯德正认为应该加强对多模态隐转喻的社会维度研究,从社会现实建构的角度,认清新奇有趣的政治漫画背后的意识形态本质(31-36);韩源提出我国应从设计国家形象、巩固客观基础、运筹战略措施、占领传媒制高点等方面构建中国形象战略框架(99-104);郭玉成和李守培研究了武术对中国形象的影响,并指出可借助武术媒介推进中国形象的国际传播(9-18);卢小军提出外宣翻译是否讲究准确性、可读性和政治性,将会影响翻译质量、受众认知、传播效果和国家形象的好坏(85-105)。

(五) 关键词共现图谱分析

关键词反映文献的要点和主题内容,而多篇文章中共同出现的高频次关键词可反映该研究领域内某一时期的研究热点与核心内容。为了解中国国家形象构建与传播的研究热点,本文分析现有研究的关键词共现图谱,如图3所示,其中隐藏了共现频次低于7次的关键词。



▲图3 关键词共现图谱

图3显示，“跨文化传播”“主流媒体”“传播效果”“中国故事”“公共外交”等均是中国特色形象国际传播研究的热点内容。鉴于中国特色形象国际传播主要包括形象构建、国际传播、传播效果评估三个关键环节，结合图3中的热点研究内容，本文从国家形象的构建策略、国家形象国际传播策略、国家形象国际传播效果等三方面进行深入分析。

1. 国家形象的构建策略

国家形象是国家软实力的集中体现，可以结合中国故事、中华文化、民族精神等要素构建。构建策略主要分为两种，一种是构建无意识的、内在的、抽象的国家形象，包括传播媒介中所蕴含的社会心理、国民性格和价值观念等；另一种则是塑造有意识的、外在的、具象的国家形象，主要指传播媒介中所展示的视听符号和文化元素，等等（黄会林等 22-28）。例如，纪录片能够借助强纪实性的国际化表达方式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元素、地理环境元素等融入具体内容中，并以此构建中国国家形象（王玉娟、赵鸿瑜 108-12）。北京冬奥会充分利用体育赛事、体育精神的普适性，制作外国受众可以接纳的传播产品，打造了一个全面真实多元的中国体育形象（张昆、蒲蕤 5-12）。

历史资源、现实资源、民族特点与品格等海量异构的国家形象构建要素，丰富了中国的国家形象，但也为其构建带来了资源组织与管理上的挑战。利用大数据、区块链、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新一代信息技术建立国家形象构建资源的数据库和基础平台，将极大推动国家形象国际传播的发展。例如，区块链技术依托非对称加密技术，采用分布式存储，利用时间戳、共识算法等保障链上数据的真实、完整、可靠，现已在数字资源管理与流通等方面得到应用（魏大威等 4-12）。针对当前国家形象资源数量庞大，类型复杂，缺乏统一规划、组织和管理等问题，新一代信息技术可从资源分配目标、服务机制和调度等方面实现国家形象资源的优化分配与智能重组，降低资源集成管理的耦合性（刘东亮等 80-86）。

此外，近年来各种抹黑中国的论调不断出现，塑造了负面的中国形象（邢丽菊、鄢传若 3-17）。因此，中国国家形象的构建策略，既要体现坚持国际社会的共同价值，更要呈现具有中国特色和中国内涵的价值（周鑫宇 19-23）。

2. 国家形象国际传播策略

全球化进程客观上促进了中国国家形象的国际传播。然而，国家形象的传播具有跨文化性，国家与地区间的意识形态、社会制度、宗教信仰、价值理念等差异，导致国际交流及更高层次的价值认同存在诸多制约因素（田宓 134）。因此，国家形象传播策略要充分了解涉华舆情的传播机制，将多种因素有效整合，更好地呈现国家形象，引导民众的认知关注。李益斌采用 SPSS 与 Eviews 软件，应用回归检验的广义矩估计，分析得出 GDP 比值、中国赴日旅游人数、中日实力对比变化等，是日本涉华舆情的关键影响因素（136-42）。通过大数据、自然语言处理等技术，柳建坤等人对世界各大主流媒体新闻报道中与中国相关的数据进行语气评估，进而识别新闻报道的情感态度，指出经济因素对涉华舆情关注度和情感度有着重要影响，而经济因素对涉华舆情情感度的影响主要出现在发达国家（79-87）。

面向不同地区和国家的特点研究传播策略，可以厘清国际传播目标受众的接受习惯和话语期待，挖掘受广泛关注的话语议题。结合恰当的话语策略、合适的媒介类型，可以探索出国家形象在国际传播中的精准推荐方法。例如，近年来，因强化民族认同和扩大本国利益的需要，越南倾向于将中国定位为竞争对手，但经济因素仍是未来中国争取越南民众好感的突破口（夏梦真、郝雨凡 52-59）。功夫电影是传播最广、知名度最高的中国类型片之一，它在北美地区构建和传播中国形象的效果好于其他大众媒介，具有独特优越性。

目前，精准国际传播研究运用数据科学和计算机学科的方法，在传播受众、内容、渠道等传播学领域中取得了一定的成果。解学芳、祝新乐提出引入区块链中的工作量证明等机制，发挥技术驱动的优势，根据受众偏好和个性化特征实现中国故事的精准推荐，推动中国形象在国际传播中的良性循环（46-60）。宋菲菲等人采用差分进化算法，以最小化受众特征（热点、时间、媒介等）和资源特征（内容类别、开发时间、载体等）的差异程度为目标来构建广义回归神经网络，进行资源推荐，获得了更优的推荐准确率（185-91）。高子建等人根据受众特

征和谱聚类算法对受众进行分类,采用基于矩阵分解的隐语义模型填充缺失的受众反馈数据,再利用改进后基于邻域的协同推荐模型进行资源推荐结果的预测,从而为受众推荐符合其习惯和喜好的资源(2517-24)。数据科学和计算机学科在数据来源与收集方法、数据分析方法层面的研究范式可为国家形象精准传播研究带来新机遇,从而打破传统传播研究的局限性;从大数据、区块链、云计算、人工智能等视角可深入开展有关传播内容、场景、用户精准传播的研究(岳琳 11-22)。

3. 国家形象国际传播效果

针对来源复杂的大众传播信息和具有明显多模态特征的媒介样本,通过准确识别受众的情感倾向,进行传播受众对华友善度的客观评价,以此评估现实中国形象的国际传播效果,进而探索出能有效反馈和优化传播效果的方法。传播效果可以分为认知、态度和行动三个层面,这些层面同时也是一个完整意义上的效果形成过程的不同阶段。在国家形象国际传播研究中,以问卷调查为评估传播效果的主要方法,手段单一,且费时费力。因此,如何利用信息技术评估中国形象传播效果,研究国家形象传播效果的动态评测方法,对于进一步推进中国形象国际传播研究具有重要作用。

在媒介技术发展迅速的今天,信息技术手段在智能传播时代的传播效果研究中拥有巨大应用价值。张腾等人为预测视频传播效果,爬取和采集相关视频平台的弹幕数据,利用Word2Vec模型和余弦相似度生成情感曲线,并使用情感词典算法对弹幕情感进行量化(32-45)。此研究从时间序列的视角分析视频受众的情感变化,探索具有良好传播效果的影片情感模式,拓展相关研究与新兴技术的融合途径。基于“上瘾模型”,高晓晶等人应用SPSS非参数检验方法对图书馆短视频传播效果的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认为标题句型、背景音乐情感类型、制作类别、信息类型等是影响短视频传播效果的主要因素,其研究完善了传播效果影响因素模型,为提升短视频的中国形象传播效果提供了新参考(13-22)。这些成果为国家形象传播效果研究与新一代信息技术的深度融合打下了坚实基础。

二、发展趋势

中国形象国际传播研究涉及多个学科,但核心作者-机构共现图谱(图2)的分析表明,不同机构、学科的作者间交流较少,局限了此领域的理论与实践发展。而从关键词共现图谱(图3)来看,大数据、区块链、神经网络等信息技术虽然被初步应用于该研究,但未形成有效的体系和系统,无法与中国形象国际传播的形象构建、国际传播、传播效果评估三个环节全面融合。在此背景下,加强理论建设,进一步推进与技术的深度融合,并强化学科交叉性,是解决当前中国形象国际传播研究痛点和难点的可行途径。

（一）加强中国形象传播的基础理论研究

基础理论研究为应用发展研究提供必需的基础理论框架支撑，理论的不足导致对问题的认识是分散和割裂的（季乃礼 104-13）。例如，在中国形象构建与传播评估上的理论建设仍有待加强，虽然相关研究主要服务于国家战略，具备宏观意义上的目标设定，但缺乏足够清晰和完备的评价指标，这导致难以建立共性与个性相结合、受广泛认可的评估体系，以及开展有针对性的资源分配和有效的资源利用。此外，在评估效果时，如何科学地为各评估指标分配权重，并适时改进，是最终建立评估体系所必须面对的问题。

在未来的中国形象国际传播研究中，要加强理论建设，实现理论性和实践性协调共进，并渐趋均衡化发展，从根本上改变中国形象国际传播领域理论研究滞后于实践探索的不均衡状态。

（二）推进新一代信息技术与中国形象国际传播的深度融合

目前，中国形象国际传播领域已积累了一些相关理论与经验，大数据、深度学习、自然语言处理等技术也已被应用于该领域，并取得一定进展。在媒体融合的背景下，新的信息技术深度融入中国形象国际传播研究是未来研究的基础。

1. 中国形象构建资源的知识化建模。要充分挖掘与组织海量、多模态的中国形象构建资源，结合国家形象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多维特点，剖析国际传播的主体、媒介、热点等差异性，考虑传播对象的偏好及传播效果的影响因素，探索多模态中国形象构建资源的组织机制，研究可以融合传播资源和相关要素的知识库的生成方式，并在此基础上实现知识融合和推理（范红 141-52）。具体而言，可先从数据库或通过爬虫采集多模态的国家形象构建资源，建立资源数据库；再利用深度学习方法剖析涉华舆情，厘清不同国家在中国政治、经济、教育、宗教、法律、文化艺术等维度上的关注点与舆情发展规律；然后探索中国形象构建资源的跨国界、跨语言的知识融合和推理模型，建立可演化的中国形象构建资源库。

2. 中国形象国际传播的精准推荐。如何深入剖析涉华舆情的传播规律和传播受众的个性化特征，以实现特定舆情背景下中国形象资源在国际传播中的精准推荐方法，是中国形象国际传播研究的关键问题（柳建坤等 79-87）。相关研究可基于神经网络中的大规模预训练模型，探讨不同语言、文化、宗教信仰下精确话语表达的自适应策略，并建立相应策略库，再根据传播对象的客观特点与主观偏好、多样的话语类别、多模态的表达内容等差异化特征，应用个性化推荐和优化技术，研究特定涉华舆情下国家形象构建资源的智能编排和推荐。

3. 中国国家形象传播效果的智能评测。结合媒体融合背景对中国形象的国际传播效果进行智能评测，对于完善国家形象的塑造和传播具有重要作用。媒体融合背景下大众传播信息来源复杂，媒介样本具有明显的多模态特征（刘燕南、刘双 9-14）。针对特定国家、区域或人群的大众传播信息的复杂性，基于多模态样本准确识别受众的情感倾向，进行传播受众对华友善度的客观评价，以评估中国形象的国际传播效果，研究国家形象传播效果的动态评测方法，

这样可以有效反馈和优化中国形象传播效果。具体而言,可利用爬虫从媒体传播渠道采集文本,语音,涉及面部表情、姿态的视频/图像等多模态媒介样本,并应用深度学习方法从样本库探索中国形象传播效果的情感分析和跟踪模型;再应用大数据和机器学习技术,研究中国形象传播效果的动态评测模型,根据评测结果进一步完善中国形象传播研究。

(三) 强化中国国家形象国际传播研究的学科交叉性

随着研究的深入,学科交叉性不断增强,除了传统的新闻与传媒学科,语言学、体育学、文学、计算机等学科的研究者也开始关注中国形象传播问题,一些广受关注的政治事件和外交策略为研究提供了不同视角和重要的切入点(吴飞、林心婕 4-9)。不同学科,尤其是不同机构之间的互相交流与合作,将进一步促进基础理论体系的形成与完善,对于深入和扩展现有研究具有重要意义。当前,中国形象国际传播研究的学科融合交叉趋势日益凸显。

近年来,中国形象的相关研究受到高度关注且发展迅速,而结合涉华舆情剖析、学科交叉等角度进行的中国形象的构建策略、国际传播和传播效果的研究,也已取得了一定进展。为推进中国形象国际传播研究,本文利用 CiteSpace 对 CNKI 中的文献进行计量学分析,系统性地从发文量变化态势、发文学科、作者-机构共现图谱和关键词共现图谱等方面概述了研究现状,指出了不足,并从加强基础理论研究、融合新一代信息技术和强化交叉学科研究三个方面归纳了中国形象国际传播的趋势,可为本领域的研究提供重要的参考与启发。

参考文献 [Works Cited]

- Chen, Yue, et al. "The Methodology Function of CiteSpace Mapping Knowledge Domains." *Studies in Science of Science*, vol. 33, no. 2, 2015, pp. 242-53. [陈悦等:《CiteSpace 知识图谱的方法论功能》,载《科学学研究》2015年第33卷第2期,第242-53页。]
- Fan, Hong. "The Strategy for National Image Building and Communication." *Journal of Tsinghua University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vol. 28, no. 2, 2013, pp. 141-52, 161. [范红:《国家形象的多维塑造与传播策略》,载《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28卷第2期,第141-52,161页。]
- Gao, Xiaojing, et al. "Model and Empirical Analysis on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of Library Short Video Transmission and Interaction Effect: Exploration Based on 'the Hook Model.'"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ervice*, vol. 65, no. 10, 2021, pp. 13-22. [高晓晶等:《图书馆短视频传播及互动效果影响因素模型及实证分析——基于“上瘾模型”的探索》,载《图书情报工作》2021年第65卷第10期,第13-22页。]
- Gao, Zijian, et al. "Intelligent Collaborative Recommendation Method Based on Spectral Clustering and Latent Factor Model." *Computer Integrated Manufacturing Systems*, vol. 27, no. 9, 2021, pp. 2517-24. [高子建等:《基于谱聚类 and 隐语义模型的智能协同推荐方法》,载《计算机集成制造系统》2021年第27卷第9期,第2517-24页。]
- Ge, Binchao, and Yifei Guo. "External Communication of China's National Image in the Context of Smart Media." *Shandong Social Sciences*, no. 5, 2022, pp. 121-28. [葛彬超、郭怡菲:《智能媒体背景下中国国家形象的对外传播》,载《山东社会科学》2022年第5期,第121-28页。]
- Guo, Ke, and Ning Wang. "Reflecting on the Path of National Image Building and Global Communication in the New Era." *China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Journal*, no. 1, 2018, pp. 15-26. [郭可、王宁:《新时代国家形象塑造及全球传

- 播路径反思”,载《中国新闻传播研究》2018年第1期,第15-26页。]
- Guo, Yucheng, and Shoupei Li. “Orientation Study on the Construction of Chinese National Image by Wushu.” *Journal of Beijing Sport University*, vol. 36, no. 9, 2013, pp. 9-18. [郭玉成、李守培:《武术构建中国国家形象的定位研究》,载《北京体育大学学报》2013年第36卷第9期,第9-18页。]
- Han, Yuan. “A Strategic Framework for China’s National Image in the Context of Globalization.” *Contemporary World and Socialism*, no. 1, 2006, pp. 99-104. [韩源:《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国国家形象战略框架》,载《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06年第1期,第99-104页。]
- He, Hui. “Analysis of China’s National Image Positioning.” *Modern Communication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University of China)*, no. 2, 2006, pp. 113-17. [何辉:《中国国家形象定位分析》,载《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2006年第2期,第113-17页。]
- Hu, Kaibao, and Xin Li. “Corpus-Based Study of Translation and China’s Image: Connotations and Implications.” *Foreign Languages Research*, vol. 34, no. 4, 2017, pp. 70-75. [胡开宝、李鑫:《基于语料库的翻译与中国形象研究:内涵与意义》,载《外语研究》2017年第34卷第4期,第70-75页。]
- Huang, Huilin, et al. “Chinese Films and the Communication of National Image-2017 Research Report on the Communication of Chinese Films in North America.” *Modern Communication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University of China)*, vol. 40, no. 1, 2018, pp. 22-28. [黄会林等:《中国电影与国家形象传播——2017年度中国电影北美地区传播调研报告》,载《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2018年第40卷第1期,第22-28页。]
- Ji, Naili. “Review and Comment on National Image Theory.” *CASS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no. 1, 2016, pp. 104-13, 128. [季乃礼:《国家形象理论研究述评》,载《政治学研究》2016年第1期,第104-13, 128页。]
- Li, Shengnan. “The Symbiotic Relationship Between Harmonious Socio-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News Media.” *Journalism Communication*, no. 9, 2020, pp. 115-16. [李胜楠:《和谐社会经济发展和新闻传媒的共生关系》,载《新闻传播》2020年第9期,第115-16页。]
- Li, Yibin. “Factors Influencing the Change of Public Opinion in China and Japan-Based on GMM Model.” *Information Science*, vol. 35, no. 11, 2017, pp. 136-42. [李益斌:《中日舆情变化的影响因素——基于GMM模型》,载《情报科学》2017年第35卷第11期,第136-42页。]
- Liu, Chen. “Analysis of Australian Media Coverage of China’s National Image in the Context of ‘Integration into the Asia-Pacific.’” *Jinan Journal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vol. 34, no. 3, 2012, pp. 155-60. [刘琛:《析澳大利亚媒体对中国国家形象报道——以“融入亚太”为背景》,载《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34卷第3期,第155-60页。]
- Liu, Dongliang, et al. “Integrated Management of Document Information Resources under the Information Ecological Chain Dynamic Mechanism.” *Information Science*, vol. 39, no. 12, 2021, pp. 80-86. [刘东亮等:《信息生态链动力机制下文献信息资源的集成管理》,载《情报科学》2021年第39卷第12期,第80-86页。]
- Liu, Jiankun, et al. “Research of China-Related Public Opinion Operating Mechanism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Multi-Dimensional National Distance: Empirical Analysis Based on GDELT News Big Data.” *Journal of Intelligence*, vol. 41, no. 9, 2022, pp. 79-87. [柳建坤等:《多维“国家距离”视野下的涉华舆情运作机制——基于GDELT新闻大数据的实证分析》,载《情报杂志》2022年第41卷第9期,第79-87页。]
- Liu, Yannan, and Shuang Liu. “Index System of Effect-evaluation of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Modern Communication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University of China)*, vol. 40, no. 8, 2018, pp. 9-14. [刘燕南、刘双:《国际传播效果评估指标体系建构:框架、方法与问题》,载《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2018年第40卷第8期,第9-14页。]
- Lu, Xiaojun. *National Image and Chinese-English Translation Strategies for China’s Global Communication*. Diss. Shanghai International Studies University, 2013. [卢小军:《国家形象与外宣翻译策略研究》。博士学位论文,上海外国语大学,2013。]
- Luo, Xing. “A Literature Review of China’s National Image Research.” *Social Sciences in Guangxi*, no. 9, 2017, pp. 232-34. [罗幸:《中国国家形象研究述评》,载《广西社会科学》2017年第9期,第232-34页。]
- Ren, Mengshan. “The Construction of China’s National Image in the Context of Public Diplomacy Theory and Practice.” *Journal of Zhejiang University of Media and Communications*, vol. 16, no. 2, 2009, pp. 85-88. [任孟山:《公共外交理论与实践视域下的中国国家形象构建》,载《浙江传媒学院学报》2009年第16卷第2期,第85-88页。]
- Song, Feifei, et al. “Intelligence Learning Resource Recommendation Algorithm Based on Deep Learning.” *Journal of Nanjing*

-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vol. 46, no. 2, 2022, pp. 185-91. [宋菲菲等:《基于深度学习的智能学习资源推荐算法》,载《南京理工大学学报》2022年第46卷第2期,第185-91页。]
- Tian, Fu. "The Image Construction of National Image in Cross-Cultural Perspective: Review of *Image Construction and Communication of National Image*." *Journal of Shanxi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vol. 43, no. 4, 2021, p. 134. [田宓:《跨文化视野下国家形象的影像构建——评〈国家形象的影像构建与传播〉》,载《山西财经大学学报》2021年第43卷第4期,第134页。]
- Wang, Haizhou. "The Knowledge Graph of the Study of the 'Image of the State' and Its Political Science Turn." *CASS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no. 3, 2013, pp. 3-16. [王海洲:《“国家形象”研究的知识图谱及其政治学转向》,载《政治学研究》2013年第3期,第3-16页。]
- Wang, Yujuan, and Hongyu Zhao. "On the Construction of National Image by Food Documentaries in a Cross-Cultural Perspective." *China Television*, no. 2, 2022, pp. 108-12. [王玉娟、赵鸿瑜:《论跨文化视域下饮食类纪录片对国家形象的构建》,载《中国电视》2022年第2期,第108-12页。]
- Wei, Dawei, et al. "Digital Resource Management of Smart Library Based on Blockchain Technology." *Journal of Library Science in China*, vol. 48, no. 2, 2022, pp. 4-12. [魏大威等:《基于区块链技术的智慧图书馆数字资源管理研究》,载《中国图书馆学报》2022年第48卷第2期,第4-12页。]
- Wu, Fei, and Xinjie Lin. "Development and Trends of China's National Image Research in the Last Decade: A Visual Analysis Based on Citespace and VOSviewer." *Contemporary Communication*, no. 5, 2020, pp. 4-9. [吴飞、林心婕:《近十年中国国家形象研究的发展与趋势——基于Citespace和VOSviewer的可视化分析》,载《当代传播》2020年第5期,第4-9页。]
- Xia, Mengzhen, and Yufan Hao. "The Cognition of National Images of China and USA in the Eyes of Vietnamese Peopl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onstructivism." *Academic Research*, no. 7, 2022, pp. 52-59. [夏梦真、郝雨凡:《越南民众眼中的中美国家形象认知——基于建构主义视角的分析》,载《学术研究》2022年第7期,第52-59页。]
- Xie, Xuefang, and Xinle Zhu. "Blockchain-Based Chinese Storytelling Communication in the New Globalization Era: Technology Empowerment and Paradigm Innovation." *Journal of Tongji University (Social Science Edition)*, vol. 33, no. 3, 2022, pp. 46-60. [解学芳、祝新乐:《新全球化时代基于区块链的中国故事传播:技术赋能与范式创新》,载《同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33卷第3期,第46-60页。]
- Xing, Liju, and Ruolan YanChuan. "Research on the Shaping Mode of China's National Image." *Northeast Asia Forum*, vol. 31, no. 6, 2022, pp. 3-17, 125. [邢丽菊、鄢传若澜:《中国国家形象的塑造模式研究》,载《东北亚论坛》2022年第31卷第6期,第3-17, 125页。]
- Xun, Changpeng, and Xinchao Guan. "The Discourse and Translation Turns of China's Image Studies: Using Python-Informed and Bibliometric Methods to Map Research Trends (1994-2021)." *Technology Enhanced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no. 1, 2022, pp. 56-62, 109. [郇昌鹏、管新潮:《中国形象研究的话语与翻译转向——基于信息贡献度与文献计量的知识图谱分析(1994—2021)》,载《外语电化教学》2022年第1期,第56-62, 109页。]
- Yin, Chuang, et al. "Bibliometric Analysis of National Image Studies." *Modern Communication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University of China)*, vol. 38, no. 12, 2016, pp. 110-16. [印闯等:《对国家形象研究的文献计量学分析》,载《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2016年第38卷第12期,第110-16页。]
- Yu, Dinghai, and Maolin Zhang. "International Promotion of Fitness Qigong and Construction of China's Image in Perspective of Word of Mouth Communication." *Journal of Shanghai University of Sport*, vol. 34, no. 6, 2010, pp. 73-77. [虞定海、张茂林:《口碑传播视角下健身气功国际化推广与中国国家形象构建》,载《上海体育学院学报》2010年第34卷第6期,第73-77页。]
- Yue, Lin. "The Theoretical Origin, Development Course and Future Prospect of Precision Communication Research in China." *The Journal of Humanities*, no. 8, 2022, pp. 11-22. [岳琳:《中国精准传播研究的理论渊源、发展历程与未来展望》,载《人文杂志》2022年第8期,第11-22页。]
- Zhang, Hong. "China's Country Image Projection from the Indexicality Principle of the Sociocultural Linguistic Approach: Analysis of Xi Jinping's Speech at UN." *Foreign Language Research*, no. 3, 2017, pp. 17-21. [张虹:《社会文化语言学“指示原则”与国家形象构建——以习近平联大演讲为例》,载《外语学刊》2017年第3期,第17-21页。]
- Zhang, Kun, and Chuangye Wang. "A Consideration of the National Image From the Political Dimension." *Journal of Shaanxi Normal University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Edition)*, vol. 46, no. 1, 2017, pp. 142-50. [张昆、王创业:《考量国家形象的政治维度》,载《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46卷第1期,第142-50页。]

- Zhang, Kun, and Rui Pu.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Strategy and Tactics of Beijing Winter Olympics under Background of Pandemic." *Journal of Wuhan Sports University*, vol. 56, no. 1, 2022, pp. 5-12. [张昆、蒲蕊:《疫情背景下北京冬奥会国际传播战略与实践策略刍议》,载《武汉体育学院学报》2022年第56卷第1期,第5-12页。]
- Zhang, Teng, et al. "Sentiment Curve Clustering and Communication Effects of Barrage Videos." *Data Analysis and Knowledge Discovery*, vol. 6, no. 6, 2022, pp. 32-45. [张腾等:《弹幕视频的情感时间曲线聚类与传播效果》,载《数据分析与知识发现》2022年第6卷第6期,第32-45页。]
- Zhao, XiuFeng, and Dezheng Feng. "Multimodal Metaphonymy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China Image: A Case of China-related Political Cartoon Discourses in *The Economist*." *Journal of Xi'an International Studies University*, vol. 25, no. 2, 2017, pp. 31-36. [赵秀凤、冯德正:《多模态隐转喻对中国形象的建构——以〈经济学人〉涉华政治漫画语篇为例》,载《西安外国语大学学报》2017年第25卷第2期,第31-36页。]
- Zhao, Yu. "The Study of Construction of National Image in the View of Documentary Film from CCTV." *Contemporary Cinema*, no. 8, 2012, pp. 58-63. [赵瑜:《中央电视台大型纪录片视阈下的国家形象建构》,载《当代电影》2012年第8期,第58-63页。]
- Zhou, Xinyu. "Diplomatic Speeches and the Projection of National Images in Terms of Positioning Theory." *Foreign Languages in China*, vol. 13, no. 6, 2016, pp. 19-23. [周鑫宇:《定位理论视角下的外交演讲与国家形象构建》,载《中国外语》2016年第13卷第6期,第19-23页。]

◇ 责任编辑:吴晋先

数字人文视域下中国科幻作品的对外传播研究: 以《流浪地球》为例

◎ 代建华 徐敏贇 曾道建

内容提要:通过人工智能算法考察中国科幻作品的对外传播情况,对推动中国文化传播具有重要意义。基于此,文章以科幻作品《流浪地球》为例,爬取海外英语受众对《流浪地球》小说英译本及其改编电影的网络评论,基于提示学习构建情感分类模型,利用关键词抽取技术挖掘评论背后的隐性知识。通过数据分析发现,英语受众对《流浪地球》英译本的整体接受程度较高,而对其改编的科幻电影评价较为一般,其负面评价主要集中在影片故事情节、影片特效及演员的人物塑造与演技等方面。实验验证了相关数字人文理论和方法应用于对外传播研究的可行性。

关键词:数字人文 对外传播 提示学习 情感分类

中图分类号:G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4366(2023)01-0091-11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新一代人工智能驱动的逻辑学研究”(20&ZD047);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面向实际应用场景的实体语义关系抽取关键技术研究”(62276095);湖南师范大学语言与文化研究院青年培育项目“低资源环境下的英文实体关系抽取技术研究”(2020QNP05)

作者单位:湖南师范大学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湖南长沙410081;湖南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湖南长沙410081;湖南师范大学语言与文化研究院,湖南长沙410081

DOI:10.19967/j.cnki.flc.2023.01.009

Title: A Study on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of Chinese Science Fiction Work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Digital Humanities: A Case Study of *The Wandering Earth*

Abstract: This study employs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lgorithms to investigate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of Chinese science fiction works, which is of paramount significance in advancing the dissemination of Chinese culture. In light of this, this paper takes *The Wandering Earth* as an example. Firstly, collecting online reviews from English-speaking people regarding its English version and its film adaptation, and then, building a sentiment classification model based on prompt learning, and using keyword extraction techniques to mine latent knowledge behind the reviews, Data analysis reveals that the overall acceptance level of the English version of *The Wandering Earth* is high, while the evaluations of the film adaptation are found to be generally average, the negative evaluations primarily center on the film's plot, special effects, and the performances of actors. The study validates the applicability of digital humanities theories and methods in the realm of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research.

Keywords: digital humanities,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prompt learning, sentiment classification

Author: Jianhua Dai, Professor, College of Information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Hunan Normal University, Changsha, Hunan, China; Minyun Xu, Foreign Studies College, Hunan Normal University,

Changsha, Hunan, China; Daojian Zeng, Associate Professor, Research Institute of Language and Cultures, Hunan Normal University, Changsha, Hunan, China.

近些年来,随着数字信息技术的发展,以机器学习、深度学习为代表的人工智能算法在学术界和工业界都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越来越多的人文学者希望借新兴的人工智能算法来解决传统的人文学科问题,这主要体现为作者归属与风格分析、作品情感分析、人物关系挖掘、模式发现与可视化等方面的研究成果不断增多(郭金龙、许鑫 11-18)。李贤平对《红楼梦》中的虚词进行词频统计,探索各回的接近程度,利用层次聚类解决了《红楼梦》前80回和后40回的作者归属问题(3-16)。邵沁清等使用文本挖掘技术对金庸文本进行关键词分析、人物关系挖掘和人物情感分析等多维度的勘探研究,从多个方面呈现了金庸笔下的武侠世界(115-36)。岑萧萍等利用关键词抽取、层次聚类分析等方法对《易经》文本进行深度挖掘,利用可视化技术展现了《易经》中六十四卦的联系,为中医的古籍挖掘工作提供了新思路(46-51)。

综观上述研究,人工智能技术在传统人文领域的应用成果颇丰,本文将利用人工智能技术探究中国科幻作品及中国文化的对外传播策略。目前学界所展开的对外传播研究长期以来集中于定性分析的层面,缺乏定量研究。利用人工智能技术,则可以从大量文本中挖掘隐性知识,进行量化分析。2023年科幻电影《流浪地球2》的热映将“中国式科幻”一词推向了前所未有的高度。本研究将立足热门科幻作品《流浪地球》的小说及其改编电影的英语网络评论,借助人工智能算法探究其对外传播情况,找出该类作品对外传播的阻隔因素,为我国的对外传播工作提供参考。

一、数字人文视域下的情感分析

数字人文(Digital Humanities)是一个将现代计算机和网络技术应用于传统的人文研究与教学的新型跨学科研究领域(王晓光 web),主要借助文本挖掘、网络分析、可视化,以及地理信息技术等技术手段对传统的人文学科进行量化研究(赵薇 191-206, 232-33)。情感分析是文本挖掘工作中的一项重要技术,它可以自动识别文本中的情感倾向,摆脱传统情感分析只能依赖专家学者进行人工分析的困境。在数字人文研究中,除了分析文学作品的情感以外,情感分析还可以用来研究社交媒体上的舆论,分析不同时期内的民众情绪变化,了解民众对某个事件或者政策的态度(黄仕靖等 149-59)。总之,情感分析技术可以帮助人文学者更好地理解人类行为和思维,对数字人文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目前情感分析的方法可以分为基于词典、基于机器学习和基于深度学习三类。基于词典的情感分析方法主要依赖于人工情感词典的构建,通过规则加权计算获得整个文章的情感值,但随着网络新词的不断涌现,原有情感词典在情感分类时存在灵活度不高的问题(王婷、杨文

忠 11-24)，分类准确率也较差。基于机器学习的情感分析方法是指以带有情感标签的数据训练一个情感分类器用以辅助研究。目前 Python 提供了很多基于机器学习的情感分析工具包，如 SnowNLP、TextBlob 等。近些年来，许多学者借这些工具在数字人文领域进行了相关实践：如张璐利用 TextBlob 工具包对《三体》的海外读者评论进行情感分析，探讨了海外读者对中国译介文学的接受与评价（80-86）；石春让、邓林利用 TextBlob 工具包对贾平凹《高兴》英译本的读者评论进行情感分析，考察了书中地域文化负载词的翻译与传播效果（58-66）。基于机器学习的方法使用更加简单，能够取得更高的分类准确率，但是需要人工指定特征。大多数机器学习算法的性能依赖于所提取特征的准确度，而深度学习能够从数据中直接获取高级特征，有效地解决了这一问题。基于预训练语言模型微调的深度学习方法给情感分析带来了新的机遇。2018 年谷歌（Google）公司发布了 BERT 模型（Bidirectional Encoder Representations from Transformers）（Devlin et al. web），它将双向的 Transformer 机制应用于语言模型（Vaswani et al. 30），能充分考虑到单词的上下文信息。研究者们利用自身数据集对该模型进行微调，在情感分析等下游任务上都取得了较好的实验结果。黄紫荆等基于 BERT 模型对《拉贝日记》进行分句情感识别，探究南京大屠杀前后拉贝的情感分布特征、变化趋势和对不同人物的情感倾向（1-10）。

综观以上研究，人工智能技术已经渗透到传统人文领域，其中自然语言处理技术被广泛使用。目前，自然语言处理技术的发展经历了四大范式。第一范式指的是概率统计时代的完全监督学习，这种完全监督学习不仅需要人为指定特征，而且性能表现依赖数据标注的质量。第二范式指的是神经网络时代的完全监督学习，这种范式下的神经网络模型能够自动获取特征，但是仍然需要人工来进行合理的模型架构设计。第三范式指的是预训练微调的范式，在这种范式下，模型往往需要在大规模的无监督数据上进行预训练，接着在下游任务的数据集上进行微调；这种特定领域内的数据集往往获取困难，需要大量的人工进行标注，人工成本较高。第四范式的提出有效解决了这一问题，通过合适的提示（Prompt）将模型的下游任务改造成预训练任务中的形式，为小样本和零样本学习提供了可能，逐渐形成了以预训练、提示、预测为主要手段的 Prompt 工程（Liu et al. web）。本文考虑到人文领域内数据获取困难、人工标注成本过高的问题，采用上述提示学习的方法，以英语受众对《流浪地球》小说英译本及其改编电影的网络评论作为研究对象，进行情感分类与关键词分析，考察把握该类中国科幻作品的对外传播情况。

二、研究设计与方法

（一）研究对象与数据来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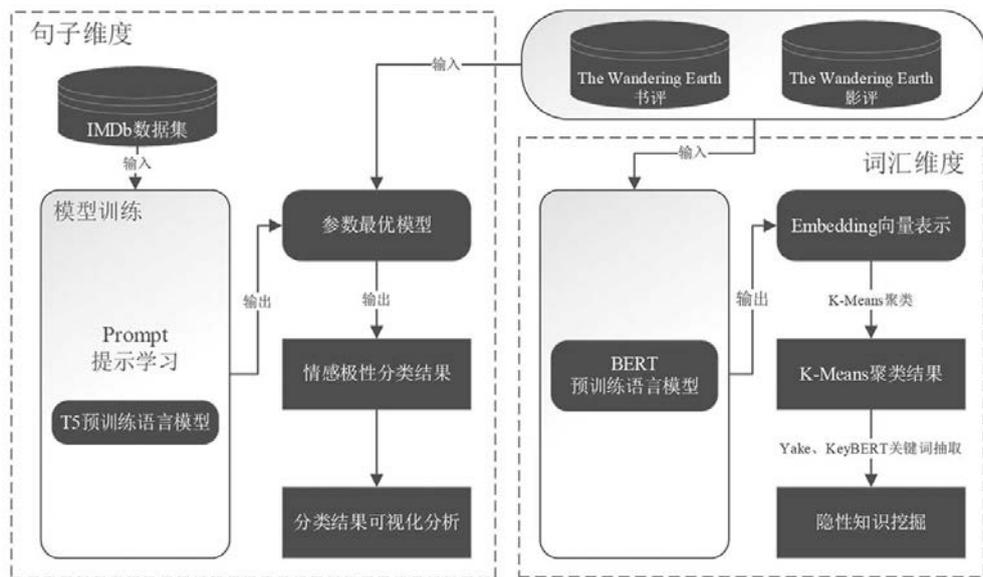
《流浪地球》是著名科幻作家刘慈欣的作品，小说讲述了太阳即将发生氦闪，人们开启“流浪地球”计划，试图带着地球去外太空寻找新的太阳的故事。刘慈欣凭借该科幻小说于 2000 年获中国科幻银河奖特等奖。2013 年，该小说的英译本 *The Wandering Earth* 被亚马逊（Amazon）

公司旗下出版社出版，面向全球发行。不仅如此，2019年该小说还被改编成同名科幻电影在国内外上映，引起了广泛关注。影片基于原著小说的背景设定创造了一个全新的故事，它们为新时代的中国形象注入了新的血液，影像化的传播使得它们已然超越文学与电影的范围上升为更大更具影响力的文化现象（张丽曦、郑艳林 62-64）。因此，本文选取《流浪地球》英译本及其改编电影的英语网络评论作为研究对象，能够有效探讨该类中国科幻作品在海外英语世界的传播情况。

本文以“The Wandering Earth”为检索关键字，借助网络爬虫工具分别爬取美国最大的电子商务网站亚马逊平台和全球最大的书评网站好读（GoodReads）平台的书籍评论，及美国著名影评网站烂番茄（Rotten Tomatoes）和互联网电影数据库（Internet Movie Database，为简便，后文全部写作IMDb）平台的电影评论。评论数据采集时间截止于2022年5月20日18时，保留用户姓名、评论内容和评论时间等相关内容，在对数据进行去重、删除非英语语言等文本降噪工作后，获取亚马逊平台206条、好读平台300条共计506条书评数据，获取烂番茄平台313条、IMDb平台705条共计1018条影评数据。实验所采用的数据集为IMDb数据集，^[1]它包含50000条严重两极分化的电影评论，其中训练数据及验证数据各25000条，且训练集与验证集中的正负评论数目相等。该数据集可直接用于二元的情感分类任务，能够适配本文的任务形式，节约人工标注的成本。

（二）方法选择与框架构建

本文从句子和词汇两个维度展现评论数据背后隐性知识的挖掘过程：首先从句子维度对评论数据进行情感极性分类，接着从词汇维度对评论数据进行主题挖掘。研究框架如图1所示。



▲图1 研究框架

1. 基于提示学习的情感分类

如上图所示,在对相关评论数据进行情感极性分类的过程中,采用T5(Transfer Text-to-Text Transformer)预训练语言模型作为情感极性分类的基础模型。相关研究表明,它在情感分析等各种自然语言处理下游任务上都有更为优异的表现(Raffel et al. 1-67)。该模型最大的贡献就是为整个自然语言处理预训练模型领域提供了一个统一的框架,它将所有的自然语言处理任务都转化成了文本到文本的形式。此外,为了解决领域内数据获取困难、数据量较小的问题,实验中采取提示学习的方法。提示学习能够将自然语言处理的下游任务改造成预训练任务中的形式,以此来有效地利用语言模型在预训练过程中学到的知识,为少样本和零样本场景提供新的解决思路。具体的实现方式是在原始输入文本中插入一个类似于完型填空的提示化模板,接着构建一个标签词表,将分类问题转化为预测和标签相关词的问题。针对手工构建标签词表会给结果带来高偏差和高方差的问题,实验选择使用Knowledgeable Prompt-tuning(KPT)知识融合的方法。大量实验证明了Prompt和KPT知识融合方法的有效性,能够进一步提高分类任务中预测的准确率(Hu et al. web)。

实验参数选择方面,为模拟某些特定人文领域内数据获取较为困难、高质量标注数据较少的情况,对IMDb训练集中的25000条数据进行随机采样,仅选取其中500条数据作为训练样本,其中正向情感评论数据样本与负向情感评论数据样本各250条。每次训练的样本数(batchsize)为4句,数据样本最大序列长度为256。优化器采用AdamW优化器,实验中创建两个优化器实例,分别为实验中的Prompt参数和Model参数进行调优,学习率分别为0.0001与0.001。损失函数采用交叉熵(Cross Entropy)损失函数,训练迭代次数(Epoch)为10。

2. 基于统计和词向量的关键词抽取

除上述从句子维度对评论数据进行的研究外,本文还从词汇维度对评论数据进行更细粒度的研究与挖掘。首先对评论数据进行聚类处理,接着在各聚类类别中分别抽取关键词,通过关键词把握评论数据中的不同维度的关键主题信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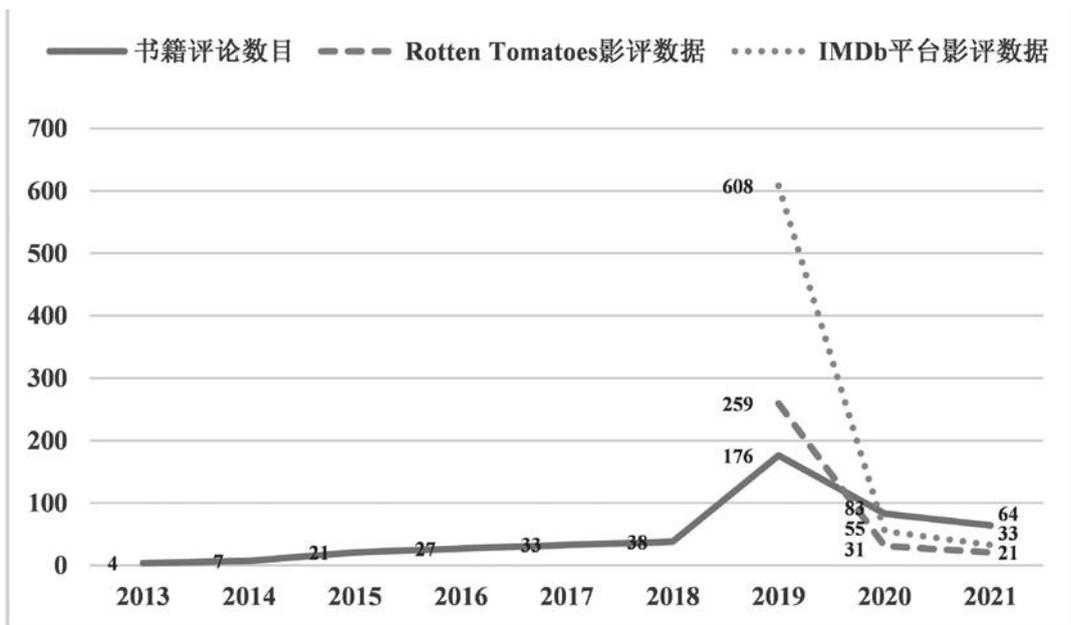
实验中使用BERT模型对评论数据进行动态编码,将评论数据转化成计算机能够识别的词向量(embedding)表示,接着利用K-Means算法对这些评论数据的词向量表示进行聚类,词向量的聚类结果即为评论数据的聚类结果,聚类类别设置为3。

为了使在各聚类类别中抽取的关键词更具代表性,实验采取基于统计和词向量关键词抽取相结合的方法。Yake(Yet Another Keyword Extractor)是一种基于统计的无监督的自动关键词提取方法,它不依赖文本的所属领域和语言,利用词条位置、词频、词条的上下文关系等统计学特征抽取关键词(Campos et al. 684-91)。而KeyBERT是基于词向量进行关键词抽取的算法,该算法假设关键词和文档在语义上表示是一致的,利用BERT词向量和简单余弦相似度来创建与文档最相似的关键词和短语(Sharma and Li web)。实验先利用Yake生成候选关键词,再利用KeyBERT从这些候选关键词中进行关键词抽取。

三、实验结果量化分析

(一) 基于句子维度的情感态度分析

为探究以《流浪地球》为代表的中国科幻作品对外传播效果，本文整理了相关书评和影评数据以绘制曲线图，描述《流浪地球》英译本及其改编电影的历时评论数目，以此来反映英语受众对它们的关注热度，如图2所示。



▲图2 评论量年度趋势

从图2可以看出，自2013年《流浪地球》英译本面向海外读者出版以来，其读者评论量总体呈上升趋势，并于2019年达到顶峰。这或许与中国的文化输出活动存在相关性。2019年，《流浪地球》小说的同名改编电影在海外上映，电影火爆的同时还推动了观众对其原著小说的关注。这也给中国的对外传播工作提供了启示：可以将一些优秀的文学作品改编成影视作品，通过多种途径讲好中国故事，形成独特的对外传播优势，让中华文化更好地“走出去”。

总体而言，英语受众对《流浪地球》小说及其改编电影都保持着良好的关注热度。为进一步考察英语受众对它们的情感态度，使用训练好的模型对原始评论数据进行情感极性预测。在原始标注数据较少（500条数据）的情况下，基于提示学习的方法训练得到的参数最优模型在IMDb验证集（25000条数据）上预测的正确率可达近90%，表明该模型具有良好的泛化能力。把收集到的书评数据和影评数据分别输入模型，让模型对其进行情感极性分类，得到各类型评论的数量及占比情况，如表1所示。

表1 各类型评论的数量及占比

| 平台 | 正向评论数量 | 正向评论占比 | 负面评论数量 | 负面评论占比 |
|------|--------|--------|--------|--------|
| 亚马逊 | 179 | 86.9% | 27 | 13.1% |
| 好读 | 244 | 81.3% | 56 | 18.7% |
| 书评汇总 | 423 | 83.6% | 83 | 16.4% |
| 烂番茄 | 175 | 55.9% | 138 | 44.1% |
| IMDb | 419 | 59.4% | 286 | 40.6% |
| 影评汇总 | 594 | 58.3% | 424 | 41.7% |

在所有书籍评论中,正向情感书评共计423条,占总书评的83.6%,负向情感书评的数量仅为83条,占总书评的16.4%。而在所有电影评论中,正向情感影评共计594条,占总影评的58.3%,负向情感影评的数量共计424条,占总影评的41.7%。由此可见,大部分英语受众对《流浪地球》英译本及其改编电影给予了较为肯定的评价,但对二者的喜爱程度却存在较大的差别。英语受众对《流浪地球》小说喜爱程度更高,而对其改编电影的喜爱程度较低。针对这种现象,下面将从词汇的维度对相关影评数据进行挖掘,从影片的负面评论中找到《流浪地球》电影观众喜爱度较低的原因。

(二) 基于词汇维度的关注主题挖掘

基于上述情感极性分类结果,为找出英语受众对《流浪地球》小说及其改编电影喜爱度差别较大的原因,对影片的负面评论进行关注主题挖掘。通过对影片负面评论进行聚类及关键词抽取工作,我们得出了各个聚类类别中评论数据的关键词表,如表2所示。

表2 各类别关键词及其余弦相似度

| 聚类类别 | 关键词及余弦相似度 |
|------|---|
| A | (‘bad sci-fi movie’, 0.361), (‘Chinese’, 0.1776), (‘time’, 0.0668), (‘earth surface’, -0.0579), (‘cgi’, 0.0338), (‘watch’, 0.3107), (‘effects’, 0.012), (‘plot’, 0.1174), (‘made’, 0.0821), (‘space’, 0.0596) |
| B | (‘bad movie’, 0.5654), (‘cgi’, 0.2249), (‘China’, 0.127), (‘time’, 0.1271), (‘made’, 0.1297), (‘sci-fi’, 0.273), (‘effects’, 0.1343), (‘plot’, 0.1906), (‘space’, 0.1275), (‘acting’, 0.3245) |
| C | (‘Chinese movie’, 0.6049), (‘bad acting’, 0.3738), (‘sci-fi’, 0.3255), (‘plot’, 0.2297), (‘space’, 0.1226), (‘people’, 0.1067), (‘wandering earth’, 0.0815), (‘make’, -0.0177), (‘disaster movies’, 0.3232), (‘characters’, 0.0849) |

从关键词抽取结果可以看出,英语受众对《流浪地球》影片的关注已经上升到了国家的高度,如A类别中的“Chinese”、B类别中的“China”以及C类别中的“Chinese movie”。从A类别中的关键词“bad sci-fi movie”和B类别中的关键词“bad movie”中可以看出英语受众对《流浪地球》影片整体评价较差。负面影评主要集中在“plot”“effects”“cgi”“characters”“acting”

(故事情节、特效、演员的人物塑造与演技)等方面。下面将主要从这几个方面着手定性分析《流浪地球》改编电影的负面评论文本,深度剖析《流浪地球》影片观众喜爱度较低的原因,进一步探究影片作为传播载体时对外传播的阻隔因素。

四、样例文本分析

故事情节方面,《流浪地球》影片向海外观众呈现了一种中国式的科幻浪漫,即“带着地球去流浪”。这一设定体现了中华民族自农耕文明以来就具有的家园情怀,蕴含中国的民族文化。即使在影片负面评论中也有对这一背景设定的肯定,如ID为j-76083的IMDb用户评论道,“It has nothing to impress me except for its visual effect and the romantic concept, which is pushing the mother Earth away instead of leaving it.”(除了视觉效果以及带着地球母亲去流浪而非离开的浪漫设定之外,这部电影没有其他地方能让我印象深刻)。然而,也有读者提出异议,觉得该设定是缺乏科学依据的,其做法是脱离现实的,如IMDb用户timbarnden认为,“The central premise of the plot had some merit, but no scientific explanation of how it could work.”(该情节的主要设定确有可取之处,但其运作方式并无科学依据)。因此,影片中缺乏科学依据的情节设定可能是其海外受众喜爱度较低的原因。

特效方面,《流浪地球》影片制作方在特效上投入了大量资金,为观众们呈现了一场无与伦比的视觉盛宴。影片中末日世界里冰封上海的视觉奇景令人震撼,博得了多数海外观众的好评。如烂番茄用户Mohammed A评论道,“CGI was the only thing I liked in the movie [...]” (这部电影中唯一受我青睐的就是电脑成像CGI [……])。特效是影片特有的表现方式,科幻影视作品中合理的特效表现形式可以让不同文化背景下的人们在影片中找到情感共鸣,进而在跨文化传播活动中发挥重要作用,更好地构建国家形象。但一部影片空有特效还远远不够,正如IMDb用户charleslanobucklin指出,“The special effects are Amazing. Unfortunately they overwhelm a thin plot. [...] It was as if I was watching an endless display of fireworks that got boring and repetitious after a while.” (该电影的特效令人惊叹。但不幸的是,特效过多使得电影情节捉襟见肘 [……] 就好像我在观看一场永无休止的烟花表演,短暂的欢快之后只剩下枯燥和单调)。

同样,作为影片不同于小说的独特之处,海外观众在演员的人物塑造与演技方面也大都给出了负面的评价。如IMDb用户yukinakayamatokyo评论道,“[...] the acting and characterisation is equally as one-dimensional.” ([……] 演技和角色刻画都如出一辙,肤浅不堪)。也有海外观众表示,文化的差异才是他们在人物塑造与演技方面给出负面评价的原因,如IMDb用户Caeradwyn评论道,“The characters might be believable for Chinese viewers, but as a European (more specifically Norwegian), I couldn't relate to how the characters behaved or most of the choices they made.” (对中国观众来说,这些角色也许可信,但作为一名欧洲人,尤其是一名挪威人,他

们的行为方式和多数选择着实令我费解)。同样,IMDb用户 carlosgarciapando 也表示,“There may be a vast cultural difference, but the characters do not exhibit any credibility in their emotions or motivation.”(文化鸿沟或许存在,但这些角色所展现的情感和动机并没有任何可信度)。

通过梳理关于《流浪地球》改编电影的负面评论,我们可以发现,除上述通过关键词抽取结果所呈现的三个主题之外,影片的配音与字幕翻译也可能是差评的原因。如烂番茄用户 Heath V 表示,不当的影片配音会影响原片中的人物性格塑造,“The dub actors make the movie much more cheesy than it is. They fail to capture the true tone of the movie, and make the young sister out to be a very whiny annoying character.”(配音演员让这部电影更加的俗不可耐,因为他们没有抓准整部电影的基调,把妹妹塑造成了一个爱发牢骚的讨厌角色)。此外,不当的字幕翻译造成了信息的丢失,进而导致影片的评价降低。例如,影片中妹妹称呼其哥哥“刘启”为“刘户口”,“启”字拆开恰好是“户口”二字,而影片的字幕翻译并未特别说明这一点,而是直接采取音译法翻译人名。因此,没有中文知识背景的人会对此感到困惑。正如IMDb用户 the_real_smile 评论道,“So it is possible I watched a masterpiece, but never know because of the translation.”(所以很有可能我看了一部杰作,却由于翻译的缘故并不知道它是一部杰作)。

在以影片为载体进行对外传播时,故事情节、特效和演员的人物塑造与演技等影片所具备的独特属性会天然地被观众所关注。一旦这些方面做得不够好,海外观众对影片的整体喜爱度便会降低,进而导致影片口碑下滑、传播受阻,这也是影视类科幻作品对外传播时的主要阻隔因素。

五、结论与启示

(一) 研究结论

本研究采用定量分析和定性分析相结合的研究方法,探析以《流浪地球》为代表的中国科幻作品的海外传播情况。基于《流浪地球》英译本及其改编电影的网络书评与影评,利用可视化和自然语言处理等技术对评论数据进行挖掘,从句子和词汇两个维度展现数据背后隐性知识的挖掘过程。这是数字人文理论和方法应用在对外传播研究中的一次具体实践,从中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1. 以《流浪地球》为代表的中国科幻作品在海外英语世界的传播情况整体较好。研究中发现英语受众对《流浪地球》小说的关注整体呈上升趋势,《流浪地球》电影的上映更是将其关注度推上了顶峰。文学作品的影视化形成了独特的对外传播优势。根据模型情感极性分类结果,超半数的英语受众对《流浪地球》小说及其改编电影给予了积极评价,这表明以《流浪地球》为代表的中国科幻作品深受英语受众喜爱。

2. 同一作品由于传播载体的差异性,其传播效果也会存在差异。研究发现,与《流浪地球》小说相比,英语受众对《流浪地球》电影的喜爱程度偏低。影片的负面评价主要集中在

故事情节、影片和演员的人物塑造与演技等方面，这也是影片作为传播载体时对外传播的主要阻隔因素。

(二) 研究启示

数字人文技术为传统的人文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本研究不仅展示出数字人文技术应用在对外传播研究中所具有的独特优势，还给中国的对外传播工作提供了一定的启示：对外传播可采用多模态的传播策略，使得各模态之间相互影响相互促进，进而提升对外传播效果。针对不同模态产生的传播效果存在差异性的问题，应注重受众的反馈以满足他们的特殊需要。例如在相关文学作品改编成影视作品对外传播的过程中，影视作品的制作方在考虑文化差异的同时也需要兼顾原著的情节特色，切勿随意改编。此外，影视作品的画面制作、演员挑选、配音及字幕翻译等都是值得制片方去关注的点。

注释 [Note]

[1] <https://huggingface.co/datasets/imdb>.

引用文献 [Works Cited]

- Campos, Ricardo, et al. *A Text Feature Based Automatic Keyword Extraction Method for Single Documents*. European Conference on Information Retrieval, Springer, Cham, 2018.
- Cen, Xiaoping, et al. "Preliminary Investigation on Visualization of *Yi Jing* Based on Text Mining Technology." *Chinese Journal of Information on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vol. 28, no. 3, 2021, pp. 46-51. [岑萧萍等:《基于文本挖掘技术的〈易经〉可视化初探》,载《中国中医药信息杂志》2021年第28卷第3期,第46-51页。]
- Devlin, Jacob, et al. "Bert: Pre-training of Deep Bidirectional Transformers for Language Understanding." The North American Chapter of the Association for Computational Linguistics, Minneapolis, 2019.
- Guo, Jinlong, and Xin Xu. "Text Mining Research in Digital Humanities." *Journal of Academic Libraries*, vol. 30, no. 3, 2012, pp. 11-18. [郭金龙、许鑫:《数字人文中的文本挖掘研究》,载《大学图书馆学报》2012年第30卷第3期,第11-18页。]
- Huang, Zijing, et al. "Research on Emotion Recognition and Analysis of *The Diaries of John Rab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Digital Humanities." *Library Tribune*, no. 3, 2023, pp. 54-63. [黄紫荆等:《数字人文视角下的〈拉贝日记〉情感识别与分析》,载《图书馆论坛》2023年第3期,第54-63页。]
- Huang, Shijing, et al. "Spatiotemporal Evolution of Public Opinion in Public Health Emergencies Based on Sentiment Analysis." *Information Science*, vol. 40, no. 6, 2022, pp. 149-59. [黄仕靖等:《基于情感分析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舆情时空演化差异研究》,载《情报科学》2022年第40卷第6期,第149-59页。]
- Hu, Shengding, et al. "Knowledgeable Prompt-tuning: Incorporating Knowledge into Prompt Verbalizer for Text Classification." Annual Meeting of the Association for Computational Linguistics, Dublin, 2022.
- Li, Xianping. "New Research on *A Dream of Red Mansions*." *Fudan Journal (Social Sciences Edition)*, no. 5, 1987, pp. 3-16. [李贤平:《〈红楼梦〉成书新说》,载《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7年第5期,第3-16页。]
- Liu, Pengfei, et al. "Pre-train, Prompt, and Predict: A Systematic Survey of Prompting Methods in Natural Language Processing." *ACM Computing Surveys*, vol. 55, no. 9, 2023, pp. 1-35.
- Raffel, C., et al. "Exploring the Limits of Transfer Learning with A Unified Text-to-Text Transformer." *J. Mach. Learn. Res.*, vol. 21, no. 140, 2020, pp. 1-67.

- Sharma, Prafull, and Yingbo Li. "Self-Supervised Contextual Keyword and Keyphrase Retrieval with Self-Labeling." *Preprints*, 6 Aug. 2019, DOI: 10.20944/preprints201908.0073.v1.
- Shi, Chunrang, and Lin Deng. "A Study on Translation of Local-Culture-Loaded Words in Jia Pingwa's *Happy Dreams* and Its Dissemination Based on Sentiment Analysis Technology." *Foreign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Research*, vol. 6, no. 6, 2020, pp. 58-66. [石春让、邓林:《基于情感分析的贾平凹〈高兴〉英译本中地域文化负载词的翻译与传播效果考察》,载《外国语文研究》2020年第6卷第6期,第58-66页。]
- Tai, Qinqing, et al. "Research on Jin Yong with Text Mining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Digital Humanities." *Digital Humanities*, no. 4, 2020, pp. 115-36. [郇沁清等:《数字人文视角下的金庸文本挖掘研究》,载《数字人文》2020年第4期,第115-36页。]
- Vaswani, Ashish, et al. *Attention Is All You Need*. Conference and Workshop on Neural Information Processing Systems, Long Beach, 2017.
- Wang, Ting, and Wenzhong Yang. "Review of Text Sentiment Analysis Methods." *Computer Engineering and Applications*, vol. 57, no. 12, pp. 11-24. [王婷、杨文忠:《文本情感分析方法研究综述》,载《计算机工程与应用》2021年第57卷第12期,第11-24页。]
- Wang, Xiaoguang. "The Generation, Development and Frontier of Digital Humanities." 3 Dec. 2009, blog.sciencenet.cn/blog-67855-275758.html. [王晓光:《数字人文的产生、发展与前沿》,2009年12月3日, blog.sciencenet.cn/blog-67855-275758.html。]
- Zhang, Lixi, and Yanlin Zheng. "The Wandering Earth: The Image of China in the Context of Science Fiction." *Peony*, no. 22, 2021, pp. 62-64. [张丽曦、郑艳林:《〈流浪地球〉:科幻背景下的中国形象》,载《牡丹》2021年第22期,第62-64页。]
- Zhang, Lu. "Python Sentimental Analysis on Overseas Readers' Reception and Evaluation of Chinese Translated Literature: A Case Study on *The Three Body Series*." *Foreign Languages Research*, vol. 36, no. 4, 2019, pp. 80-86. [张璐:《从Python情感分析看海外读者对中国译介文学的接受和评价:以〈三体〉英译本为例》,载《外语研究》2019年第36卷第4期,第80-86页。]
- Zhao, Wei. "Transformation and Transcendence of Humanities Research in the Digital Age: Digital Humanities in China." *Exploration and Free Views*, no. 6, 2021, pp. 191-206, 232-33. [赵薇:《数字时代人文学研究的变革与超越——数字人文在中国》,载《探索与争鸣》2021年第6期,第191-206, 232-33页。]

◇责任编辑:马妮娅

FLC

语 言 学 研 究

基于学习者学业情绪的在线英语教学评价研究

◎ 王文菁 徐启豪

内容提要: 疫情以来广泛开展的在线教学对高校师生都是一次新的挑战 and 体验。本研究基于学习者的学业情绪,以外语专业学生线上学习为例,深度了解线上学习者的需求和体验,对在线教学课程进行评价,为现阶段课程质量认定和教学效果检验提供依据。研究设计学习者在线学习学业情绪量表和问卷,并对学生开展问卷调研与分析。研究发现整体上疫情期间线上学习环境下受测学生对积极情绪的感知程度高于消极情绪,学生的愉快、希望等积极高唤醒情绪感受最高,表示学生在疫情线上学习期间依然能保持良好的学习状态和持续学习的动力。但通过消极情绪的分析也能体现出线上教育在互动性、教学设计系统性方面的欠缺。研究为今后线上教学的发展提供参考与建议。

关键词: 线上学习 学业情绪 学业情绪量表 在线教学评价

中图分类号: G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6-4366 (2023) 01-0102-15

基金项目: 山东省教育科学规划“疫情与教育”专项课题“基于学习者学业情绪的在线教育评价与改进研究”(2020YZB41);山东省教育科学“十四五”规划课题“高校大学外语教学学术共同体研究”(2021WYB016)

作者单位: 山东农业大学外国语学院,山东 泰安 271018

DOI: 10.19967/j.cnki.flc.2023.01.010

Title: Research on Online English Teaching Evaluation Based on Learners' Academic Emotion

Abstract: The online teaching carried out since the outbreak of the epidemic is a new challenge and experience for college teachers and students. Based on learners' academic emotions and taking foreign language majors' online learning as an example, this study deeply understands the needs and experience of online learners, evaluates online teaching courses, and provides a basis for the identification of curriculum quality and the inspection of teaching effect at the present stage. The study designs learners' online learning Academic Emotion Scale and questionnaire, and carries out questionnaire surveys on students. It can be seen from the research that, on the whole, in the online learning environment during the epidemic, the students' perception of positive emotions is higher than that of negative emotions, and the students' feelings of positive high wake-up emotions such as happiness and hope are the highest, indicating that students can still maintain a good learning state and motivation for continuous learning during the online learning of the epidemic. However, the analysis of negative emotions can also reflect the lack of interaction and systematic teaching design in online education. The research provides reference and suggestions for the development of online teaching in the future.

Keywords: online learning, academic emotion, Academic Emotion Scale, online teaching evaluation

Authors: Wenjing Wang, Associate Professor, College of Foreign Languages, Shandong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Tai'an, Shandong, China; Qihao Xu, Associate Professor, College of Foreign Languages, Shandong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Tai'an, Shandong, China.

疫情以来开展的在线教育对高校老师及学生都是一次新的挑战 and 体验。在线教育作为新型的教育方式正在经历一场前所未有的挑战与机遇。教育系统需要在短时间内实现各要素的重新融合,借助“互联网+教育”的模式推进在线教育在短期内全面铺开。在线教育教学效果、学习效果如何,如何对在线教学进行评价认定仍缺乏清晰的标准。有关在线教育的评价的研究一直很活跃,但是学习者作为主体的重要性未得到强调,其情感体验受到忽视。因此,本研究从学业情绪的角度出发探讨分析学习者对在线教育的评价,将学习者分为积极高唤醒、积极低唤醒、消极高唤醒和消极低唤醒四种类型,依据四类学习者学业情绪设计学习者在线学习学业情绪量表,从教师、教学内容、教学效果、教学资源,以及教学技术五个方面进行课程评价反馈和学生学业情绪问卷调研。研究有助于发挥学习者为评价主体的作用,帮助教学者了解学习者对线上教学的评价和学业情绪表现,为在线学习平台与在线教学课程的建设 and 改进提供建议。

一、文献综述

情绪是一个难以捉摸的结构,包括情感、认知、动机、表达、生理过程和组成部分(Prior 1-26)。在研究情绪的各种理论方法中,佩克伦(R. Pekrun)等人认为学业情绪是“与学术学习、课堂教学和成就直接相关”的情绪(Pekrun et al. 91-105),并提供了一个有用的分析框架来分析学业环境中出现的情绪。佩克伦将情绪概念化为沿两个维度变化的情绪,即效价和活跃度,并且具有不同的对象焦点(Pekrun 315-41)。佩克伦等又将学业情绪从效价维度分为积极情绪和消极情绪;从活跃度维度分为高唤醒情绪和低唤醒情绪(韩晔、许悦婷 50-59)。目前,研究者基本认可学业情绪的二维度划分。

近几年,随着积极心理学研究的发展,情绪对二语学习的重要性日益凸显,外语情绪方面的研究逐渐增多,也取得了一定成果。基于拓展—建构理论,德维勒(J. M. Dewaele)和麦金泰尔(P. D. MacIntyre)率先探讨国际二语学习者的外语愉悦及焦虑体验,开辟了情绪和二语学得相结合的领域(237-74)。不少国内学者应用控制—价值理论进行学习外语情绪体验和调节的实证研究。同时,研究所涉及的情绪种类不断拓展,除了备受关注的外语愉悦和焦虑,关于厌倦等情绪的相关研究也迅速增加。韩晔、许悦婷探讨了二语写作过程中学习者的情绪

体验及情绪调节策略(50-59)。董连棋考察了251名中国英语学习者的外语学习控制—价值评价对外语课堂焦虑和愉悦情绪的预测作用(79-88)。李成陈、韩晔调查了外语愉悦、焦虑及无聊情绪对网课学习成效的预测作用(207-19)。夏洋、陈雪梅在内容语言融合课堂环境下针对英语专业学生,考察课堂给养感知、控制—价值评价及外语课堂无聊水平(44-49)。

综上,现有研究侧重于探讨常规课堂内大学生群体的外语情绪,对特殊背景或学习方式影响下外语情绪的关注有限,而疫情、线上学习等因素也是外语情绪的影响变量。疫情期间,也有学者关注到这一点。王雪等基于控制—价值理论的元分析研究了在线学习资源如何影响学业情绪和学习效果(82-93)。吴世珍、孙百才探讨了学生在线学习适应能力、学业情绪与学习投入的关系及作用机制(87-95)。因此,本研究将关注疫情背景下学习者线上学习的学业情绪体现及其相关性。

国内研究者也在学业情绪的结构划分和测量上开展了各方面的研究。董妍、俞国良编制了青少年学业情绪问卷,该问卷由13种情绪组成,是研究青少年学业问题的一个有效工具(96-104)。马惠霞编制了《大学生一般学业情绪问卷》,问卷中学业情绪由羞愧、焦虑、气愤、兴趣、愉快、希望、失望、厌烦、自豪、放松这10种组成(36-39)。经过论证可以看出大学生一般学业情绪问卷能够基本反映出大学生的特点。夏阳、孟健编制了英语专业学生课堂学业情绪问卷,对英语专业学生课堂情绪感知进行了调查研究(147-56)。本研究对学业情绪的研究参考了马惠霞编制的《大学生一般学业情绪问卷》,沿用了以效价和唤醒度对学业情绪结构进行划分的方法,同时结合线上教学特点进行重新编制。

二、研究方法

(一) 研究问题

本研究在网课环境中考察学生的学习满意度和各种学业情绪表现,最后探讨线上教学评价的不同方面和学业情绪之间的关系。研究问题如下:

1. 疫情线上教学环境下,学习者对英语线上教学评价满意度如何?
2. 疫情英语线上教学期间,学习者的各种学业情绪表现如何?
3. 学习者对英语线上教学的评价和几类学业情绪之间呈现何种关系?

(二) 研究对象

本研究采用分层整群抽样的方法,以某高校本科商务英语专业大学生为被试,共回收得到有效问卷308份。其中大一占49.35%,大二占34.74%,大三占15.58%;男生29人,女生279人。

(三) 研究工具

为了对疫情期间进行线上学习的学生学业情绪研究提供科学规范的测量工具,本研究根据马惠霞的《大学生一般学业情绪问卷》,结合在线教育和疫情时期的特点进行设计编制了《疫情期间大学生在线学习学业情绪量表》(以下简称《学业情绪量表》),测量疫情期间学生在线学习学业情绪。问卷共79题,分为基本情况调研和情绪量表两部分:1.在线学习基本情况;2.在线学习学业情绪量表。

1. 在线学习基本情况

该部分问卷共17题,主要调查学生线上学习时间、学习方式、课程整体评价、教学软件等情况。同时,针对学生对线上教学的满意度,问卷分别从教学、自身和平台硬件三个方面调研学生的满意度及原因反馈。

2. 在线学习学业情绪量表

(1) 量表设计

《学业情绪量表》问卷问题设计中学业情绪共10种,分四类:消极低唤醒情绪(失望、厌倦)、消极高唤醒情绪(气愤、焦虑、羞愧)、积极低唤醒情绪(放松)和积极高唤醒情绪(愉快、希望、自豪)。邱均平教授曾构建包含慕课教学队伍、教学内容、教学效果、教学资源,以及教学技术五个一级质量评价指标(邱均平、欧玉芳 72-81)。本研究也从这五个方面分别针对线上教学质量设计量表问题,共计62题,其中包括教师方面(1—9题)、教学内容方面(10—23题)、教学资源方面(24—32题)、学习效果方面(33—57题)、教学技术方面(58—62题)。量表的具体维度、题型分布和题项举例见表1。量表以李克特五级量表的形式呈现,要求学生根据自己在疫情期间线上教学英语类课堂上的情绪体验程度完成。

表1 量表的维度、题型分布和题项举例

| 维度 | N | 题项分布 | 题项举例 | |
|-----------|----|------|---------------------------------|--|
| 积极 高唤醒 | 愉快 | 11 | 3、12、22、27、30、38、46、52、58、59、61 | 12.线上教学目标明确让我学习起来很愉快 61.我能够自如地使用线上教学平台让我很开心 |
| | 希望 | 4 | 5、20、28、32 | 28.关于疫情的思政资源让我很受鼓舞 |
| | 兴趣 | 7 | 14、17、21、24、31、41、57 | 14.线上学习内容丰富让我学习热情很高 |
| 积极 低唤醒 | 放松 | 7 | 1、8、23、34、43、51、56 | 51.在家无人约束的学习环境让我很放松地学习 |
| | 自豪 | 4 | 11、36、49、53 | 49.我对自己的学习成果很满意 |
| 消极 高唤醒 | 焦虑 | 10 | 4、9、10、18、25、26、29、40、54、55 | 27.大量的学习资源让我很焦虑 40.线上的课程学习让我感觉很焦虑 |
| | 羞愧 | 3 | 37、45、47 | 37.我这段时间觉得自己学习不好对不起家人和老师 |
| | 气愤 | 2 | 42、60 | 42.我在进行线上学习时容易心浮气躁 |
| 消极 低唤醒 | 厌倦 | 7 | 6、7、13、15、16、33、62 | 62.线上各类平台的使用让我感到疲惫烦躁 |
| | 失望 | 7 | 2、19、35、39、44、48、50 | 48.线上学习约束性弱让我情绪很低落 |

(2) 信度效度分析

采用 alpha 系数对量表整体及各情绪维度进行可靠性分析, 量表信度 (Cronbach $\alpha = 0.904$) 较为理想, 其中各维度信度如表 2 所示。

表 2 各情绪维度信度分析

| 学业情绪类型 | 积极高唤醒 | 积极低唤醒 | 消极高唤醒 | 消极低唤醒 |
|-------------------|-------|-------|-------|-------|
| Cronbach α | 0.959 | 0.890 | 0.876 | 0.918 |
| 项数 | 22 | 11 | 15 | 14 |

使用 KMO 和 Bartlett 检验对量表进行效度验证, KMO 值为 0.926, KMO 值大于 0.8, 且 Bartlett 球形度检验 $P=0.000 < 0.05$, 研究数据适合提取信息。数据使用最大方差旋转方法 (Varimax) 进行旋转因子分析考察问卷的结构效度, 量表分为四个因子, 且因子负荷大于 0.50, 见表 3。以上数据表明结构效度基本良好。

表 3 旋转后因子载荷系数表格

| 学业情绪类型 | 因子载荷系数 | | | |
|--------|--------|--------|--------|--------|
| | 因子 1 | 因子 2 | 因子 3 | 因子 4 |
| 积极高唤醒 | -0.162 | 0.862 | 0.417 | -0.240 |
| 积极低唤醒 | -0.235 | 0.478 | 0.821 | -0.206 |
| 消极高唤醒 | 0.933 | -0.138 | -0.182 | 0.277 |
| 消极低唤醒 | 0.532 | -0.306 | -0.240 | 0.752 |

(四) 研究程序及统计方法

由研究者经线上向被测班级学生集体发放测试问卷, 测试前由主试指导被试阅读指导语并告知注意事项, 被试当场提交填答完毕的问卷。

回收整理有效问卷, 采用 SPSSAU 对所得数据进行统计处理, 主要运用了描述性统计、方差分析、相关分析等统计方法。

三、结果与讨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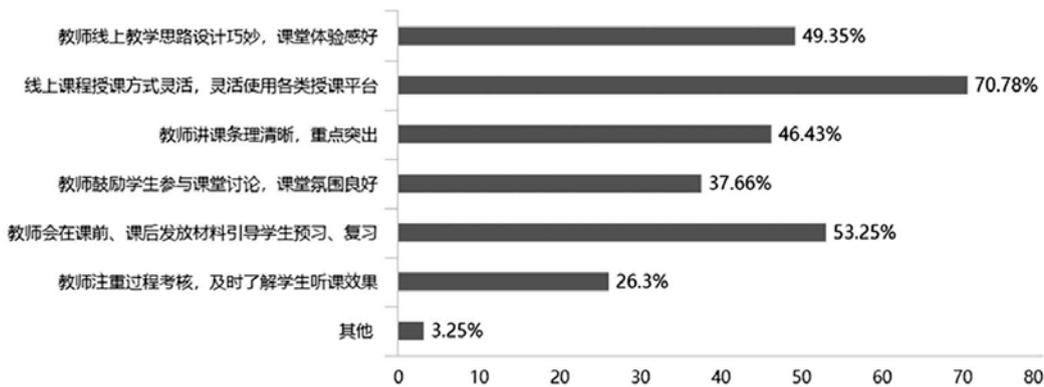
(一) 在线学习基本情况及满意度评价

根据问卷的基本情况调研可以得知: 受测学生包括大一 152 人, 大二 107 人, 大三 49 人。

50.97%的同学平均每天线上学习时间为5—6小时, 40.91%为3—4小时。本学期的在线学习主要方式因为课程性质和学习需求不同, 方式呈现多样化, 主要有直播、录播、直播录播相结合, 以及自主学习在线资源等方式。受测学生对本学期在线学习的整体评价打分(打分区间1—10分)平均分为7.17。众多线上教学软件中, 学生使用感受较好前四位有: 腾讯会议(65.26%)、智慧树(53.9%)、雨课堂(22.4%)、QQ(22.0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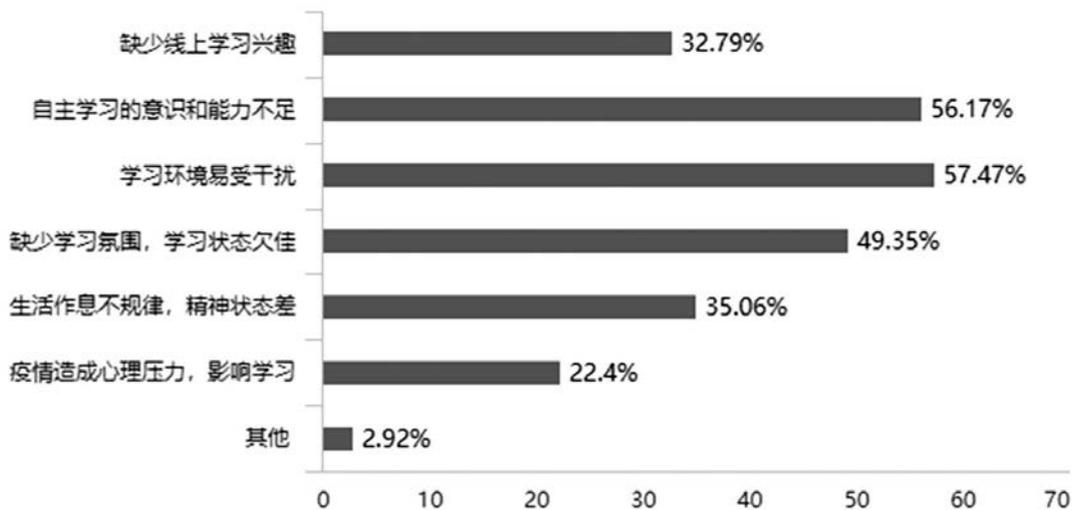
针对学生对线上教学的满意度, 问卷分别从教学、自身和平台硬件三个方面调研学生的满意度及原因反馈。

学生对线上学习满意的原因调查结果为: 教学的原因(73.7%)、自身的原因(53.9%)、平台硬件的原因(51.3%)、其他(3.57%), 由此可以看出学生对线上教学实施的接受与认可。(1)对于教学方面满意的具体原因如图1所示, 灵活的授课方式和设计完整的教学环节保障了线上教学的实施。(2)对于自身方面满意的原因则主要有: 直播回放等功能有助于复习(72.08%); 录播的方式让学习时间更加灵活(62.66%); 线上互动交流轻松活跃, 更愿意参加(50.32%); 线上学习方式灵活, 激发自主学习性(46.43%)。(3)硬件方面令学生满意的原因则主要是: 线上平台功能丰富, 满足各种学习需求(72.08%); 授课平台种类较多, 可供选择(66.23%)。



▲图1 教学方面的满意因素

学生对线上学习不满意的原因调查结果为: 教学的原因(25%)、自身的原因(64.29%)、平台硬件的原因(44.48%)、其他(10.71%)。由此看出学生对自身的反思和线上教学对学生学习产生了一定的情绪影响。(1)教学方面令学生不满意的原因主要有: 老师布置的作业太多(37.34%); 不能把握学生的学习效果, 并进行调整(34.09%); 课堂授课方式单一不灵活(27.6%)。(2)自身方面令学生不满意的原因如图2所示: 体现出学习环境改变的影响和学生自主学习能力不足。(3)硬件方面令学生不满意的原因主要是线上平台“慢”“卡”“停”影响上课效率(69.81%)。



▲图2 自身方面的不满意因素

总体上,学生对传统教学和线上教学的倾向为:传统教学(50.79%)、线上教学(49.03%)。从数据可以看出学生对于线上教学并不排斥,接受和喜欢程度与传统教学不相上下。学生、教师和学校利用网络和各类线上教学平台克服空间的障碍,参与直播、录播课堂,进行师生互动,完成线上线下教学任务。线上教学满意原因反馈体现出尽管教学媒介或方式发生改变,若能保障好教学各环节的设计与实施,依然能够达到较为满意的教学效果。由于时间紧迫,大多数线上课程仍沿用了传统教学的设计,缺乏复杂精细的教学设计或者更多样的教学方法。任课教师可以根据学生情况、网络实际情况、现有网络课程资源情况等,结合专业和课程特点,对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进行调整,以适应网络教学(李军靠、王明慧 106-11)。建议线上课程在今后建设过程中完善教学设计。线上教学不满意原因虽主要源于学生自身问题,但也反映出线上教学在交互性上的不足。作为一种异步在线教学,教师无法时刻监控到学生的学习效果(焦建利等 106-13)。因此,教师可以通过细化知识点、切分任务、调整节奏等方式督促学生进行在线学习,及时检验学习效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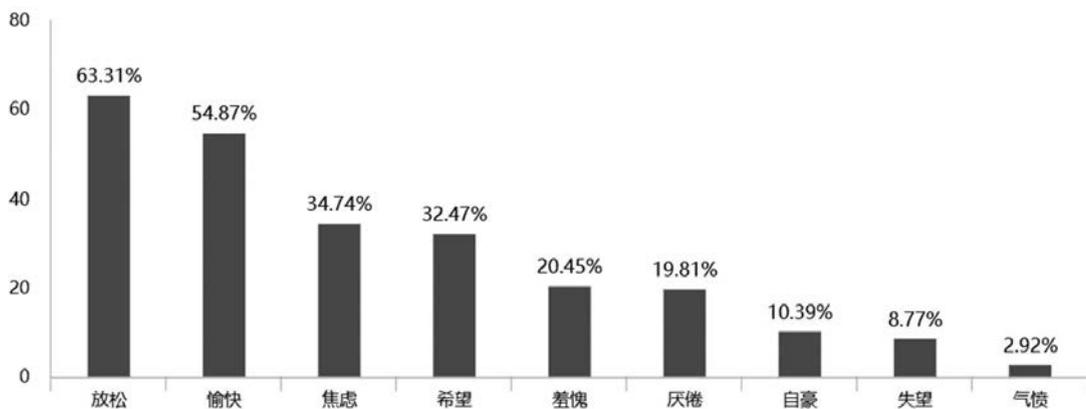
在短时间内实现的线上教学可以说在疫情特殊时期内帮助学生基本完成了课程的学习任务,尽管仍有各种不足之处,但也进一步证实了在今后的教学中线上线下结合的混合式教学才能更好地融合线上线下的优点,更好地实现教学目标。

(二) 疫情期间大学生在线学习学业情绪表现

1. 学生线上学习总体学业情绪感知

通过问卷中多选题“本学期的线上教学和学习给你的总体感受是?”的结果显示,本学期

的线上教学和学习给学生的总体学业情绪感受选择排名依次是：放松、愉快、焦虑、希望、羞愧、厌倦、自豪、失望、气愤。具体分布比例如图 3。



▲图 3 本学期的线上教学和学习的总体感受

2. 学生线上学习学业情绪均值分析

从《学业情绪量表》的统计结果看，整体上疫情期间线上学习环境下商务英语专业学生对积极情绪的感知程度高于消极情绪。其中，积极情绪的均值均高于 3，均值范围介于 4.07 至 3 之间，均值 $M=3.602$ 。而消极情绪的均值范围介于 3.82 至 2.16，均值 $M=2.92$ 。每一类学业情绪的分值范围和均值见表 4：

表 4 四类学业情绪量均值分布

| 学业情绪类型 | 均值 | 标准差 | 中位数 |
|--------|-------|-------|-------|
| 积极高唤醒 | 3.659 | 0.702 | 3.636 |
| 积极低唤醒 | 3.560 | 0.669 | 3.545 |
| 消极高唤醒 | 3.032 | 0.677 | 3.000 |
| 消极低唤醒 | 2.712 | 0.778 | 2.857 |

从学业情绪四个维度的描述性数据统计可以看出：首先，从均值看，商务英语专业学生疫情期间线上学习的学业情绪总体体现出积极情绪体验高于消极情绪体验 ($3.602 > 2.92$)，其中积极高唤醒情绪的均值达到 3.659，说明线上学习期间，学生的愉快、希望等积极高唤醒情绪感受最高，积极高唤醒情绪能够显示学生良好的学习状态和激发学生持续学习的动力。其次，学生感受到的放松、自豪等积极低唤醒情绪均值为 3.56。积极低唤醒情绪说明学生能够放松自如地完成学习，但轻松的感觉对于激发学生的学习动力方面略显不足。相比较积极情绪，

羞愧、焦虑、气愤等消极高唤醒情绪相对较低，均值为 3.032。消极低唤醒情绪说明学生在学习中因各种原因产生负面的情绪，但这类情绪往往会引起学生反思并由此唤醒学生的学习动力。学生感受的失望、厌倦等消极低唤醒情绪排位最低，均值为 2.712。消极低唤醒类情绪不利于学生维持学习状态和学习动力。

疫情期间在线学习环境下学生的 10 种主要学业情绪均值按照降序排列顺序见表 5:

表 5 学业情绪表现水平

| 情绪类型 | 平均值 | 标准差 | 中位数 |
|------|-------|-------|-------|
| 愉快 | 3.721 | 0.697 | 3.636 |
| 希望 | 3.616 | 0.771 | 3.500 |
| 放松 | 3.594 | 0.676 | 3.571 |
| 兴趣 | 3.587 | 0.757 | 3.571 |
| 自豪 | 3.502 | 0.738 | 3.500 |
| 羞愧 | 3.329 | 0.817 | 3.333 |
| 气愤 | 3.195 | 0.934 | 3.000 |
| 焦虑 | 2.910 | 0.700 | 3.000 |
| 失望 | 2.798 | 0.833 | 2.857 |
| 厌倦 | 2.626 | 0.831 | 2.714 |

从量表数据和问卷可以得知，疫情期间在线学习环境下学生对积极高唤醒情绪感知整体较高，其中三种积极高唤醒愉快、希望和兴趣的排序也位列所有情绪前三位。面对疫情影响和在线学习的环境，学生呈现出积极的情绪，说明学生能够较好地调整状态应对新的学习方式。学生对积极低唤醒情绪主要感知是放松和自豪。线上教学脱离了学校教室的环境，手机电脑变成主要的学习工具，屏幕替代黑板，教师变身主播，网络联结起师生。教学方式、互动方式的变化减轻了面对面授课的压力感，让学生体验到更多的放松感。

通过量表可以看出，疫情期间学生线上学习时也存在消极情绪。首先是消极高唤醒情绪中焦虑、羞愧情绪感知明显。线上互动沟通不便、外界环境干扰、疫情环境影响、学生自主学习能力和自律能力差异等因素容易导致消极情绪的产生。焦虑和愧疚虽然属于消极情绪，但是却有较高的唤醒学生学习动力的功能。因此，通过自身的调整和正确的引导，消极高唤醒类情绪有可能唤醒学生的学习意识，激发学生的潜力。消极低唤醒情绪中，学生对于厌倦、失望的感知程度不高（ $M=2.626$ ； $M=2.798$ ）。学生出现厌倦失望情绪多与教学内容和学习效果相关。该结果支持了麦金泰尔和格雷格森（T. Gregersen）的观点，即语言学习过程中的积极情绪与消极情绪既可能交替（193-213），亦可能并行（李成陈、韩晔 207-19）。线上教学模式下，学习者的情绪感知具有个体差异性和交叉性。消极低唤醒情绪不利于学生保持

学习动力和学习效果, 长期负面情绪的积累不仅会对学生的外语学习有效性产生负面影响, 更不利于学生的心理健康(夏洋、陈雪梅 44-49)。根据拓展一建构理论的消除假说: 积极情绪对消极情绪具有一定的缓解作用(Fredrickson 330-35)。教师和学生都应通过教学的不同环节来引导调整情绪和心理状态, 尽量疏解消极低唤醒类情绪, 帮助学生焕发学习的良好情绪。

(三) 线上学习的评价和学业情绪的相关性分析

1. 学习者对本学期在线学习的整体评价打分和学业情绪的相关性

表 6 显示了利用相关分析去研究学习者对本学期在线学习的整体评价打分别和消极低唤醒、消极高唤醒、积极低唤醒、积极高唤醒共 4 项之间的相关关系, 并使用 Pearson 相关系数去表示相关关系的强弱情况。具体分析可知:

表 6 在线学习整体评价打分与 4 类学业情绪的 Pearson 相关

| 学业情绪类型 | 对本学期在线学习的整体评价打分 |
|--------|-----------------|
| 积极高唤醒 | 0.593** |
| 积极低唤醒 | 0.588** |
| 消极高唤醒 | -0.263** |
| 消极低唤醒 | -0.402** |

* $p < 0.05$ ** $p < 0.01$

学习者在线学习的整体评价打分和消极低唤醒、消极高唤醒之间的相关系数值分别为 -0.402 和 -0.263, 并且呈现出 0.01 水平的显著性, 因而说明整体评价打分和消极低唤醒之间有着显著的负相关关系。整体评价打分和积极低唤醒、积极高唤醒之间的相关系数值分别为 0.588 和 0.593, 并且呈现出 0.01 水平的显著性, 说明整体评价打分和积极高唤醒之间有着显著的正相关关系。

学习者对本学期在线学习的整体评价打分别和 10 种学业情绪之间的相关关系, 也可由 Pearson 相关系数显现出, 如表 7。积极情绪中愉快、希望、兴趣、放松和自豪均和评价打分有着显著的正相关关系。消极情绪中焦虑、失望、厌倦、气愤均和评价打分有着显著的负相关关系, 而评价打分和羞愧之间并没有相关关系。

表7 在线学习整体评价打分与10种情绪的Pearson相关

| 情绪类型 | 对本学期在线学习的整体评价打分 |
|------|-----------------|
| 愉快 | 0.586** |
| 希望 | 0.549** |
| 兴趣 | 0.560** |
| 放松 | 0.584** |
| 自豪 | 0.529** |
| 焦虑 | -0.275** |
| 羞愧 | -0.098 |
| 气愤 | -0.272** |
| 厌倦 | -0.407** |
| 失望 | -0.344** |

* $p < 0.05$ ** $p < 0.01$

这一结果部分验证了积极学业情绪助力学业成就，而消极学业情绪削弱学业成就。积极情绪体验较多的学习者对学习成效更为满意，对在线教学评价也更高。而受到消极情绪影响的学习者则易于产生不满，同时影响学习效果。因此，教师在英语教学中应关注学习者的各类情绪特征，重视学生消极情绪引导。教师动态把握、学校督导监督、家长辅助支持，多方联动，畅通沟通交流渠道，设立情绪干预机制，充分发挥各方面作用，激发学生的学习动力，唤醒学习者积极的学业情绪，以确保教师教学效果好、学生线上学习效率高。

2. 学习者对线上学习满意的原因与学业情绪的相关性

利用相关分析去研究学习者对线上学习满意的原因选项——教学的原因、自身的原因、平台硬件的原因和其他分别和积极高唤醒、积极低唤醒、消极高唤醒、消极低唤醒共4项之间的相关关系。

表8 线上学习满意的原因与学业情绪的Pearson相关

| 学业情绪类型 | 12. (教学的原因) | 12. (自身的原因) | 12. (平台硬件的原因) | 12. (其他) |
|--------|-------------|-------------|---------------|----------|
| 积极高唤醒 | 0.297** | 0.236** | 0.068 | -0.132* |
| 积极低唤醒 | 0.252** | 0.240** | 0.053 | -0.078 |
| 消极高唤醒 | -0.047 | -0.187** | -0.048 | 0.031 |
| 消极低唤醒 | -0.157** | -0.237** | -0.024 | 0.078 |

* $p < 0.05$ ** $p < 0.01$

从表 8 可以看出：“教学的原因”与积极高唤醒、积极低唤醒之间有着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和消极低唤醒之间有着显著的负相关关系。除此之外，教学的原因与消极高唤醒之间的相关关系数值并不会呈现出显著性 ($p>0.05$)，意味着其与消极高唤醒之间并没有相关关系。“自身的原因”和积极高唤醒、积极低唤醒之间有着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和消极高唤醒、消极低唤醒之间有着显著的负相关关系。“平台硬件的原因”与四类学业情绪之间均不会呈现出显著性，相关系数数值均接近于 0，并且 p 值全部均大于 0.05，意味着其与四类情绪之间均没有相关关系。

从数据上看，线上教学的多个方面能够激发学生的积极类情绪。这与相关研究结果一致。有研究表明，教师支持、交互投入和学习愉悦彼此显著相关；教师支持对交互投入和学习愉悦产生直接的正向作用（刘晓红、郭继东 34-42）。教师方面，新鲜灵活的线上互动、全新的线上教学设计、教师饱满的授课热情带给学生愉快放松的感觉。教学内容方面，线上教学内容新颖，直播或者录播内容清楚、安排合理、方便有序让学生感到愉快、有成就感。丰富多样的线上授课资源及时事思政等相关学习资源让学习者感觉充实、高兴且备受鼓舞。学习效果方面，网课的灵活自主性、直播或录播的各种功能提升了学习者的学习成效。在线学习环境下，教师支持对学生的学业投入至关重要，不仅可以促进学习投入，也与积极学业情绪等学习者情感因素显著相关（蒋志辉等 103-10）。但也要注意，宽松的课堂及学习氛围、放松的线上互动沟通也会逐渐让学习者感受到放松甚至松懈，导致积极低唤醒情绪及消极类情绪的产生。教师可以利用不同平台功能开展不同类型的教学活动。只有全面把握教学交互设计各要素，实行嵌入性教学交互过程设计，力求交互内容的情感与认知相结合，践行交互方式的促进性原则（祝智庭、彭红超 1-6），才能最大限度地达到期望的教学效果。

3. 学习者对线上学习不满意的原因与学业情绪的相关性

利用相关分析去研究学习者对线上学习不满意的原因选项——教学的原因、自身的原因、平台硬件的原因，以及其他分别和积极高唤醒、积极低唤醒、消极高唤醒、消极低唤醒共 4 项之间的相关关系。

表 9 线上学习不满意的原因与学业情绪的 Pearson 相关

| 学业情绪类型 | 16. (教学的原因) | 16. (自身的原因) | 16. (平台硬件原因) | 16. (其他) |
|--------|-------------|-------------|--------------|----------|
| 积极高唤醒 | -0.216** | -0.191** | 0.002 | 0.168** |
| 积极低唤醒 | -0.226** | -0.266** | 0.045 | 0.237** |
| 消极高唤醒 | 0.195** | 0.147** | 0.047 | -0.218** |
| 消极低唤醒 | 0.279** | 0.161** | 0.003 | -0.206** |

* $p<0.05$ ** $p<0.01$

从表 9 可以看出：“教学的原因”和积极高唤醒、积极低唤醒之间有着显著的负相关关系，

和消极高唤醒、消极低唤醒之间有着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自身的原因”和积极高唤醒、积极低唤醒之间有着显著的负相关关系，和消极高唤醒、消极低唤醒之间有着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平台硬件的原因”与四类学业情绪之间均不会呈现出显著性，相关系数值均接近于0，并且p值全部大于0.05，意味其与四类情绪之间均没有相关关系。

线上教学过程中教学原因也会导致消极类情绪的产生，尤其是低唤醒类情绪。线上互动沟通的局限性、对学生学习效果把握的滞后性、线上教学设计的不完善等因素会使学生产生消极情绪。自身原因是造成学习者不满意的主要原因，易于产生积极低唤醒和消极类情绪。学习环境易受干扰、缺乏学习氛围、自主学习意识和能力差等问题容易诱发放松、焦虑或厌倦的情绪，自身问题越多的学习者越不容易体验到线上学习的愉悦，越容易感到焦虑或无聊。帮助学生解决自身问题，可以通过建立和完善学习评价机制来督促学生学习。评价机制不仅是教师了解督促学生学习的环节，也是学生自我成就感获得的重要环节之一。借助精细化、多元化的过程性学习评价，能更好地督促检验学生整个的学习过程，也让学生学习有依托、反馈的途径，有利于激发学生积极学业情绪。同时，高校需要根据线上教学的特性，更新教学评价指标，形成在线教学共同体，实现学校、家庭、教师、学生等各个主体之间的互动沟通和协同对话（鲁小艳 42-44）。

本研究基于学习者的学业情绪，考察了疫情期间线上英语教学环境下，学习者对在线教学的满意度及其学业情绪表现。通过问卷调研和设计疫情期间学生在线学习学业情绪量表来探讨大学生线上外语学习的情绪体验。研究得出学生对线上英语教学满意度较高，对新颖的学习方式表现出积极的情绪。量表体现出学生积极情绪高于消极情绪，高唤醒情绪又高于低唤醒情绪，说明学生在疫情线上学习期间依然能保持良好的学习状态和持续学习的动力，学生能够意识到并自我调节负性情绪，同时也表明线上教学给学生带来较好的体验。同时，消极情绪与线上教学不满意因素有相关性，这也说明疫情特殊时期的线上学习对学习者的学业情绪也带来了一定的消极影响，突如其来的线上教学仍存在固有的不足与问题。学习者是学习的主体，也是课程体验的主体，其情绪体验和评价对于课程的改进与完善有很大价值。教学环节环环相扣，从事线上外语教学的教师需要建立情绪意识，要时刻通过多渠道关注学生的学业情绪，深入研究学习者学习过程的心理和认知变化，让学习者、教师、学校及线上教学平台获得更加准确有效的反馈，促进学生积极情绪体验，为学习者提供更好的线上课程，构建积极语言教育理念（李成陈 57-63）。

引用文献 [Works Cited]

- Dewaele, J. M., and P. D. MacIntyre. "The Two Faces of Janus? Anxiety and Enjoyment in the Foreign Language Classroom." *Studies in Second Language Learning and Teaching*, no. 2, 2014, pp. 237-74.

- Dong, Lianqi. "The Predictive Effect of Control-value Appraisals on Anxiety and Enjoyment in Foreign Language Classroom." *Foreign Language World*, no. 3, 2022, pp. 79-88. [董连棋:《控制-价值评价对外语课堂焦虑和愉悦的预测作用》,载《外语界》2022年第3期,第79-88页。]
- Dong, Yan, and Guoliang Yu. "The Development and Application of an Academic Emotion Questionnaire." *Acta Psychologica Sinica*, no. 5, 2007, pp. 96-104. [董妍、俞国良:《青少年学业情绪问卷的编制及应用》,载《心理学报》2007年第5期,第96-104页。]
- Fredrickson, B. L. "The Value of Positive Emotions: The Emerging Science of Positive Psychology Is Coming to Understand Why It's Good to Feel Good." *American Scientist*, vol. 91, no. 4, 2003, pp. 330-35.
- Han, Ye, and Yueting Xu. "Emotional Experiences and Emotional Regulation Strategies in Second Language Writing Classroom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ositive Psychology: What Can We Learn from Written Corrective Feedback Situations?" *Foreign Language World*, no. 1, 2020, pp. 50-59. [韩晔、许悦婷:《积极心理学视角下二语写作学习的情绪体验及情绪调节策略研究——以书面纠正性反馈为例》,载《外语界》2020年第1期,第50-59页。]
- Jiang, Zhihui, et al. "Construction of the Model of Online Learner-perceived Teacher Support Behavior." *China Educational Technology*, no. 11, 2018, pp. 103-10. [蒋志辉等:《在线学习者感知的教师支持行为模型构建》,载《中国电化教育》2018年第11期,第103-10页。]
- Jiao, Jianli, et al. "Case Analysis of Online Instruction in the Context of 'Classes Suspended but Learning Continues' for Plague Prevention." *China Educational Technology*, no. 3, 2020, pp. 106-13. [焦建利等:《疫情防控背景下“停课不停学”在线教学案例研究》,载《中国电化教育》2020年第3期,第106-13页。]
- Li, Chengchen. "Looking Back and Looking Forward: SLA Research from a Positive Psychology Perspective over the Past Decade (2012-2021)."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vol. 42, no. 4, 2021, pp. 57-63. [李成陈:《积极心理学视角下的二语习得研究:回顾与展望(2012—2021)》,载《外语教学》2021年第42卷第4期,第57-63页。]
- Li, Chengchen, and Ye Han. "The Predictive Effects of Foreign Language Enjoyment, Anxiety and Boredom on Learning Outcomes in Online English Classrooms." *Modern Foreign Languages*, vol. 45, no. 2, 2022, pp. 207-19. [李成陈、韩晔:《外语愉悦、焦虑及无聊情绪对网课学习成效的预测作用》,载《现代外语》2022年第45卷第2期,第207-19页。]
- Li, Junkao, and Minghui Wang. "The Effect of Teaching Interaction on College Students' Online Learning Engagement and Its Promotion Strategies." *Journal of Yan'an University (Social Science Edition)*, vol. 43, no. 6, 2021, pp. 106-11. [李军靠、王明慧:《教学交互对大学生在线学习投入的效用及提升策略》,载《延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43卷第6期,第106-11页。]
- Liu, Xiaohong, and Jidong Guo. "Teacher Support, Interaction Engagement and Learning Enjoyment in Online EFL Teaching." *Journal of PLA University of Foreign Languages*, vol. 44, no. 5, 2021, pp. 34-42, 160. [刘晓红、郭继东:《外语在线教学教师支持与学生交互投入和学习愉悦的关系》,载《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2021年第44卷第5期,第34-42, 160页。]
- Lu, Xiaoyan. "Construction of Online Teaching Quality Evaluation System in Universities." *China Higher Education*, no. 10, 2021, pp. 42-44. [鲁小艳:《高校在线教学质量评价体系构建》,载《中国高等教育》2021年第10期,第42-44页。]
- Ma, Huixia. "Development of General Academic Emotion Questionnaire for College Students." *Chinese Journal of Clinical Psychology*, no. 6, 2008, pp. 36-39. [马惠霞:《大学生一般学业情绪问卷的编制》,载《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2008年第6期,第36-39页。]
- MacIntyre, P. D., and T. Gregersen. "Emotions That Facilitate Language Learning: The Positive-broadening Power of the Imagination." *Studies in Second Language Learning and Teaching*, vol. 2, no. 2, 2012, pp. 193-213.
- Pekrun, R. "The Control-value Theory of Achievement Emotions: Assumptions, Corollaries, and Implications for Educational Research and Practice." *Educational Psychology Review*, vol. 18, no. 4, 2006, pp. 315-41.
- Pekrun, R., et al. "Academic Emotions in Students' Self-regulated Learning and Achievement: A Program of Qualitative and Quantitative Research." *Educational Psychologist*, vol. 37, no. 2, 2002, pp. 91-105.
- Prior, Matthew T. "Contextualizing Emotion in Multilingual Interaction: Theoretical and Methodological Perspectives." Introduction. *Emotion in Multilingual Interaction*, edited by Matthew T. Prior and Gabriele Kasper, John Benjamins, 2016, pp. 1-28.
- Qiu, Junping, and Yufang Ou. "The Construction and Application Research of MOOC Quality Evaluation Indicators System." *Higher Education Development and Evaluation*, vol. 31, no. 5, 2015, pp. 72-81. [邱均平、欧玉芳:《慕课质量评价指

- 标体系构建及应用研究》，载《高教发展与评估》2015年第31卷第5期，第72-81页。]
- Wang, Xue, et al. "How Online Learning Resources Affect Academic Emotion and Learning Outcomes: A Meta-analysis Based on Control-value Theory." *Modern Distance Education Research*, vol. 33, no. 5, 2021, pp. 82-93, 102. [王雪等:《在线学习资源如何影响学业情绪和学习效果——基于控制-价值理论的元分析》，载《现代远程教育研究》2021年第33卷第5期，第82-93，102页。]
- Wu, Shizhen, and Baicai Sun. "How Adaptability Influences Student Engagement under COVID-19: Medication Effects of Academic Emotion." *Contemporary Educational Science*, no. 8, 2021, pp. 87-95. [吴世珍、孙百才:《疫情背景下学生适应能力对学习投入的影响: 学业情绪的中介效应》，载《当代教育科学》2021年第8期，第87-95页。]
- Xia, Yang, and Xuemei Che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erceived Classroom Affordance and Boredom in CLI Classrooms: The Medicating Role of Control-value Appraisals."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vol. 43, no. 3, 2022, pp. 44-49. [夏洋、陈雪梅:《CLI课堂给养感知与无聊情绪的关系研究: 控制—价值评价的中介作用》，载《外语教学》2022年第43卷第3期，第44-49页。]
- Xia, Yang, and Jian Meng. "Practical Research on the Making of a Scale for the Measurement of Academic Emotions of English Majors." *Foreign Languages and Cultures*, vol. 1, no. 1, 2017, pp. 147-56. [夏洋、孟健:《英语专业学生课堂学业情绪量表的编制及应用研究》，载《外国语言与文化》2017年第1卷第1期，第147-56页。]
- Zhu, Zhiting, and Hongchao Peng. "Omnimedia Learning Ecology: a Practical Solution to Cope with Schooling Difficulties during a Large-scale Epidemic." *China Educational Technology*, no. 3, 2020, pp. 1-6. [祝智庭、彭红超:《全媒体学习生态: 应对大规模疫情时期上学难题的实用解方》，载《中国电化教育》2020年第3期，第1-6页。]

◇责任编辑: 林小慧

论俄罗斯宗教哲学的语言本体论特征

◎ 姜宏 王云婷

内容提要: 纵观俄罗斯宗教哲学的整个发展历程, 不难发现其具有深厚且鲜明的语言本体论特征。这主要体现在: 俄罗斯宗教哲学复兴的直接结果是俄罗斯语言本体论学说(流派)的形成; 其核心主题之一是语言本质的问题; 其中心理念在语言本体论研究中彰显。此外, 语言本体论还是俄罗斯宗教哲学的民族特色之所在, 凝聚着弘扬俄罗斯民族精神的至高追求。这同时也启示着我们, 理应将民族语言和民族精神作为当代哲学研究的重要范畴。

关键词: 俄罗斯 宗教哲学 语言本体论 称名哲学 语言哲学

中图分类号: G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6-4366 (2023) 01-0117-10

基金项目: 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范式视域的俄罗斯语言哲学史研究”(17BY034)

作者单位: 复旦大学外国语言文学学院, 上海 200433

DOI: 10.19967/j.cnki.flc.2023.01.011

Title: Characteristics of Language Ontology in Russian Philosophy of Religion

Abstract: Throughout the entire development process of Russian philosophy of religion, it is not difficult to find that Russian philosophy of religion has deep and distinct linguistic ontology features. This is because the revival of Russian philosophy of religion directly contributed to the formation of Russian language ontology theory; the core theme in Russian philosophy of religion is precisely about the nature of language; and the central idea of Russian philosophy of religion is manifested in the study of language ontology. Also, language ontology shows the national characteristics of Russian philosophy of religion, embodies the pursuit of developing the Russian national spirit, and it suggests that national language and national spirit should serve as important categories of contemporary philosophical research.

Keywords: Russia, philosophy of religion, language ontology, philosophy of name, philosophy of language

Authors: Hong Jiang, Professor, College of Foreign Languages and Literature, Fudan University, Shanghai, China; Yunting Wang, Ph.D. Candidate, College of Foreign Languages and Literature, Fudan University, Shanghai, China.

宗教哲学是俄罗斯哲学的最初形态，也是其特色和亮点之所在。有别于将物质与精神进行对立二分的西方理性主义哲学传统，俄罗斯宗教哲学始终对上帝、人、世界之本质及其相互关系做整体性的理解，强调人的心灵和精神力量的作用，且尤为注重对俄罗斯民族精神的凸显，从而使宗教从纯粹的神学体系走入人文科学的广阔天地。宗教哲学作为俄罗斯极具民族特色的哲学样式，一直吸引着俄罗斯本国乃至世界哲学界的目光。然而，很少有人关注俄罗斯宗教哲学与语言本体论学说之间一脉相承、浑然一体的关系。纵观其发展历程，可以发现，它具有鲜明的语言本体论（онтология языка）特征。这是因为：俄罗斯宗教哲学复兴的直接结果是语言本体论学说（流派）的形成；有关语言本质的问题是其始终探讨的核心主题之一；其中心理念彰显在语言本体论学说中。可以说，俄罗斯宗教哲学体系的建构与其对语言哲学问题的探讨紧密相关。通过理清这一问题，我们能获得尤为珍贵的启示。

一、俄罗斯宗教哲学概述

俄罗斯宗教哲学活跃在人类思想史舞台的时间为19世纪初至20世纪初，经历了萌芽期（19世纪初）、建立期（19世纪中后叶）、复兴期（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三个阶段（Полторацкий 123）。该哲学样式试图将基督教的神秘主义和西方哲学的理性主义融合到自身更宏大的思想框架之下，旨在建构和发展东斯拉夫世界观的表达形式和手段，探索其深层基础。俄罗斯宗教哲学家们研究领域广泛，探讨主题众多。他们既关注传统的神学问题，例如作为真实存在的上帝、上帝与世界的关系、上帝与人的关系等，同时又开辟出一系列新的议题，例如聚合性学说（соборность）、索菲亚学说或智慧说（софиология）、精神现象的本体论基础（онтологические основания духовных явлений）、万物统一学说（философия всеединства）、语言本体理论（онтологическая теория языка）或称名哲学（философия имени）等。

俄罗斯宗教哲学精神旨趣和研究主题的确立与其特定的形成背景和一大批宗教哲学家的理论探索息息相关。

首先，从其形成背景来看，俄罗斯宗教哲学的萌有着深厚且特定的社会文化根基，其整个形成背景是各种条件和因素的综合，其中最为重要的因素可以说是东正教文化传统和斯拉夫主义（славянофильство）哲学思潮。自公元988年罗斯受洗以来，东正教开始全面而深刻地主导着俄罗斯人的精神世界。古代俄罗斯的哲学思想主要存在于东正教教会的神学理论之中，长期未能形成以人为主体的世界观。生发于这种历史土壤的俄罗斯宗教哲学自然而然地将东正教视为自身的基础和语境，从东正教信仰中获取其理论创造的内在动因和源泉（张百春 4）。18世纪初彼得大帝西化改革之后，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法国启蒙哲学家伏尔泰，德国宗教哲学家谢林，唯心主义哲学家康德和黑格尔等人的学说先后被引入俄国思想界，冲击着俄罗斯人民原有的世界观体系。在这种情况下，形成了两个对立的哲学思

潮（或流派），其中一对西方思想采取接纳和学习的态度，史称西欧派；另一派坚守东正教传统，认为不应该也不能够在俄国复制西方文明，俄国应该走自己的、具有民族特色的发展道路，此即斯拉夫派。西俄新旧思想的交锋碰撞使得俄罗斯宗教哲学拥有了延续至今的方向和动力——建立不同于西方的、属于俄国自己的哲学。东正教神学院的教授们秉持斯拉夫派的观点，认为，对西方哲学原则的一味吸纳是导致俄国一直缺乏民族传统哲学的原因。例如，神学院的代表人物卡尔波夫（В. Н. Карпов）认为，如果单独看西方哲学家的著述，其中确有许多美好的思想，但它们并不适合俄罗斯，因为其中没有任何观点和思想可以给俄罗斯的科学土壤带来益处，可以与真正的俄罗斯心智相一致（转引自 Безлепкии 181）。可见，东正教神学界开始重视民族精神的独特价值。另外，卡尔波夫指出，“在哲学领域，世界观的命运往往取决于时代和国家的统治精神，取决于生活的需求和方向，尤其取决于宗教信仰”（295-96）。由此，俄国哲学家们开始着力于批判西方理性主义哲学，积极寻求契合自身的发展路线。最终，他们找到了东正教和斯拉夫主义这两个精神内核。虽然当时俄罗斯宗教哲学尚处于萌芽期，未形成完整的理论学说，但这一阶段为后来的宗教哲学体系的建构奠定了思想基础。

其次，从其理论探索来看，俄罗斯宗教哲学的理论大厦是由一批杰出宗教哲学家的学说共同构筑的。其早期思想源自基辅神学院、莫斯科神学院和彼得堡神学院的代表们，包括戈鲁宾斯基（Ф. А. Голубинский）、卡尔波夫、基里亚罗夫-普拉东诺夫（Н. П. Гиляров-Платонов）等人。戈鲁宾斯基创建了独特的宗教思想流派——神学-哲学流派，并奠定了俄罗斯神学本体论学派的基础。他的思想后来得到了其学生、同样是神学院教授的库德里亚夫采夫-普拉东诺夫（В. Д. Кудрявцев-Платонов）和宗教思想家索洛维约夫（В. С. Соловьёв）的继承和发展。准确来说，库德里亚夫采夫-普拉东诺夫和索洛维约夫提出了真正意义上的宗教哲学学说，尤其是后者的万物统一学说，不仅标志着俄罗斯宗教哲学正式建立，也是其思想高峰，至今仍享誉世界哲学界。库德里亚夫采夫-普拉东诺夫继承了其导师戈鲁宾斯基有关哲学的两个目标的思想：一是唤醒人们寻求“智慧神”（索菲亚）的渴望，这也是人们的使命，其体现是“逻各斯”这一词语；二是唤起人们对智慧的热爱，使其了解智慧神。库德里亚夫采夫-普拉东诺夫把导师哲学体系中的神秘主义换成了理性主义，指出了理性神学认识的可能性和必要性。他的哲学体系被评价为经过最深刻思考、具有最严格体系的俄罗斯哲学之一，就逻辑推理性而言，在19世纪与之能够相提并论的只有索洛维约夫（Алексеев 98）。索洛维约夫接受过东正教神学院教育，又通晓西方哲学理论，对俄国民族精神的意义和价值有着深刻理解，其观点在万物统一学说中得到了集中阐发。万物统一学说旨在构建整体世界观，寻找上帝统一的无限智慧。他提出，要克服万物的割裂和矛盾，因为神和人类是统一的，物质和精神是同源的，理性主义、经验主义与直觉-神秘主义的知识是一致的，道德、科学、宗教和美学也是统一的。一切特性与差异都是普遍性存在的各种变体。存在，即拥有积极意义的“绝对本源”（абсолютное первоначало），就是上帝，是人格化的逻各斯（Соловьёв 333-34）。万物统一学说在形而上学中找到了俄罗斯宗教哲学发展的方向和路线，并影响了后来的

一大批俄罗斯宗教哲学家，包括语言本体论的主要代表弗洛连斯基（П. А. Флоренский）、布尔加科夫（С. Н. Булгаков）和洛谢夫（А. Ф. Лосев）。可见，俄罗斯宗教哲学的学说不是相互割裂的或矛盾的，而是保持着学术思想的承续和演进。东正教、斯拉夫文化、民族精神始终是存在于俄罗斯宗教哲学内核中的基因，它们共同指向一个重要的民族使命——为俄罗斯人寻找真理和精神归宿。

二、俄罗斯宗教哲学复兴的语言本体论特征

语言本体论是对语言本质的一种哲学性认识，它认为语言是一种具有独立性的实体，与语言工具论相对立。以洪堡特（В. фон Гумбольдт）、索绪尔（Ф. де Соссюр）、维特根斯坦（Л. Витгенштейн）等人为代表的语言本体论学说影响深远，广为学界所知晓。而本文所指的是由一批俄罗斯宗教哲学家、语言哲学家基于本民族文化土壤所建构的语言本体论学说或流派，即称名哲学。俄罗斯语言本体论是世界哲学思想库中一个独一无二的现象，它由弗洛连斯基首先推出，并得到布尔加科夫和洛谢夫等人的传承和发展。弗洛连斯基于1908年在莫斯科神学院所做的一场题为《唯心主义的全人类根基》（«Общечеловеческие корни идеализма»）的报告是其形成的标志。俄罗斯的语言本体论学说着力展现名称在认识论中的中心地位，因此其理论内核就是所谓的称名哲学。从其属性来看，该学说属于索洛维约夫的万物统一范畴，强调语言在认识人、神、世界的本质及其关系中的功能和价值，将称名过程理解为人和事物显示自身存在的过程、与神直接建立联系的过程。

语言本体论作为俄罗斯思想史上极为重要的一个语言哲学学说（或流派），与俄罗斯其他人文社会科学一样，其出现是本国社会文化背景和宗教哲学自身发展综合作用的产物。我们将其最为重要的，也是最为直接的原因归结为俄罗斯宗教哲学的复兴。可以说，宗教哲学的复兴是俄罗斯哲学的历史选择，而语言本体论则是俄罗斯宗教哲学复兴的直接结果。

俄罗斯语言本体论兴起并发展于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正值俄罗斯宗教哲学的复兴期，也是俄罗斯文化史上的“白银时代”。此时，艺术新思想、新形式、新方法、新种类和新体裁大量涌现，丰富了俄罗斯人民的精神生活，而这些新事物、新现象形成的统一精神基础则是俄罗斯宗教哲学。这是因为，盛行于19世纪的实证主义将形而上学排除在外的做法带来了一系列不良后果，它导致了俄罗斯社会精神生活的贫乏。在这种情况下，宗教哲学代表们以复兴国内哲学传统为己任，在宗教哲学中找到了理解生活的唯一途径，并把解决存在问题的希望也寄托在这一哲学上（Безлепкии 178-79）。于是，俄国社会出现了一股“带有某种普遍性的宗教哲学探索的潮流，参与这一探索的，主要是持有不同社会政治观点、哲学思想和艺术见解的人文知识分子”（汪介之 48）。这表明，东正教传统价值在遭受西方唯物主义、无神论冲击的俄国重新受到重视，进入了复兴阶段，并且宗教哲学与政治、文化、道德伦理等社会

生活的内容有了紧密的联系，获得了更大的现实性意义。

此外，卷入这场宗教哲学复兴热潮的不仅有哲学界、文艺界人士，还有宗教界修士。这指的是1910年发生的赞名论运动（имяславское движение），也称“阿索斯圣山辩论”（Афонский спор）。事件的起因是阿索斯圣山的修士们在上帝之名的现实性，也即上帝之名中是否存在上帝及其本质、特征和能量等问题上出现分歧。就以上问题持肯定观点的为赞名论派（имяславцы），他们确信，在精神世界里，一切都是可见的、可感受的，其口号是“上帝之名就是上帝”（Лескин, *Спор об Имени Божием* 19-21）。而反名论派（имяборцы）则认为：“上帝的名字只是名称，而不是上帝本人。称名的特性是对事物的命名，而不是事物本身。”（45-55）由于无法从东正教教条主义立场解决该事件，因此，这场神学纠纷蔓延到了哲学领域，在知识分子阶层也引起了强烈的共鸣和广泛参与。于是，争论的重点逐渐转移到探讨个体及其名称相互关系的问题，也意味着称名问题由此获得了本体论的阐述，语言本体论属性的问题跃升为宗教哲学讨论的焦点（Безлепкин 206）。

可见，该时期活跃的宗教哲学讨论氛围，以及宗教界、哲学界对语言本体问题的关注为语言本体论的形成创造了良好的条件。此时的俄罗斯宗教哲学代表们试图借助对语言的本体论研究来复兴和重振俄罗斯哲学中因新康德主义和实证主义影响而发生动摇的形而上学。在这一方面，以弗洛连斯基、布尔加科夫和洛谢夫为代表的语言本体论流派为捍卫俄罗斯宗教哲学做出了最大的尝试。在他们所建构的称名哲学中，名称和词的价值被提升到了新的高度，对语言本体问题的阐释相较于宗教哲学的前一阶段也显得更为系统和充实。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得出结论：俄罗斯宗教哲学发展的第一阶段深受斯拉夫派的影响，重点在于批判西欧的理性主义，将神学纳入哲学范畴，并致力于建构俄罗斯自己的具有民族特色的哲学；第二阶段则主要基于对基督教中传统主义和神秘主义的批判，发展先验一元论（теория трансцендентного монизма），建构万物统一哲学；第三阶段就是在前人的基础上提出语言本体论，建构称名哲学。总之，语言本体论乃是俄罗斯宗教哲学复兴期繁荣景象的典型成果，该学说融合神学、哲学、语言学视域，拥有广阔的阐释空间和丰富的理论内涵。在学术指向上，语言本体论发扬本国宗教文化和斯拉夫主义传统，明确对抗西方主流哲学，使俄罗斯哲学获得了与西方哲学平等对话的地位。

三、俄罗斯宗教哲学核心主题的语言本体论特征

尽管俄罗斯宗教哲学研究范围非常广，涉及领域非常多，但语言始终是它十分注重的议题。早在其萌芽期和建立期，语言就已进入宗教哲学的视野，而后来的语言本体论流派更是将语言本质问题作为宗教哲学重点阐释的内容。不仅如此，语言本体论的核心思想与宗教哲学的语言观是基本一致的，或者说承袭了宗教哲学的语言观。

如前所述，俄罗斯宗教哲学的发展可分为萌芽期、建立期、复兴期三个阶段。就语言本体论的探讨而言，俄罗斯宗教哲学萌芽期的神学院代表们受到斯拉夫派的影响，把语言的本质和用途与哲学的本质和对象等同起来。斯拉夫派把语言视为民族自我认识最充分的体现形式。而在宗教哲学代表们的意识中，宗教、语言和民族是同一回事。因此，语言理所当然被视为是民族心灵认知、心智和智慧历史最恰当的表达手段（Безлепкии 180-81）。到了宗教哲学的建立期，哲学界代表库德里亚夫采夫-普拉东诺夫将自己的哲学思想与语言问题紧密结合，提出了对词语意义的独特理解方式。在开始阶段，他的观点与斯拉夫派还比较接近，其语言本质观带有典型的形式主义特点，认为语言是一个民族神圣的恒定财富，并将语言归结于基本语音和基本语法形式中。但后来，他采用先验一元论理论对语言学说进行了全面的阐述，并得出结论，每个人无非都是通过词语表达来获得有关上帝的概念的，也就是说，他赋予了词语以相应的地位（Кудрявцев-Платонов 125）。

在语言问题上，第一和第二阶段的宗教哲学代表们具有以下三个共同特质。第一，他们有关语言的学说大多是基于对俄罗斯民族的社会生活基础和精神意识的思考。因此，他们对语言本质的理解也非常相似，得出的结论非常接近：词语不是外部事物的形象，而是民族精神存在的形式，是心灵情感的体现和人们内心感受的生成（Юркевич 81）。如果说前一点（语言是民族精神存在的形式）在斯拉夫派和形式主义流派那里已经得到全面论证，那么俄罗斯宗教哲学家们重点阐述的则是后一点，也即语言是心灵情感的体现，是人们内心感受的生成。例如，基里亚罗夫-普拉东诺夫反对黑格尔关于语言是思维表达工具的思想，认为这是错误的表达。他认为，语言是整体上相同的世界观的体现，同时是人类认识和精神经验的表达（*Сборник сочинений* 307）。再如，尤尔科维奇（П. Д. Юркевич）指出，词语的生成不仅与思维、思想相关，还与作为心理过程体系的整个心灵相关，与心灵的深处相关；语言把我们的注意力转向了心灵深处方面，而这一方面构成了个体独特且独立的心灵生活（81）。第二，他们有一个共同思想，那就是语言的本体化。基里亚罗夫-普拉东诺夫指出，语言在人们的精神经验和民族心智历史中具有自己的基础，而语言存在的形式，也即语言存在的本体论性质，就是词源学（этимология），因为词源学将语言的现代形式和民族的历史精神经验结合在一起，既反映语言历史，又反映个人和民族的认识历史（*Экскурсия в русскую грамматику* 23）。第三，他们对西方理性主义的批判态度还反映在对俄语的研究上。他们都反对用国外的语言学体系来研究俄语，认为语言是民族自我认识的体现手段。基里亚罗夫-普拉东诺夫指出，语言的变化和发展在于其自身。俄语是独一无二的现象：在所有的文明现象中，它是唯一非人为的、人造的、自然的现象。语言的天才不在于作家的权威，而在于民族对语言的活用（Шаховской 516）。

在俄罗斯宗教哲学的复兴期，弗洛连斯基提出，名称“是思想-力量 [идея-сила]，是物质-词语 [субстанция-слово]”（“Общечеловеческие” 190）。言下之意，名称既是事物本身，又与词语和思维相等。同时，人的精神力量（意志）在名称中被客体化，并得以确定。只需说出

名称,意志就会使人进入世界的大门。按照弗洛连斯基的观点,事物的名称也即事物实体本身,名称存在于事物之中,事物由名称创造。事物与名词相互作用,事物与名词相仿。认识事物的前提就是必须知道其名称。他说:“谁会知道没有名称的事物?”(185)“词语表达现实,但并非复制现实,因为词语就是现实,名副其实的*现实*”(Философское наследие 262-63)。尽管后来布尔加科夫和洛谢夫对弗洛连斯基的思想和观点做出了进一步修正和完善,但可以说,弗洛连斯基有关名称本质的阐述在很大程度上已经明确了语言本体论流派的主题和方向。

语言本体论作为俄罗斯宗教哲学的核心流派和一个独立思想潮流,其典型特征是把词语和名称与人类存在等哲学问题之间的相互关系作为研究对象,将注意力集中在对语言-符号现象(指名称和词语)的探讨上。它把语言要素看作是核心要素,把名称和词语解释为世界万物的普遍基础,试图用万物统一哲学思想来描写语言。具体而言,称名哲学家们把名称看作是本体论哲学中存在和认识的形而上学原则,将之阐释为世界最初本质的表达;万物都是通过名称和词语渗透的事实,而所有名称和词语的原型则是上帝的名称;上帝的名称穿透一切,并包含一切名称。与此同时,名称是思想的凝聚体,名称的身上以明确的表达形式聚集了一般词语所具有的所有内容和所有能量(Замалеев 259)。他们认为,名称填补了本体和现象之间的间隙。词语是符号,它可以采用感官方式表达精神内容。本体和现象世界可以通过符号-词语联系起来。总的来说,称名哲学试图揭示和论证本体与现象、存在与认识、客体与主体、语言与思维,以及世界相互统一的可能性与必要性,旨在证明语言是现实存在的理性反映,而词语则是这一被反映的存在的本质(萧净宇、霍花 89)。这实际上是试图建立一种新型哲学,占据其中心位置的是对词语和称名现象的探索。

不难发现,俄罗斯宗教的语言哲学首先指的是语言本质、意义和用途(也即语言作为民族精神存在形式)的自我认识。也就是说,在有关语言本质的看法方面,宗教及其神学既基本沿袭了斯拉夫派的观点,把俄语的形成与民族联系在一起,又发展了自身的神学内容,认为语言是人类意识和精神经验的体现方式。另外,宗教哲学代表们对语言本体论的兴趣引出了新的形而上学问题和议题,由此大大丰富了俄罗斯宗教哲学,同时体现了俄罗斯社会意识中追寻上帝这一思潮的存在。这从另一角度证明,俄罗斯宗教思想的哲学问题带有明显的本体论性质,而且俄罗斯哲学具有深刻的形而上学基础。

四、俄罗斯宗教哲学中心理念的语言本体论特征

如上所述,语言本体论的形成不仅是宗教哲学复兴的直接结果,而且其核心思想也基本源自于宗教哲学。更为重要的是,语言本体论的方法论就是宗教哲学的万物统一思想。或者说,语言本体论哲学家的学理基础和方法论基础遵循的是基督教世界观的发展规划。该规划由基列耶夫斯基(И. В. Киреевский)构建,并在索洛维约夫万物统一形而上学中得以实现,那就

是哲学、神学和科学共同构成一个知识整体的思想观念。

索洛维约夫不同于他人的地方在于，他意识到哲学、神学和科学之间有着很深的渊源。基于这一认识，他构建起解决这一问题的学说，即万物统一哲学。万物统一哲学有两个重要学说或者概念，即世界是一个“有机整体”(органический синтез)的学说和“整体知识”(цельное знание)的概念(Соловьёв 290)。整体知识不仅指的是认知活动努力的最终目标，也即纯粹的认识论现象，还包括人类生活和世界的本体论方面，真正的现实现象，也即是存在的本体论基础。换言之，该哲学承认知识具有本体论性质，知识属于存在，充当存在中的创造性事件。

索洛维约夫的万物统一世界观方法论在语言本体论中得到了充分体现。首先，语言本体论三位代表人物的世界观基础都是万物统一范畴。他们的万物统一思想与索洛维约夫的相关哲学有着较大的不同，但同时也有相似之处。因为他们对存在的划分有着共同的理解，又都是通过哲学、神学和科学综合统一的方式来认识世界，并以此方式来考察语言事实，同时他们还都试图在万物统一范式的基础上对语言进行描写。

其次，语言本体论对语言问题的阐释与索洛维约夫具有一致的理念和方法。万物统一语言哲学本质上是一种神学—人类学—宇宙学的语言研究范式。在这一范式中，语言被置入最大程度的存在主义和概念主义语境(也即上帝、世界和人)之内。语言本体论哲学家们从本体主义和现实主义的立场来理解语言的本质，认为语言具有能量基础。换言之，这种理念和方法呈现的是万物统一的人类学范式，其中，语言被放入人的世界中予以观察。

再次，语言本体论充分体现出万物统一哲学研究无限广阔性的特点。神学—人类学—宇宙学综合框架的特点就是广阔性和包容性，涉及领域十分广泛。语言本体论的代表们通过词语问题渗透到人类文化的不同领域，包括语言学、人类学、神学、美学、心理学、伦理学、宇宙学和天体演化学，从而实现了语言观照下对人和人的存在及其命运的思考，传承和突出了俄罗斯哲学的人文主义传统，也即“以人为中心思考一切的传统、东正教所崇尚的‘人与上帝对话’的思想”(萧净宇 166)。这与宗教哲学的无限广阔性研究特点十分切合。

最后，语言本体论带有浓厚的神学性质，也即宗教性质。它是历史—哲学和神学广阔语境下俄罗斯宗教哲学传统对词语的认识成果，基本脱离了西方存在论和唯名论原则，更多是建立在俄罗斯圣经主义和东方教父主义哲学的传统上(Лескин, *Метафизика* 2)。本体论语言哲学把语言看作第一存在(上帝)的体现形式之一，这一立场是对新教徒哲学思想的代表康德的批判，同时是对作为东正教本质最充分的表达者赞名派的支持。与此同时，语言本体论标志着形而上学在理论上的形成，因为在挖掘语言深层的本体属性时，俄罗斯哲学家们发现了解决一系列哲学和其他历史文化问题的途径，找到了进入现代形而上学思维水平的入口(Безлепкин 226)。以上几点自然是传承了俄罗斯宗教哲学传统的结果。

总之，语言本体论展示的不仅仅是词语形成的辩证—现象主义历史，而且还是宇宙学、天体演化学、神学与人类学的综合体。这都是万物统一哲学方法论的体现。正因为如此，现代学者们认为，称名哲学就其学科属性和定位来说，应该属于万物统一哲学的语言学分支。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做出如下总结:第一,语言本体论从形成背景、核心思想到研究方法论均受到俄罗斯宗教哲学,尤其是索洛维约夫万物统一学说的深刻影响,其哲学基础是索洛维约夫的万物统一范畴。第二,称名哲学家们对语言本体论的关注引出了新的形而上学主题,由此丰富了俄罗斯宗教哲学,且为俄罗斯语言哲学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因此,我们既可以说俄罗斯宗教哲学带有典型的语言本体论特征,也可以说语言本体论具备鲜明的宗教哲学特点。前者是后者的形成条件、理论来源和方法论基础,后者是前者发展的直接结果和重要成果,也是前者的踵事增华,二者乳水交融,浑然一体。第三,俄罗斯宗教的语言哲学首先指的是对语言之本质、意义和用途(也即语言作为民族精神存在形式)的自我认识,它始终把语言的形式与民族的精神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这也是斯拉夫主义一贯倡导的原则和精神。

发扬俄罗斯宗教传统,弘扬俄罗斯民族精神,建构能与西方哲学平等对话、具有俄罗斯特色的哲学,并为俄罗斯人找到精神归宿,这是始终贯穿于俄罗斯宗教哲学研究的主题,也是其最终使命,探讨语言本质和功能问题是实现这一使命的重要途径之一。在当今时代,俄罗斯宗教哲学的这种理念对于我们建构属于自己的、具有民族特色的哲学体系不无借鉴作用,启示着我们将弘扬民族文化、坚持民族精神、捍卫民族语言作为哲学研究的重要范畴。

引用文献 [Words Cited]

- Alekseev, P. V. *Russian Philosophers in the XIX-XX Centuries: Biographies, Ideas, Works*. Book and Business, 1993. [Алексеев П. В. *Философы России XIX-XX столетий: Биографии, Идеи, Труды*. Книга и Бизнес, 1993.]
- Bezlepkin, N. I. *Philosophy of Language in Russia: To the History of Russian Linguistic Philosophy*. Art-St. Petersburg, 2002. [Безлепкин Н. И. *Философия Языка в России: к Истории Русской Лингвофилософии*. Искусство-СПб, 2002.]
- Florensky, P. A. "The Universal Roots of Idealism." *Symbol*, no. 11, 1984, pp. 171-93. [Флоренский П. А. "Общечеловеческие корни идеализма." *Символ*, №.11, 1984, стр. 171-93.]
- . *Philosophical Heritage of the Compositions of Florensky P. A.: In 4 Volumes. Vol.3*. Thought, 1999. [Флоренский П. А. *Философское наследие сочинения Флоренский П. А.: в 4 томах. т.3*. Мысль, 1999.]
- Gilyarov-Platonov, N. P. *Collection of Works, vol.1*. Moscow: Synodal Printing, 1899. [Гиляров-Платонов Н. П. *Сборник сочинений, Т. 1*. Москва: Синодальная типография, 1899.]
- . *Excursion to Russian Grammar*. K. P. Pobedonostsev, 1904. [Гиляров-Платонов Н. П. *Экскурсия в русскую грамматику*. Издание К. П. Победоносцева, 1904.]
- Карпов, V. N. "Philosophical Rationalism of Modern Time." *Christian Reading*, no. 3, 1860, pp. 288-326. [Карпов В. Н. "Философский Рационализм Новейшего Времени." *Христианское чтение*, №. 3, 1860, стр. 288-326.]
- Kudryavtsev-Platonov, V. D. "On the Unity of the Human Race." *Collection*, vol. 3, 1854, pp. 1-195. [Кудрявцев-Платонов В. Д. "О единстве рода человеческого." *Кудрявцев-Платонов В. Д. Соч.* Т.3. Вып.2, 1854, стр.1-195.]
- Leskin, D. Yu. *The Dispute about the Name of God - Philosophy of the Name in Russia in the Context of the Athos Events of the 1910s*. Aletheia, 2004. [Лескин Д. Ю. *Спор об Имени Божием - Философия имени в России в контексте афонских событий 1910-х гг.* Алетея, 2004.]
- . *Metaphysics of the Word and the Name in Russian Philosophy of Religion*. Lomonosov Moscow State University, 2006. [Лескин Д. Ю. *Метафизика слова и имени в русской религиозной философии*. Московский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ый университет имени М. В. Ломоносова, 2006.]

- Poltoratsky, N. P. "Russian Philosophy of Religion." *Questions of Philosophy*, no. 2, 1992, pp. 123-41. [Полторацкий Н. П. "Русская религиозная философия." *Вопросы философии*, № 2, 1992, стр. 123-41.]
- Solovyov, V. S. *Collection of works. Vol. 2*. Book Publishing Company "Enlightenment", 1911. [Соловьёв В. С. *Собр. соч.: В Ют. Т. 2*. Книгоиздательское Товарищество «Просвещение», 1911.]
- Shakhovskoy, N. V. "Gilyarov-Platonov N. P., Aksakov K. S." *Russian Review*, vol. 36, 1895, pp. 509-16. [Шаховской Н. В. "Гиляров-Платонов Н. П., Аксаков К. С." *Русское обозрение*, т.36, 1895, стр.509-16.]
- Wang, Jiezh. *Distant Brilliance: Russian Culture of the Silver Age*. Yilin Press, 2003. [汪介之:《远逝的光华: 白银时代的俄罗斯文化》。南京: 译林出版社, 2003。]
- Xiao, Jingyu. *Meta-Linguistics: A Study of Bakhtin's Philosophy of Language*. Shanghai People's Publishing, 2007. [萧净宇:《超越语言学——巴赫金语言哲学研究》。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7。]
- Xiao, Jingyu, and Hua Huo. "The School of Language Ontology in the History of Russian Philosophy of Language." *Russian Studies*, no. 2, 2007, pp. 89-92. [萧净宇、霍花:《俄国语言哲学史上的语言本体论流派》, 载《俄罗斯研究》2007年第2期, 第89-92页。]
- Yurkevich, P. D. *Philosophical Works*. "Truth" Press, 1990. [Юркевич П.Д. *Философские произведения*.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Правда», 1990.]
- Zamaleev, A. F. *History of Russian Philosophy*. Philosophy Faculty of St. Petersburg State University, 2012. [Замалеев А. Ф. *История Русской Философии*. Изд-во филос. ф-та СПбГУ, 2012.]
- Zhang, Baichun. "Tradition of Russian Philosophy of Religion." *Social Science Journal*, no. 4, 2006, pp. 4-9. [张百春:《论俄国宗教哲学传统》, 载《社会科学辑刊》2006年第4期, 第4-9页。]

◇责任编辑: 吴晋先

基于语料库的“V+down”构式搭配分析及语义映射

◎ 刘国兵 张莫晗

内容提要:本研究基于美国当代英语语料库(COCA),采用构式搭配分析法中的共现词素分析法对“V+down”构式中进入V槽的动词与该构式之间的关联强度进行分析,考察共现动词的语义聚类,从而探究该构式的语义映射。研究发现:(1)“V+down”构式多表示空间运动或消极的结果状态;(2)“V+down”构式的原型语义是“向下运动义”,通过隐喻机制将其语义从空间域映射到社会域、心理域和生理域,使该构式具有了丰富的隐喻义。该研究是对构式搭配分析法的进一步应用,对“动词+小品词”构式教学具有一定启发作用。

关键词:“V+down”构式 构式搭配分析法 构式义

中图分类号: G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6-4366 (2023) 01-0127-10

基金项目:河南省重点研发与推广软科学项目(222400410043);河南省高等教育教学改革研究与实践项目(2021SJGLX056Y)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河南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河南 新乡 453007

DOI: 10.19967/j.cnki.flc.2023.01.012

Title: A Collostructional Analysis of “V+down” Construction and Its Semantic Mapping: A Corpus-Based Approach

Abstract: Based on COCA corpus analysis and constructional analysis, the study first checks collostructional strength of the verbs in “V+down”, then examines the semantic clustering of these co-occurring verbs and semantic mapping of this construction. The main findings show that: (1) most of the verbs occurring in the “V+down” construction represent spatial motion or a bad result state; (2) the prototypical semantics of “V+down” construction is “to move downward”, and its semantic extensions are realized by metaphorical mapping from the spatial domain to the social, psychological and the physical domain, so that the construction has rich metaphorical meanings. The collostructional analysis of “V+down” construction and its cognitive semantic research using corpus-based approach is a further application of the collostructional analysis method. Furthermore, it is enlightening for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in the “verb-particle” construction.

Keywords: “V+down” construction, Collostructional Analysis, constructional meaning

Authors: Guobing Liu, Professor, Faculty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Henan Normal University, Xinxiang, Henan, China; Mohan Zhang, Ph.D. Candidate, Faculty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Henan Normal University, Xinxiang, Henan, China.

戈德伯格 (A. E. Goldberg) 认为某一语言形式, 若其形式或功能的某些部分不能严格地从其组成成分或已知的结构中获得, 就可以称为一个“构式”(4)。在构式语法研究范畴中, 研究者探索各种构式的中心语义, 词素与构式之间的语义关联和互动关系, 以及构式与构式之间的范畴化关系(陈佳 23)。在构式语法研究尚未运用语料库工具之前, 戈德伯格等学者多是利用内省的方法探寻构式意义。随着语料库语言学的兴起, 一些学者开始尝试用语料库方法研究构式。但截至目前, 基于语料库的方法对搭配强度的分析十分有限, 且主要是对于词汇搭配强度的分析, 如分别用 t 值和卡方值的统计标准, 对词汇搭配强度进行计算分析 (Church et al. 115-64; Dunning 61-74)。以上统计方法的缺点有二: 一是当分析低频语言构式时, 这些检验方法通常会高估或者低估 p 值, 造成统计结果不准确; 二是自然语料很难满足这些统计检验方法要求的分布正态性(胡健、张佳易 62; 房印杰 426)。就此问题, 史蒂芬维策斯 (Anatol Stefanowitsch) 和格里斯 (S. T. Gries) 以认知语言学的构式语法为理论框架, 开发出了一种新的概率统计方法——构式搭配分析法 (Collostructional Analysis)。该方法以费舍尔精确检验 (Fisher exact test) 测定词语间共现关系, 无需考虑样本容量, 弥补了前者的不足, 较上述其他方法具有理论优势。

“动词+小品词”结构 (verb-particle construction) 是英语中广为使用的结构之一, 其形式虽简单, 语义和用法却较为复杂, 一直是语言学界研究的热点(刘梅丽、王文斌 49)。语言学家认为, 人类的范畴、概念、语言等与人类和空间环境的互动感知体验密切相关(王寅, 《构式语法研究》443), 因此对语言中表示空间关系的介词做深入而系统的研究很有必要。已有研究多采用内省法探讨该构式的认知语义和语义延伸 (Lakoff, *Women* 269-303; 王寅, 《认知语言学》180-87), 通过语料库等实证方法考察该构式动词槽位语义聚类研究较少。本研究以“V+down”构式为研究对象, 基于美国当代英语语料库 (Corpus of Contemporary American English, 之后简称 COCA), 采用共现词素分析法, 对进入目标构式 V 槽的动词与该构式之间的关联强度进行分析, 考察高频共现动词的语义聚类, 从而探讨“V+down”构式的认知语义。

一、文献综述

张伯江将构式语法介绍到中国, 运用构式语法理论探讨现代汉语的双及物结构, 为汉语研究提供了全新视角(175-84)。王寅系统阐述了国外构式语法的基本理论与观点, 并加以语料实例进行分析(《认知语言学》313-42)。刘正光收集了中国构式语法研究初期所取得的一些重要成果, 从认知视角提供了解决问题的新观点和新方法(3-129)。但这些研究多是通过内省的方法探寻语言构式意义及用法。随着语料库语言学的兴起, 一些学者开始尝试将语料库的方法运用到构式研究中, 取得了丰富的成果。史蒂芬维策斯、格里斯在构式语法框架的基础上提出“构式搭配分析法”, 该方法是语料库语言学与认知语言学结合发展的重要成果(209-43)。王仁强、

陈和敏基于英国国家语料库等5个大型语料库,对动词与构式的关系问题进行研究(19-31)。

近年来,构式搭配分析法得到了越来越多国内学者的关注。胡健、张佳易对该分析法进行了详细阐述,分析了共现词素分析法(Collexeme Analysis)、(多项)显著共现词素分析法([Multiple] Distinctive Collexeme Analysis)以及共变共现词素分析法(Covarying Collexeme Analysis)的应用(61-69)。之后越来越多的学者运用该方法对构式进行研究,研究成果大致可分为两类:一类是以形容词为考察对象,如陈佳考察了“COME/GO+ADJ”构式中共现形容词的语义聚类,发现该构式的核心语义为“状态变化的结果义”,通过隐喻联接机制可拓展出其他概念义(23-30)。邵斌等运用共现词素分析法和多项显著共现词素分析法,比较了6个近义极强词与形容词搭配使用的差异(379-91)。另一类是以动词为考察对象,如刘国兵、彭梦月对汉语轻动词构式“进行/加以+动词”中的动词词素特征进行归纳,并总结“进行”和“加以”的语义特点,得出“进行”如与持续性动词搭配,与之搭配的动词多含书面语特征,而“加以”和不可持续性动词搭配,动词会带有明显的感情色彩,即褒贬义(5-15)。

“动词+小品词”构式是英语中较为常用的动词性结构之一,因此被学界广泛关注。王寅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归纳出英语小品词over所具有的“上方运动”“覆盖关系”“静态居上”和“路径终点”4种基本意象图式以说明意义扩展的认知过程,认为over的原型意象图式通过隐喻形成了一个辐射性范畴(《认知语言学》181-86)。刘梅丽、王文斌从认知语义视角,考察了“V+up”结构在不同认知域中的语义,发现该结构的语义延伸主要通过隐喻、转喻等机制来实现(49-53)。杨莎莎研究了“V(a)round”构式中的动词与构式的搭配强度,分析此类动词的语义聚类,并指出构式搭配强度的分析对外语教学具有重要意义(336-41)。陈泽南、张雪梅考察了“V+up”构式显著吸引动词的语义聚类,进而结合原型范畴理论探讨该构式的原型语义和延伸语义,发现“V+up”构式倾向于与表示动态变化的动词共现,其中既包括物理空间中的变化,也包括数量域、社会域、心理域等概念空间中的变化(30-43)。国内有关“V+up”构式的研究成果较为丰富,但与之相对的“V+down”构式研究不多,目前仅有李瑛以“V+down”构式为例研究词汇压制(44-49),还有刘馨璐对出现在该构式中频率最高的前200个动词进行认知语义研究(26-47)。以上研究选取研究对象时仅以动词出现频率为依据,没有考虑到动词与构式之间的搭配强度,因此研究方法有待改进。

纵观学界对于“V+down”构式的研究,可以总结出以下特点:(1)传统英语教学中,“V+down”构式被当作英语固定搭配,其中蕴含的概念隐喻义没有被挖掘,这就导致英语学习者在习得该构式时容易出现偏误;(2)前人对“V+down”构式的研究多运用内省法,缺乏大量真实语料数据的支撑;(3)前人较少使用搭配强度等计算方法分析该构式中动词词项与构式之间的搭配关系,研究方法有待改进。针对以上不足,本研究基于COCA,采用构式搭配分析法中的共现词素分析法归纳“V+down”构式显著吸引动词的语义聚类,进一步探究该构式的构式义,以期为该构式的教学实践提供借鉴意义。

二、研究设计

(一) 研究问题

本研究拟回答以下三个问题：

“V+down” 构式中动词槽位吸引的词素有哪些？

“V+down” 构式中动词槽位吸引的词素有何语义特征？

“V+down” 构式是怎样进行语义映射的？

(二) 语料来源

本研究的语料来源于 COCA。该语料库是当今世界上最大的在线免费英语平衡语料库，由美国杨百翰大学语言学教授戴维斯(Mark Davies)创建。COCA 包含了 1990 年以来的美国英语，涵盖口语、小说、杂志、报纸和学术文本等 5 大语类。

(三) 研究方法

本研究采用构式搭配分析法，针对不同的研究目的和对象，该分析方法类型呈现不同的变化。本研究将运用其中的共现词素分析法，计算出出现在“V+down” 构式动词槽位的词素与该构式的搭配强度。

研究包括以下几个步骤。首先，对研究所需频数进行统计。史蒂芬维策斯和格里斯认为，采用共现词素分析法计算某特定词项L与某一特定构式C之间的构式搭配强度，需要四个频数（见表1中a、b、c、d）。四个频数中只有频数a可以通过语料库检索直接得出，b、c、d则需要借助该词项在所有构式中出现的总频数X、目标构式出现的总频数M，以及所有构式出现的总频数W计算得出（218-19）。由于构式“V+down” 是以动词为中心的构式，所以总频数应为所有动词出现的频数。本研究中，M值通过检索式“VERB down” 在COCA中检索获得；词项在所有构式中出现的总频数X等于该动词在语料库中出现的总频数；所有构式出现的频数W则等于所有动词出现的频数。

表1 共现词素分析法所需的频数数据（胡健、张佳易 63）

| | 词项 L | 词项非 L | 总频数 |
|-------|-------------|-------------|---------------------|
| 构式 C | a | c | $a + c = M$ |
| 非构式 C | b | d | $b + d = N$ |
| 总频数 | $a + b = X$ | $c + d = Y$ | $W = M + N = X + Y$ |

经语料库检索后，利用费舍尔精确检验工具进行搭配强度检验，当p值<0.05时，词项与构式之间的相关关系达到统计学意义上的显著水平。以“go down” 为例，通过检索表达式“[go] _vv down” 获得“go” 作为动词出现在该构式中的频数a，其余频数通过计算获得（见

表 2)。将表 2 中带“*”的 4 项数值代入费舍尔精确检验工具表中进行精确检验, 得到 p 值 < 0.001 。因此可判断, 动词“go”与构式“V+down”有着十分显著的关联意义。经过检验发现, 目标词项出现在目标构式中的频数并不完全与搭配强度存在强对应关系, 因此本研究先确定了与“V+down”构式存在显著关联意义的动词 (p 值 < 0.001), 再选取频数排在前 30 位的动词词素进行语义归类和分析, 从而确定进入构式 V 槽中动词的语义分类及构式义。

表 2 “go”出现于“V+down”构式的相关数据分析

| | go | 非go | 每行总数 |
|------|----------|------------|-----------|
| 构式 | 47224* | 490997* | 538221 |
| 非构式 | 3499508* | 104780618* | 108280126 |
| 每列总数 | 3546732 | 105271615 | 108818347 |

三、结果与讨论

(一) 共现词素分析法

首先通过 COCA 检索, 之后逐条进行人工剔除。由于目标词项出现在目标构式中的频数并不完全与搭配强度存在强对应关系, 如“get down”出现的频数高达 14105 次, 在所有“V+down”构式中排在第九位, 但经过费舍尔精确检验后其 p 值 > 0.05 , 即 get 与“V+down”构式的搭配强度很低, 因而此处提取与该构式呈现显著相关关系且频数最高的前 30 个动词词素 (见表 3)。

表 3 “V+down”构式高频动词搭配

| 序号 | 词素 | 频数 | 序号 | 词素 | 频数 |
|----|--------|-------|----|-------|------|
| 1 | go | 47224 | 16 | step | 6232 |
| 2 | sit | 46922 | 17 | bring | 6196 |
| 3 | come | 36826 | 18 | fall | 6074 |
| 4 | shut | 18668 | 19 | cut | 5812 |
| 5 | look | 18627 | 20 | lie | 5492 |
| 6 | break | 16917 | 21 | track | 4888 |
| 7 | slow | 15463 | 22 | shoot | 4593 |
| 8 | calm | 11968 | 23 | drive | 3860 |
| 9 | walk | 9645 | 24 | tear | 3769 |
| 10 | lay | 9012 | 25 | close | 3216 |
| 11 | put | 8396 | 26 | boil | 3212 |
| 12 | turn | 7787 | 27 | burn | 3135 |
| 13 | run | 7185 | 28 | pull | 3088 |
| 14 | settle | 6474 | 29 | knock | 3018 |
| 15 | write | 6470 | 30 | head | 3016 |

（二）基于数据分析结果的动词语义聚类

通过对进入构式的典型动词进行语义分类，发现这些动词多为单音节动词，且多为描述自然发生的简单动作。但这些动词的语义广泛，进入到不同构式中常表示不同语义。基于莱文(B. Levin)的动词语义分类，这些动词可分为动态义动词和静态义动词两大类(111-313)。其中动态义动词主要包括运动动词(如go, come, run, walk, fall等)、状态变化类动词(如break, slow, boil等)、放置动词(如lay, put, lie等)、创造转变动词(如head, turn等)和碰撞接触动词(如cut, strike, knock等)；静态义动词主要包括视觉动词(如look等)和心理动词(如calm等)。被“V+down”构式显著吸引的动词大部分具有明显的动态变化义，如运动动词、状态变化动词、放置动词、碰撞接触动词等，它们是否具有共性是需要思考的问题。进入“V+down”构式中的动词词义广泛，它们在构式中所表示的概念语义主要归纳为三类，以下为COCA中的实例。

一是表示动作的结果：

(1) He lost to a fricking community organizer, who will *go down* in history as the worst president this nation ever had.

(2) Once you have your goals *written down*, talk to the right people about them.

分析以上例句可以发现，例(1)中“go”这一运动动词进入到构式后不再表示“去、走”等动作本身的意义，这里的“go down in history”可理解为中文的“载入史册”，是表示“载入”这一结果状态。例(2)中的“write”在构式中同样表示“写下、记下”这一结果。同理，诸如创造转变动词、碰撞接触动词和所属变化类的动态义动词进入构式后都强调动作的结果。如“turn down”表示关小、调小的结果，“strike down”多用于表示击败或杀死。

二是表示运动的路径：

(3) It is a separate room from the neat area when you first *come down* the stairs.

(4) It took much too long for fighter Jets to scramble and so, they were unable to *shoot down* hi-jacked planes.

以上两个例句中的动词具有不同的动态义，“come”是运动动词，而“shoot”是发射动词，但出现在“V+down”这一构式中便都具有了强调该动作路径的语义。例(3)中的“come”表示由远及近的运动，而“down”一词指明了该运动是“向下”移动。例(4)中的“shoot”在该构式中的语义注重强调将高处事物击落，其运动轨迹为自上而下。因此“shoot down”在句子中多用于形容击落飞机、卫星、火箭等位于空间域上方的事物。

三是表示动作持续的状态：

(5) I set up a thing in my studio where I had a very comfortable bed to lie on and I put speakers at each side of the pillow so I could *lie down* and be inside this piece of music.

(6) It may be that in spite of eating does not come quickly to calm, *calm down* when you feel that your stomach is full.

放置动词 lie 和心理状态动词 calm 都属于动态义动词, 但进入到构式之后具有了强调状态的保持的含义。除动态义动词外, 大多数静态义动词进入构式后也表示动作持续的状态。比如, 视觉动词 look 进入构式后, look down 便多了轻视、瞧不起的意思。

(三) “V+down” 构式的语义映射

通过前文的研究可知, down 的含义与 up 相反, 其字面含义为向下移动, 即从高处移动到低处。因此, “V+down” 构式的典型语义表示一种自上而下的动态变化。除此之外, 该构式还有毁坏 (如 pull down、run down), 减少 (如 turn down、come down、bring down), 压制 (如 keep down、break down), 打败 (如 put down、stare down), 固定 (如 tie down、nail down) 等非典型语义。上述意义共同构成该构式的语义集合。变化义具有较多的下义层次, 且过于抽象, 难以向上不断扩展出上义层次, 因而不能作为该构式语义集合中的原型成员 (陈泽南、张雪梅 36)。绪可望、杨忠曾在研究 “V+up” 构式空间关系时发现, “英语中的 ‘V+up’ 构式可以被视为是一个原型范畴集合, 范畴中的原型成员是那些表达具体空间关系概念的语式” (27)。由此可以推断, “V+down” 构式语义的基本层次可理解为 “某事物空间运动义或空间位置变化义”, 其原型语义为 “向下运动义”。除该原型语义外, 我们参照《牛津短语动词词典》中 down 的义项, 归纳出 “V+down” 构式除原型语义外的主要拓展语义 (见表 4)。

表 4 “V+down” 构式的原型语义和延伸语义

| 原型语义 | 拓展语义 | 构式实例 |
|-------|-------------------|---|
| 向下运动义 | (数量、程度、地位) 减少/减弱义 | turn down, bring down, calm down, come down, cut down, slow down, step down |
| | 完成义 | settle down, write down, boil down, track down |
| | 破坏义 | knock down, run down, shoot down, burn down, pull down |
| | 失败义 | break down, fall down, shut down, close down, head down |
| | 向下施力义 | put down, tear down, drive down |
| | 延续义 | walk down |
| | 静态义 | lie down, lay down, look down |

观察表中 “V+down” 构式的主要延伸语义可知, 该构式多表达消极含义, 这与莱考夫 (George Lakoff) 和约翰逊 (Mark Johnson) 提出的关于 down 一词具有的方位隐喻含义大致相同 (15-21)。由此可知, 隐喻是该构式的构式语义拓展的基本方式之一。隐喻的认知机制可以理解为, 一个概念域经过认知和推理, 系统且对应地映合到另一个概念域, 抽象性的语义主要是以空间概念为基础跨域隐喻而成 (王寅, 《认知语言学》305)。“V+down” 构式之所以延伸出了非原型范畴的语义, 主要归结于 down 从原始的空间概念拓展到非空间概念, 在拓展过程中始终以空间方位原型为认知参照点, 以隐喻为认知机制, 进而形成一系列非中心的、抽象的语义项。隐喻使该构式的语义从空间域映射到社会域、心理域、生理域等非空间域, 以

下为COCA中的例子。

(7) We used to *go down* to the boardwalk all the time when we were kids. (空间域)

(8) The New York region's transit systems may *shut down* Sunday evening. (社会域)

(9) What I'm really doing is forcing myself to *slow down* my thought processes. (心理域)

(10) I couldn't *lie down* on the bed. (生理域)

结合“V+down”构式的延伸语义以及进入该构式动词的语义聚类,可进一步分析上述例句。例(7)中“V+down”构式的语义为空间域,并且具有趋向义,强调动作运动的过程,因此该构式的语义可细化为“空间趋向义”。例(8)中“V+down”构式的语义不再是空间域,而是社会域,强调动作发生后的结果,因此可概括为“社会结果域”。例(9)中“V+down”构式的语义延伸为心理域语义,并且强调动作发生的过程,因此该构式语义可概括为“心理趋向域”。同理,例(10)中“V+down”构式在此处具有“生理结果义”。概括地来看,通过考察“V+down”结构的语义并依据认知域概念,其语义可划分为空间域、社会域、心理域以及生理域,其中每个认知域的语义大致可再分为趋向义和结果义两类。

本研究基于COCA,采用构式搭配分析法中的共现词素分析法对“V+down”构式中进入V槽的动词与该构式之间的关联强度进行分析。通过定性和定量相结合的方法,对与构式具有强烈互动关系的动词进行语义聚类,进而探究该构式的构式义。研究发现,进入“V+down”构式V槽的动词多描述自然中发生的简单动作,可分为运动动词、状态变化类动词、放置动词、创造转变动词、碰撞接触动词、所属变化动词、发送携带动词、存在动词、心理动词等。动词进入到该构式后表达的概念语义可大致分为三类:(1)表示动作的结果;(2)表示动作的路径;(3)表示动作持续的状态。同时,当表示结果状态时多具有消极含义。“V+down”构式的原型语义是“向下运动义”,通过隐喻机制将其语义从空间域映射到社会域、心理域和社会域,使该构式具有了丰富的延伸语义。

基于语料库的“V+down”构式搭配分析及其语义映射研究不仅有助于探究该构式的构式义,也是对构式搭配分析法的拓展和应用,对我国外语教学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外语教学可以尝试以构式为单位,将主动加工的学习过程同认知教学法相结合,提高学习者主动解决问题的能力,强化学生的隐喻思维意识,培养抽象思维能力及创新意识。此外,外语教学过程可以以大型语料库为辅助,通过语料库进行数据及索引行分析,从而更科学有效地归纳出构式语义的方法。限于课堂教学时间,教师可能无法当堂演示这一系列的操作,但可以将操作方法传授给学生,学生课下进行操练,这样也有助于培养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

引用文献 [Works Cited]

- Chen, Jia. "A Corpus Based Study on Collostructional Strength and Constructional Categorization of 'COME/GO + ADJ' Constructions." *Journal of PLA University of Foreign Languages*, vol. 38, no. 3, 2015, pp. 23-30. [陈佳:《基于语料库的“COME/GO+形容词”构式搭配关联强度与构式范畴化关系研究》,载《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2015年第38卷第3期,第23-30页。]
- Chen, Zenan, and Xuemei Zhang. "A Collostructional Analysis of 'V+up' Construction and the Study of Its Semantic Extension: A Corpus-based Approach." *Corpus Linguistics*, vol. 8, no. 1, 2021, pp. 30-40, 164. [陈泽南、张雪梅:《基于语料库的“V+up”构式搭配分析与构式语义延伸探究》,载《语料库语言学》2021年第8卷第1期,第30-43,164页。]
- Church, K. W., et al. "Using Statistics in Lexical Analysis." *Lexical Acquisition: Exploiting On-line Resources to Build up a Lexicon*, edited by Uri Zernik, Lawrence Erlbaum, 1991, pp. 115-64.
- Dunning, T. "Accurate Methods for the Statistics of Surprise and Coincidence." *Computational Linguistics*, vol. 19, no. 1, 1993, pp. 61-74.
- Fang, Yinjie. "Collostructional Analysis: A State of the Art Review." *Modern Foreign Languages*, vol. 41, no. 3, 2018, pp. 425-35. [房印杰:《搭配构式分析——应用与发展》,载《现代外语》2018年第41卷第3期,第425-35页。]
- Goldberg, A. E. *Constructions: A Construction Grammar Approach to Argument Structure*. U of Chicago P, 1995.
- Hu, Jian, and Jiayi Zhang. "Collostructional Analysis: An Integration of Cognitive Linguistics and Corpus Linguistics." *Journal of Foreign Languages*, vol. 35, no. 4, pp. 61-69. [胡健、张佳易:《认知语言学与语料库语言学的结合:构式搭配分析法》,载《外国语(上海外国语大学学报)》2012年第35卷第4期,第61-69页。]
- Lakoff, G., and M. Johnson. *Metaphor We Live By*. U of Chicago P, 1980.
- Lakoff, G. *Women, Fire, and Dangerous Things: What Categories Reveal about the Mind*. U of Chicago P, 1987.
- Levin, B. *English Verb Classes and Alternations: A Preliminary Investigation*. U of Chicago P, 1993.
- Li, Ying. "Word Coercion: A Case Study of V+down Construction." *Foreign Languages and Literature*, vol. 27, no. 5, 2011, pp. 44-49. [李瑛:《词汇压制:以V+down构式的个案分析为例》,载《外国语文》2011年第27卷第5期,第44-49页。]
- Liu, Guobing, and Mengyue Peng. "A Corpus-Based Study of Chinese Light Verb Constructions." *Corpus Linguistics*, vol. 8, no. 1, 2018, pp. 5-15, 163. [刘国兵、彭梦月:《汉语轻动词构式“进行/加以+动词”的语料库研究》,载《语料库语言学》2021年第8卷第1期,第5-15,163页。]
- Liu, Meili, and Wenbin Wang. "A Cognitive Semantic Approach to the Meanings of the 'V+up' Construction in English." *Foreign Language Research*, no. 1, 2016, pp. 49-53. [刘梅丽、王文斌:《英语“V+up”结构的认知语义研究》,载《外语学刊》2016年第1期,第49-53页。]
- Liu, Xinlu. *A Cognitive Semantic Study of English "V+down" Construction*. Thesis. Northeast Normal University, 2018. [刘馨璐:《英语“V+down”构式的认知语义研究》。硕士学位论文,东北师范大学,2018。]
- Liu, Zhenguang, editor. *Study of Construction Grammars*.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2011. [刘正光编:《构式语法研究》。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11。]
- Shao, Bin, et al. "A Collostructional Analysis of English Amplifiers and the Visualization of Their Semantic Distances."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vol. 49, no. 3, 2017, pp. 379-91, 480. [邵斌等:《英语强化词的构式搭配分析及其可视化研究》,载《外语教学与研究》2017年第49卷第3期,第379-91,480页。]
- Stefanowitsch, A., and S. T. Gries. "Collostructions: Investigating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Words and Construction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orpus Linguistics*, vol. 8, no. 2, 2003, pp. 209-43.
- Wang, Renqiang, and Hemin Chen. "A Corpus-based Study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Verbs and Constructions: The Conventionalization of Transitive sneeze."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vol. 46, no. 1, 2014, pp. 19-31, 158. [王仁强、陈和敏:《基于语料库的动词与构式关系研究——以sneeze及物动词用法的规约化为例》,载《外语教学与研究》2014年第46卷第1期,第19-31,158页。]

- Wang, Yin. *Cognitive Linguistics*.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2007. [王寅:《认知语言学》。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7。]
- . *Researches on Construction Grammar (Vol.1): The Theoretical Exploration*.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2011. [王寅:《构式语法研究(上卷):理论思索》。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11。]
- Xu, Kewang, and Zhong Yang. "Research on Space Constructions: A Constructional Analysis of 'V+up.'" *Foreign Languages and Their Teaching*, no. 4, 2014, pp. 26-31. [绪可望、杨忠:《空间关系构式研究——以英语V+up构式为例》,载《外语与外语教学》2014年第4期,第26-31页。]
- Yang, Shasha. "Study on Collostructional Strength of 'V(a)round' Construction and Semantic Clustering of 'V' Verb Based on Corpus." *Journal of Zhejiang Sci-Tech University (Social Sciences)*, vol. 38, no. 4, 2017, pp. 336-41. [杨莎莎:《基于语料库的“V(a)round”构式搭配关联强度及动词“V”语义聚类研究》载《浙江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38卷第4期,第336-41页。]
- Zhang, Bojiang. "Study of Ditransitive Construction in the Modern Chinese." *Studies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no. 3, 1999, pp. 175-84. [张伯江:《现代汉语的双及物结构式》,载《中国语文》1999年第3期,第175-84页。]

◇责任编辑:马妮娅

FLC

外语基础教育

高中英语学科大观念的概念辨析及建构路径

◎ 张智义 刘斌河

内容提要: 大观念的提出与流行掀起了新时代教学改革的热潮。本文从哲学观念、教学观念和学科观念着手梳理学科大观念的发展脉络, 概括大观念特征, 并依据其他学科大观念的研究成果, 借助地理学科大观念的知识体系、具体情境、实际功用, 语文学科的形式与内容、语言与思维两组关系, 对高中英语学科大观念进行了明确界定。在此基础上, 针对既往单一的大观念建构路径单元整体教学, 提出了较为多元的建构路径: 一是要进一步加强对语言知识技能的系统指导, 增强学生的元认知能力; 二是在系列语篇的基础上强化大观念建构; 三是坚持英语学习活动观, 增强大观念的情境性、实践性和实用性。

关键词: 大观念 英语教学 高中英语

中图分类号: G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6-4366 (2023) 01-0137-11

基金项目: 江苏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赵元任语言思想研究”(21YYB005) 阶段性成果; 江苏省教育科学十三五规划项目“高品质高中建设标准观照下学校教育质量监测实践研究(D/2020/02/236) 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 南京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 江苏 南京 210023; 江苏姜堰中学, 江苏 泰州 225500

DOI: 10.19967/j.cnki.flc.2023.01.013

Title: The Conceptual Distinction and Route Construction of the Disciplinary Big Concept for Senior High School English Course

Abstract: The proposing and prevailing of the disciplinary big concept initiate a big wave of teaching reformation for the new era. The present study first analyzes the development of the big concept from philosophical, pedagogical as well as disciplinary perspectives and derives its defining features. Based on the academic achievements of other subjects, especially the knowledge system, specific context and practical function of geographical big concept, as well as the relation between form and content, language and thought of Chinese big concept, the present study clearly defines the disciplinary big concept for senior high school English course. Starting from this definition, the present study, different from the single construction route of teaching unit as a whole, provides multiple construction routes, to enhance the students meta-cognitive ability by strengthening the systematic instruction of language knowledge and skill as the first route; to improve the big concept construction on the basis of a series of units as the second and to highlight the contextual, experimental and practical features by sticking to the idea that English learning is an activity as the last.

Keywords: big concept, English teaching and learning, senior high school English course

Author: Zhiyi Zhang, Professor,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Nanjing Normal University, Nanjing, Jiangsu, China; Binhe Liu, Senior Teacher, Jiangyan Senior High School, Taizhou, Jiangsu, China.

信息时代知识的爆炸性增长和技术的飞跃式发展对基础教育提出了新的要求。为应对这些要求,学科大观念应运而生。既有理论和实证研究表明,基于学科大观念的课程教学有助于学生在知识整合的基础上,构建有结构、有联系的知识体系,提升知识掌握度和应用度。我国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特别是高中学段的课程改革,也将大观念作为学科教学的基本理念写入课程标准。如《普通高中课程标准(2017年版2020年修订)》(以下简称《新课标》),首次使用了大概念(等同于大观念),明确了高中课程要重视以学科大概念为核心,使课程内容结构化;以主题为引领,使课程内容情境化;促进学科核心素养的落实。结合新课标的大观念,众多专家学者围绕高中英语学科大观念进行了研究,取得了较多成果。但已有研究也有一些不足,主要表现在从概念辨析角度看,高中英语学科的大观念构建缺乏跨学科的比较融通,因此在概念辨析层面有待进一步明晰;从路径建构看,缺乏多元的路径。有鉴于此,本研究拟在系统梳理学科大观念的基础上,采用跨学科比较的办法,进一步对高中英语学科大观念进行概念辨析,并以此为前提,拓展高中英语学科大观念的实施路径。

一、大观念和教育大观念

德国古典哲学创始人康德最早提出了观念这一表述,并区分了观点和概念。康德指出:“人类所有的认识都是以观察为起点,然后成了概念,最后以观念作为终站。”(544-45)在康德看来,观念是概念的概念,因此观念构成知识的最高形态。换言之,观念已经不是具体的作为概念的知识,而是由概念连接起来的知识体系。因此,观念反映了深刻的元知识性,体现出对知识的连接和组织。

而最早将观念这一称谓引入教育领域的是杜威(John Dewey)。早在1902年,杜威就指出,教师应该把知识“心理学化”,从而形成大观念,这样就可以摆脱既往教学中对具体事实和概念的偏执,培养学生对知识体系和学习过程进行反思的能力(Smith and Girod 301)。这其中,特别值得关注的是“心理学化”的称谓,这表明大观念的形成过程是一个认知和心理的过程。怀特海(A. N. Whitehead)进一步指出,教育中的大观念,就是通过关联将少而精的知识形成体系(142)。怀特海所谓的教育大观念实际就是强调知识的体系。

当代教育研究对大观念也多有论述,如埃里克森(H. Lynn Erickson)指出,大观念是对概念关系的表述,是指将离散的知识联系起来,抽象出具有深层含义的重要概念(36)。而克拉克(Edward T. Clark)提出,大观念是在理解和连接小概念的基础上形成的(148)。因此,

埃里克森和克拉克对于教育中大观念的阐释仍然是基于知识体系和知识点的辩证关系。而哈伦(Wynne Harlen)对于教育中大观念的阐释则更进一步,他指出,在教育理念层面,大观念是有组织、有结构的科学知识和模型,能对较大范围内的物体、事件和现象进行解释和预测(8-9)。

本研究认为,哈伦对教育大观念的界定,在大观念本体属性(即知识点系统整合)的基础上,阐释了构建大观念的目的,即将知识体系用于解释和预测。这种解释一方面符合科学的本体特征——在零散的现象基础上探求普遍的规律(类似大观念),同时通过掌握规律认识和改造世界。另一方面,这种对大观念的理解也更符合教育的本体特征。因为教育的本体就是引导和发展:引导学生构建知识体系,同时发展学生运用知识体系进行解释和预测的能力(李金辉 1-4)。

综观大观念从哲学理念到教育理念的转变,不难发现,教育大观念至少应该包含如下属性:首先是系统性,诸多教育领域的大观念研究都认定大观念是零散知识的系统建构;其次是心理性,大观念的构建过程本质上是认知和心理发展的产物,因此必须注重对大观念构建的心理阐释;最后是应用性,大观念构建是为了能够对现实世界进行解释和预测。接下来,我们将进一步分析学科大观念。

二、学科大观念

我们这里提到的学科大观念,包括两个层面的含义:一是从学科本体出发,即从宏观的学科教育层面入手研究大观念;另一个是从学科教学出发,即从微观的课程开发和教学设计层面入手研究大观念。

先看前者,基于学科本体的大观念源于布鲁纳(J. S. Bruner)倡导的学科结构运动。他认为,掌握学科结构就是在相信许多事物有意义且相互关联的前提下来理解该学科,习得学科结构就是学习理解事物是如何相互关联的(7-8)。在这一思想指导下,本世纪以来,陆续有研究者对不同学科的大观念进行了讨论。如哈伦编制了科学学科的大观念体系,明确了科学学科的14项大观念,并着重探讨了学科本体层面大观念的标准问题,即如何遴选大观念。他认为,作为学科本体的大观念,必须符合下列条件:首先,学科大观念必须对学科内的现象有足够的解释力;其次,学科大观念必须为理解学科内容提供基础;再次,学科大观念必须促进学生对学科知识的兴趣和动力;最后,学科大观念必须具备社会文化意义,即对社会发展和文化传承有意义(122)。与此同时,哈伦还讨论了学科大观念中“大”的标准问题。就学科本体而言,大观念所谓的“大”必须承载学科本体知识的主要内涵,但不能无限扩大,必须保持学科主体特色。如科学学科的14项大观念中,为生物学科设定的大观念就是“所有的生命体都在细胞结构的基础上构建”,生命体的结构是生物学科的主体,细胞是所有生物结构的基础,因此这一大观念在生物学科内具有普适意义,但并没有超越生物学科的本体特征(124)。

再看后者,有很多研究者和机构从教学设计和课程开发的角度分析了学科大观念。在教学

设计层面,威金斯(G. Wiggins)和麦克泰(J. McTighe)在《追求理解的教学设计》(*Understanding by Design*)一书中,认为学科理解的一个重要目标就是使学科“大观念”的含义成为现实,而学科大观念就是学科的概念、主题或问题,是学生要理清自己的学习内容并将学习迁移到新的课程和现实环境中,必须能够掌握重要的想法(233)。比安奇尼(J. A. Bianchini)认为,学科大观念或是学科的基本概念或方法,或是现实生活中的问题和困境,通过大观念设计教学,能够帮助学生与日常生活建立联系(40-43)。博克瑟(A. Boxer)认为,学科大观念是学生认识现实问题和困境的透镜(web)。无论是指引功能还是透镜功能,都要求在教学设计中引入学科大观念,优化教学的效果。在课程开发层面,加拿大哥伦比亚省科学和社会课程标准指出,学科大观念是用于组织学科知识的关键概念、原则和原理(Province of British Columbia web);而美国大学先修课程中的人文地理课程与考试框架则认为,学科大观念是抽象的概念或主题,是贯穿整个课程的线索。无论是前者的组织功能还是后者的贯穿功能,都表明课程开发者必须依据学科大观念来开发课程。综上,结合学科大观念分析不难发现,从学科本体角度看,学科大观念具有学科本体知识基础性和核心性的特征,是基础、核心的知识体系;从教学设计和课程开发看,学科大观念具有方法性和指引性的特征,即通过大观念的设计方法指引学生掌握学科知识。

下面,将进一步结合国内不同学科大观念的概念,分析高中英语学科大观念的内涵属性,并在此基础上分析高中英语学科大观念的建构路径。

三、高中英语学科大观念概念辨析

自大观念被纳入普通高中课程标准以来,我国高中学段许多学科对各自的学科大观念进行了概念辨析和跨学科的比较梳理,有助于明确高中英语学科大观念的内涵属性。

(一) 跨学科比较视野

迄今,高中学段的语文、数学、历史、物理、化学、地理、生物等都有涉及大观念内涵属性的研究。本文限于篇幅,只选取研究较深入的地理学科和跟英语关联度较大的语文学科加以分析。

相关研究对高中学段地理学科中的大观念进行了深入、系统的分析,对高中地理学科大观念做了明确界定,指出:“地理教师从启发学生与已有经验、真实世界建立联结以及指导教学实践的视角,对处于地理学科中心位置的地理学科概念、地理要素间的抽象关系[……]的一种情境化的理解,是要求学生通过地理课程学习养成的用于解释一定范围的地理现象、解决具体地理问题的心理框架。”(苏小兵 118)上述高中地理学科大观念内涵的界定,是对既有学科大观念的继承和发展。一方面,从知识的体系性和获知的心理性看,这一界定强调了大观念是学科概念和学科要素的抽象体系;另一方面,从知识的情境性和实用性看,其对学科大观念又做了一些发展。具体表现在:首先,大观念是基于情境的大观念,因此必须启发学

生与已有经验和真实世界建立联结，同时对于地理概念和地理要素的抽象关系，必须做出情境化的理解。以具体情境为例，依据“河水冲击河岸，河岸沙土滑入河水，河水变浊，而在下游30米，一个沙砾坝伸入河中”这一现实情境，可以构建“有些地质作用力会破坏地表形态，有些地质作用力则创造新的地表形态”这一高中地理学科大观念（120）。其次，大观念不仅具备传统意义上的解释、预测功能，也是解决具体地理问题的心理框架。

而就与英语学科属性相似的语文学科而言，既往研究对其学科大观念也进行了界定。如李卫东认为：“对于语文学科而言，最为核心的大观念是围绕‘内容和形式’的概念性关系和‘语言和思维’的概念性关系的理解，这是指向语文学科思想和学科思维的本体性的大观念。”（12）本研究认为，李卫东对语文学科“内容和形式”“语言和思维”大观念的界定，也是对学科大观念的发展，因为这一界定敏锐地捕捉到了语言类学科的特殊性，即语言是思维的工具。因此，在分析语言类学科的大观念时，一方面要注重作为工具的语言本体的知识体系，另一方面也要注重语言所承载的思维体系，而两者恰恰体现了作为形式的语言和作为内容的思维之间的辩证关系。作为形式的语言有自己的一套知识，而作为内容的思维恰恰是语言的应用维度。结合这两个高中学科大观念的界定，我们再来看高中英语学科大观念的内涵属性。

（二）高中英语学科大观念界定及内涵属性

陈则航教授曾指出，英语学科大观念应是英语学科最核心的内容，是上位的，是可迁移的（15）。同时，英语学科在本质上也是语言学科，借助上文对地理学科和语文学科大观念的界定，依据其中的系统性、心理性、实用性，还有内容和形式、语言与思维等核心概念，可以清晰界定英语学科大观念的内涵属性。本研究认为，高中英语学科大观念，是师生对英语语言知识（语音、词汇、语法、语篇）和英语语言技能（听说读写译）的一种情境化的心理构建，并通过教学，在英语知识和英语技能情境化的基础上，构建思维能力和文化意识的心理框架。

上述界定综合考察了学科大观念和英语学科的本体特征。学科大观念首先是学科知识的系统构建，而英语学科知识包括语言知识和语言技能，因此，语言知识和语言技能的系统构建是英语学科大观念的题中之义。我们在语言知识和语言技能层面加上了情境，主要是考虑到语言的交际目的：脱离了具体情境谈语言知识和语言技能，难以实现语言的交际目的。在学科知识系统构建的基础上，学科大观念还强调学科知识对现实问题的解释、预测和解决，即学科知识的实用性。而具体到英语学科，其实用性凸显为语言的工具性；语言是思维表达和文化遗产的工具，从这个意义上，我们认为高中英语学科大观念既是语言知识和技能的体系，也是思维能力和文化意识的心理框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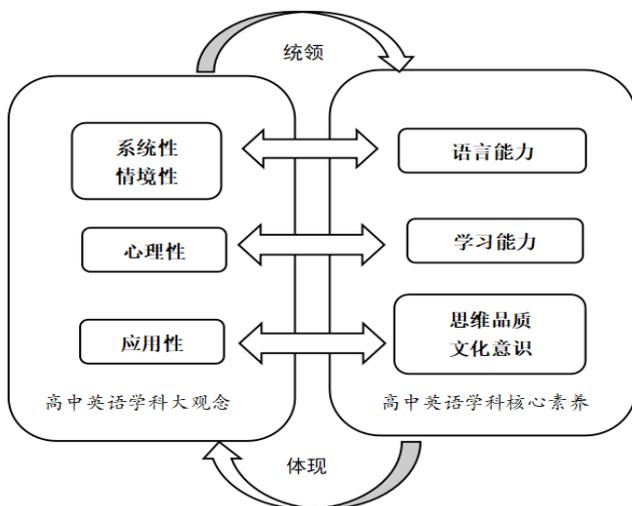
结合上述对高中英语学科大观念的界定，我们认为，高中英语学科大观念具有如下内涵属性：系统性，体现在语言知识和语言技能的综合体系；情境性，体现在语言知识和技能必须依赖情境构建；应用性，体现在语言知识技能体系的构建对思维发展和文化遗产的作用；心理性，体现在无论是语言知识和语言技能的体系建构还是实际应用，均是认知和心理的过程，

体现为心理构建和心理框架。下面,将结合高中英语学科大观念的构建分析大观念和《新课标》的关联与契合。

四、高中英语学科大观念与《新课标》的联系

(一) 高中英语学科大观念之于核心素养

众所周知,《新课标》在总论中明确了以学科大观念为核心的要求,而《新课标》在高中英语课程的属性界定中,明确“普通高中英语课程是高中阶段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发展英语学科核心素养、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的基础文化课程”(教育部 1)。既往研究指出,英语学科大观念是落实核心素养的重要抓手,也是核心素养的概念锚点(王蕾、孙万磊等 13)。本研究认为,在高中英语学科理念层面,英语学科大观念和英语学科核心素养相辅相成,前者统领后者,后者体现前者,如图 1。



▲图 1 高中英语学科大观念与核心素养之间的关系

具体来看,高中英语《新课标》明确了语言能力、文化意识、思维品质和学习能力四位一体的英语学科核心素养,这是对既往单纯强调综合语言能力的纠偏。而四位一体的学科核心素养构成,正是对学科大观念的具体实现。其中的语言能力是指在社会情境中,以听、说、读、写、看等方式理解和表达意义的能力,以及在学习和使用语言的过程中形成的语言意识和语感。这体现了学科大观念中作为基础的语言知识和语言能力体系要素。同时,这也十分强调语言的社会情境性,体现了学科大观念的系统性和情境性特征。学习能力指学生积极运用和主动调适英语学习策略、拓宽英语学习渠道、努力提升英语学习效率的意识和能力。学习能力系统反应学生在语言知识和能力体系学习中的心智发展,这体现了学科大观念中的心理性特征。思维品质指思维在逻辑性、批判性和创新性等方面所表现出的能力和水平。文化意识指对中外文化的理

解和对优秀文化的认同，是学生在全球化背景下表现出的跨文化认知、态度和行为取向。这两个维度又恰恰是语言工具的两个主要功能，体现了学科大观念的应用性特征。因此，我们认为，《新课标》中核心素养的设定，显示了学科大观念的核心和统领作用。

（二）高中英语学科大观念之于课程结构与内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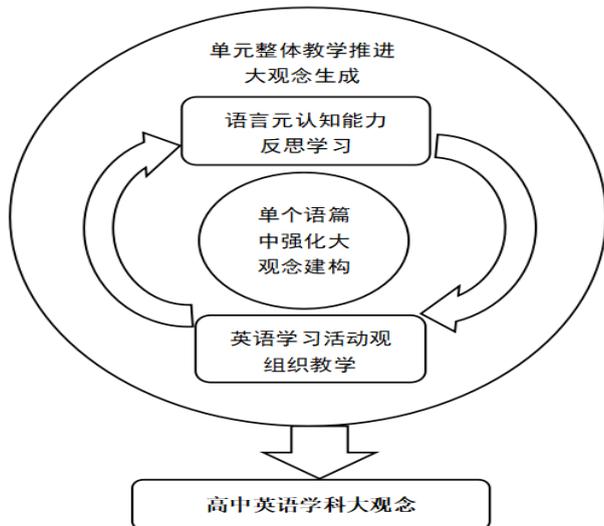
如果说，核心素养在学科本体层面体现了学科大观念，那么新课标中关于课程结构、课程内容的设定，则在课程开发和课程设计角度体现了学科大观念。比如，《新课标》中对课程结构做了必修、选择性必修和选修的三级课程管理框架。其中的必修课程主要指向学科大观念中语言知识和语言能力的系统构建，选择性必修课程则体现了学科大观念中心理架构的梯度性，因为《新课标》明确了选择性必修课程要和必修课程形成递进关系（教育部9）。选修课更侧重于学科大观念中利用语言知识和语言技能的系统构建，实现英语的应用目的这一方面，如《新课标》中将选修课主要设定为实用类和拓展类课程，实用类中的专门用途英语课程体现了语言的交际实用性；拓展类中的文学文化课程、演讲辩论课程体现了语言的思维和文化实用性。

同时，《新课标》对高中英语课程做了通过英语学习活动对六大要素进行整合的课程内容设定。六大要素包括主题语境、语篇类型、语言知识、文化知识、语言技能和学习策略。《新课标》明确指出，六要素整合的英语学习活动观，在课程内容上，就是在主题意义引领下，通过学习理解、应用实践、迁移创新等一系列体现综合性、关联性、实践性的英语学习活动，使学生基于已有的知识，依托不同类型的语篇，在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过程中，促进自身语言技能发展、文化内蕴理解、多元思维发展、价值取向判断和学习策略运用（13）。这一过程既是语言知识和语言技能整合发展的过程，也是思维品质、文化意识、学习能力不断提升的过程。六要素整合的英语学习活动很好地体现了英语学科的大观念，既强调了学科知识的系统整合，也强调了英语学习在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过程中的实际应用，同时还指明了知识和应用连接的现实途径——英语学习活动。

综上，英语学科大观念作为核心，统领《新课标》。《新课标》中的英语学科核心素养在课程本体层面体现了大观念，而《新课标》中的课程结构和课程内容部分则从课程开发和课程设计角度体现了学科大观念。下面我们将进一步结合高中英语课程实际，对高中英语大观念的建构路径进行分析。

五、高中英语学科大观念建构路径分析

既往高中英语学科大观念的建构路径研究认为，英语学科大观念主要通过设置主题语境的单元整体教学实现，因为基于主题语境的单元整体教学有利于实现知识的整合和应用。本研究认为，除了单元整体教学外，英语学科大观念的建构还有多种路径可以选择（见图2），



▲图2 高中英语学科大观念多元建构路径

下面将结合实例进行分析。

(一) 坚持语言知识、技能系统引导，增强语言元认知能力

上文已经明确，英语知识和英语技能的系统构建是学科大观念的基础，同时，学科知识的系统构建是认知的、心理的过程。因此，在高中英语学科教学实践中，坚持对英语知识和技能的系统引导，增强学生的元认知能力，是高中英语大观念建构的一条主要路径。

由于英语作为语言学科的特殊性，过去在英语知识和技能的教学中，往往强调简单识记和机械操练，造成英语教学费时低效。在大观念的引领下，教师可以通过对语言知识和语言技能的系统引导，帮助学生构建系统的学科知识。在语言知识层面，帮助学生构建语音、词法、语法、语篇的系统知识，解决学生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的难题，可以有效实现学习效率的提升。例如，在英语存在句语法知识教学中，存在句只能使用非定指的名词短语。存在句的非定指效应可以把占位主语 *there* 的虚指性和非定指名词短语的虚指性匹配起来加以解释，而非通过简单的语言规则，这样就无要求学生死记硬背。语言技能训练也是如此。比如，对应高考阅读七选五题型，不能只注重阅读文本的简单梳理，而应该从语篇全局层面略读文章抓大意，语篇局部层面分析空格上下句，以及标题结构、句子结构、词汇复现等层面加强阅读技能的系统训练，提升学生的阅读能力。另外，基于学科大观念的心理和认知属性，可以加强学生语言元认知能力的培养，这和高中英语《新课标》中学习策略要求的元认知策略存在内在契合。应该加强对学生的引导，指导学生在语言知识和语言技能的学习中，不断反思知识、技能的薄弱环节和方法、手段上的不足，以促进后续的改进提高。比如，可以鼓励学生通过自建电

子学习档案袋的方式，及时对自己的学习过程进行反思。

（二）坚持单元整体教学、适度多元推进，体现大观念的系统整合

既往研究指出，基于主题语境的单元整体教学是英语学科大观念建构的主要路径，因为其有利于语言知识、语言技能的整合，也有利于学习、思维能力和文化意识的提升，这里不再赘述。本研究认为，在坚持单元整体教学的基础上，学科大观念建构也可适度多元推进，体现大观念的系统整合观。

例如，在特定情境下，对单个语篇进行基于大观念的整合，也能有效建构学科大观念。以译林版九年级上册英语教材Unit 7中的“Hollywood’s all-time best—Audrey Hepburn”语篇为例，对该语篇进行基于学科大观念的教学整合，可以促进学科大观念的形成。在语言知识层面，该语篇反映个人职业生涯，能在词汇层面加强对身份、职业语汇的系统学习，如actress, humanitarian, work as, make her final appearance等；在句法层面能加强对反应简历叙事的过去、现在完成等时态的系统学习；在语篇层面能加强对时间线性推进手段，如in 1991, two years later等的学习，在语言技能层面可以加强对人物简历的复述性介绍等口语、书面语练习。这些手段的综合使用，可以体现知识和技能的系统性。在思维能力、文化意识提升的实用性方面，可以鼓励学生通过获取赫本的基本信息，梳理其早期生活、演艺生涯、晚年生活的成就和贡献，形成信息结构图；基于信息结构图，推理、论证all time best的不同境界层级，助力学生思维品质和文化意识的提升，以此实现学科大观念的建构。再比如，现在逐渐得到推广的读后续写教学模式，鼓励学生在对既有文本词汇、语法、语篇知识和阅读能力进行系统建构的基础上，加强写作能力培养。学生在读的过程中提升了学习能力，在写的过程中锻炼了思维能力，因此这种教学模式也是建构高中英语学科大观念的有效路径。

（三）坚持英语学习活动观，体现大观念的情境、实践、实用特征

《新课标》提出了指向学科核心素养发展、课程内容六要素整合的英语学习活动观，明确了活动是英语学习的基本形式，是学习者学习和尝试运用语言理解和表达意义，建构文化知识，发展思维品质，形成学习能力的主要途径（教育部62）。英语学习活动观取代了以往的“任务型教学法”。从活动的前提看，英语学习活动观是指学生在主题意义的引领下，以语篇为依托的活动；从活动的性质看，是通过学习理解、应用实践、迁移创新等促进语言、文化、思维融合发展的活动；从活动的方式看，是帮助学生做到以主动、合作、探究学习，灵活运用所学语言知识和听说读写看等语言技能及多种学习策略；从活动的内容看，主要包括获取文化知识，理解文化内涵，比较文化异同，吸取文化精华，发展逻辑思维、批判思维和创新思维，涵养内在精神；从活动的宗旨看，主要是指向知行合一，落实英语学科核心素养。

基于以上《新课标》对英语学习活动观的论述，本研究认为，坚持英语学习活动观，也是建构学科大观念的重要路径。同时，王蔷等国内学者也指出要以英语学习活动观这一指向

过程的大观念统领教学活动设计(王蕾、周密等 106)。英语学习活动很好地体现了英语学科大观念的情境性特征,学习活动的设计和展开,都要求在主题意义的引领之下,依托于语篇进行。同时,英语学习活动的本质,更好地体现了学科大观念中对语言知识和技能的实践要求,而从活动的方式、内容、宗旨看,则又很好地体现了大观念的实用性旨归。比如,高中英语阅读教学中,在读前的导入阶段,教师让学生预测课文内容、介绍背景知识;读中,让学生根据语篇内容描画思维导图;读后,让学生进行讨论、角色扮演、信息填充、纠错、读后写作等,都能够促进学生对语言知识和技能的系统掌握,也能提升学生英语的实际应用水平,因而能够对学科大观念的构建发挥积极作用。

大观念的提出使以往零散的教学整体化。既往高中英语学科大观念的概念辨析及建构路径研究形成了较多研究成果,但也存在如下不足:一是概念辨析缺乏跨学科视野,二是路径建构比较单一。基于上述问题,本研究通过梳理国内外研究对大观念的价值辨析与提炼,并融合不同学科对大观念的探讨,指出高中英语学科大观念是英语语言知识和技能基于心理的系统构建,同时要考察这种心理构建对思维和文化架构的建构意义,并提出多元建构路径。总之,高中英语学科大观念的建构能够焕发高中英语教学课堂新的活力,使得外语教学有新突破,引导教师走向工具性与育人性融合的高中英语学科育人体系。值得注意的是,高中英语学科大观念的理论和实践研究,是当下学科教学研究的一个热点和亮点,对其进行持续的探索,能够真正助力高中英语教学的实践。

引用文献 [Works Cited]

- Bianchini, J. A. "What's the Big Idea?" *Science and Children*, vol. 36, no. 2, 1998, pp. 40-43.
- Boxer, A. "Building a Curriculum towards Big Ideas." Science Teacher Website, 25 July 2022. thescienceteacher.co.uk/bigideas-in-the-curriculum/.
- Bruner, J. S. *The Process of Education*. Harvard UP, 1960.
- Chen, Zehang, et al. "The Teaching Design Principle, Idea and Method." *Teaching Monthly (Middle School Edition)*, no. 4, 2022, pp. 15-23. [陈则航等:《基于大观念的教学设计原则、思路与方法》,载《教学月刊·中学版(外语教学)》2022年第4期,第15-23页。]
- Clark, Edward T. *Designing and Implementing an Integrated Curriculum: A Student Centered Approach*. Holistic Education Press, 1997.
- College Board Website. "Human Geography: Course and Exam Description (Effective Fall 2020)." 25 Aug. 2016. apcentral.collegeboard.org/media/pdf/ap-human-geography-course-and-exam-description.pdf?course=ap-humangeography.
- Erickson, H. Lynn. *Stirring the Head, Heart, and Soul: Redefining Curriculum and Instruction*. 2nd ed. Corwin Press, 2001.
- Harlen, Wynne. *Principles and Big Ideas of Science Education*. Association of Science Teachers, 2010.
- Immanuel, Kant. *Critique of Pure Reason*. Translated by Xiaomang Deng, People's Publishing, 2004. [康德:《纯粹理性批判》,邓晓芒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 Li, Jinhui. "Return to The Essence of Education: On the Epitome of Respect Education." *Journal of Teaching and Management*, no. 18, 2017, pp. 1-4. [李金辉:《回归教育本质:论“尊重教育”的旨归》,载《教学与管理》2017年第18期,第1-4页。]

- Li, Weidong. "Big Idea and the Big Unit Design Under the Guidance of the Core Learning Tasks." *Language Planning*, no. 21, 2019, pp. 11-15. [李卫东:《大观念和核心学习任务统领下的大单元设计》,载《语文建设》2019年第21期,第11-15页。]
- Ministry of Education. *The Senior High School English Curriculum Standard* (2017 version, revised in 2020). People's Education Press, 2020. [教育部:《普通高中英语课程标准》(2017年版2020年修订)。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20。]
- Province of British Columbia Website. "Glossary of Curriculum Terms." 4 Sept. 2018. curriculum. gov. bc. ca/sites/curriculum. gov.bc. ca/files/pdf/supports/glossary . pdf.
- Smith, J., and M. Girod. "John Dewey and Psychologizing the Subject Matter: Big Ideas, Ambitious Teaching, and Teacher Education." *Teaching and Teacher Education*, vol. 19, no. 3, 2003, pp. 295-307.
- Su, Xiaobing. "The Conceptual Distinction and Route Construction of the Disciplinary Big Concept for High School Geography Course." *Curriculum, Teaching Material and Method*, vol. 42, no. 3, 2022, pp. 115-23. [苏小兵:《中学地理学科大观念的概念辨析及建构路径》,载《课程·教材·教法》2022年第42卷第3期,第115-23页。]
- Wang, Qiang, Mi Zhou, et al. "The Analyses of Teaching Design of English Course Based on Big Idea." *Curriculum, Teaching Material and Method*, vol. 40, no. 11, 2020, pp. 99-108. [王蔷、周密等:《基于大观念的英语学科教学设计探析》,载《课程·教材·教法》2020年第40卷第11期,第99-108页。]
- Wang, Qiang, Wanlei Sun, et al. "The Significance and Value of Big Idea to the Realization of Mentality Teaching Aim of English Courses." *Teaching Monthly (Middle School Edition)*, no. 4, 2022, pp. 3-14. [王蔷、孙万磊等:《大观念对英语学科落实育人导向课程目标的意义与价值》,载《教学月刊·中学版(外语教学)》2022年第4期,第3-14页。]
- Whitehead, A. N. *The Aims of Education and Other Essays*. Macmillan, 1929.
- Wiggins, G., and J. McTighe. *Understanding by Design* (Expanded 2nd edition). Association for Supervision and Curriculum Development, 2005.
- Wynne, Harlen. *Principles and Big Ideas of Science Education*. Translated by Jue Wei. Science Popularization Press, 2011. [哈伦:《科学教育的原则和大观念》,韦钰译。北京:科学普及出版社,2011。]

◇责任编辑:马妮娅

《外国语言与文化》征稿启事

由湖南师范大学主办的《外国语言与文化》是经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批准[新广出审(2016)5011号]的外语类学术期刊。本刊热切期盼得到社会各界的关心与支持,热忱欢迎广大外语教育工作者和研究者踊跃来稿。现就投稿事宜说明如下:

1. 本刊欢迎以下领域具有独到见解的理论性、实证性和综述性论文:语言与语言学研究、文学理论与批评、区域与国别文化研究、翻译理论与实践、外语教学与测评等,也欢迎介绍相关学科最新动态的新书评介、名家访谈等。
2. 研究性论文篇幅一般在8,000~12,000字左右,综述性文章8,000字以内,新书评介、名家访谈等一般为4,000字左右,特别优秀的稿件可适当放宽字数限制。
3. 为便于匿名审稿,请另页注明作者姓名、性别、出生年份、最后学位、职称、工作单位、通信地址、电话号码、E-mail地址等。投稿后3个月内若未接到稿件修改意见或录用通知,作者可自行处理。
4. 本刊不以任何形式收取版面费,优稿优酬。
5. 投稿网址:中国知网“腾云”期刊协同采编系统<http://wywh.cbpt.cnki.net>
6. 联系方式:电话0731-88873041,邮箱jflc@hunnu.edu.cn,公众号“外国语言与文化杂志”

FLC

书

评

开拓与创新：寻中西文论同筑之鉴，探世界文心共通之缘 ——评蒋洪新教授新作《T. S. 艾略特文学思想研究》

◎ 张龙海

内容提要：作为极具世界影响力的作家和文论家，T. S. 艾略特为世人留下了丰富的文学宝藏，也一直都是国内外文学研究的热点。《T. S. 艾略特文学思想研究》在选题方面不仅填补了国内尚无艾略特文学思想整体性研究的空白，而且有效克服了国外艾学研究中缺少中国视角的不足。它在内容整体性、发展历时性、理论实践结合性和论证严谨性上系统全面、客观辩证地分析了艾略特文学思想。在方法方面，它以其作者一以贯之的中国视角中西对读艾略特文学思想。该书“思接千载”“视通万里”，融合西方文学传统，打通中西经典对读，以寻中西文论同筑之鉴，以探世界文心共通之缘，为世界艾略特研究贡献中国视角和中国智慧。

关键词：T. S. 艾略特 文学思想研究 中西对读 中国智慧

中图分类号：I5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4366 (2023) 01-0148-09

作者单位：闽南师范大学，福建 漳州 363000

DOI：10.19967/j.cnki.flc.2023.01.014

Title: Pioneering and Innovating: Seeking Lessons from the Co-Construction of Chinese and Western Literary Theories, and Proving the Commonness of the World's Literary Minds: A Review on *Research on T. S. Eliot's Literary Thought* by Hongxin Jiang

Abstract: As an influential writer and literary critic throughout the world, T. S. Eliot has left a wealth of literary treasures and has always been a hot spot in literary research at home and abroad. *Research on T. S. Eliot's Literary Thought* not only fills the blank that there is no holistic research on Eliot's literary thought in China but also effectively overcomes the shortage of lacking Chinese perspective in Eliot's studies abroad. It systematically, comprehensively, objectively, and dialectically analyzes Eliot's literary thought from the aspects of content integrity, developmental diachronism, the combination of theory and practice, and rigor of argumentation. In terms of methods, it deals with Eliot's literary thought comparatively between China and the west from the consistent Chinese perspective of the author. The book connects ideas of more than one thousand years and sees scenes thousands of miles away. By combining the western literary tradition and opening up the comparative reading between Chinese and western classics, it aims to learn from the co-construction of Chinese and western literary theories, to prove the commonality of the world's literary minds, and to contribute China's perspective and China's wisdom to the world research on Eliot.

Keywords: T. S. Eliot, research on literary thought, comparative reading between Chinese and western classics, China's wisdom

Author: Longhai Zhang, Professor, Minnan Normal University, Zhangzhou, Fujian, China.

2022年12月,我收到湖南师范大学曾艳钰教授寄来的蒋洪新教授新作《T. S. 艾略特文学思想研究》,马上秉烛达旦。读着读着,我突然萌发一个念头:何不写篇书评呢?有了这个想法后,我由原来的泛读变成细读,就这样不知不觉地走进了洪新教授构建起来的艾略特文学思想研究这一宏大叙事空间。

T. S. 艾略特(T. S. Eliot)是英美文学史上极具世界影响力的诗人、剧作家和文学评论家,创作了大量的文学作品,构建了宏大的文学思想体系,为世人留下了丰富的文学宝藏,一直都是国内外文学研究的热点。因此,要在浩瀚的艾略特研究成果中异军突起,实非易事。然而,作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20世纪美国文学思想研究”的首席专家,洪新教授积极探究20世纪美国文学思想百年间的发展历程、现实语境、内涵特色和现实影响等,对艾略特文学思想展开立体式全方位研究,从选题、内容和方法上实现开拓创新,为世界艾略特研究贡献中国视角和中国智慧。

一

从选题上看,该著作聚焦艾略特文学思想,展开了立体化、全方位的深入研究,为国内外艾学研究提供新尝试。自从1923年艾略特这个名字首次进入中国学界(董洪川89),从早期的叶公超、赵萝蕤和卞之琳等学者,再到如今的冯至、梁宗岱、郑敏、王佐良、袁可嘉、杨周翰、陈嘉、周珏良、裘小龙和张子清等专家的翻译和研究,国内学界相关成果不断涌现,硕果累累。90年代中后期,张剑教授的《艾略特与英国浪漫主义传统》和蒋洪新教授的《走向〈四个四重奏〉——T. S. 艾略特的诗歌艺术研究》开启了艾略特研究专著出版的大门。紧接着,刘燕、董洪川、李俊清、陈庆勋、邓艳艳、江玉娇、陆建德、章晓宇、秦明利、赵晶、林季杉、周亭亭、李兆前、虞又铭、黄宗英等纷纷著书立说,从艾略特的文学创作、影响源头、哲学语境、文学批评和译文比较等视角加以分析,再加上200多篇相关学术期刊论文和11篇博士论文(根据知网查询,这11篇博士论文已有9篇经过修改完善,以专著形式出版),可谓规模宏大,精彩纷呈。尽管如此,对艾略特文学思想的整体研究尚需跟进。^[1]

跟国内相比,国外的艾略特研究不管是时间上还是规模上,都遥遥领先。国外研究呈现如下四个特点。首先,时间较早。早在1935年,文学评论家马西森(F. O. Matthiessen)就出版了《艾略特的成就:论诗歌的本质》(*The Achievement of T. S. Eliot: An Essay on the Nature of Poetry*)一书,这是早期艾略特研究中较为全面论述艾略特诗学的著作。其次,机构齐全。在美国,设有专门的艾略特研究会(T. S. Eliot Society),英国、日本和韩国均设有分会,哈佛大学、纽约公共图书馆均收藏艾略特手稿书信等档案;在英国,设有艾略特遗产管理学会(T. S. Eliot Estate)和艾略特基金会(T. S. Eliot Foundation);英美均设有“T. S. 艾略特诗歌奖”(T. S. Eliot Prize for Poetry)。第三,系统全面。国外艾略特研究系统全面,类型大致如下:(1)生平传记,它们为艾略特研究奠定了更为扎实的基础,如比较通用的阿克洛伊德(Peter Ackroyd)

的《艾略特的一生》(*T. S. Eliot: A Life*)等;(2)研究论文集,为该研究提供思想火花碰撞的平台,如20世纪末较权威的穆迪(A. David Moody)编的《T. S. 艾略特剑桥文学指南》(*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T. S. Eliot*)等;(3)文学批评研究,聚焦艾略特作品分析及其批评观点,比较有代表性的如洛布(Edward Lobb)的《T. S. 艾略特和浪漫主义批评传统》(*T. S. Eliot and the Romantic Critical Tradition*)等;(4)思想研究,涉及艾略特与基督教、印度教、神秘主义、反犹主义和政治意识形态等,如穆雷(Paul Murray)的《艾略特与神秘主义:〈四个四重奏〉秘史》(*T. S. Eliot and Mysticism: The Secret History of Four Quartets*),探寻艾略特神秘主义思想和诗歌灵感来源,分析其在《四个四重奏》(*Four Quartets*)中的运用和体现。^[2]第四,活动频繁。1980年至今,艾略特研究年会已召开了43届,艾略特国际暑期学校也已举办了十多届。纵观国外研究情况,我们欣喜地看到:研究内容持续扩大,研究队伍不断壮大,研究影响愈加深远。但是,这些研究都是基于西方视角,缺少中国视角的参与和互动。

该书在吸收国内外艾学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以“文学思想”为轴,整合“文学创作”“文学理论”与“文学批评”研究,从美学、哲学、政治、文化、宗教和道德层面来充分揭示博大的艾略特文学思想体系,填补了国内尚无艾略特文学思想整体性研究的空白。同时,该书充分利用作者雄厚的中文功底,运用中国传统诗学理论阐释艾略特文学思想,丰富了具有中国特色的艾略特研究,有效克服了世界艾学研究中缺少中国视角的不足,为世界艾略特学术研究共同体的形成添砖加瓦。

二

从内容上看,洪新教授积极开拓创新,以系统的思维全面分析艾略特文学思想,以发展的眼光客观评价艾略特文学思想。

第一,以系统的思维全面分析艾略特文学思想,首先体现在艾略特文学思想内容的整体性。作为20世纪西方新旧文化转型时期最具影响力的知识分子之一,艾略特不仅仅是诗人、剧作家,而且也是文学批评家。他的文学思想博大精深,引领着英美文学,乃至世界文学思潮的发展。因此,如何在研究过程中做到系统全面而又避免一概而论、深入细致而非蜻蜓点水是该书最为关键的问题。从篇章结构方面看,该书共分十章,另加绪论和结语。绪论部分阐释艾略特文学思想研究及其独特地位,为该研究拉开了序幕。第一章着重探讨艾略特的思想历程,为该研究做了铺垫;第二章分析艾略特传统观与文学思潮的变迁,开启了宏大叙事;第三章深入剖析艾略特文学思想的核心——非个性化理论;第四章剖释艾略特的诗歌语言观和诗学实践;第五章阐释艾略特的文学批评功用观;第六章通过艾略特与白璧德(Irving Babbitt)、马修·阿诺德(Matthew Arnold)的对话阐明文学与道德的关系;第七章剖判艾略特文学思想中的宗教色彩;第八章比较艾略特与庞德(Ezra Pound)的文学思想;第九章阐述艾略特与新批评派在文学理念上的异同;第十章阐释艾略特文学思想与中国文论之间的对话。结语部分简要梳理艾略特文

学思想与后来诗歌流派的关系。这些章节逻辑清晰, 层层递进, 形成了艾略特文学思想的整体观照。从研究维度方面看, 该书以艾略特文学思想为统摄, 整合吸纳了传统的“文学创作”“文学理论”与“文学批评”研究, 涵盖了文学活动的特点、风格、类型和理念等, 从美学、哲学、政治、文化、宗教和道德层面入手, 多路进发, 细微考辨, 全方位地解析艾略特文学思想的深度和广度, 充分揭示其丰富内涵。

其次, 体现在艾略特文学思想发展的历时性。艾略特文学思想的形成不是一蹴而就的, 而是经过他长期的认知和实践得来。“因此, 研究艾略特的思想和作品不能采用切片式或断层式的方法, 否则会有见木不见林的障目之感; 亦不能采用鸟瞰式的方法, 否则会有囫囵吞枣、以偏概全的危险; 而是要以‘致广大、尽精微’的思维和发展动态的眼光去明澈艾略特文学思想的脉络走向, 从而更好地理解和阐释其诗歌和批评理论”(蒋洪新 17)。该书根据孟子的“颂其诗, 读其书, 不知其人, 可乎?”的观点, 穷源溯流艾略特的生活轨迹, 深入探究了家庭、教育、婚姻、社会等不同语境因素对艾略特文学思想的影响, 重点阐述了白璧德、桑塔亚纳(George Santayana)、伯格森(Henri Bergson)、罗素(Bertrand Arthur William Russell)、布拉德利(F. H. Bradley)、庞德等人在不同阶段对艾略特的影响, 分析了其文学思想的源头、发展和特征。艾略特的文学思想是宗教、哲学、文学等多股力量综合影响的结果, 并且体现了当时欧美社会思潮和文学思潮的基本状况。这一思想又对后来诗歌流派, 特别是英美后现代诗学产生影响。因此, 这个成果上溯其思想之源流, 又下探其思想之流光, 形成了一个闭环的纵向研究脉络。

再次, 体现在艾略特文学思想理论实践的结合性。艾略特既是诗人, 也是理论家。他从自己的创作实践中不断进行思想探索, 将其升华为批评理论, 然后再将这些理论运用到自己的文学创作实践, 使理论和实践相得益彰。因此, 要做好艾略特文学思想研究, 就要注意把握其诗人与批评家的结合、实践与理论的结合, 即做好理论研究和文本阐释相结合。该书很好地做到了这一点。它通过对艾略特诗歌作品具体特征和美学价值的阐发, 明晰其文学思想与诗学实践互为支撑、相互观照的关系, 促进文学理论与具体文本的充分互释, 挖掘其文学思想的深刻内涵和革新意义。例如, 关于诗歌语言, 艾略特有独特的见解。他在《诗歌的三种声音》(“The Three Voices of Poetry”)中阐释诗歌叙事方式: 诗人的自言自语, 诗人对读者说话和诗中角色的对话(转引自蒋洪新 108)。这三种叙事方式通过日常生活语言完成。艾略特看到了日常生活语言所隐含的力量, 非常看重日常语言对诗歌创作的作用, 提出“诗不能过分偏离我们日常使用和听到的普通的日常语言[……]诗不能同人们彼此间交流所使用的不断变化的语言失去联系”(106)。他这样主张, 也这样实践。《荒原》(*The Waste Land*)中部分语言风格就是如此。“那是什么声音?”“是门下面的风。”“这会儿又是什么声音? 风在干什么?”“没有什么, 是没有什么。”(108-109)这种带有明显对话体叙事特征的诗行, 如果单独拿出来读, 很难看出是诗歌。然而, 艾略特就是在这样实践自己的理论。由此可见, 诗句就是由日常语言构成的。艾略特凭借自身无与伦比的文学才能, 在自己的文学创作过程中不断总结提炼文学理论, 从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 然后再将其运用到新的文学创作实践中, 得到补充发展, 从而实现新的飞跃。

这种阐释艾略特文学思想中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做法在书中比比皆是。

最后，体现在艾略特文学思想论证的严谨性。文学思想研究必须科学严谨，不仅需要阐释过程抽丝剥茧的严密科学，也需要论证过程旁征博引的翔实可信。该书在这方面做出了榜样。首先是论证的科学性。一方面，全书十个章节紧紧围绕艾略特文学思想展开，从十个方面进行细致深入分析（可详见本部分第一点“艾略特文学思想内容的整体性”）。这些章节既是相对独立的分析，又在逻辑上前后呼应，环环相扣，共同构成一个完整的体系。另一方面，每个章节的论述都是论点鲜明，分析透彻，论证流畅。这里仅以第三章“非个性化理论”为例。该章先简要阐明艾略特所处时代背景——精神分析理论兴起，读者的兴趣开始转向作者的创作心理——指出非个性化是直接对抗精神分析的有效手段。接着，从哲学角度阐发“非个性化理论”的哲学观念，从文学角度窥探这个理论产生的重要推力，通过文本对照、意义解析，分析了“客观对应物”的源流、内涵和功能等，比较了“客观对应物”与象征主义、意象派和中国诗学传统中的“克己”和“物化”。在此基础上指出，该理论是现代主义对浪漫主义的反思，凸显艺术自足性和审美自律，最大程度地降低诗人的存在度，而不是消解诗人。这种阐释有理有据，一环紧扣一环，有让人爱不释手之感。其次是论证的全面性。该书参考书约300本左右，提及的作家、批评家、哲学家和学者等多达292人（包括引用），直接引用的书目就有296本。这组数据令人惊叹：作者的博览群书、旁征博引为该书论证的翔实性打下坚实基础。

第二，该书的开拓创新体现在以发展的眼光客观评价艾略特文学思想。艾略特文学思想不是直线形发展的，而是经过艾略特“大量的回旋和反复”以及不断修正得来的。艾略特曾经因为别人引用他很久以前说过的话而大为光火。“经常有人引用我的话，可能是我三四十年前说的，却当作我昨天才说的，这让我很恼火”（转引自蒋洪新17）。艾略特的“恼火”折射出他可能因为学术观点前后不一致而显得尴尬的事实，因为“艾略特的文学思想是一种复杂的递嬗过程，在这个过程中，艾略特一贯的怀疑主义和不确定论使其不断地对各种源于宗教、哲学、文学的思潮力量进行汲取、扬弃、修正和融通”（17）。这说明，要以发展的眼光客观评价艾略特文学思想，才能从其前后不太一致的论述中窥探其思想发展轨迹。该成果成功地做到这一点。艾略特关于文学批评功能的理论就是一个不断发展变化、扬弃修正的例证。年轻的艾略特和晚年的艾略特所持的观点大不一样。他因早年在《传统与个人才能》（*Tradition and the Individual Talent*）中提出文学批评要“不注意诗人，而注意诗”而被当成新批评派的鼻祖。1945年，他在《诗的社会功能》（*The Social Function of Poetry*）中写道，“我认为如果诗——我指所有伟大的诗——在过去没有社会功能，那么在将来它可能也不会有”（转引自蒋洪新130）。此时的艾略特仍然坚持文学批评的文学性，认为诗歌评判的标准在于文学性，而不在于其社会功能，就像布鲁姆（Harold Bloom）坚持美学标准一样。而到了1961年，艾略特敏锐捕捉到文学批评的发展趋势，发现批评家、批评流派和文学受众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文学批评呈现跨界性特征。所以，他在《批评批评家》（*To Criticize the Critic*）中指出，“不可能把文学批评单独圈起来[……]孤立地单论文学特征，是一种幻想”（131）。同时，该书还专

门在第九章“艾略特与新批评”分析了艾略特的文学整体论、非个性化理论和批评风格对新批评的影响,指出晚年的艾略特将批评重点转向社会文化批评,逐渐淡化文学本体批评。诚然,艾略特在经历不同时代的洗礼之后,在不同时期关于文学批评理论的观点有所不同,甚至说是前后不一样。该书能引经据典,翔实地勾勒出这个理论的发展轨迹,将其客观地呈现在读者面前,让我们仿佛看到类似《典籍里的中国》中的虚拟现实画面,以鲜活的历史感再次感受艾略特的文学批评构建历程。

“非个性化理论”也是艾略特不断修正自己理论的一个明显例子。每个作家、批评家都具有鲜明的时代烙印。他这个理论的鲜明时代背景就是19世纪英国浪漫主义诗人高举表达自我、宣泄情感大旗最为热闹的时代,是现代主义呼之欲出的时代。当时年轻的艾略特提出这一理论,确实是引领时代潮流。但随着社会的发展进步,晚年的艾略特觉得,自己年轻时提出的“感性的脱节”和“客观对应物”这两个术语不知还能否站得住脚,并建议读者不要过于纠结某个术语。作者此时恰到好处的点评让人眼前一亮:“艾略特虽然对之前观点有所背离,底气也一再减弱,但不能作为攻击者的把柄。因为,用几十年后的眼光去评价之前的观点,本身就是语境的错位。艾略特想要传递给年轻人的是,不要过度地沉溺于术语的解读,用一成不变的标尺去衡量所有的学说。”(95)

艾略特反对别人一成不变地看待他的理论。他也同样以发展的眼光看待不同时代的理论。他在构建自己的文学批评体系过程中不断吸收借鉴前人的成就,从而使其更加包容和开放。那么,如何对待前人的成就呢?或者说,以什么样的立场和视角看待前人的观点呢?艾略特这样说道:“评判过往时代的任何批评家的判断,都要回到他所处的时代背景,竭力站在他的时间上看问题。”(转引自蒋洪新 134)确实,作家、批评家身上具有鲜明的时代烙印,这就决定了每个理论都具有鲜明的时代性。因此,要以发展的、客观的态度对待前人的理论成果。这就像习近平总书记所提的“两个不能否定”:不能用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也不能用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

三

从方法上看,洪新教授大胆尝试、认真求证,以我国传统诗学理论剖析艾略特文学思想,为外国文学研究探索出一条中西对读新路径。不同于庞德,艾略特对中国和中国文学无甚了解。尽管他曾写信给瑞恰兹(I. A. Richards),表示他对中国“十分感兴趣”,但他在《荒原》中的六种创作语言却没有中文;他的诗作中唯一提及中国之处是在《四个四重奏》中用中国花瓶暗指语言的静动辩证关系。因此,要从中西比较来对读艾略特文学思想难度极大。然而,“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洪新教授十分睿智地做到了。他不仅将艾略特文学思想系统科学、发展全面地置于整个西方文学思潮体系中进行考察,而且还将其放在中西文学互动的宏阔框架中,以个体比较、中西对话的方式,在横向并置的研究空间对读艾略特文学思想,在形成

更为立体的视角的同时发出中国声音、投射中国智慧。

首先,要想更好理解《T. S. 艾略特文学思想研究》,很有必要先了解洪新教授前期主要学术成就中一以贯之的中国视角。洪新教授一直从中国视角出发,以深厚的中西文学修养,将中国学术话语权建构贯穿于他的美国文学研究全过程,致力于建构具有中国特色的美国文学研究话语体系。1998年,他的处女作《走向〈四个四重奏〉——T. S. 艾略特诗歌艺术研究》结合艾略特的家庭、社会、历史等背景,探析了艾略特的宗教信仰演变对其诗歌理论的影响,并从学术渊源、文化意识上全面考察了以《情歌》(*The Love Song of J. Alfred Prufrock*)为代表的早期创作,中期的《荒原》,以及晚期的《四个四重奏》等作品。他专门将“远游的诗神:艾略特与中国”单独成章,着重介绍了“艾学”在中国的发展情况,以及国内“艾学”研究的逐步繁荣。他以新诗歌运动为切入点,深入探讨了艾略特对中国诗歌艺术产生的深远影响,并以卞之琳和穆旦的诗作为例,重点分析了“艾学”对两位中国诗人新诗创作的影响,具有鲜明的中国视角。基于庞德与艾略特密不可分、相辅相成的文学批评关系,随着对艾略特研究的逐步深入,洪新教授转向了艾略特和庞德两位诗人的诗学理论和文化批评研究,于2001年4月出版《英诗新方向——庞德、艾略特诗学理论与文化批评研究》,着重分析了艾略特的象征主义诗学理论和庞德的意象主义诗学理论,探究了两人的诗学理论、政治主张、宗教信仰和文化批评的思想渊源,并在第二章“庞德与中国”中,梳理了庞德与中国的因缘关系,重点探讨了中国古典诗歌对以庞德为首的西方现代诗人乃至整个英美新诗运动产生的不可估量的影响,凸显中国文学对世界文学的贡献。随后,洪新教授十年磨一剑,于2014年出版了《庞德研究》,将抽象的庞德理论研究融入对其具体作品、社会历史背景和个人经历的分析解读中,从庞德浩瀚的诗作和论文中进行精选,将最能体现其艺术风格的诗作进行翻译和分析,总结了庞德的文学理论和文艺思想,并在最后一章中延用了“庞德与中国”这一章节的内容,补充了庞德与中国的情缘以及东西方诗学的相互借鉴、影响,将我国对庞德的研究推至新高度。紧接着,笔耕不辍的洪新教授与郑燕虹教授联袂在2014年12月再出新作《庞德学术史研究》,从学术史的角度对庞德的文学观进行再梳理,详细整理了庞德作为诗人、评论家、译作家的学术史,并回顾了学术界对庞德的诸多学术评论,使关于庞德的学术发展呈现出完整清晰的脉络结构,并一以贯之地将“中国的庞德研究”和“庞德对儒家经典的翻译”等章节融入该书,围绕庞德对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的痴迷、庞德数目繁多的对中国诗歌和经典的译注、庞德诗歌理论中众多的中国元素,以及由此引发的西方读者对中国的兴趣等进行挖掘,并指出中国学者在庞德研究中的先天优势和独特视角。^[3]洪新教授的这些研究尽显中国学者的独立创新观念与责任担当意识,为更加全面对读艾略特文学思想打下坚实基础。

其次,该书从始至终都将艾略特文学思想与我国的相关经典论著进行对比,从比较研究的角度对艾略特这一经典文学家进行创新性的研究。这里略举一二,加以阐明。绪论部分在概述文学思想时嵌入我国文学思想的内涵和六个时期的文学思想简况。第一章谈及“客观对应物”时将其与中国的“比兴”手法进行类比,并在结尾处引用苏东坡行云流水的文章境界

来评价艾略特深厚的文学积淀和境界。第二章阐述艾略特之所以能够奠定现代主义基石是因为他深刻认识、继承西方文学传统, 形成“传统与现代融合的思想综合体”(蒋洪新 58), 指出这种传统观与中国古代文论家刘勰的观点相似。第三章辨析非个性化理论中如何隐蔽和舍弃个人情感时, 将其与中国诗学传统中的“克己”“物化”和“比”进行详细对比。第四章在探析艾略特如何划分重要诗人和次要诗人时指出, 这与中国古代文学批评家钟嵘的评判做法类似。第五章在阐明文学批评发展历程时引用《文心雕龙》加以佐证。凡此种种, 不仅提升论证的说服力, 而且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艾略特文学思想。

最后, 该书专辟一章“艾略特文学思想与中国文论的对读”, 从跨文化视角构建艾略特文学思想与中国文论之间的对话互动关系。该章从艾略特与叶公超、赵萝蕤、吴宓、钱钟书及卞之琳等中国学者之间的交流入手, 揭示了艾略特对中国现代诗派的影响, 引经据典地以中国诗学理论中的“通变”思想阐发艾略特关于传统与革新、经典与批评、情感与表达的辩证关系的看法。接下来, 从《文心雕龙》的由“道”至“心”再至“文”的视角详细剖析艾略特诗学批评文章《但丁》(“Dante”)中关于批评过程的三个阶段: 从“心灵感受”出发, 发展到“熔铸历史与现实”, 最后升华至“熔铸自我与文本”。紧接着, 分别用我国诗学理论“虚静说”和“象外之境”阐释“非个性化理论”和“客观对应物”等。这种鞭辟入里的中西对读展现了艾略特在文学思想的各个层面与中国文论不约而同的相似性, 表明了不同社会和时代语境下的文化思想共鸣现象, 昭示了中西两个宏大批评体系中的跨文化适用特征, 有力印证了习近平总书记的“文明因交流而多彩, 文明因互鉴而丰富”的重要论断, 为我国的外国文学研究提供了新范式。

这种中西对读的创意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和社会意义。第一, 它有助于读者更好地理解艾略特文学思想。从内容方面看, 艾略特文学思想确实融古通今、经天纬地, 内涵十分丰富。从形式方面看, 由于艾略特认为经典的成熟标志之一就是复杂的句式结构, 这就使得他的创作显得晦涩难懂, 让人望而却步。面对这种较为陌生的理论, 如果辅之以某种较为熟悉的理论作为参照物, 问题就能迎刃而解。书中运用我们比较熟悉的中国传统文论阐发我们比较陌生的艾略特文学批评就是一个例证。艾略特关于传统与革新、经典与批评、情感与表达的辩证关系的观点让读者有点雾里看花的感觉。然而, 该书通过中国诗学中“通变”思想对此加以阐释, 马上让人眼前一亮。“艾略特诗歌中的‘故实(神话与历史)’与‘新声’(时代性的情感和主题), 在文本内外互为凭凭, 显现着理解和阐释的巨大空间”(蒋洪新 228)。“实际上《文心雕龙》指出了由‘道’至‘心’, 由‘心’至‘文’的三个基本要素, 这与艾略特对经典的定义所强调的‘心智’‘情感’‘诗学形式’这三个要素是相对应的”(230)。这种阐释方式由中及外, 由易及难, 从熟悉到陌生, 能很好地帮助中国读者进一步了解认识艾略特复杂的诗学体系。第二, 这有助于在国际学术舞台弘扬中国文化。该书中的中国视角不仅有利于中国读者更好地认识艾略特文学思想, 而且还能帮助外国读者进一步了解中国和中国文化。该书在分析艾略特文学思想的过程中, 植入中国视角和中国诗学传统, 不仅可以进一步促进世界艾略特学术研究共同体的形成, 而且还能悄无声息地推动中国诗学传统“走出去”。特别是,

该书将来如若入选“中华学术外译项目”，必将引发越来越多的外国读者像当年的艾略特一样对“关于中国研究的任何结果都十分感兴趣”（蒋洪新 103）。

“一编在手君无怪，曾典蓬山四库书”。手中一本好书足可化解无尽工作压力、消除诸多学术盲点。洪新教授的《T. S. 艾略特文学思想研究》“思接千载”“视通万里”。它不仅融合西方文学传统，系统深入研究艾略特博大精深的文学思想，而且打通中西经典对读，用中国传统诗学理论阐释艾略特文学思想，以寻中西文论同筑之鉴，以探世界文心共通之缘，从而在国际学术舞台上发出中国学者声音，构建世界艾学研究中的中国学术话语权，为我国的外国文学研究再添新佳作，为世界艾学研究再作新贡献。

（致谢：本文的完成得益于湖南师范大学曾艳钰教授寄来蒋洪新教授这本新作和我的博士生王赟与牛培帮忙查阅相关文献研究资料。特此致谢。）

注释 [Notes]

- [1] 参见张剑：《T. S. 艾略特：诗歌和戏剧的解读》。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6；蒋洪新：《走向〈四个四重奏〉——T. S. 艾略特诗歌艺术研究》。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98；陆建德：《破碎思想体系的残编：英美文学与思想史论稿》。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陈庆勋：《艾略特诗歌隐喻研究》。上海：上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林季杉：《T. S. 艾略特基督教思想研究》。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7。
- [2] 参见F. O. Matthiessen, *The Achievement of T. S. Eliot: An Essay on the Nature of Poetry*. Houghton Mifflin, 1935; Peter Ackroyd, *T. S. Eliot: A Life*. Simon and Schuster, 1985; A. David Moody, *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T. S. Eliot*. Cambridge UP, 1994; Edward Lobb, *T. S. Eliot and the Romantic Critical Tradition*. Routledge, 1981; Paul Murray, *T. S. Eliot and Mysticism: The Secret History of Four Quartets*. Palgrave Macmillan, 1991.
- [3] 参见蒋洪新：《英诗新方向——庞德、艾略特诗学理论与文化批评研究》。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2001；蒋洪新：《庞德研究》。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14；蒋洪新、郑燕虹：《庞德学术史研究》。南京：译林出版社，2014。

引用文献 [Works Cited]

- Dong, Hongchuan. *The Wind of "The Waste Land": T. S. Eliot in China*. Peking UP, 2004. [董洪川：《“荒原之风”：T.S. Eliot 在中国》。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
- Jiang, Hongxin. *Research on T. S. Eliot's Literary Thought*. People's Literature Publishing, 2022. [蒋洪新：《T.S. 艾略特文学思想研究》。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22。]
- Jiang, Hongxin, and Yanhong Zheng. "On Pound's Affection with China and Pound's Research by Chinese Scholars: A Study of the History of Ezra Pound Studies." *Soochow Academic*, no. 3, 2011, pp. 122-34. [蒋洪新、郑燕虹：《庞德与中国的情缘以及华人学者的庞德研究——〈庞德学术史研究〉》，载《东吴学术》2011年第3期，第122-34页。]

◇责任编辑：吴晋先